

凤凰文库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CAMBRIDGE

刘东主编



THEORISING CHINESE MASCULINITY

# 男性特质论

中国的社会与性别

*Society and Gender in China*

〔澳〕雷金庆 著  
〔澳〕刘婷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ww.cambridge.org](http://www.cambridge.org)

ISBN 978-7-214-08385-2



9 787214 083852 >

定价: 27.00 元

上架建议: 中国文学、中国历史



凤凰文库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刘东主编

THEORISING CHINESE MASCULINITY

# 男性特质论

中国的社会与性别

*Society and Gender in China*

〔澳〕雷金庆 著  
〔澳〕刘婷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男性特质论:中国的社会与性别/[澳]雷金庆著;  
刘婷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6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ISBN 978-7-214-08385-2

I. ①男… II. ①雷…②刘… III. ①男性—社会角  
色—研究—中国 IV. ①C9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25357号

*Theorising Chinese Masculinity (Society and Gender in China)* [1<sup>st</sup>]

ISBN: 9780521119047 by Kam Louie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2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此版本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不得出口。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11-218

书 名 男性特质论——中国的社会与性别

---

著 者	[澳]雷金庆
译 者	[澳]刘 婷
责任编辑	戴宁宁
装帧设计	陈  契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a href="http://www.ppm.cn">http://www.ppm.cn</a>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a href="http://www.book-wind.com">http://www.book-wind.com</a> <a href="http://jsrmcbs.tmall.com">http://jsrmcbs.tmall.com</a>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毫米×1304毫米 1/32
印 张	9.25 插页4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8385-2
定 价	27.00元

---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 译者的话

《男性特质论——中国的社会与性别》一书，是澳大利亚著名华裔学者雷金庆(Kam Louie)教授的名著。此书是一部有关中国男性研究的开创性专著，迄今仍是这一领域为数不多的重要著作之一。作为中国性别研究的必读参考书，这本书在西方一版再版，颇受欢迎。把这部著作译成中文，相信对中西比较文学以及跨文化研究感兴趣的读者都能有所获益。对那些期望在全球化浪潮中更好地了解自身的男性和了解异性的女性，读来也会颇多启迪。此次出版的中译本根据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英文本第一版翻译。和原版相比，中译本新增了一篇作者序言，回顾此书首版迄今十年来中国男性与世界加速碰撞的历程。

对这部著作原题中主题词 Masculinity 的翻译，我曾颇费踌躇。许多学者曾在不同作品中将 Masculinity 译为“男子气概”、“男性气质”、“阳刚之气”等，不一而足。但就原著所要表达的“文武”观念之于中国男性的特殊性而言，似乎都未尽其意。况且，英文中男性的 Masculinity 和女性的 Femininity 是对等的概念。思量再三，我将之译为“男性特质”，以体现其在“文武”框架中的特殊性及在性别框架



中与 Femininity 的对等性。

雷金庆教授自 2005 年起在香港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他于幼时移民澳大利亚，一方面对多元文化的对撞、融合有着深刻了解，另一方面对中国思想文化也有着丰厚的学养和精湛的研究成果。他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后于悉尼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先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南京大学、奥克兰大学(新西兰)和默多克大学(澳大利亚)，并曾任昆士兰大学(澳大利亚)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研究首席教授和中文系系主任。他是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在加盟香港大学前，他还曾是澳大利亚政府最高文化咨询机构——澳中理事会理事。雷金庆教授在学术上兴趣广泛，其研究涉猎中国文学、文化、语言、哲学和历史等多个领域，主要著作有：《当代中国儒学批判》(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继承传统：解读中国的古典哲学家 1949—1966》(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事实与虚构之间：〈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文学与社会〉论文集》(野芍药出版社 1989 年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杜博妮合著，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政治》(与霍奇合著，路特里奇出版社 1998 年版)等；编著有：《剑桥文化指南：现代中国文化》(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张爱玲：浪漫语言、文化与类型》(香港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等。

作为一部跨文化研究的专著，这本书以独特的视角对许多传统与当代文本进行了重读与诠释，打破了以往西方对中国男性特质从阴阳出发的逼仄理解。书中对近年海外汉学研究的大量成果也广有涉猎。此书所分析的文本从《三国》、《西厢》到成龙、周润发的电影，不光时间跨度很大，更涵盖了文化思潮、经典文学、民间话本和电影作品等诸多体裁。除了本土化的社会建构分析外，作者还借鉴了西方的符号学和精神分析理论。因此，无论是西方读者还是中国读者，很多时候都可能觉得这本书是一部“颠覆”之作，在很大程度上刷新了读者既有的阅读体会。有时，这种颠覆性的诠释显得有些过于偏离

我们的解读经验。但综观全书，作者所发掘出的众多文本的潜在意义足以令囿于单一本土文化角度的读者别开思绪、兴味盎然。

在雷金庆教授加入香港大学前，我有幸投于门下，蒙恩师指导博士课题。在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文系助教时，为了给学生准备性别研究课程，我曾通读此书。博士论文中更借鉴过其中的一些观点。不过，我从未想过自己能有幸成为把这本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人。其中缘起颇为偶然。在雷教授前往执掌港大文学院之后，对我们这些留在国立大学的后辈仍关心备至，再三叮嘱我们经过香港时一定要过门而入，去他家里盘桓几日。一次在电话中问起老师近况，雷教授偶然提及江苏人民出版社有意把这本书引入内地出版，他正在寻找合适的翻译。不知从何而来的勇气，当时我毛遂自荐，不想老师竟一口答应。现在回想起来，对老师无条件的信任真的非常感激。正是这种信任让我在日后的翻译工作中，以自己所学尽力忠实流畅地反映原著的意思与风格。

翻译这本书，对我而言，是一个艰苦而又新奇的历程。尽管我是中文科班出身，博士研究对性别理论和当代中国的性别现状也多有论及。但在翻译此书时，仍时常觉得是个挑战。雷金庆教授写作此书时，广征博引，处处跳跃着对中国文化的独到理解。尽管译者在难点处反复推敲，自觉尽力，但不妥不达之处仍在所难免，只有敬乞读者赐正。

本书的翻译、校改历经两年。在此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帮助。雷金庆教授不但时时予以鼓励，还认真解答了我的许多问题。杨露最后对全书译文进行了统校，查证了不少我在澳大利亚难以确认的资料来源，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卜元和吕乐千仔细阅读了部分译文，他们中肯的意见也使译文更为通畅。我谨在此深表谢意。

刘 婷

2012年2月于阿德莱德

## 中文版序

本书在中国男性特质的特定层面上对“文武”的概念进行了探讨，同时也对这一理想随时间而变迁的历程做了纵向审视。“文武”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建构这一理想的历史背景。同样的，我对这一建构的阐释自然也无法摆脱我本身所处的社会环境。《男性特质论——中国的社会与性别》的英文版于十年前由剑桥大学出版社首次在西方出版。这次中文版印行前几年，我也再次回到了中国这个大环境中——重归香港工作、生活，因而更易于观察“文武”在中国背景下运行的具象和底里。不过，今天的香港虽然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却又和中国内地其他城乡各处大相径庭。它可能是中国文化圈中西化程度最甚的地方。令人吊诡的是，它同时又保存着中国文化中一些极为传统的因子。对本书最后一章中所讲到的关于中国男性特质全球化的双向历程，我体会尤深。在香港的每一天，我都对之耳闻目睹、心有戚戚。

在本书原版问世后的十年间，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流互动大为增强，影响波及广泛，所到之处，如浪潮席卷。中国自身所经历的变化尤其惊人，很多时候甚至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伴随着这种巨变，西方世界对中国男性特质的感知也大为扭转。对我而言，对这一转变最

神奇的展现莫过于众多西方时尚专营店也开始讨论中国男性特质的崛起。而我个人最感兴趣的,则是连《Elle》这样的时尚女性杂志也开始刊登有关中国男性的文章,甚至还专程向我咨询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在时尚、雅致的年轻女性的世界里,中国男性如今被郑重其事地视为性感而又“具有男子气概”的对象。当年在写作这本书时,我还觉得这仅仅是一个令人惊异的、“起于青萍之末”的趋向。没有料到,这些变化是如此迅猛,趋向已转而化为了现实。

当然,说中国男性特质正在“崛起”应属用词失当。细究起来,这种表达的背后也许是那些自认为被当作“劣等男人”对待的中国男性对自身价值的维护,也可能是一些感受到中国软实力威胁的外国男性恐慌的体现。但这两种立场表现出的都只是负面情绪的释放,也并不准确。事实的真相其实较这种表达更为恰切,也更显和谐。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东亚在经济上的表现极为出众。中国正与日本、韩国一起在世界经济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紧随贸易而至的,还有文化上的交流。因此,毋庸置疑,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产品都进入了对方的视野之中。

政治领袖和影像制造者们从传统美德中获得灵感的一致努力,以及他们令世界相信“中国特色”不仅至关重要且值得褒扬的尝试,使这一点尤显真实。对孔子的宣扬就是其中最醒目的例子。不仅儒家价值观在中国卷土重来,通过遍布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孔子的形象和哲学思想也隐然得到了传播。对孔子着意复兴的现象,本书在相关章节中已有所探讨。但是,十年前的我并没有料到,以扮演动作英雄而闻名的影星周润发,会在一部受到广泛关注的影片中演绎“阳刚”的孔子形象。他所扮演的“孔子”文武双全,对男女两性都深具吸引力。传统象征的回归和所谓的“男性美德”已渗透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新术语的创造。无论海内外,用“小皇帝”、“王子”来形容那些被宠坏了的中国孩子或精英男性的描述俯拾皆是。这表明,帝国时期的意识形态结构离当代人的生活表象并不遥远。

毋庸讳言,在中国历史上,不同阶级都曾试图以不同的方式获取政治利益。但就男性特质而言,在过去,“文”、“武”借以争夺权力与影响力的思想互动并不鲜见。这些相互作用往往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不期而至。比如,在蒙古人入主中原时,“武”的男性特质——肌肉更发达的一方就占据了上风。而更为稳定的时代则需要文官们来提供庞大官僚机构所需的人力资源。如今的情况又有不同。在现代性的要求下,男性要掌握新的技能,他们的外表也应时而变。随着日韩流行乐队在娱乐圈的声名鹊起,这些精心打造出来的青年男子不但受到了万千中国人的追捧,在世界各地的亚裔群落中也颇受青睐。儒雅、整洁的男子逐渐成为东亚年轻男性模仿的对象。这种用化妆品打造男性外表的流行趋势必将向世界其他文化扩散。比如,西方的男性模特看起来就越来越需要雄性激素,极少有人像绿巨人似的肌肉纠结。

这种变化也是国际领域中正在发生的社会经济转变所带来的结果。东亚地区各国在最近几十年中经济先后崛起,这在东西方不约而同引发了大讨论。为了摆脱西方经济低迷不振的影响,亚洲价值观、儒家价值观,甚或中国特色都被拿来当成驱动经济增长的可能答案。就像我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提到的,中国在国际领域中日渐增长的文化、经济的参与和影响,意味着中国人观念中的男性特质也正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生根开花。不断变化的物质环境最终将对“文武”这样的思想建构产生持续不辍的影响,但这些建构本身将会在传承中保留下来。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建构已被证明是使人类关系井然有序的强大工具,无论这关系存在于男人之间,还是国家之间。

就这一点而论,我相信,尽管这本书写成于十年之前,它的基本前提依然真实无误。不过,我最初写作针对的目标群体是讲英语的西方读者。我假定那些读者对西方的男性特质熟稔于心,因此,我当时的主要目的是对中国人观念中的男性特质作出分析。事实上,上个世纪,在好莱坞和其他欧美的软实力组织的帮助下,西方的意识观念已在世界上占

据了主导地位。由于中国正在以十分严肃的方式加入世界博弈,这本书在西方读者中引发了巨大的兴趣。我希望这本书在中国出版后,也能成为中国读者关注的一个焦点。

当然,就一本针对西方学者的、有关中国观念的英文著作而言,要想引起中国读者的阅读兴趣与严肃思考,它的中文译本就不只需要准确,还需要雅致。就本书的翻译而言,我找不到比刘婷更好的译者了。刘婷本身也是一位学者。她在翻译本书中所做的工作超出了任何一个原作者的预期。她不但出色地完成了翻译任务,而且,她审慎的学术态度及其在这一研究领域的专业素养,都意味着她能够自如地解释我的学术观点、遵循我的逻辑论证。我对她和帮助检查译文的杨露非常感激。我谨借此机会感谢李木兰、方小平、戴宁宁和香港大学文学院中西研究计划基金,是他们使本书中文本在中国的出版成为了可能。

雷金庆

2012年2月于香港



## 致 谢

在完成这本书的十年间,我得到了众多研究机构和个人的热忱帮助。昆士兰大学、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和中国台北的汉学研究中心为我提供了资金和机构支持。昆大幼儿园、雷恩沃思小学和布里斯班州立中学在照料孩子们上帮了大忙,我才得以把宝贵的时间和宁静的内心用在了研究上。牛津大学出版社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和辅助使我受益匪浅,卡拉·泰尼斯(Carla Taines)一丝不苟的编辑工作大大提高了本书的文字质量。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同事和朋友,感谢他们用心倾听我对一个中国男人意味着什么的理解,并悉心予以评论。我要特别感谢马克·麦克莱兰(Mark McLelland)、刘振辉(Morris Low)、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张钊贻、彼得·克莱尔(Peter Cryle)、钟雪萍、包苏珊(Susan Brownell)、李金玉、宋耕、陈顺妍(Mabel Lee)、白杰明(Geremie Barmé)、马克梦(Keith McMahan)、马兰安(Anne McLaren)、邝喜鸾(Helen Fong)、陈卡罗(Carole Tan)、卡尔·海因兹(Carl Hinze)、艾伦·卢克(Allan Luke)、丽萨·奥康内尔(Lisa O'Connell)、鲍伯·霍奇(Bob Hodge)、陈平、胡敏娜(Mary Farquhar)、吕黄惠慧(Wai Wai Lui)、高斯林(Andrew Gosling)、艾伦·沃克(Alan Walker)、雷·吉特森(Ray

Kitson)和牛津大学出版社以及下面罗列的一些出版物的读者,是他们无私地向我提供了帮助、资料和建议。一如往常,对我妻子李木兰(Louise Edwards),我亏欠良多,实在无法用言语表达。她不但合写了本书第一章的一部分,还对整部书稿提出了深刻的批评意见。对男人或女人的分析,如若不参照对异性的研究,就不可能完整;李木兰对女性所做的研究是这个关于男性的研究项目不断获得灵感的源泉。

本书部分章节的初稿曾发表于下列出版物:第一章:《中国男性特质:文武论》(“Chinese Masculinity: Theorizing *Wen* and *Wu*”)(与李木兰合著),载《东亚历史》(*East Asian History*),1994年第4期;第二章:《中国文化中的性、男性特质与政治》(“Sexuality, Masculinity and Politics in Chinese Culture”),载《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1999年第33期(4),剑桥大学出版社;第三章:《圣人、先师、商人:作为男性典范的孔子》(“Sage, Teacher, Businessman: Confucius as a Male Model”),载华世平编:《中国的政治文化》(*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M. E. Sharpe 出版社2001年版;第五章:《硬汉阉人》(“The Macho Eunuch”),载《现代中国》(*Modern China*),1991年第2期(17),赛奇出版社;第七章:《为现代世界构建中国男性特质》(“Constructing Chinese Masculinity for the Modern World”),载《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2000年第164期,牛津大学出版社;和《我娶了个外国人:在澳大利亚恢复中国男性特质》(“I Married a Foreigner: Recovering Chinese Masculinity in Australia”),载奥门森(Wenche Ommundsen)编:《杂种月亮:澳大利亚华裔作品评论集》(*Bastard Moon: Essays on Chinese-Australian Writing*),《他乡》特刊(*Special Issue of Otherland*),2001年第7期。为追踪和获得版权许可,我已尽了最大努力。对那些我没能联系上的版权所有人,如能致函,我将感激不尽。

2002年于布里斯班



# 目 录

- 译者的话 1
- 中文版序 1
- 致谢 1
- 第一章 “文武”导论:中国男性特质定义发轫 1
- 第二章 战神关羽:性、政治与“武”的男性特质 32
- 第三章 圣人、先师、商人:“文”之象征孔子的变迁 61
- 第四章 旧式文人和当代知识分子:“文”的男性特质在过去与现在的代表 82
- 第五章 劳动阶级的英雄:传统与后毛泽东时代小说中“武”的形象 110
- 第六章 女性的声音:20世纪“女性的男性”理想 136
- 第七章 老舍的《二马》与外国妻子:为现代世界构建“文”的男性特质 166
- 第八章 李小龙、成龙和周润发:国际化的“武”的男性特质 197
- 第九章 重建“文武”:中国男性特质的杂糅与国际化 226
- 参考文献 233

# 第一章 “文武”导论：中国男性特质定义发轫



汉字“文”、“武”(雷金庆书)



进入 21 世纪之后,种族和性别作为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的基本分析范畴已经鲜有争议了。声势浩大的社会政治运动,如二战后在美国兴起的公民权利运动以及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运动,都凸显了基于肤色的不公正是多么普遍的现象。与之相似的是,女权运动提高了与性别不平等有关的公众意识。女性主义研究与后殖民主义研究在方法论上相辅相成,使得“女性”与“本土”这两个范畴所享有的关注与时下炙手可热的“他者”概念旗鼓相当。<sup>①</sup> 显而易见,如果以性别为工具来审视“本土民众”,中国研究将获得更多的洞见和新知。自 1980 年代以来,已有不少关于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的著作面世。<sup>②</sup> 然而,尽管中国的性别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学术关注,其中却仍然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空白——男性特质研究。事实上,由于对男性特质缺乏关注,性别研究已成了女性研究的代名词。<sup>③</sup>

直到 1970 年代早期,西方的性别研究也同样被等同于女性研究。但从 1980 年代开始,关于男性和男性特质的文献呈指数级增长。尽管世界各国的历史(history)所记录的几乎都是“他的故事(his-story)”,但将“他”问题化、将男性特质作为文化建构而进行理论化却不过是近 20 多年来的

① 曲明函(Trinh T. Minh-ha)著作的书名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曲明函:《女性、本土、他者》(*Woman, Native, Other*),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② 参见柯临清(Christina K. Gilmartin)、贺萧(Gail Hershatter)、罗丽莎(Lisa Rofel)和怀特(Tyrene White)等编:《性别化中国:女人、文化、国家》(*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哈佛大学出版社,1994 年;斯黛西(Judith Stacey):《中国的父权制与社会主义革命》(*Patriarchy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加州大学出版社,1983 年;李木兰(Louise Edwards):《中国女性:对大性别叙事的新挑战》(“Wome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challenges to the Grand Gender Narrative”),见李木兰、若塞斯(Mina Roces)等编:《亚洲女性:传统、现代与全球化》(*Women in Asia: Tradition, Modernity and Globalisation*),密歇根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9—82 页。

③ 在对近期中国性别与性研究发表的颇具启发性的评论中,姜克维(William Jankowiak)指出,对女性排他性的关注不幸导致了人们对社会阶级在生活形成中作用的忽略,对情感纽带重要性的轻视,以及对情欲完整理解的失败。姜克维:《中国女性、社会性别和性:对最近研究的批判性评价》(“Chinese Women, Gender, and Sexuality: A Critical Review of Recent Studies”),载《关心亚洲学者通报》(*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第 31 卷第 1 期(1999 年),第 31—37 页。

事儿。虽然对男性特质问题诸多方面的探讨已有所进展,但在其基本特征方面,仍然没有一个综合性的理论体系可以提供普适性的界定。在对男性特质的一项重要的跨文化研究中,吉尔莫(David Gilmore)发掘出一组核心的男性特质属性,诸如自主性、纪律性等等。它们似乎具有某种普适性。但是,他也注意到,在跨文化的男性形象和男性规范的连续谱系之外,还存在着诸多“变体”。<sup>①</sup> 这些“变体”的存在使得人们很难提出一个明确而普适的男性特质的理论架构。相反,由此产生了林林总总有着显著差别的男性特质种类,从“主流”类的女性主义拥护者、神话诗化主义者<sup>②</sup>,到“外来”类的同性恋者和黑人,几乎所有的男性特质种类都处于西方视野之下。

鉴于以“男人”(man)为“人类”(huManity)统一符号的认知直到近些年才受到质疑,而男人在实际生活中的特异性即使在西方世界里也相当多样,因此,关于泛型男性的理论贫乏其实并不难理解。<sup>③</sup> 实证经验表明了对男性特质的社会建构主义模型的支持。这一模型主张,“男性特质的含义既不跨越历史,亦非文化普适,而是伴随不同文化形态呈现差异,并在各种文化形态中与时同迁”。<sup>④</sup> 然而,如果重建、解构男性特质的理论模型以失败告终,无论这种模型是东方式的还是西方式的,我们就只能延续一个超性的“[男]人类”(mankind)神话<sup>⑤</sup>,而将其他的人的类别置于边缘化的境地。

即便我们要提供有关男性特质的“观点”<sup>⑥</sup>,这些观点也必须将非西方

① 吉尔莫(David D. Gilmore):《男子汉的长成:男性特质的文化概念》(*Manhood in the Making: Cultural Concepts of Masculinity*),耶鲁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22—223 页。

② 基梅尔(Michael S. Kimmel)编:《男人政治:亲女性主义男性对神话诗化男性运动的反应》(*The Politics of Manhood: Profeminist Men Respond to the Mythopoetic Men's Movement*),坦普尔大学 1995 版。

③ 参见基梅尔(Michael S. Kimmel)和梅斯纳(Michael A. Messner)编:《男人的生活》(*Men's Lives*),Allyn and Bacon 1995 年版。这本书涵盖了与男人——包括第一部分中的非洲裔、墨西哥裔和犹太裔——有关的广泛问题。不过,这本书讲述的都是当代美国男人的经历。

④ 同上书,第 21 页。

⑤ 中文里人的统称为“人类”,而英语中则为“mankind”,直译即为“男类”。即使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中国人对世界的性别分类也和英语国家大不相同。

⑥ 克拉特鲍(Kenneth Clatterbaugh):《男性气概的当代观点》(*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Masculinity: Men, Women and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韦斯特维尤出版社 1990 年版。

的因素考虑在内。特别是对中国而言,正如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Said)所说,由于对东方的女性化已达到“被侵入、被沉默、被占有”的程度,一般性的理论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sup>①</sup>就某些方面而言,西方视野下中国男人的形象写照似乎证实了这个观察。在北京或香港街头的广告牌上,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中国男人的形象并不符合在西方占据着主导地位的“硬汉”式男性特质的刻板形象。<sup>②</sup>与东方主义传统一脉相承的是,西方对中国人的性的描述,依然集中于道家房中术、缠足类的奇风异俗以及春药等物事上。直到最近,专门探讨中国男性特质的学术研究也还寥寥无几。正如曼素恩(Susan Mann)认为的,关于中国男人的研究之贫瘠其所以令人失望,就在于:“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是精英抑或平民,男人之间的纽带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成功和生存的关键。”<sup>③</sup>有关中国男人的研究本已凤毛麟角,而其中的佼佼者,却又均以非主流人群——如同性恋者为对象。<sup>④</sup>为普通读者设计的图书当中,则充斥着那些要么天赋异秉、要么性功能有障碍的男人的奇闻轶事。<sup>⑤</sup>直到2000年,也只有一个英文学术专著致力于研究“主流”的男性特质。<sup>⑥</sup>然而,这本书的注意力集中在后毛泽东时代深受困扰的中国男人的心理状态上。<sup>⑦</sup>在包苏珊(Susan Brownell)和华志坚

- 
- ① 萨伊德(Edward Said):《东方主义》(*Orientalism*),路特里奇与克干·保罗出版社1978年版,第207页。
- ② 例如,尽管旨在指导男女关系中的交流,格雷(John Grey)的畅销书《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却老调重弹,认为男人从本性上就强硬好战而女人则温柔而善解人意。
- ③ 曼素恩(Susan Mann):《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的兄弟义气》(“The Male Bond i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载《美国历史书评》(*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105卷第5期(2000年),第1601页。
- ④ 例如小明雄:《中国同性爱史录》,粉红三角出版社(香港)1997年版。
- ⑤ 参见李碧华:《中国男人》,天地图书(香港)1993年版;谢鹏雄:《文学中的男人》,九歌出版社(台北)1992年版。
- ⑥ 我要补充一点:《男女:中国先秦与封建时期的男人、女人和社会性别》(*Nan nu: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这本杂志于1999年开始发行。尽管不全关于男人,它已发表并将继续刊载有关古代中国男性特质的优秀文章。
- ⑦ 钟雪萍:《被围困的男性特质? 二十世纪后期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性与男性主体性问题》(*Masculinity Besieged? Issues of Modernity and Male Subjectivity in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杜克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Jeffrey Wasserstrom)即将出版的著作中,男性特质这一主题占据了至少一半的篇幅。<sup>①</sup> 但是,该书入选的大多数论文采取的是人类学或史学的方法,“引起人们对中国的女性特质与男性特质如何以‘生活经历’的形态得以建构、表现的思考”。<sup>②</sup> 所有这些研究对增强我们对中国男性特质的了解都具有宝贵的价值,但迄今为止,对于普遍意义上的中国男性特质,还没有任何著作对其理论基础作出系统的概念化尝试。这本书将致力于填补这一空白,发展出适应广泛、有助于中国男性特质理论化的范式。

我分析的对象不是以“生活经历”的形态展现出来的中国男性特质的代表与行为,而更多侧重于作为“经历”结果的概念、象征和符号。就此而言,我的研究方法属于社会建构主义范畴。作为社会建构,这些象征和符号很难保持一成不变。我的目标是发展一些以中国为主、西方为辅的范式,以便在与之相应的背景中对这些不断演进的建构进行概括。一方面,我将把这些社会建构作为象征、符号和范式来进行检视。而另一方面,我也充分认识到,它们同样可以作为话语来进行探讨;这样,每个话语之中都含有矛盾性、颠覆性的元素,而这些元素又将转而改变建构本身。还应当说明的是,虽然不打算在本书中使用实证的研究方法,但我对社会科学领域派生而来的真知灼见也有颇多了解。近年来,除了包苏珊的研究以外,中国还涌现了一大批关于性别和性(绝大多数是女性的性)的出色的人类学、社会学著作。<sup>③</sup> 受访对象既有工厂工人,又有大学教授,涵盖宽广。其

① 包苏珊(Susan Brownell)和华志坚(Jeffrey N. Wasserstrom)编:《中国女性特质与男性特质论文集》(*Chinese Femininities, Chinese Masculinities: A Reader*),加州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② 包苏珊、华志坚编:《引言》,载同上书。

③ 例如,卢蕙馨(Margery Wolf):《推迟了的革命:当代中国女性》(*Revolution Postponed: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韩起澜(Emily Honig)、贺萧(Gail Hershatter):《个人的声音:1980 年代的中国女性》(*Personal Voices: Chinese Women in the 1980's*),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姜克维(William R. Jankowiak):《中国城市里的性、死亡和阶级斗争:一份人类学报告》(*Sex, Death, and Hierarchy in a Chinese City: An Anthropological Account*),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克罗尔(Elisabeth Croll):《中国妇女的身份变迁》(*Changing Identities of Chinese Women*),Zed Books 1995 年版;杰华(Tamara Jacka):《中国农村妇女的劳动》(*Women's Work in Rural China*),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中探讨的问题也五花八门,丰富多样。但是,迄今为止,我尚未发现其中任何一项研究采用了中国最重要的范式之一,“文武”(文化修养和勇武之气)的二元组合,来对性别化的身份表现——特别是中国男性特质——进行阐释。

尽管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文武”这一建构在关于中国的性别或男性特质的研究中受到的关注实属微不足道。<sup>①</sup> 在本章,我将概述这个建构的一些主要特点。本书的其余部分将对作为中国男人界定性特点的“文武”所具有的不同表现与涵义展开讨论。我在前面把“文武”注释为“文化修养和勇武之气”,不过,这也远远只是个近似的诠释。本章的后半部分,我将对“文武”的定义予以详尽阐述。在此之前,应当强调的是,对男性特质进行本土化定义并不意味着我相信“文武”二元组合当中所蕴含的心与身、心智与体格、文化知识与武术技巧等诸般二元对立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男性特质概念。“文武”范式的变体在其他文化——特别是东亚地区的文化中也广为采用。<sup>②</sup> 例如,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在剖腹自杀前就曾强身健体,以达到他在文学和武艺之间实现理想中的平衡状态的目标。<sup>③</sup> 虽然和其他文化的相似点不像和日本这么直接,但众所周知,其中一些如古希腊人和罗马人也强调重视身体和心灵两个方面<sup>④</sup>,其他如犹太人则更侧重智力

① 关于“文武”的资料匮乏并不限于英文资料。中文资料也是如此。例如,刘达临:《中国古代性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当代性文化》,三联书店1992年版,涉及了从太监到男妓的一系列有关性与男人的问题,但没有对“文武”男性特质的讨论。

② 韩歇尔(Kenneth Henshall)将日本男性理想的特点用“软”与“硬”概括出来,其描述和“文武”的特点相似。见韩歇尔:《日本社会分层:性别、边缘与主流》(*Dimensions of Japanese Society: Gender, Margins and Mainstream*),圣马丁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③ 对三岛由纪夫(Yukio Mishima)引人深思的维护传统男性之道的论述,参见三岛由纪夫:《叶隐入门》(*The Way of the Samurai: Yukio Mishima on Hagakure in Modern Life*),英译本斯帕林(Kathryn Sparling)译,基本书局1977年版。日本武士道的古典称为“叶隐”(hagakure),是江户时代的佐贺藩(肥前锅岛藩)所传诵的武士道修养书。“叶隐”就如树木的叶荫,在看不见的地方为主君“舍身奉公”之意。

④ 参见福克斯豪尔(Lin Foxhall)和塞尔文(John Salmon)编:《当男人为男性:古典时期的男子气概、权力与身份》(*When Men Were Men: Masculinity, Power and Identity in Classical Antiquity*),路特里奇1998年版。

的一面。<sup>①</sup>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尽管采用了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的方法，我的研究焦点始终没有离开中国。这类跨文化研究的工作当然更适合由比较人类学家去做。<sup>②</sup> 但是，像本书这样深入透彻的案例研究则对得出更具普遍性的跨文化观点大有助益。例如，大卫·吉尔摩对男性形象的比较研究工作始于他对安达卢西亚男子气概(machismo)的发现。这种男子气概，他“相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诸多社会形态之中”。<sup>③</sup> 尽管男子气概构成了吉尔摩对从地中海到印度等多种男性特质的描述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却认为，男性特质行为在中国社会“往往表现得比在大男子主义社会中更难捉摸”。<sup>④</sup> 实际上，与流行的看法相反，本书的第二章、第五章和第八章都将表明，只要通过适当的“文明”的透镜，男子气概在中国文化中就随处可见。我认为，在概述“文武”的主要特点之前，有两个相互关联的要点需要明确。第一点与将男性特质包含在所谓的“性别”研究当中的重要性相关；第二个要点则是：我们为什么要把中国男性特质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来加以概念化。

## 性的差异

任何对亚洲性差异进行的有价值的学术工作，将关于男性特质的研究包含进来都至关重要。人们常常批评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的历史，

① 博亚林(Daniel Boyarin):《非英雄主义行为：异性恋的崛起与犹太男人的出现》(*Unheroic Conduct: The Rise of Heterosexuality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Jewish Man*)，加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0页。

② 参见姜克维编：《情爱的震撼：一种普遍经验？》(*Romantic Passion: A Universal Experience?*)，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中有关男性浪漫激情的论文，特别是姜克维：《中国的情爱震撼》(“Romantic Pass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China”)，第166—183页。

③ 吉尔莫(David D. Gilmore):《男子汉的长成：男性特质的文化概念》(*Manhood in the Making: Cultural Concepts of Masculinity*)，耶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④ 同上书，第170页。



均以叙述男性关注的事件为主导。而实际上,这些事件的“男性本质”仍未得到揭示。诚如上述,由于既往的史书始终将“男人”作为普遍的、规范性的描述主体,结果,这些男人作为“男性”躲过了聚光灯的照射,任何对男性主导地位的分析都被巧妙地掉转了枪口。本书的主旨,正在于消除以中国“男性本质”为描述主体的常态性。将父权社会中的男性特质观念问题化,就是要将这两个概念剥离开来——男性特质并非父权制度,而是父权社会当中建构起来的性别秩序话语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男性特质亟需更进一步的检视。

通过对男性特质的关注,我们可以借鉴男性本位研究和受女性主义启发的研究里“性化”女人的方式来“性化”男人。这对中国研究来说尤其重要,因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比起黑种男人和白种男人,中国男人的形象都被描绘成不如他们“性感”,但比他们“聪颖”。<sup>①</sup>我们在下一章就将看到,如果与文学领域中的骑士传统做比较的话,这种观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近年来,西方的一些大众文本,例如广告,已经开始性化中国男人的身体。然而,这些浮夸的形象将客体置于脆弱与被动的状态下,只不过证实了萨伊德关于东方已隐晦地被女性化了的观点。它们只是(西方)买家眼中的消费品,并不必然反映客体本身的世界观。

在本章,我提出了一个中国男性理想的普遍范式。这样,对这种理想在现实中的代表和内涵,我们都能得到更好的理解。在接下来的四章当中,我将审视那些刻板印象下的男性类型,如温文尔雅的书生和孔武有力的战士。而在第七章和第八章,我将分析“文武”在不同时空中的影响和演变。在本章当中,我的主要目的仅在提供一个代表中国男性理想

---

<sup>①</sup> 参见加拿大心理学家洛旭庭(J. Philippe Rushton)等著名优生学家的著作。菲律普·洛旭庭认为在脑体积、繁殖行为和性激素等方面,“东亚人的祖先……和非洲人的祖先……处在谱线的两端,而欧洲人的祖先处于中间”。参见《种族、演化及行为:生命历史的远景》(*Race, Evolution, and Behaviour: A Life History Perspective*),事务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的模型。我之所以从一开始就介绍“文武”，是因为它构成了所有关于中国男性特质讨论的核心。

由于同时包含了理想男人心智与体格两方面的构成，“文武”理应在生物与文化两个层面上得到建构。毋庸赘言，我反对早期女性主义理论家对性和社会性别的区分——他们认为前者指向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生物层面，而后者则指向其文化层面。<sup>①</sup> 这些理论虽由女性主义者为抨击生物还原主义的需要发展而来，但它们自己也处于把所有事物约化为文化决定论的危险境地。文化确实对生物个体的体格发育存在显著的影响<sup>②</sup>，这从现代科技对男性身体产生的作用就可以看出来。健身、举重在男性外形上产生的效果十分明显。<sup>③</sup> 而在性方面，伟哥等药物确实让使用者起了生理变化，从而也相应地促成了一些心理和“文化”上的改变。

因此，我们生物意义上的身体也同样塑造着我们的文化——心理存在。虽然诸如斯托尔滕贝格(Stoltenberg)之类的理想主义者可能会提出阴茎与阴蒂并无显著差异<sup>④</sup>，但这种过于简单化的提议却无法解释男女之间的差异。对男人来说，自我的观念是社会流行的男性特质的理想、刻板印象和典型的投射，并与它们交互影响。但同时，这一观念也来自一个男人对性快感如何产生及力量如何持久的经验。男人的性或许是被社会构建的，但我们的身体远不止是被动地接受文化的烙

① 参见奥克雷(Ann Oakley)开创性的著作《性、性别和社会》(*Sex, Gender and Society*)，高尔出版社1972年版。

② 对这一辩论的概要，参见《澳大利亚女性主义研究》(*Australian Feminist Studies*)第10期(1989年)；更多细节见格罗斯(Elizabeth Grosz)：《易变的身体：身体女性主义》(*Volatile Bodies: Towards a Corporeal Feminism*)，艾伦·昂文出版社1994年版。

③ 关于西方各种形式的理想的男性身体，参见肯尼斯·达顿(Kenneth R. Dutton)：《可塑的身体：身体发育的西方理想》(*The Perfectible Body: The Western Ideal of Physical Development*)，艾伦·昂文出版社1995年版。

④ 斯托尔坦伯格(John Stoltenberg)：《拒绝做男人》(*Refusing to Be a Man*)，Breitenbush Books 1989年版。

印——它们会根据环境改变、转换自身，并在文化趋势下产生变化的典范。<sup>①</sup>

运用上述“相互参照”、“相互作用”的概念，我们就可以解释“男子气概”和“男子汉体格”在中国漫长历史中的变迁。高罗佩(Van Gulik)注意到了男性美的典范在各个朝代的不断变化，并将这种变化与身体活动重要性的起伏变迁联系起来。唐代男子“练就了刚健甚至勇武的外表。他们喜欢浓胡、髭须和长长的八字胡，崇尚身体力量。无论文官还是武将都练习射箭、骑马、剑术和拳术，技艺高超者获得高度赞美”<sup>②</sup>。高罗佩接着对比了明清与唐宋时的男性美：

大众偏爱的情人不再是唐宋时期留胡子的中年男子，而变成了没有络腮胡、八字胡或是髭须的年轻男子。在那时(明朝)，矫健的男子依然很受欢迎，年轻学子练习拳术、剑术和射术，而马术和狩猎则是人们最喜爱的娱乐消遣。因此，身体力量是那时公认的美男子的标准之一。美男子们身材修长、肩膀宽阔，春宫画中的裸体显示着他们结实的胸肌和肌肉发达的四肢……到了清代，满族入主中原，武术也由征服者们垄断。于是，作为回应，汉人——特别是文人阶层——开始以身体锻炼为粗鄙行为，认为运动竞技只适于“清夷”、汉人中的拳师和杂技演员……理想的爱人被塑造成一个风雅秀致、多愁善感、脸色苍白、身材瘦削的青年男子的形象。他终日在书本、花丛中流连幻想，稍遇挫折就生起病来。<sup>③</sup>

因此，男性身体在文化上被烙刻于男性特质的话语中，远不只是一

---

① 对中国人身体之文化表现的精彩讨论，参见司徒安(Angela Zito)、白露(Tani E. Barlow)编：《中国的身体、主体与权力》(*Body, Subject & Power in China*)，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② 高罗佩(R. H. Van Gulik)：《中国古代房内考》(*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布利尔出版社1974年版，第188页。

③ 同上书，第295—296页。

个“保存”了“主要”生物差异的产品。同时，男性身体也决定了文化和话语是以微妙而辩证的方式互相作用的。<sup>①</sup> 认识到生物层面和文化层面都在男性特质研究中必不可少对中国男性特质的显现尤其重要。这是因为，在我看来，种族和民族对于理解这个概念的建构过程都不可或缺。高罗佩曾就汉、满民族差异对男性特质的影响做出了一些推想。近年来，人类学家对中国汉族与少数民族在性别问题上的论争进行了一些研究。<sup>②</sup> 本书第七章将对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相互往来及其对男性特质的影响有所涉及。然而，本书的读者大多来自英语国家，加之西方仍然是对中国本土和海外居住的华人影响最大的外来势力，有鉴于此，我将集中探讨西方是如何影响中国男性特质的建构的。第七章和第八章都把“白种人—黄种人”相互往来的背景下有关男性特质的中国观念与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问题。

## 从男子气概到“英雄好汉”

男性研究在西方的大学中正蓬勃发展，反映出大众对这个话题不断增长的兴趣。这种文化转变随着越来越多诸如《男人装》(FHM)、《绅士季刊》(GQ)和《男士健康》(Men's Health, 中国版为《时尚健康》)的“男士”杂志的面世而更为显著。<sup>③</sup> 这些大学课程和流行杂志只考虑欧美文化，采用的也主要是当代视野。而我的目标则是扩大讨论范围，将中国的男性特质研究也包含进去。社会底层研究学派通过揭示西方女性主

① 社会生物学与心理生物学的文献非常丰富，我们显然无法在这本书中涵盖这一领域中时而爆发的激烈争论。对此富有影响、令人信服的阐释，可参见西蒙斯(Donald Symons)：《人类性演进》(*The Evolution of Human Sexuality*)，牛津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② 沙因(Louisa Schein)：《弱势群体法则：中国文化政治中的苗族及女性》(*Minority Rules: The Miao and the Feminine in China's Cultural Politics*)，杜克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③ 当然，此前也有些“男性杂志”，如《花花公子》和《阁楼》，至今仍很受欢迎。但是它们把男人作为消费者，而新兴男性杂志则把男人作为研究客体和读者。

义范式对亚非女性的不适用性,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它们的偏颇乃至褊狭。<sup>①</sup> 同样,我们也可以证明,男性的主导地位超越了西方模式,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显现并长期存在。事实上,如果女性的从属性具有多重表现形式的话,那么,男性的支配性也势必存在着某种对应的变通。

即使只对中国有过短暂的造访,人们也会即刻明了:当代中国人的性,是以与西方不同的截然方式建构而成的。<sup>②</sup> 这一点在对男性特质的建构进行观察时尤为明显。在西方的“硬汉”刻板形象的影响下,坚韧、勇敢、果断的形象成为欧美男人形成男性自我观念的基础。此外,西方男性自我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包括了冒险精神、暴力倾向、喜欢诉诸行动而非口头表达想法以及对性关系的漠然态度。<sup>③</sup> 这并不是说,西方有关男性特质的观念是鲜明清晰或静止不变的;也不是说所有或众多西方男人都向往住在“万宝路的国度”。实际上,“硬汉”理想正在发生蜕变——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些新出版的书籍或新播放的电视纪录片以不同方式劝诫男人们该如何行为举止。<sup>④</sup> 有些白人男子会觉得一场“男性

① 相关讨论参见巴尔贝克(Chilla Bulbeck):《一个世界的妇女运动》(*One World Women's Movement*),普路托出版社1988年版;以及《重新定位西方女性主义:后殖民世界女性的多样性》(*Re-orienting Western Feminisms: Women's Diversity in a Postcolonial World*),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关于现代中国性身份演进的讨论,参见冯客(Frank Dikötter):《性、文化与现代性:民国时期的医学与性控制》(*Sex,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赫斯特公司1995年版。

③ 参见基梅尔(Michael S. Kimmel)编:《男人的变化:男人和男性特质研究的新方向》(*Changing Men: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 on Men and Masculinity*)中的论文,特别是贺瑞克(Gregory M. Herek)《异性恋的男性特质:性别与性的社会建构之身体后果》(*On Heterosexual Masculinity: Some Phys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and Sexuality*),第68—82页;考夫曼(Michael. Kaufman):《超越父权制:快感、权利与变化之男性论文集》(*Beyond Patriarchy: Essays by Men on Pleasure, Power, and Change*),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杜贝特(Joe. L. Dubbert):《男人的空间:嬗变中的男性特质》(*A Man's Place: Masculinity in Transition*),普伦蒂斯霍尔出版社1979年版。

④ 参见希伊(Gail Sheehy):《男人通道:探索男性生活新地图》(*Passages for Men: Discovering the New Map of Men's Lives*),西蒙与舒斯特公司1998年版;安·莫伊(Anne Moir)和比尔·莫伊(Bill Moir):《为什么男人不熨烫:性别研究的真知》(*Why Men Don't Iron: The Real Science of Gender Studies*),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1998年版。

特质危机”正在降临<sup>①</sup>，因而企图把自己重新定位成史蒂夫·比达尔夫(Steve Biddulph)型的“敏感的新时代男性”，或者罗伯特·勃莱(Robert Bly)型的新男权主义硬汉。<sup>②</sup> 但其他肤色的男人则会问：“为什么这场男性运动如此之‘白’？”<sup>③</sup> 在西方国家生活的华人男性，无论直男抑或同志，都对肤色给他们在身份认同和男性特质的感知上所造成的差异深有体会。<sup>④</sup> 而他们所感受到的疏离感，是无法在这些新“男性运动”团体中得到缓解的。在第七章和第八章，我将对海外华人在多大程度上促成这些情况发生改变作出衡量。

在当代西方的“硬汉”范式当中，男人的力量是从蛮力和沉默寡言中展示出来的。但把这一范式放在中国并不恰当。这是因为，尽管中国传统上也曾崇尚过男子气概，但它并不占主导地位。由“才子”、“文人”所代表的温和而理性的男性传统抵消了由“英雄”、“好汉”<sup>⑤</sup>所代表的具有男子气概的英雄传统。这种抵消的程度在当代西方的男性概念中很难找到。此外，稍后当我们探讨“武”的英雄时就会发现，不同于当代西方，在中国，理性智慧型的男性典范往往主宰勇武健壮型的男性典范。尽管古希腊哲学家、殖民时代的英国绅士和最近的电脑迷确实为男性特质提

① 利万特(Ronald F. Levant):《男性特质危机》(“The Masculinity Crisis”),载《男性研究》(*The Journal of Men's Studies*),第5卷第3期(1997年),第221—31页。

② 参见比达尔夫(Steve Biddulph):《男子气概:一本关于男人挣脱枷锁的书》(*Manhood: A Book about Setting Men Free*), Finch Publishing(悉尼),1994年;布莱(Robert Bly):《铁约翰:一本关于男性启蒙的书》(*Iron John: A Book about Men*),元素出版社1991年版。

③ 戈登(Michael-David Gordon):《为什么这场男性运动如此之白?》(“Why is This Men's Movement So White?”),载《变化中的男人》(*Changing Men*),第26期(1993年),第15—17页。

④ 参见卢克(Allan Luke):《亚洲男性特质的代表与再构建:这不是电影评论》(“Representing and Reconstructing Asian Masculinities: This is not a Movie Review”),载《社会替代》(*Social Alternatives*),第16卷第31期(1997年),第32—34页;埃尔斯(Tony Ayres):《不受欢迎的异类》(“Undesirable Aliens”),载《HQ》第57期(1998年),第110—115页。

⑤ 参见詹纳尔(W. J. F. Jenner):《历史上的暴政:中国危机的根源》(*The Tyranny of History: The Roots of China's Crisis*),艾伦·莱恩出版社1992年版,第203—206页中关于好汉的讨论。关于英雄的详细描述参见下一章。

供了其他一些模式,但他们还没有像文人那样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被塑造成令人爱慕、魅力四射的形象。

由此可知,男性特质的西方范式不太适合中国的情况:由于无法通过(西方)男性特质的考验,把它们应用到中国,只能证明中国男人“不够男人”。在以西方视野为准则的跨文化调查中,亚洲男人往往会被认为不够男人。例如,孙隆基(Sun Longji)对男性特质的研究就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男人实际上被阉割了,并提议理想的男性应是拉美和地中海男人。<sup>①</sup>这就好像在说,在跨文化比较的阵列中,“男性特质”的对立面不是“女性特质”,而是“阳痿”。在这种模式下,西方得以设定“正常”、“自然”的男性特质标准,而其他文化都被拿来和这个模板做比较。这种分析路径显然是在误导。关键之处在于,要从亚洲自身的环境中发现问题、发展范式,而不能简单地模仿十几年前针对西方所做的研究工作,更不能因此削足适履地得出中国男人女性化或中性化的结论。<sup>②</sup>这将是我在本书中尝试要做的事。

## 从“阴阳”到“文武”

在对亚洲人的性的讨论中,最常被援引的“中国”范式是“阴阳”的对立和谐观念。在大众对阴阳理论的浅显了解中,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被置于一组二元对立关系之中,阴为女而阳为男。<sup>③</sup>这一二元对立与毕达哥拉斯哲学中明暗、男女、右左等对立范畴相似。真正的男人应该有充沛的阳气。例如,最近出版了一本男性手册,涵盖了从性礼仪到为父之道的广泛议题,其中首节即开宗明义地解释到:“男子汉的阳刚之气有如

---

① 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集贤社(香港)1983年版,第210页。

② 同上书,第210页。

③ 参见胡马纳(Charles Humana)、王武(译音)《阴阳之道:中国式的爱情》(*The Yin-Yang: The Chinese Way of Love*), Tandem出版社1971年版。

下主要特征：刚毅、顽强、善于自制”<sup>①</sup>。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将再次叙及这些素质，特别是善于自控。

毕达哥拉斯对立哲学与阴阳理论的不同在于，后者认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交互感应，生生不息。这就意味着每个男女都同时具有阴阳之气，两性交合时，则阴阳互补。对男人而言，理想的境界是采阴补阳而不失其阳精；对于女人而言，情况正好相反，她必须采补阳气而不失其阴精。这种采补理论意味着某种形式的生发能力。具有这种能力的人，能保持自身的元气（在男为阳、在女为阴），而又有吸取对方元气、增强活力与力量的潜能。<sup>②</sup> 这就揭示了化约主义论者“男属阳、女属阴”的理解的片面之处。事实上，依照阴阳学说，男女可以是一阴一阳或“阴阳合抱”，这一学说对性的差异表现是无法作出完全解释的。然而，在跨文化分析中，我们可以说，阴阳交融的理论使中国男性特质在本质上比西方的更为包容。

这种基于阴阳哲学的范式认为男人和女人无论在任何时间点均同时具有阴阳两种属性，因而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事实上，连宇宙天地也可置于男女的性的坐标格中进行概括描述。在本书中，我将把那些只用来充当男性坐标的大类剔除出来。摒弃阴阳之说在此非常关键，否则，阴阳无休止的内在互动的潜力将对认知性别的特异性造成阻碍。“阴阳”二元的流动性也会限制对男性特质进行深入理论化的尝试，因为它造成的是任何关于男性的论断也将同样适用于女性。然而，儒家思想对社会组织的约束体现于性别秩序当中，就是将男性明显置于女性之上，这意味着必然有其他的性话语存在，足以抵消“阴阳”的互动关系，并将两性

① 司马小萌编：《男子生活大全》，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引文出自本书前言，第2页。

② 高罗佩对此举过几个例子，参见他在《中国古代房内考》第158—60页中的阐释。另见费侠莉(Charlotte Furth)：《重新思考高罗佩：中国传统医学中的性与繁殖》(*Rethinking Van Gulik: Sexuality and Reproduc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中对这些技巧的评论，载柯临清(Christina K. Gilmartin)等编：《女人、文化、国家》(*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哈佛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146页。



权力的不平衡合法化、常态化。<sup>①</sup>

能为深入分析男性特质提供线索的中国范式,就是“文”(心智的或文职的)与“武”(体力的或武术的)的二元对立。这对术语具有许许多多的含义。《汉语大词典》列出了“文”字的 26 个定义<sup>②</sup>,其核心含义都围绕着文学和其他文化修养。顾理雅(Herrlee G. Creel)择其释要指出:“‘文’本意为‘纹’‘饰’,由此拓展开来,文意味着‘有成就的’、‘成就’,甚至‘文明’——所有将文明人区别于毫无教养的野蛮人的生活用品。”<sup>③</sup>《汉语大词典》也列出了 20 多个“武”的释义,其核心含义围绕着战争、军事、武力和力量。<sup>④</sup>在最近一本关于武侠小说史的著作里,陈山把武侠和欧洲骑士与日本武士进行了对比。他认为,“武”的信奉者为正义而战,忠于自己集团中的男人,并回避女色。相比之下,欧洲骑士具有更多的贵族价值观,为宗教或其他更高尚的理想而战;而日本武士则保有武士道精神,忠于他们的大名或藩主。<sup>⑤</sup>陈山认定,在周朝,有“武”艺的男人占据了“士”(上层阶级)的主导。他们于是被称为“武士”。只是在独尊儒术之后,“文”才逐步在上层阶级取得支配地位,把“士”和“文官”联系在一起。<sup>⑥</sup>

那些“武”曾在传说中的过去支配过“文”的说法,很可能是后世那些

① 关于雌雄同体,费侠莉(Charlotte Furth)在《兼具两性的男人与不完整的女人:中国十六、十七世纪的生物学》(“Androgynous Males and Deficient Females: Biology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载《末代中华帝国》(*Late Imperial China*),第 9 卷第 2 期(1988 年 12 月),第 1—31 页中指出了这种阴阳宇宙观与儒家思想的分离。费侠莉:《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加州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更详实地记述了性别与中国医学对阴阳的应用。

② 罗竹风:《汉语大词典》第 6 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512—1513 页。

③ 顾理雅(Herrlee G. Creel):《中国国家治理的起源(第一卷):西周王朝》(*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 vol. I: The Western Zhou Empire*),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70 年版,第 67 页。

④ 罗竹风:《汉语大词典》第 5 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38—339 页。

⑤ 陈山:《中国武侠史》,三联书店 1992 年版,第 298—310 页。

⑥ 同上书,第 10—13 页。

专长于“武”的人对历史浪漫化、理想化的重建。但不争的事实是，“文”或“武”抑或“文武”成为本真男人必不可少的特质。这一“文武”范式对理解男性特质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激起了学者与军人两方的权威性。我将表明对中国男性特质进行理论化的可能性：由于中国男性特质同时糅合了“文”与“武”，学者并不比军人更缺少阳刚之气。事实上，在一些特定历史时期，人们对理想男人的期望是文武兼备。而在另外一些时期，人们所期望的就只有二者之一；但重要的是，无论“文”还是“武”，都是令人满意的男子气魄。《论语》以“莫不有文武之道焉”的说法向我们呈现了这种二元对立。<sup>①</sup>“文”、“武”特指周朝的两个帝王，他们以自己的谥号——文王和武王而闻名。他们的个性特点和统治技巧分别发展成为文治之道与武治之道的象征。《礼记》以“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来描述他们的不同之处。<sup>②</sup>两者之间的关系一直被认为是既截然对立又无所不在。在论及国家治理与个人修养时，他们也时常被提起。

性的特异性，也即“文武”二元体系独特的男性特征，在与阴阳体系作对比时更为明显。本书第五章将对此进行更详细的阐述。应当指出的是，从阴阳的角度，男女均可被纳入讨论。但对女人来说，“文武”二元论只有在她们把自己转换成男人时才适用。除此之外，“文”或“武”无法对女人进行有效的研究。这是因为，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尽管限制程度不一，官方的社会生活都明明白白地拒绝女性涉足“文武”领域。尽管女性也可以在闺阁中进行学术活动，或修习剑术、射术，但只有在玄幻小说当中，如晚清著名的《镜花缘》里，她们的这些技艺才会获得公开认

① 《论语·子张第十九·文武章》：“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见北京大学哲学系：《〈论语〉批注》，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第1版。

② 《礼记·祭法》：“汤以宽治民而除甚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录于《古今汉语成语辞典》，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6页。英译本参见缪勒（F. Max Muller）编：《东方圣书（第二十五卷）：理雅各英译儒家经典第四部〈礼记〉三十五》（*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Vol. XXVIII: James Legge, trans. The Texts of Confucianism part IV The Li Ki, XI-XVII*），牛津大学出版社印刷所1885年版。

可。在这些小说中,妙龄侠女报仇雪恨,才女们则通过女皇武则天举办的女科入仕。<sup>①</sup>

古代中国有“天才”女性存在是毫无疑问的事儿。<sup>②</sup>但在实践中,中国女性特质的构建引入这些侠女、才女的形象,只是把它们作为女性无法实现的梦幻世界的一部分。这个梦幻世界最终确定了她们的空间只在“内部”的私密世界当中。<sup>③</sup>即使是那些跳出了这些束缚的女性,也仍然被限制在“模范女性”的概念中。她们对男性属性的模仿起着强化男性理想的“优越性”和“标准性”的作用。因此,“文”、“武”的公共形体必然以男性的面貌出现。女性对男性竞技场的短暂入侵通常发生在她们穿上男装之后。这就是为什么《镜花缘》里的女侠客一再被当成男子;而另一个经典文学中的女英雄花木兰,在她12年的军旅生涯中也一直是女扮男装。有趣的是,这些女人“在回到自己的女性角色后,甚至比尝试女扮男装之前更有女人味,也更加传统。”<sup>④</sup>除了这些“武”的典范,还有祝英台的浪漫悲剧。她穿着书生的长袍参加了正式的书院学习。

在所有这些情形下,女性在修文习武方面所获得的成就,只有在她们公开把自己表现为男性时才能获得承认,无论这种表现是多么虚假、多么短暂。通过文举和武举考试是获得官方对“文武”成就承认的最普

---

① 李汝珍:《镜花缘》,学海出版社(台北)1985年重印本(首次出版于1828年)。

② 见曼素恩(Susan Mann):《兰闺宝录:晚明至盛清时的中国妇女》(*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③ 李木兰(Louise Edwards)也认为这些扮演男性角色的女人——才女和女侠的存在被放置在武则天“混乱的”、“道德沦丧”的统治时期,进一步加深了《镜花缘》文字世界中社会混乱的印象。见李木兰:《清代中国的男人和女人:〈红楼梦〉中的性别》第六章,布利尔出版社1994年版。

④ 熊贤关(Anne-Marie Hsiung):《从女性主义新视界看徐渭的〈雌木兰〉和〈女状元〉》(“A Feminist Re-Vision of Xu Wei's *Ci Mulan* and *Nü Zhuangyuan*”),载张英进(Yingjin Zhang)编:《多极世界中的中国》(*China in a Polycentric World*),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

遍的方式。<sup>①</sup> 而这两者都只有男性才有机会参与。因此，从字面上，“文人”只能被翻译为“有学识的男性(men accomplished in wen)”或“有修养的男性(cultured men)”。人们认为女性在“文”的方面表现卓越是反常的现象。考虑到她们必须克服的中国古代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她们很可能也的确不同寻常。与此类似，“侠”指的是男性英雄。尽管文学作品也有不少女性斗士被专称为“侠女”，但在中国历史的大多数时候，她们通常都不是现实中的人物，而是幻想的结果。在此我必须再次强调，如上所述并不意味着中国女性不擅长文学、战事或任何其他文化修为。关键是，“文武”主要与文化建构的概念化有关。作为文化建构，“文”和“武”的疆域是男人的公共用地；任何敢于进来冒险的女人，她们所采取的方式必须进一步证明这一建构所暗示的男性权利的排他性。

不光是女性不属于“文武”范式的一部分，其他非华裔种族的外国男性也不在此列。这并不意味着非中国人没有男子气概，而是说，他们的男性特质已被性化，以暴露他们动物般的野蛮。西方男人是从他们的“文明”中被剥离出来的文明人——他们有着动物的本能和动物的性驱动。冯客(Frank Dikötter)提到早期华人认为西方男人有四个睾丸、体毛过剩。这两个特点都暗示着一个高度性化的男性特质观念。<sup>②</sup> 这种对“他者”的性化与维多利亚时代对殖民地人民的描绘、1960年代白人关于黑人性欲强烈的说法以及当下关于男同性恋者多滥交的观点很相似。事实上，很大一部分的女性主义研究一直在试图阐明男性究竟是以何种方式将女性作为他者而性化的。“文武”之所以不适用于中国文化圈之

① 尽管女皇武则天在唐代将武术列入科举考试(武举)，但这些考试并不是定期举办的。而且，和公务员考试(文举)不同，通过武举并不意味着向权力与特权的自动进阶。大多数武进士并没有机会在政府中任职。而那些幸运儿的位阶也总是比文举考试的通过者低。相关讨论参见张颖真(译音)(Ying-jen Chang)，《武术在中国与美国的崛起》(*The Rise of Martial Arts in China and America*)，U. M. I. 公司 1978 年版。

② 冯客(Frank Dikötter)：《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香港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4—47 页。

外的男性,是因为其体系所蕴含的男人的性,肯定自身在潜移默化中的差异性。因此,“文武”是一种用来分析中国男性特质的理想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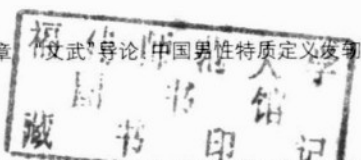
在上述讨论中,我提供了一个范式以揭示迄今为止中国人是如何将男性特质加以概念化的。构成这一范式的坐标体系,能够也确实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这一范式无疑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随着全球化的进展,中国男人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更密切、更强烈,“文武”在种族和文化上的参考点也随之而迅速改变。美国传媒在世界上仍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意味着很多美国人的形象所代表的西方男性理想正越来越普遍地得到中国的接受。反过来,大量中国留学生和移民涌入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也对西方的男性概念产生了影响。李小龙、成龙功夫电影的流行也微妙地改变了西方关于勇士和男子气概的观念。本书的第七章和第八章将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

除了性别、种族和民族的考量之外,“文武”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阶级意义。在国家统治和自我修养两个方面,“文武”作为一个可将男性进行概念化的范式,能够广泛地适用于各个社会阶层。它不是一个专属于精英男人的男性范式。那种专属范式使男性特质与社会权力糅合在一起。这种融合确立了男性的强大和女性的无力,因此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合并。事实上,男人(尤其是中国男人)拥有的权力可以比精英女人(尤其是白种女人)少,但毫无疑问,他们仍然是男性。由于只适用于男人,男性特质指的就不是社会权力。它以女性特质不具备的、男性独有的方式显示了一种获得终极权力的可能性。<sup>①</sup>

在小说《镜花缘》里,对男性统治地位作出了激烈挑战的武则天(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在这个虚构世界中被塑造成一个转世狐狸精。她在酒醉中下令百花在死寂的冬天盛开,从而引出了小说中形形色色的奇

---

<sup>①</sup> 关于女皇武则天“反常”统治的历史记载都表现出了对那些胆敢篡夺“男性”终极权力的女性的极度不信任。



闻逸事。她登上皇权顶峰并颁布帝国诏令，这些都被当成是对自然秩序的倒置。而这个被颠倒的秩序只有在其他有才华的女子对她进行反抗时才得以恢复正常。因此，虽然不必以僵化的“压迫者—被压迫者”的成规对性别进行构想，但它的确意味着不同的权力与社会控制的可能性——男性特质体现为“最终决定”权，而女性特质体现为“最终赞同”权。在从性别中厘清阶级时，“文武”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范式，是因为它对精英男性和普通男性大众都同样适用。对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中明确说明。

“文”，通常被理解为与古典文人的文学、艺术追求相关的高雅、精致的品格，因而可以部分地作为闲适阶层的男性典范来进行分析。这种类型的男性特质的最佳写照，是一群用吟诗作对来消遣娱乐并纪念难忘时刻的男人。然而，“文”并不只隶属于精英阶层，广大的社会各阶层都希冀拥有文人属性。清代小说《儒林外史》中的王冕就是一位农民出身的文人典范。<sup>①</sup> 所有的中国男人，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都拥有通过考试制度竞逐高级文官职位的权利。

同样，身体力量、军事实力这样的“武”的属性也不独为普通大众所拥有。在很大一部分的男性群落中——无论唐代精英阶层的马球手还是清朝街头的卖艺人，它们都是男人努力培养的品格。“武”几乎无处不在的广度，从“武”的哲学的含混就可见一斑。人们认为“武”包含了七种美德，它们合在一起，“意味着军威强盛，可不战而胜”。<sup>②</sup> 这七种美德即所谓“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功定、安民、和众、丰财”。<sup>③</sup> 因

① 吴敬梓：《儒林外史》，作家出版社 1954 年版。

② 麦大维(D. L. McMullen)：《齐太公崇拜及唐对武的态度》(“The Cult of Ch'i T'ai-kung and Tang Attitudes to the Military”)，载《唐代研究》(T'ang Studies)，第 7 期(1989 年)，第 68 页。

③ 《左传·宣公十二年》，岳麓书社 1988 年版，第 134 页。参见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安禄山之乱与晚唐藩镇割据的根源》(“The An Lu-Shan Rebell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ronic Militarism in Late T'ang China”)，载佩里(John Curtis Perry)和史密斯(Bardwell L. Smith)编：《唐代社会论文集》(Essays on T'ang Society)，布利尔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33 页。

此，“武”的概念，既体现了军事力量的威力，同时也体现了何时行使这一力量的智慧。

在大众想象中，孔子是“文”的体现。而另一个同样声名卓著，并且可能更受大众欢迎的人物形象——关羽(或关公)则是“武”的体现。在整个华人世界，被尊为“武圣”的关羽常常出现在寺庙和神龛中(往往和被尊为万世师表的“文圣”孔子一起供奉)。关羽是三国时期(公元220—280)的一位著名将领，因古典小说《三国演义》而变得不朽。<sup>①</sup> 在本书接下来的两章中，我将对这两个偶像对中国男性特质的影响作出详细考察。“文”、“武”的二元区分可以广泛涵盖各种社会现象和各色男性。因此，在《三国演义》中和关羽的“武”直接相对的是另一个主要人物：以智慧和学问见称的丞相诸葛亮。而另一部围绕着男人的英雄事迹展开的古典小说《水浒传》<sup>②</sup>，则塑造了醉酒打虎的武松(武)和韬略非凡的“智多星”吴用(文)。在嗣后的章节中，我将把孔子、关羽、武松的形象作为“文武”的范例予以分析。

在那些神秘制造者设计的组合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文武”两极之间，总有一个人物处于二者之上。正如在阴阳组合中最完美的是阴阳调和的存在，“文武”组合中地位高于其他男人的男性必须文武兼备。这种三边配置适用于所有阶级。例如，《三国演义》里的统治阶级中，丞相诸葛亮和将军关羽之上是主公刘备。《水浒传》里，水浒好汉的领袖宋江在杀人犯出身的武松与教师出身的吴用之上。经过提升，这些最高领导人总是拥有文武双全的男性身份。

## 领导与“文武”

在传统上，人们认为，为了持续、成功、长远的治国、修身理想，应

<sup>①</sup> 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sup>②</sup> 施耐庵：《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实现男性特质两种风格之间的平衡。统治者长于治国、男人作为个体擅于修身、齐家都被看作是平衡这两种力量的过程。《左传》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在兵法和文艺哲学这两方面均有造诣的贵族典范。例如，儒家所宣扬的治国楷模周公就既是卓越的军事家，也是多才多艺的诗人、学者。以闻名于世的哲学思想、文学才能被尊为文圣的孔子，同时是射箭和御车的爱好者，并鼓励他的学生在接受教育时也修习武艺。<sup>①</sup>早在汉代，司马迁就已经有这样的记录，“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向）；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向）”。<sup>②</sup>而皇帝，理所当然在文武两群臣子之间的上位就座。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初。

中国历史上沿袭下来的为数众多的四字成语和常用语也证明了“文”、“武”的相互强化和在“文武”统一体中的差异。例如，《韩非子·解老篇》有言：“国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赏罚。”<sup>③</sup>《史记》亦云：“文武并用，长久之术。”<sup>④</sup>此外，还有数量可观的成语俗语，如文武双全、文武两全、文武全才、文武健全、文武兼备、文武并用等。它们指的都是文武并举对成功管理国家、家庭和自身的重要性。

麦大维(McMullen)在他有关唐代对武神齐太公崇拜的研究中援引了唐代学者陆淳对文武平衡的理想解说。陆淳认为，文武平衡在春秋时期曾得以实现。但到战国时期，由于军队变得愈加专门化、职业化，与

① 有趣的是，有关武圣关羽的通俗读物中经常提到他喜读儒家五经之一的《春秋》，尽管他在历史上很可能是个文盲。

② 司马迁：《刘敬叔孙通列传》，载《史记》第8册第99卷，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23页。

③ 《韩非子·解老篇》，见《韩非子集释》上卷。周公曰：“冬日之闭冻也不固，则春夏之长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费，而况于人乎？故万物必有盛衰，万事必有弛张，国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赏罚。是以智士俭用其财则家富，圣人爱宝其神则精盛，人君重战其卒则民众。民众则国广。是以举之曰：‘俭，故能广’。”陈奇猷校注：《韩非子集释》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7页。

④ 司马迁：《酈生陆贾列传》，载《史记》第8册第97卷，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99页：“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



文职官吏的距离也逐步加大,这种平衡便被打破了。麦大维将春秋时期的情况总结为:“军中将领同样也是朝中大臣;那些手握(行政)大权的人,同时也是[军队]最高指挥官”。<sup>①</sup> 在陆淳看来,唐代官员的理想形象也应该是“出将入相”的男人。<sup>②</sup>

在清代,满族统治者尤其需要展示他们文武兼备的一面。这在史景迁(Joanathan Spence)对康熙皇帝的叙述中即可见一斑。为了争取汉族精英人士的支持,康熙帝刻意展现自己的文武全才,并表现出对文、武精英双方的需要都予以尊重:

因此,康熙皇帝发起了那些令大清名垂青史的宏大典籍整理工作中的第一项工程(《全唐诗》)。这是一个能带给他自信心与稳定感的措施;在征服了吴三桂、葛尔丹之后,他已然享有赫赫“武”功;现在,他要确保自己的“文”名——成为有文学造诣的皇帝,以证明他虽非汉族后裔,却同样能够欣赏汉人的诗文传统。<sup>③</sup>

因此,尽管并非所有男人都能体现出高水准的文武技能,但真正伟大的男性就可以做到。以乾隆为例,司徒安(Angela Zito)在对一系列乾隆画像的分析中精彩地展示了满族统治者在“文武”上汉化自己的需要。<sup>④</sup> 理想的男性特质可“文”可“武”,但只有在文武双全时才能达到它的最高境界。

对文武平衡的展示不但是道德、文化素养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有助于将其统治权合法化。公开处决死囚、将囚犯游街示众、举行盛大的

---

①② 见麦大维:《齐太公崇拜及唐对武的态度》,第75页。陆淳(?—806),后因避唐宪宗名讳而改名质,字伯冲,号文通,唐吴郡(郡治在今江苏吴县)人,唐代儒家学者,经学家。

③ 史景迁(Joanathan D. Spence):《曹寅与康熙皇帝》(*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耶鲁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157页。史景迁在第130页也探讨过康熙皇帝为赢得文武精英而做的努力。

④ 司徒安(Angela Zito):《身体与笔墨:作为文本和仪式表演的十八世纪祭天大典》(*Of Body & Brush: Grand Sacrifices as Text/Performanc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6页。

阅兵仪式都有助于证明其统治的正当性，并保证其统治的延续性。但仅仅炫耀武力本身是不够的。在有关中国的叙述中，它常常被当作是一个文化优越、先进的国家。因此，要使其在中国的统治合法化，帝王们还必须唤起人们对他们文化成就（其“文”的属性）的尊重。在这种背景下，“文”、“武”便成为展示和维护皇权的重要工具。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看到历朝历代的社会领导人，特别是皇帝，在书法条幅、卷轴和碑刻上展现其“文”的力量。在当代中国，毛泽东的书法以象征性地表达他对（男性）“文”的力量的驾驭为显著特色。<sup>①</sup>直到今天，我们仍常常听到人们对女性书法的质疑，认为她们从来没能真正抓住这一艺术形式的本质。内在的力量是写出苍劲字体的必然需要，而女性被视为缺乏释放这种力量的能力。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当代，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著名书法家都是男性。书法已构成了“文”的力量展示的一部分，并与男性特质密切相关。因此，对非男性来说，书法已不可掌控。各个历史时期、各个信仰的男性领导者都在寻求展示他们文武两方面的实力。也就是说，所有雄心勃勃的男人都在向文武兼备努力，而真正做到这两点的就成了伟大的人物。比他们稍逊一筹的男性可能只做到了其中之一。但即便如此，这种部分成功也会赋予他们男性特质的光环以及在某一领域的主宰权，无论这领域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毛泽东在他的诗词《沁园春·雪》中认为，包括汉唐在内的所有伟大王朝的开国皇帝都算不上是真正的伟大人物，因为尽管他们都曾以武力征服了中国，但他们“略输文采”、“稍逊风骚”，欠缺了对一个最高领导人而言十分重要的品质。<sup>②</sup>

① 对书法与权力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参见理查·克劳斯(Richard Kraus):《书法与权力：中国书法艺术与现代政治》(*Brushes with Power: Modern Politics and the Chinese Art of Calligraphy*)，加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② 毛泽东：《沁园春·雪》，载《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1页：“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 “文”优于“武”

虽然理想的男性形象必须达到“文武”之间的和谐,但这并不是说,“文武”之间的关系是或一度是平等的。事实上,这两股力量之间的关系既动态对立,又融洽和谐。《论语》中的一段摘录表明,虽然在秩序井然的儒家统治中,文武各据其位,但从中国哲学思想发轫之初,“文”就被认为比“武”更优越。在对音乐和美德的讨论中,孔子明确表示了他对非武力方式的偏好。正如刘殿爵(D. C. Lau)指出的,尽管并非所有的音乐都有唱词,但所有的诗歌都可以吟唱;因此,音乐与诗歌(文)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刘殿爵认为,由于这种紧密的联系,可以说,孔子对音乐发表的观点也就相当于他对整个文学的观点:“孔子要求音乐不仅尽美,而且尽善。这也隐含着他对文学同样的要求”。<sup>①</sup>

《论语·八佾》的记载中显现了孔子对“文”胜于“武”的偏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这里的《韶》是歌颂传说中部落联盟首领舜的德行的古乐,表现了舜以圣德受禅于尧。另一方面,武王以征伐夺取天下,歌颂他的音乐因此被称作《武》。由于“武”需要诉诸武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武”不如“文”。同样,汉代儒家经典《春秋繁露》也记叙有这样的文字:“故文德为贵,而威武为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sup>②</sup>

作为文神,孔子对“文”胜于“武”的偏好不足为奇。在第三章,我们将对孔子的重要意义做进一步的探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汉语中的“儒”字,最早指儒家学者,而现在则成为学者的普称。正因为如此,至少是在书面文字中,相较于“武”,“文”在多数时候都占据了首要地位。虽

<sup>①</sup> 刘殿爵(D. C. Lau)译:《论语:前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年英文版,第39页。

<sup>②</sup> 董仲舒:《春秋繁露卷第六·服制像第十四》:“夫执介冑而后能拒敌者,故非圣人之所贵也,君子显之于服,而勇武者消其志于貌也矣。故文德为贵,而威武为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载曾振宇、傅永聚:《春秋繁露新注》,商务印书馆2010年6月版。

然这两种男性之道之间的关系可能曾经充满张力，但至晚唐时期，文臣们已经在讥笑武将们空有一身蛮力却大字不识一个了。<sup>①</sup>这一时期“文”的优胜地位还表现在麦大维(McMullen)对册封称号的讨论中。无论是单字还是双字出现的册封称号，都反映了“文武”的二元对立。“在这种背景下，‘文’、‘武’开始相互排斥。即便如此，唐朝在其他时候的男性理想仍是一个能把‘文’、‘武’结合起来的文官或武将……”<sup>②</sup>册封称号中的文武分隔明显展现出一种等级制度，那些获得“文”字封号的大臣享有至高声望。而那些获得“武”字封号的，则被认为是等而下之的异类。<sup>③</sup>

这种对人才进行划分的等级制度，意味着“武”在中国历史的许多时期都与非精英的男性特质联系在一起；而“文”则常常是更为精英的男性形式。正如麦大维指出的，这种情形并非始终如一。在春秋时期，周室衰微，诸侯混战才使周室得以残喘。<sup>④</sup>这也许可以解释春秋时期文武在一名官员身上统一的原因。而这种文武兼备的官员在此后是如此之少，以至于陆淳、黄宽重等古今学者都为之感到遗憾。黄宽重指出，到东晋时，士兵与奴隶同类；而在宋代则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说法。<sup>⑤</sup>这时，“武”已更多地与缺乏社会权力的非精英男性联系在了一起；而“文”，则很明显成为精英阶级的男性特质。当然，在理论上这两者都有实现的可能。普通男人可以对获得“文”的属性抱有雄心，一如精英男人可以对“武”的属性有所追求。清朝的满族统治者就是这样做的。

在他们和女人之间的两性关系上，具有“文武”不同属性的男人之间也显现了明显的差异。作为文学艺术最普遍的主题，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表现出“文”与女性的亲密关系。而“武”的英雄则以抵挡女性魅力的诱惑来展现他的力量与男性特质。西方的“男子汉”总是俘获女人。与

① 黄宽重：《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新文丰出版公司（台北）1980年版，第391页。

② 麦大维：《齐太公崇拜及唐对武的态度》，第80页。

③ 同上书，第82页。

④ 同上书，第68页。

⑤ 黄宽重：《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第397页。

之相反,在中国文化里,“武”的英雄则必须克制自己的性欲和爱欲。在下一章对武圣关羽进行探讨时,我们将对这一重要差别作出进一步的阐释。在第五章中,我将以武松为例,证明《水浒传》、《金瓶梅》的读者在他为淫荡的潘金莲所爱慕时认定他将是个“男子汉”。<sup>①</sup> 而只有当他拒绝了嫂子的勾引时,武松才真正成为“男子汉”。对情欲和性欲的克制是“武”的美德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武”的男性对女性的必然排斥所相反,“文”的男性却常常超额履行他们对女性的性义务。

参加或成功通过皇家科举考试是男性形象一个受人尊敬的部分,标志着通向无数“才子佳人”爱情故事的吸引力和性权力。就像张生和崔莺莺的例子,考生赴省城或进京赶考的旅途给他们带来了与女性邂逅的机会。<sup>②</sup> 本书将在第四章对作为才子典型的见习文人张生予以讨论。才子在古代中国总能赢得女人的欢心。和当代西方的硬汉相似,才子也有权在不便宜时抛弃她们。而这无损于他们今后的吸引力。与“武”的英雄以拒绝女性的方式来反衬其道德力量不同,要成为一个成功的文人,抱得美人归的年轻书生就必须恪守义务。滥用这项权力,毫不在意地抛弃妻子、情人,会给“文”的主角招致非议和可能的惩罚。坏丈夫的典型陈世美,在高中状元后抛妻弃子,因而死于铡刀之下。这就是对上述原则一个很好的说明。<sup>③</sup>

“文”、“武”的分离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农民或者说劳动阶级的“英雄”得到了广泛宣传,也由于近期西方男性形象的输入,“武”的理想获得了愈加显著的地位。与这两种趋势相伴

① 施耐庵:《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3 年版。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② 王实甫:《西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③ 《秦香莲》,又名《铡美案》,是中国戏曲舞台上最流行的剧目之一,讲述陈世美考中状元被招驸马后追杀携儿女进京寻夫的妻子秦香莲,后被包拯铡死的故事。对陈世美的形象描述,参见刘兰英等编:《中国古代文学词典》(第二卷),广西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721 页。

的，是男性特质中“武”的类型在电影、小说和戏剧中的加强。<sup>①</sup> 李存葆的小说及改编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反映了 1980 年代初军队中的同志之情、忠诚无私与自我牺牲。<sup>②</sup> 1986 年拍摄的电影《红高粱》则揭示了传统好汉与当代西方硬汉形象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这部电影的男主角鲁莽、冷酷、凶残、粗野，但又强壮、果断、不可战胜——他在对日本人的一次大胆袭击中幸存下来。同样，“寻根”文学被贴切地形容为“中国的西部小说”。<sup>③</sup> 在第五章，我们将对“寻根”作家贾平凹的小说做更为仔细的考察。许多“寻根”文学作品都以对粗犷不羁的边民的描写而引人注目。这些边民用对待自然的粗暴态度对待女人，这一点和美国的西部拓荒者十分相似。<sup>④</sup>

人们认为上述这些故事中的男主人公是“武”的男性形象，尽管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不是士兵。因此，“武”不完全是一项军事活动，正如“文”也不只是学者专属。比如武松，与其说他是衙门里的官差，就不如说他是绿林强盗。近年来，海外华人也开始展现出“武”的一面。这从李连杰、成龙的功夫电影中即可窥见一斑。他们以及其他一些流行的电影男演员，比如李小龙，常常扮演劳动阶级的英雄形象。这些英雄不但在中国内地与香港上演自己的英勇事迹，还踏入了西方世界。“文武”在世界舞台上发生着既潜移默化、又明白无误的影响。我将在最后一章对这一现象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尽管“武”的地位日渐升高，但在中国男人对自我的日常表达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更为柔弱文雅的知识男性的力量。例如，中国台湾的电视报道在选情摘要中经常罗列候选人的最

① 包苏珊记录了克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所蕴含的传统偏见的困难，当父母的甚至不愿让子女进体育院校并以此为业。见包苏珊：《为祖国锻炼身体：道德秩序下的中国体育》（*Training the Body for China: Sports in the Moral Ord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80—209 页。

② 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载《十月》，第 6 期（1982 年）。

③ 朱红翻译的这种风格的集子起名叫《西部中国》，巴兰坦图书出版集团 1988 年版。

④ 参见雷金庆编译：《异乡异闻：郑万隆小说选》，康奈尔东亚丛书 1993 年版。

高学历,显示了“文”的价值仍保持着强势。大量拥有博士学位的候选人活跃于台湾地区政坛,这与当代西方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西方候选人很少拥有博士学位,即使有,也不会把重点放在他们所受的精英教育上,而会强调他们的体育特长或从军经历。从“文”的意义上来说,教育象征着“得到权力的权利”,因而是吸引华裔选民的特点。但对澳大利亚等许多西方国家的候选人而言,高学历背景很可能是选战中的不利因素。

一般而言,“文”、“武”两极之间的动态张力为多种男性自我表达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文武”二元体系的历史既足够古老又足够新近。相对于西方男性特质和中国女性特质,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用来发展中国男性特质理论的基础。早前研究对西方男性的性模型不加质疑的认同,引出了中国男人不是“男子汉”(对这一现象的讨论参见第七、八章)的偏颇结论。而用来解释中国性差异的阴阳模式受限于“气”的流动性,也无法深入阐明男性特质的特异性。“文武”二元论则克服了这两种理论窘境。此外,将阶级差异融入性别分析的问题也在“文武”二元体系当中得到了解决。不同阶级男性社会权力的不平等现象可以借由“文武”二元论作出解释,而不必诉诸倾向于将男性特质与社会权力直接联系起来的化约主义。<sup>①</sup>

在本章,我已论证了采用本土化理论建构来分析中国男性特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接下来,我们需要为这种分析方法的意义如何、影响怎样找出答案。为此,我主张对“文”、“武”的象征孔子和关羽进行详细研究,以廓清建构他们男性特质的方式在性和政治上的意义。虽然“文武”

---

<sup>①</sup> 尽管没有提及文武概念,但诺尼尼(Donald M. Nonini):《“争论”与“吃米的钱”之辩证法:西马来西亚华人男性的阶级冲突与性别想像》(“The Dialectics of ‘Disputatiousness’ and ‘Rice-Eating Money’: Class Confrontation and Gendered Imaginaries Among Chinese Men in West Malaysia”),载《美国民族志家》(*American Ethnologist*),第26卷第1期(1999年),第47—68页,是将阶级、种族和男人之间权力斗争中的话语操纵联系起来的最富见地的文章之一。

二元构成了我们分析框架的基础,但如果仅仅只是重复与性有关的传统理论和陈词滥调,我们显然无法超越现存的性别、阶级意识形态。而这些意识形态已帮助世界上适应力最强的文化在中国延续了几百上千年。因此,本书以下的章节除了使用中国的分析方法之外,还将使用诸如符号学和精神分析理论等西方方法论。我将把目光放在男性特质的典型代表上。因此,我援引的大部分资料都将来自那些塑造了标志性、典范性男性人物的文学文本。虽然我在研究中涉及的文本原文大多为中文,但由于它们本身地位重要,通常已有现成的英译本。其中一些,比如将下一章进行讨论的《三国演义》,更是译本众多的经典之作。





## 第二章 战神关羽：性、政治与“武”的男性特质



1890年版《三国演义》中的插图：关羽读春秋。  
请注意他身前地上放着的书匣和仆从扛着的大刀——这分别是“文”和“武”的象征。

在上一章我曾指出，因为常见于与勇敢、友情和身体力量有关的行为中，“武”的特点是比较容易得到西方读者认同的男性品质。和“武”的男性联系最为紧密的中国典范形象，是“英雄”。这一章，我们将探讨中国英雄的构成因素，并在性与政治的层面上分析它的特点，以放松“武”的男性特质上弥漫着的性与政治的紧张感；传统上，这种紧张总是包裹在道德的外衣下。从性与政治的角度来明确“武”的男性特质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中国的武士/战士常常被塑造成毫无浪漫情怀的男人。似乎激励他们的只该是有意义的大事，而不是个人的爱恋。

中国英雄的无性化特点也反映在了现有的学术研究中。有些学者把英雄与中国的侠义观念联系起来。<sup>①</sup> 另一些则对英雄所具有的“革命性”和“群众基础”进行了探讨。<sup>②</sup> 然而，目前还没有研究把性政治当成理解“武”英雄之动态变化的重要一环。中西学术传统对中国英雄的性都没有引起重视。人们常常解释说，在西方骑士的浪漫故事中，爱情往往是骑士们所作所为的主要动力；与此相反，在古代中国的侠义故事中，爱情（及其性暗示）“的作用就没那么重要了”。<sup>③</sup> 在上一章中，我们曾约略提及那种认为中国男性不及白人或黑人男性性感的观点。而上面的解释不但源自而且更强化了这种观点。

尽管经过了精心选择和形象处理，对中国英雄明显的去性化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中西大众偶像的制造者都成功地建构了一些看似无性的人物形象，比如电视连续剧《功夫》中的金贵祥（大卫·卡拉丁饰）和永垂不朽的解放军战士雷锋。文艺批评界在对这些号称无性的形象进行描述时未能辨识他们身上性的因子。这意味着他们也是性这个重要层面

① 参见刘若愚 (James J. Y. Liu)：《中国之侠》(The Chinese Knight-Errant)，路特里奇与克干·保罗出版社 1967 年版；崔奉源：《中国古典短篇侠义小说研究》，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6 年版。

② 周中明：《中国的小说艺术》，贯雅文化（台北）1990 年重印本。

③ 刘若愚著，周清霖，唐发铨译：《中国之侠》，上海三联书店，第 203 页。刘若愚、崔奉源在其著作中均未提及性。

在中国男性特质形成过程中遭到忽视的原因之一。<sup>①</sup>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不承认中国英雄身上存在着性的人,只反过来加剧了人们对性的敏感。在过去的几年里,多多少少受到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思潮的启发,西方汉学家们也开始探索传统与当代华语文学中男人与性的问题。<sup>②</sup> 有一些学者,比如马克梦,已经对明清文本中男人的性进行了研究。在他之前,这还是个长期被学术界忽略了的边缘化问题。<sup>③</sup>

在这一章中,我将汇入这股对男性特质的中国表达重新进行评估的队伍,从性和政治的角度分析武圣(英文中常常译为战神)关羽。“在中国,孔子被尊崇为文化学术领域最伟大的人物,而关羽被尊崇为军事领域最伟大的人物”;<sup>④</sup>因此,关羽对男性特质的“文武”构建至关重要。在中国大陆和各种海外华人社会中,关羽的形象都无处不在。他招牌似的红脸和暴烈的表情使得这个形象的辨识度极高。但是,他的重要地位却不易察觉,也很难用言语描绘。关羽(公元 160—221)在世时,漫长而繁荣的汉代(公元前 206—公元 220)正走向末路,而混乱的三国时期的帷幕正徐徐拉开。他只是这一时期诸多著名军事将领中的一个。他可能不识字,既没打算救国于水火,也对投靠明君以驱除鞑虏没兴趣。然而,

① 给“英雄”下个精确的定义自然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在涉及到不同文化时。在本章中,它指的是中文术语“英雄”与“好汉”所涵盖的各种变体。其他“道德”类的变体则在此后章节中提及。

② 参见马克梦(Keith McMahon):《吝啬鬼、泼妇、一夫多妻者:十八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性与男女关系》(*Misers, Shrews and Polygamists: Sexuality and Male-female Relation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杜克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白露(Tani E. Barlow)编:《现代中国的性别政治:写作与女性主义》(*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Writing and Feminism*),杜克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李木兰(Louise Edwards):《〈红楼梦〉中的性别规则:贾宝玉的双性恋》(“Gender Imperatives in *Honglou meng*: Jia Baoyu's Bisexuality”),载《中国文学:论文、文章、评论》(*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and Reviews*)第 12 期(1990 年),第 69—81 页;《末代中华帝国》(*Late Imperial China*)女性特刊,第 13 卷第 1 期(1992 年 6 月);和《立场》(*Positions*)“当代的性”特刊,第 13 卷第 2 期(1994 年冬季刊)。

③ 马克梦(Keith McMahon):《十七世纪中国小说中的因果与限制》(*Causality and Containment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布里尔出版社 1988 年版。

④ 朱正明:《中国关帝文化寻踪》,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 页。

在嗣后的 1600 年间，他的地位却稳步上升，直至明代由帝王封神，成为“关圣大帝”。在西方有关权力与统治的叙述中，我们很难找到任何一个与之相应的形象。或许，他是圣乔治和圣彼得的“混合体”。又或许，他中和了罗宾汉和丹尼尔·布恩、席德和奈德·凯利、约翰·韦恩和阿诺德·施瓦辛格的形象特点。但这些类比远远不够精确。这些组合尽管独特，却不够稳定。而关羽的人格特征中却有一点始终如一——坚定不移的自我控制。要是用现代一点的词汇来描述的话，他就是冰山“酷”男的化身。

在本章，我们将还原关羽的爱与欲。迄今为止，人们一直认为这位不朽的中国英雄只受诸如忠诚之类的崇高理想或动物野性所驱使。在大多数读者的头脑中，性在本质上是异性情欲行为的观念还占据着主导地位，这部分导致了人们否认性是“武”所固有的元素。这一先设观念蕴藏的暗示是，男人之间的情感表达非关性欲。然而，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阅读这些文本，就像在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和古希腊那样将双性恋作为常态、将同性情欲置于异性情欲之上<sup>①</sup>，我们对“武”的英雄的看法就会迥然改变。<sup>②</sup>

毫无疑问，在整个中国历史时期，同性恋是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创

① 我需要在此说明一下，本书中提及的同性恋、双性恋和异性恋都是描述人与人之间性行为术语，不附带任何现代病理学的含义。霍尔珀林认为在古代这些术语的构建是完全不同的，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霍尔珀林(David M. Halperin):《性别在性之前:古雅典的男性、政治与权力》(“Sex Before Sexuality: Pederasty, Politics, and Power in Classical Athens”),载杜伯曼(Martin Bauml Duberman)等编:《隐藏的历史:复原男、女同性恋的过去》(*Hidden From History: Reclaiming the Gay and Lesbian Past*),企鹅图书公司 1991 年版,第 48 页。

② 关于日本的情况,参见井原西鹤(Ihara Saikaku):《男色大鉴》(*The Great Mirror of Male Love*),沙洛(Paul Gordon Schalow)译并附译者前言,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关于希腊,参见多佛(K. J. Dover):《古希腊同性恋》(*Greek Homosexuality*),达克伍出版社 1978 年版。古希腊同性恋当然不是没有自己的问题。比如,布洛赫最近就对变男童癖做了负面的评定。布洛赫(Enid Bloch):《古希腊经典中男人与男孩的性:是公民教育还是虐待儿童》(“Sex between Men and Boys in Classical Greece: Was It Education for Citizenship or Child Abuse”),载《男性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Men's Studies*),第 9 卷第 2 期(2001 年),第 183—204 页。

造性艺术其中的一个很大的特色。<sup>①</sup> 尽管同性恋行为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界定<sup>②</sup>，但它往往与行为者之间的身体接触有关。而其他不太明显的同性关系，则有可能涉及更深层的情绪和感觉。这些同性关系经常在有关男性亲密的讨论中受到忽视。例如，男人之间的相互亲近和吸引力可能来自各种社会关系，比如恩惠施予、兄弟情谊、同志友爱，甚至竞争对手。这些社会关系所引发的英雄之间的情感，诸如占有欲、嫉妒心和性欲（即使只存在于潜意识之中），可能比单纯由性引发的情感更为强烈。为了避免在准确界定同性恋构成时遇到的困难，也为了把握“同性社交与同性恋之间难于打破的连续体”，我将在这里使用塞奇维克（Kosofsky Sedgwick）“同性社交欲望”的概念。<sup>③</sup> 通过证明它在西方世界以外同样有效，这一概念也为中国研究在性别领域作出贡献指明了方法。

塞奇维克的模型之所以特别具有启发性，是因为它“为概括男人与其他男人之间的关系结构，并显现其历史差异提供了一个策略”<sup>④</sup>。这一策略使我们能够在承认它们差异的同时，将两套与关羽有关的资料放在一起并排比较。就这一点而言，什么才算是性（再次借用塞奇威克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艺术类别或是历史时期。毋庸置疑的是，文学小说往往对性不着一墨，而言情小说则会对情欲与感情活动大肆渲染。然而，同性社交连续体的结构却保持恒定，尽管这个恒定状态随着文化差异会有所变化。

① 这在小明雄：《中国同性爱史录》，粉红三角出版社（香港）1997年增订版中有记录。英文著作参见韩献博（Bret Hinsch）：《断袖之情：中国男同性恋传统研究》（*Passions of the Cut Sleeve: The Homosexual Tradition in China*），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与当代更为相关的探讨参见裴开瑞（Chris Berry）：《略有偏侧：东西欲望的形貌》（*A Bit on the Side: East-West Topographies of Desire*），EmPress（悉尼）1994年版。

② 比如，对男人来说，拉手在某些圈子中被视作一种有性意味的行为。

③ 塞奇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男人之间：英国文学及男性同性欲望》（*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④ 塞奇维克：《男人之间：英国文学及男性同性欲望》，第2页。

如前所述，作为武圣的关羽，在庙宇中总是被放置在文圣孔子（下一章将专章研究孔子）的身边。他是用来说明“文武”男性特质原则的完美模型。通过否认“武”的英雄身上存在任何性或浪漫的欲望，作家们（不用说这都是些“文”的男性）已成功地把身体力量更强大（通常也来自下层阶级）的男人塑造成没有同情心或其他人类情感的形象。不过，关羽是个模糊的形象。只要阅读者对精确的敏感度不要过高，这个形象足够模糊到可以用各种各样、出乎意料的方式进行解读。因此，普罗大众大多对关羽顶礼膜拜，而文化政治精英们却对孔子崇敬有加。虽然是古典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把关羽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文学形象<sup>①</sup>，但有关他的传说却是一个混合体，综合了小说和整个三国传奇故事链中他所有那些令人难忘的事迹。<sup>②</sup>

## 性化的武士写照

高罗佩(Van Gulik)等学者指出，在有关性的中国传统经典中，性交往往被当成战争来描写。<sup>③</sup> 反之亦然。军事和政治活动也可以从性的角度去解读。这种喻意可以用来阅读整部《三国》。例如，当武士们被迫为盗为匪时，他们说自己“失身为寇”、“失身为盗”，就像女人形容自己被迫失去处女或贞节一样。另一常见语“宁死不屈”，也同样既可以从政治角度也可以从性的角度来阐释。虽然这些说法有着高度的隐喻色彩，但无论从哪个层次阅读，《三国》终究还是一部关于政治和军事战争的小说。而这个领域最具价值的东西，是男性的实力展现。因此，不管是不是从

① 小说《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重要小说。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嘉靖元年(1522)刊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公认的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也是今天中国人最常阅读与最有影响力的三部中国小说之一。

② 为清楚起见，我将用《三国》来指称小说，而用“三国”来指代这个时期所有相关的故事文本，包括小说在内。

③ 高罗佩(R. H. Van Gulik):《中国古代房内考》(*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布里尔出版社1974年版，第278—279页。

性化的角度去阅读,《三国》都为研究男性特质的表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这部长篇小说塑造了数以百计的英雄,但只有关羽脱颖而出,成为原型式的“真英雄”——武圣。<sup>①</sup>

作为英雄的化身,关羽被描述成只具有“光明磊落”的情感,而“对美女、宝藏无动于衷”。<sup>②</sup> 所有评论者都不拿这其中潜藏的禁忌当回事儿,从而忽略了从“性”的角度对这个人物予以分析。因此,恢复关羽的性身分,是对他在中国精英文化中“无性大丈夫”的正统形象的驳斥。我们聚焦于关羽的另一个原因是,尽管关羽是独一无二的,但他也是进行一般化概括的最佳样板。他是所有中国历史和文学人物中最受颂扬与崇拜的一个。<sup>③</sup> 在其他死后的1600年间,他被历代统治者推崇为关公、关帝和关圣。<sup>④</sup>

这些册封追认把关羽当成“武”的完美化身。这延续并反映了他在普通老百姓中日隆的声望。人们以他的名义建造了数以千计的庙宇。今天,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海外,他都是华人文化圈最有名的神祇。除了众多的关帝庙,从澳大利亚的偏远内陆到纽约的繁华都会,关公的小神龛在当地的华人餐馆中都随处可见。他的人气之旺,已扩展至各种社会组织,甚至包括了反建制组织。例如,三合会就以关羽为其守护神。在其他的大众媒介中<sup>⑤</sup>,比如戏曲、漫画和故事书,关羽和《三国》中其他

---

① 于如柏在他对传统小说英雄的研究中把关羽单列出来做单独讨论。于如柏(Robert Ruhlmann):《中国通俗小说中的传统英雄》(“Traditional Heroes in Chinese Popular Fiction”),载芮沃寿(Arthur Wright)编:《儒家信念》(*The Confucian Persuasion*),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41—176页。谢鹏雄在他关于文学中的男人的书中开篇即把关羽作为首要一章。谢鹏雄:《文学中的男人》,九歌出版社(台北)1992年版,第11—18页。

② 李希凡:《略论〈三国演义〉里的关羽的形象》,原载《文艺报》,第17期(1959年),重刊于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编:《三国演义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408页。

③ 参见黄华节:《关羽的人格与神格》,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

④ 对关羽名号的讨论参见罗斯(Gordon Victor Ross):《戏剧中的关羽:两部元杂剧的译本与批判性讨论》(*Guan Yu in Drama: Translations and Critical Discussions of Two Yuan Plays*),得克萨斯大学1976年未发表博士论文,第19—25页。

⑤ 新年剪纸、庙宇绘画等例子请参见王树村编:《关公百图》,岭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

英雄的传奇故事仍在为老老少少提供着无尽的乐趣。<sup>①</sup> 关羽的形象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男性特质观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关羽身后谥号、庙宇虽多，关于他的形象对男人的性与权力建构的影响，却没有任何专门研究见诸于世。

这种学术沉默，并不是由这个形象的创造者们对关羽的最初建构造成的。例如，汉丞相曹操和关羽的义兄兼主公刘备在小说中有一段关于英雄的著名对话。其中，就强调了男性特质和权力。曹操把英雄描述为拥有巨大野心的男子——几乎志在统治天下。更重要的是，曹操还对英雄本色做了个间接说明：像龙一样，“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曹操概括出的这个特点既不新鲜，也不意外。他只不过是在重复他那个时代“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的老生常谈而已。<sup>②</sup> 令人感兴趣的，是他所重复的这些“英雄”品质的象征意义。龙不单单指向权力和控制。更重要的是，透过对其阴茎般伸展性的描述，龙还召引着男性所特有的潜力。<sup>③</sup> 通过曹操，小说的作者提出了这样一个英雄的概念：阳刚的男性特质和权力——尤其是统治权——相结合。这个概念是由曹操这个人物来阐明的。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曹操是小说塑造的所有人物中最会弄权也最醉心于权力的一个。

曹操这段话的结论是：“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即他和刘备是当时唯一的真英雄。这个判断的基础显然不怎么可靠。历史上的曹操虽然是三国时期最有权势的人，也可能是最杰出的男人的领袖，但由于

① 关于关羽对大众文化与海外华人的影响的探讨参见霍奇(Bob Hodge)、雷金庆(Kam Louie)：《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政治》(*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路特里奇 1998 年版，第 119—142 页。

② 对龙的力量这番描述非常古老。参见许慎(汉)撰、段玉裁(清)注：《说文解字注》，古籍出版社(上海)1981 年版，第 582 页。

③ 把龙和男人的性联系起来是很普遍的。在周嗣文关于中国性史的著作中，书名就生动地表明了这一点。周嗣文(Eric Chou)：《龙凤》(*The Dragon and The Phoenix*)，Corgi Books 1973 年版。



小说把他描写成一个“奸雄”、一个“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暴君，他在中国读者的心目中就丧失了作为一个真英雄资格。类似的，刘备虽然在小说中被当成是大汉王位的正统继承人，但又被称为“枭雄”，许多评论家都视之为不值得效法的虚伪政客。以“文武”而论，曹刘二人都不孚擅武之望。相比之下，关羽作为“武”的象征最经久不衰的神话之一，就是他的从不背叛，坚持正道。在整部小说中，也只有他令曹操始终满怀敬意。在性的层面，曹操和刘备都相当活跃。而关羽的行为举止则显得忠贞、正直，其隐藏的性意义需要一番梳理才能显现。

对关羽的外貌特征进行一番考察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在大众印象中，关将军身材魁梧、长须红脸。这与小说中第一次对他进行的外貌描写是一致的：他“身長九尺，髯長二尺，面如重棗，唇若塗脂，丹鳳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凜凜”。这里提到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他非比寻常的身高。《三国》中所有的英雄人物如放在普通士兵中都显得鹤立鸡群。拿身材大小来衡量权力与男子气概的多少似乎是一个普遍接受的概念，并不需要什么缜密推敲。<sup>①</sup>

关羽的另一个特征是两尺长髯。面部和其他身体部位的毛发都是公认的男子成年的标准。在《三国》中，曹操对关羽的胡子大加赞赏，称他为“美髯公”，还赐给他两个纱锦囊裹胡子。我们从而得知，关羽的胡子格外地与众不同。但这胡子和男性特质之间的联系还不是很清晰。<sup>②</sup>在大众想像中，毛发（在这儿指的是非同一般的胡子）与男性特质则联系得更为紧密。据民间传说，关羽的胡子是由小龙变来的。<sup>③</sup>而在对关羽

① 在许多武侠小说，如《儿女英雄传》里，我们的确能找到一些小制大、以弱制强的例子。不过在这种情形下，胜者多半是女人。而在涉及到男人时，尺寸的逆转似乎暗示着大块头是留给有权势的男人的。

② 秦汉律法规定剃须发是对严重罪行的惩戒。剃发戴枷就是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的象征。参见何四维(A. F. P. Hulswé):《汉代文献》("Han-time Documents"),载《通报》(T'oung Pao),第45期(1957年),第36—37页。对关羽胡须的强调因而可被视为在特定历史时期对他坚不可摧的美德与男子气概夸大的推想。

③ 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735—736页。

的外貌描述中，龙这个主题反复出现。

关羽外貌上的第三个特征是红脸——这也是具有男子气概的英雄（例如，中国戏曲脸谱）所共有的特点。小说只是顺便提及了关羽“面如重枣”。但在民间故事中，关羽的红脸是许多神话传说的中心。有个传说讲到，为搭救一个被强奸的女子，关羽杀了人。在他洗脸易容时，用了王母娘娘赐下的圣水。这个用圣水洗脸的过程把关羽变成了闻名遐迩的红脸英雄。就阴阳关系而言，水属极阴（女），而红色是极阳（男）的颜色——因此，在至高无上的女神的干预下，极阴之气转化成了至强的阳气。<sup>①</sup>

关羽的红脸意味着强大的阳（男）气。作为他男性特质最突出的标记，这个红脸已经成为战神的象征。然而，这一男性特质的标记源自一个男人杀死正在侮辱女性的另一个男人这样的正义行为。透过至高无上的女神圣水（最极致的女性液体）的洗礼，性的弦外之音得以实现。这个传说中蕴含着具体的性（sex）与广义的性（sexuality）。而这些，在《三国》中都完全被省略了。

## 作为陪衬的女人

男性力量与性的关联不光体现在关羽的外貌特征上。他挥舞的大刀——闻名遐迩的关刀——又被称为“青龙偃月刀”。武器，包括大刀在内，普遍被用来作为阳具能力的标志。<sup>②</sup> 关羽这把刀借着龙的主题重申并强调了这种关联。事实上，没有历史证据表明关羽曾使过大刀；同样，

① 这个故事的一个版本，可参见丘振声：《三国演义纵横谈》，晓园出版社（台北）1991年版，第46—47页。天后娘娘需要通过吸精大法来保存她的青春活力——把阳气从她的男性性伴侣身上吸出来。因此，她的“水”中很可能含有这种阳气。参见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第158页。

② 希腊的例子参见多佛（K. J. Dover）：《古希腊同性恋》（*Greek Homosexuality*），达克伍出版社1978年版，第133—134页。

还有他的枣红脸。是后世的故事讲述者才使得这些创造经世不衰。<sup>①</sup> 关羽的这把青龙偃月刀象征着一种自恋的力量。这种力量,只有在女性的衬托下才能显现出来;她的身体令男性的力量不言自明。

关刀的性意味只有在大众文化层面才展现得更为清晰。这也反映在故事讲述者对三国时期最迷人的美女貂蝉的命运的再创造中。在大众想象里,貂蝉的故事是“英雄难过美人关”的古训缩影。而关羽跨越了这一关障。在一出元曲中,貂蝉在丈夫吕布死后,被猛张飞(关羽的义弟)献给了关羽。关羽不但没有把她作为战利品接收,还挥刀杀了她。<sup>②</sup> 无论是史书《三国志》还是小说《三国演义》,貂蝉被关羽斩杀的情节都从未出现过。这个创造显然是通过大众媒介——如戏曲、评书——才广为流传的。<sup>③</sup> 超阳刚的象征符号(红脸、长髯和大刀)和对女性的性反感,这二者之间的联系,在大众文化形式中找到了最直接的表达。而以儒家文人为主要读者的正史和小说,则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用隐约、微妙的文字对男为女所制而生的罪孽进行再创造。

关羽和貂蝉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并无接触,尽管貂蝉在关羽和他的两个结义兄弟成为小说主要人物之前就已经出场。根据红颜祸水的古训,她是暴君董卓和他的义子吕布之间冲突的根源。董卓的政敌司徒王允把她作为礼物献给董卓,以挑起董卓与吕布之间的相互嫉恨。她的美貌和手腕,最终收到了预期的结果:吕布杀了他的义父董卓。在小说的

① 小说《三国演义》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提到是刘备命人打造了这把刀给关羽:“玄德谢别二客,使命良将打造双股剑。云长造青龙偃月刀,又名‘冷艳锯’,重八十二斤。”这点儿创新之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肯定了刘备皇室(龙饰)的合法性和他授予政治和性力量的权利。

② 对貂蝉命运的讨论,参见刘知渐:《三国演义新论》,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93—96页。

③ 对杂剧中貂蝉、关羽这一插曲的探讨,参见蒋星煜:《中国戏曲史钩沉》,郑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240—244页。昆剧《斩貂》细述了吕布在白门楼被曹操捉住斩首后,貂蝉被张飞转送给了关羽。关羽怕她为他人玷污,为保全其名节,乘夜传唤貂蝉入帐,将其斩于灯下。元杂剧《关公月下斩貂蝉》与此大同小异,只是多了曹操欲以美色迷惑关羽,遣貂蝉前去引诱关羽而被其杀死的情节。

开头，吕布和董卓是最令人恐惧的一组人物：单就身材大小而言，董卓身形庞大到步履维艰；而即使是在英雄辈出的年代，吕布也是其中的纠纠巨人。作为一个对朝廷和诸侯都拥有绝对权力的暴君，董卓是朝臣们最痛恨也最惧怕的权臣。而他的义子吕布，无疑是小说中武艺最高强的将领。他同时与刘关张三兄弟“转灯儿厮杀”，就足以证明“人中吕布”那英勇无敌的男子气概。

虽然吕布和董卓手握比东汉末年十八路诸侯中的任何一个人更多的权势和勇武之力，他们却从未被视作真正的英雄。相反，这两个人都被认为是道德品质低下的男子。这集中体现在他们对美色的屈从上。吕布在对他的最后围攻中丧命就是一个例子。他犯的错误被归结为听从了妻妾的妇人之见，而对手下将领制定的作战计划置之不理。<sup>①</sup>这种对女人(和孩子)可能对男性同性社交契约构成威胁的担心，在民间叙事的传统中，是以更为残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例如，在关于刘备义子花关索的词话传说的开篇，当叙及刘、关、张约定聚义兴刘、替天行道的情节时，刘备说：“我独自一身，你二人有老小挂心，恐有回心。”于是，在关羽的提议下，关羽、张飞互相杀死对方的家小，以确保他们对刘备的忠诚。<sup>②</sup>

因此，尽管身材、武艺和极度残忍这样的力量展示的确是“武”的男性特质的标记，但这些特点本身并不足以造就“真”英雄。真英雄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必须要有能力抵挡女性的魅力。借用夏志清(C. T. Hsia)对《水浒》<sup>③</sup>英雄的观察来评价关羽：“正是因了在性上的清教主义，

① 参见罗贯中：《三国演义》全2册，桂冠图书(台北)，1988年重印，第177页。陈宫先向吕布献内外夹击之计，布妻严氏阻拦曰：“倘一旦有变，妾岂得为将军之妻乎？”陈宫又献断曹粮之计，吕布复入内告严氏，又遭阻拦。“布愁闷不决，入告貂蝉。貂蝉曰：‘将军与妾作主，勿轻骑自出。’……布于是终日不出，只同严氏、貂蝉饮酒解闷。”

② 参见明成化刻本《花关索传说唱词话》，载朱一玄：《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1997年校点本。英文版参见《花关索传》(The Story of Hua Guan Suo)，金(Gail Oman King)译，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9年版。

③ 另一个著名的《水浒》英译本是赛珍珠本。我们将在第五章对这部小说做进一步的探讨。

这些英雄在潜意识中隐藏着对女人的仇恨。他们把女人当作自己最大的敌人，他们如英雄般成就自我，女人却总是嘲讽地提醒他们做作的一面。”<sup>①</sup>这种抗拒女色的能力有着“阴暗的一面”：它把女人这个魅力之源彻底地消除在了毫无节制的“厌女症”中。在《水浒》里，英雄好汉们对女人的仇恨常常沦为嗜血的屠杀。在《三国》里，英雄们的“厌女症”不像《水浒》中那样肆无忌惮。不过，在三国的通俗叙事中，关羽和貂蝉之间的关系却是这种厌女现象的典型例证。在这里，关羽杀死貂蝉的原因很简单——他不想为女主角所诱惑。这种借由对美女实施暴力而显现男子气概的特点，将欧洲的骑士英雄和中国的“武”英雄生动地区分开了。

阴阳被看成在不断地相互影响中此消彼长。对女性虐待狂式的暴力行径被当作男性力量的一个有效标志。这一点虽然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并没有明确的体现，但民间流传的故事就显示出了比一般的性角力更深的含义。由下层阶级施行性暴力的描写即便是在当代小说里也似乎显得特别锐利、生动。在第五章我们将对此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对于没有其他力量的人来说，诉诸武力以显示力量是他们最容易的选择。阶级就这样和性别交汇在了一起。在小说《三国》中，残暴的行为是由没有直接政治权力的女性施行的。<sup>②</sup>类似的，施行最残暴行为的男人，譬如《水浒》中的“武”英雄杨雄、武松，就都出身于社会底层。<sup>③</sup>

当然，人们也可以争辩说，把作为欲望对象的美色除掉，这种极端行

① 夏志清(C. T. Hsia):《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106 页。

② 例如, 袁绍的妻子刘夫人进行了小说中最残酷的谋杀之一: 袁绍死后, “刘夫人便将袁绍所爱宠妾五人尽行杀害; 又恐其阴魂于九泉之下再与绍相见, 乃髻其发, 刺其面, 毁其尸……恐宠妾家属为害, 并收而杀之”。参见罗贯中:《三国演义》1988 年版第 281 页。

③ 杨雄和武松都以血腥残忍的杀戮而闻名。比如, 杨雄把自己的妻子潘巧云割成了七块, 而武松杀死嫂子潘金莲时的情景也非常恐怖。

为只确定了行为和行为者受性欲支配达到了什么程度。在儒家文人的故事版本——小说《三国演义》中，这种欲望的控制是以更晦涩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关羽和貂蝉之间没有交集，以免英雄的完美形象因与高级妓女有染而被玷污。貂蝉这样的女人是可以被视为商品的。除了作为商品被交换买卖，她们无法在男人之间促成显而易见的联系。只有那些地位相近的男人的妻子或姐妹，才能在它们之间形成超越商品关系的联系。

### 眷恋女色与乱伦禁忌

在被软禁在曹操大营时，关羽日夜守护着他的嫂子们。这段情节是《三国》对社会地位相同的男女之间的关系最著名的写照。在小说里，关羽要领着嫂子们去投奔她们的丈夫刘备。他极度地遵守礼法：从不进入她们的住处，每晚在门外守夜，秉烛夜读。我们在今天看到的关羽的神像，不是持刀，便是持书。他死后不但得以封神，还吸收了文人的特点。就像我们即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文圣孔子经常被称为文武全才。作为武神被崇拜的关羽，同样也往往被赋予“文”的属性。这段情节记叙了他在对待和自己社会地位相同的女性时是如何地恪守礼法。在这里提到他夜读春秋、腹有诗书（而且是儒家诗书）<sup>①</sup>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个桥段常被援引来证明关羽在对待贵妇人时举止得体。在整个寻找刘备的曲折历程中，包括忍辱负重地客居于曹操大营时，关羽最大的担心是这些贵妇人不能受辱。而他自己也和她们保持着一个男人和他的嫂子们之间应有的适当距离。如果故事在这里结尾，那这位在中国文化中备受推崇的伟丈夫就的确是个完全能够控制自身欲望的“酷男”。但是，小说在后面的一个情节中却为其他的解释提供了线索，反映出关羽高度性化的男性特质。

<sup>①</sup> “关云长读春秋”意味着关羽是个忠实的儒家学者。这已成了一个流行的说法。谭良啸、张大可编：《三国人物评传》，水牛（台北）1992年版，第177页。

这个后续情节把关羽对嫂子的执念以政治权力的形式隐晦地表达了出来。关羽的结局是惨死荆州。在他死前不久，关羽梦见他的腿被野猪咬伤，在惊骇中醒了过来。罗慕士(Moss Roberts)指出<sup>①</sup>，这个梦见野猪、伤了腿脚的细节暗指《左传》中的一个经典故事——齐襄公诸儿派大力士公子彭生杀鲁桓公，以掩盖他和妹妹，也是鲁桓公之妻文姜私通之事。事毕又杀了彭生以平息鲁国怒火。他共祖父的堂兄弟公孙无知在齐襄公一个不得宠的妾的从兄、大夫连称协助下作乱。襄公田猎时遇到大野猪，侍从说这野猪是被杀的彭生。齐襄公害怕，坠落车下，伤了脚。公孙无知趁机谋杀了齐襄公，“自立为齐君”。无知续娶了堂兄齐襄公的遗孀、连称的从妹为“夫人”。在血缘传统上，堂兄弟被认为是兄弟。因此，这是一个兄弟相残的故事。<sup>②</sup> 关羽的噩梦象征着他对于刘备的王国和女人有着潜意识的渴望。而这，指向对兄嫂的觊觎、对兄长的背叛。这个发现，使他对兄长表面的忠诚和对嫂子得体的举止有了完全不同的意味。

古往今来的批评家们坚持认为，关羽对嫂子的态度体现了他对义兄刘备的忠贞不二，应该作为一个浩然正气的模范为后世所效仿。<sup>③</sup> 然而，这个梦却指向了一种更为性化的解读。关羽自己在梦醒之后显然很沮丧。不论是在小说还是在那些有关他的众多传说中，他全部的身份都取决于对其英雄形象的维护。这个形象不为凡情所动。他可以不打麻药、刮骨疗毒，也可以把美女貂蝉一刀了断。然而，荆州惊梦却敏锐地对这位军事英雄控制自己恐惧和欲望的能力提出了质疑。对此，公认的解

① 罗慕士(Moss Roberts)编译：《三国演义》(Three Kingdoms: China's Epic Drama by Lo Kuan-chung)，众神图书公司1976年版，第303页。

② 《左传·庄公八年》，岳麓书社(长沙)，1988年，第30—31页。这一情节的英译版，参见理雅各(James Legge)编译：《春秋左传》(The Ch'un Tsew with The Tso Chuen)，初版于1935年，南天书局(台北)1985年重印本。这个故事把关羽通晓《春秋》的流行说法变得更加意味深长，因为《左传》和《春秋》通常是被当成一本书来读的。

③ 直至1985年，中国的批评家继续强调这一情节。参见刘知渐：《三国演义新论》，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28页。

读是，这个梦透露了关羽篡夺其义兄政治权力的秘密野心。但是，如果我们把政治和性当作塑造同一个英雄的不同坐标，那么，从这段情节中读出更多的弦外之意也不是不可能的。

在小说的情境中，对关羽乱伦欲望的暗示，即使是以一种隐蔽的形式，也必须要等到他的狂妄自大已达到自我毁灭的程度才能出现。正如一些评论家指出的，关羽在他被抓住处死之前已狂傲自大到了极点。早前的他可能是会把他的嫂子们完璧归赵地奉还给自己的结拜兄长。但到了做这个梦的时候，他已为自己聚集了相当的政治力量。作为枢纽重镇荆州的统帅，关羽对权力与势力有了更大的野心。这个惊梦的场景当然可以解读为是对他违背道德、攫取权势的教训——即便他妄图从自己兄长、汉中王刘备手中夺取权力的事儿仅仅只是在梦中。<sup>①</sup> 同样，这个场景也揭示了一个男人用一生来压抑自己欲望的潜藏痛苦，无论这欲望是与性有关，还是与政治有关。<sup>②</sup>

不过，这种心理解读对于千百年来各个阶层对关羽日益增长的敬慕之心并无所碍。作为“武”英雄的化身，关羽成功地将他对女色与权力的欲望压抑在自我的潜意识中。这起到了和完全没有这些欲望相同的社会作用。历代统治者都将他供奉为神的原因至此昭然若揭。下属们对篡夺权力的冲动进行自我抑制，这毫无疑问对专制统治有利。在三国故事中，这种权力冲动被巧妙地与乱伦联系在一起。在关羽这里，就模糊地显示为对嫂嫂的觊觎。而这种觊觎，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深受鄙夷的行为。在关于英雄主义和兄弟情谊的故事中，兄弟们不是靠血缘联系在一起的，而是靠爱和感情。因此，在这里，禁忌格外需要强化，以防止

① 其他批评家也对关羽这时的行为作了同样的解读。例子参见金姆里卡(Paul Kimlicka):《文学小说〈三国通俗演义〉:罗贯中的讽刺手法》(*The Novel San Kuo chih Tung-su yen-I as Literature: Uses of Irony by Its Author Lo Kuan-chung*),印第安那大学 1986 年未发表硕士论文。

② 我知道对这个梦的这种佛洛伊德式的解读会引出一些文化问题。然而，即使不做此种解读，关羽梦醒后的行为也证明了我的论断：他不合理的举动很大程度上是他对攫取权力不安的结果，这种对权力的追寻很可能威胁到他对刘备的忠诚。



降临在暴君董卓及其义子吕布身上的灾难重现。董、吕二人的“父子关系”，就是由盟誓而不是通过血缘来加固的。

## 手足之爱

如果我们把乱伦视为关羽与嫂嫂之间一种可能的关系，那么，他和这些女人保持着过分的距离就显得更加意味深长。在三国的传说故事中，刘备、关羽和张飞之间的兄弟情谊备受歌颂。他们的手足之爱使这个故事家喻户晓。假如说关羽或其他英雄在三国中曾显示过任何情感的话，那就是他们对彼此的强烈感情。当他们对彼此众所周知的感情走向极端时，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sup>①</sup>

对大多数评论家和故事的续编者来说，这种感情象征着手足情谊的最高境界。它是“义”的缩影。或者，像许多人所说的，这种感情与臣下对君主的“忠”不同，是一种更为平等的忠诚。由于对小说或三国传奇故事的学术解读不把同性欲望当成一个问题，这种兄弟情谊几乎成了对性免疫的关系。<sup>②</sup>

然而，更接近大众的文学类别却把三国英雄之间这种“兄弟爱”的性意味露骨地展现了出来。例如，在著名清代诗人、学者袁枚收集的故事集中，有一篇特别明确地提到大都督周瑜和他的主君孙策之间的同性恋情是不言自明的。<sup>③</sup> 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这类小说中，男人之间的联

① 例如，刘备在得知关羽死讯时的悲痛欲绝和他以自己国家为代价的复仇渴望。

② 当然，辩称同性社交欲望已成为传统文人生活的一部分，以至于这个问题从来不需要讨论是否是可以的。要是这样的话，现当代的演绎者在这一点上就不够明确。

③ 袁枚：《双花寺》，英译版载雷金庆(Kam Louie)和李木兰(Louise Edwards)译：《袁枚〈子不语〉》(*Censored by Confucius: Ghost Stories by Yuan Mei*)，M. E. Sharpe 1996年版，206—208页。有趣的是，不太宽容的清代文人的笔记小说则视直白的同性恋为可耻的行为，武神关羽就是那个谴责者。例子参见伍慧英(Vivien W. Ng)：《末代中华帝国的同性恋与政府》(*Homosexuality and the Sta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载杜伯曼(Martin Bauml Duberman)等编：《隐藏的历史：复原男、女同性恋的过去》(*Hidden From History: Reclaiming the Gay and Lesbian Past*)，企鹅图书1991年版，第86—87页。

系一直被视为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纽带关系。但是，作为“英雄榜”，这些小说回避任何对同性恋或异性恋行为的明确描述。只有在《金瓶梅》或袁枚辑录的短篇鬼故事这类通俗读物中，这些不够“阳刚”的行为才会被提及。<sup>①</sup>

如果由此就得出这个“男人的世界”中没有任何形式的性或情色感觉的推论，那是愚蠢的。但这显然是大多数传统及现代批评家所持有的观点。在文人小说中，比如《三国演义》，对男人的同性社交欲望的描述多以象征的手法出现。例如，在小说第一章，刘、关、张举行了一个兄弟结义的仪式。他们桃园结义的盟誓方法从此被广为效仿。<sup>②</sup> 情色小说《金瓶梅》就在第一章中重演了这一场景。据埃伯哈德(Eberhard)说，桃子，尤其是桃花，具有明确的性内涵。<sup>③</sup> 值得注意的是，张飞在他对刘、关的邀请中提到他的桃园刚刚开花。

如果我们接受同性社交欲望是三国故事链的一个基本价值，那么男人们有关“义”的行为就变得更加意味深长。例如，“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这样的表达，被频繁地用来描述三兄弟之间的爱。<sup>④</sup> 由于没有明确提及性交行为，这一表达很少被解读为与性有关。虽然在文人观念中这些兄弟间萌生同性恋关系是不被允许的，但非文人的民间故事，如袁枚辑

① 更不用说《弁而钗》和《宜春香质》这样更专门的同性浪漫小说了。马克梦(Keith McMahon)对此的探讨参见马克梦：《十七世纪中国小说中的因果与限制》(*Causality and Containment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布里尔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

② “桃园结义”这一表达通常被用来指代结成兄弟同盟及其他代表忠诚的行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对这一仪式的模仿到处都是。例见麦岚(Lee McIsaac)：“‘兄弟之义’和侠义男人：战争年代的重庆哥老会》(“‘Righteousness Fraternities’ and Honorable Men: Sworn Brotherhoods in Wartime Chongqing”)，载《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5期(2000年)，第1648页。

③ 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中国符号字典》(*Dictionary of Chinese Symbols*)，联邦出版社(新加坡)1990年版，第227—228页。“分桃”，就像“断袖”一样，也指同性恋行为。参见周嗣文：《龙凤》，第21—23页。

④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说法来自《三国志·蜀志·关羽传》：“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12月版，第114页。这一说法在小说的对应点上(三兄弟刚参军时)则没有出现。

录的故事集,则视《三国》小说中英雄之间的同性恋情为自然而然。兄弟“同榻”因而可以被解读为具有超越兄弟般的亲密意味。小说在许多地方都提到刘备和其他英雄人物“同榻”而眠。<sup>①</sup> 尽管中国人有睡在同一张床上(通常一个人的头挨着另一个人的脚)的习惯,而这样做,并不一定意味着性行为,但“同榻”这一用语却长期与性相关。而且,它还经常被用来表示一种等级气息浓厚的性关系。<sup>②</sup> 例如,早在宋代就有了君主“令”属官与他“同榻”的例子。<sup>③</sup>

小说《三国》中没有出现过任何关于同性恋关系的露骨描述。这符合其对任何形式的露骨性描写——无论异性抑或同性——保持的一贯缄默。通过比较小说人物在“同榻”前后的行为和他们对彼此的看法,我们就可以推断出英雄人物到底因为这个行动而亲近了多少。例如,刘备似乎曾与许多下属同榻,尤其是年轻的文人谋士。刘备与他的谋士徐庶执手告别的文字及其显示的强烈感情单从儒家礼仪已无法解释:“玄德就马上执庶之手……泪如雨下。庶亦涕泣而别。玄德立马于林畔,看徐庶乘马与从者匆匆而去……凝泪而望,却被一树林隔断。玄德以鞭指曰:‘吾欲尽伐此处树木。’众问何故。玄德曰:‘因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sup>④</sup>

小说中男男关系之强烈在由同榻产生的嫉妒情绪中表现得更为明

① “同床”与“同榻”都指分享同一张床铺。例如《史记·田叔列传褚少孙论》:“两人同床卧。”唐元代元稹《酬友封话旧叙怀十二韵》:“莫馆同床宿,沙头待月归。”不过,韩非子早就把“同床”当成了“八奸”之一,“贵夫人,爱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同床因此意味着为“夫人”——女人和“孺子”——年轻男人所迷惑。

② 吴存存指出,在明代,描述同性恋关系的动词(如嬖、宠、幸,都指爱宠)通常都带有阶级意味,譬如主上爱宠仆从,年长者爱宠年幼者。而描述异性恋关系的相应动词(如爱、悦和慕)则显得更平等一些。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③ 历史上对“同榻”的使用,参见罗竹风编:《汉语大词典》第3册,三联出版社(香港)1989年版,第122页。例如,《北史·文苑传》:“帝每与嫔后对酒,时逢兴会,辄遣命之至,同榻共席,恩比友朋。”(宋)洪迈:《夷坚乙志·赵仕藻》:“至夜,令尉同榻寝。”《三国演义》第二十九回:“一日,众官皆散,权留鲁肃共饮,至晚同榻抵足而卧。”

④ 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一卷,第321—322页。

显。众所周知,关羽和张飞都曾对刘备与三国中最机智过人的战略家诸葛亮同榻而郁郁不乐。例如,刘备、诸葛亮第一次同榻后关、张二人忿忿不平、不予合作。他们的态度,连诸葛亮都注意到了。<sup>①</sup> 他们似乎对任何分享刘备床榻的男人都心存不满。有趣的是,刘备和下属的关系在同榻后,却总是更为巩固、亲如手足。那些才华出众的男人,如诸葛亮、徐庶和赵云,在和刘备共度一晚之后,似乎都甘为臣下。同榻的行为,并不局限于刘备和他的部下。小说中还有其他几对相亲相爱的男男组合:孙策与周瑜、孙权与鲁肃就是典型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每个组合里,至少有一方是文人。小说对性欲的抹杀在“武”英雄的身上似乎表现得更为彻底。<sup>②</sup>

《三国演义》对性接触并没有露骨描述。对英雄们的同榻时光,小说也和叙述男女同床时一样不着一字。然而,没有读者会质疑小说暗示了吕布与貂蝉之间的关系与性有关。大多数读者的异性恋倾向使他们觉得,在男女关系中有性接触是理所当然的事儿。说到底,如何解读这些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想要采取的写作策略和阅读策略。重要的是,围绕着这些三国英雄,有大量的标记促使人们在采用读写策略时把性与情欲的东西转向政治与军事层面。

男人之间的感情在古代中国为文学创作带来了很多灵感。这并不令人惊讶。这些“千古风流人物”在“谈笑间”、“雄姿英发”的浪漫形象一直萦绕着历代文人骚客。<sup>③</sup> 潜在的性,在诗歌、散文这些更高雅的文学体裁中不出意外地表现得更为优雅、克制。文学类别之间虽有差异,但它

① 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一卷,第347页。第三十八回“定三分隆中决策,成长江孙氏报讎”中,“玄德待孔明如师,食则同桌,寝则同榻,终日共论天下之事。”第三十九回“荆州城公子三求计,博望坡军师初用兵”中:“却说玄德自得孔明,以师礼待之。关、张二人不悦……”

② 上一章已提及这种不平衡之所以会出现的原因。在稍后章节中还会有更详尽的讨论。

③ 例见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Tune: The Charms of Nian-nu”),初大告(Ch'u Ta-kao)英译,载白之(Cyril Birch)编:《中国文学选》(*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企鹅图书1967年版,第361页。

们都公认：男人之间的情感之自然、之基本，令它凌驾于所有其他的人类感情之上。正是这种理解，为克服女性入侵所带来的挑战赋予了重要的意义。

和其他为男子气概的行为举止树立榜样的故事一样，三国故事明确指出：不论情色与否，男男之爱是世上唯一高尚的情感。异性恋至多也不过是个消遣。不仅如此，如果对异性恋情太过认真，它还会破坏英雄们理想的兄弟情谊。这种感情必须被剪除。无论是出自“忠”，还是出自“义”，对感情的忠诚只适用于男男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只有男人才配有“义”举，女人是不配的（当然，她们像仆从或义犬一样自杀尽忠是例外）。“义”之崇高意味着男人认为他们施行的义举具有排他性，无论是个体排他性还是群体排他性。他们还要遵循与“义”相关的礼仪。无论多么重视对方，重要的是，他们也要表现得完全能够控制自我，从不会陷入自我另一面当中对妻妾成群的纵欲沉湎。

### 有些兄弟比其他的更平等

在对三国故事更为正统的记述以及儒家复述中，关羽这个人物再次为——一对一关系中英雄的性心理——特别是同性性心理——活动提供了良好的例证。刘备似乎从不觉得跟其他男人分享床榻有任何问题，但整部小说从未提及关羽有和其他男人同榻的迹象。<sup>①</sup> 他与同性的关系和与异性一样控制有度，也同样有礼。这礼和度，使他成为一个宣扬克己的道德体系最合适的典范。古希腊也提供了这样的美德宣示：“色诺芬的阿格西劳斯不仅‘对他无意建立亲密关系的人敬而远之’，对满怀爱意的男孩，他也同样保持着距离；他还小心翼翼地只住在寺庙或那些‘有目共

---

<sup>①</sup> 实际上，小说在很多的交往关系中都用到了“同榻”这个说法，以至于在关羽和刘备的关系中根本没有提及。

睹可证实他清白’的地方。”<sup>①</sup>正如福柯指出的，这种对禁欲的炫耀，不但“显示了他们对自身的掌控力，而且显示了他们因此值得拥有掌控他人的权力。”<sup>②</sup>

然而，传统的中国文学批评并不从欲望和权力的角度去解释关羽在“有目共睹可证实他清白”的地点与情形下所显示的浩然正气。<sup>③</sup>相反，它们通常从“义”的角度出发来解释这个问题。“义”是一个包含了忠诚、诚实、友谊和荣誉等各种观念的概念。“义”的概念在这部小说中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小说的名字就叫《三国演义》。<sup>④</sup>

作为儒家主要的美德之一，对“义”进行的阐释可谓数不胜数。而对其含义达成共识之困难，从“大义”、“小义”这样的区分中就可窥见一斑。然而，许多评论家，特别是一些当代评论家，仍旧坚持认为男人之间的忠诚与义务在他们结义为盟时本该是相互的。也就是说，不论是《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还是《水浒传》中的兄弟结拜，这些著名场景里义兄义弟之间缔结的“义”的盟约是平等的。所有的兄弟都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亲相爱、彼此尊重。

许多评论家声称，这最初的平等的“义”很快就恶化了。一些兄弟成为统治者，而另一些成为追随者，“义”也变成了上下之间效忠的关系。“义”之纽带的平等，也表现在诸如“义仆”、“义马”之类的表达中。<sup>⑤</sup> 这

①② 福柯(Michel Foucault):《性史(卷二):快感的享用》(*The Use of Pleasure*),赫利(Robert Hurley)英译,企鹅图书1987年版,第20页。

③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国故事链的背景下,关羽从来不是政治势力上的最强者。他的影响力和神圣地位是在他死后才获得的。在大众影像中,关羽总是由他的两个下属关平和周仓随侍左右。这组群像反射着刘关张的三人组合。但这组群像在大众想象中的主导地位显示出关羽在普罗大众中超越刘备的地位。

④ 一些批评家,如卢庆滨(Andrew Lo),觉得这个书名“意即关于道德准则各种含义的一场演出”。参见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编:《印第安那中国古典文学指南》(*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69页。“义”成为这类浪漫历史故事的核心,以至于之后的许多小说都把“演义”当成了标题的一部分。

⑤ 对三国中使用“忠”和“义”的详细探讨,参见高明阁:《三国演义论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5—215页。

种不平等的纽带关系在关羽身上表现得格外明显。在他死后，他的手下要么自杀要么被杀，他的马也因不肯吃草而死去。人们常常认为，“义”的观念的转变，在更为常见的表达——“忠义”一词中显现得最为清晰；这里的“忠”字毫无疑问地指向一种自下而上的忠诚。<sup>①</sup>这种等级关系也可以从同性恋的层面予以解读。尽管如前所述，刘、关、张三兄弟之间的“义”是排他的，并在对入侵者表达的嫉妒之情中得到了卫护，但事实上，两个弟弟在政治上对刘备的唯命是从意味着他们在同性恋关系中也扮演着顺从一方的角色。虽然刘备可以与其他奇人贤士建立“义”的纽带（这通常意味着与之同榻），关羽和张飞却必须对占据主导地位的刘备保持完全的忠实。他们也有对自己忠实的下属，但如果他们与这些下属建立任何在政治或性的地位上与刘备相当的“义”之纽带，那么，整个“义”的概念都将遭到怀疑。

而男女在性关系中的不平等，也从这里折射了出来。睡在一起，对女人来说是“失身”给男人，意味着屈从。它确实是一种纽带，但也是一种等级极度森严的纽带，绝不能指望它能像预期的那样拉平男人之间的差距。正如婚姻旨在巩固强大的盟友或与敌人保持力量的平衡，《三国》中男人之间的性和“亲如兄弟”的关系往往也建立在对政治力量的考量之上，而非任何“横向”的情感。“义”的概念中所应有的正义美德，因而生来就与行使力量的权利或者向他人力量低头的意愿联系在一起。通过将自己塑造成“义”的化身，关羽被迫向刘备彻底屈服。

关羽、刘备和曹操所组成的三角关系是“义”在权力和同性社交关系层面发生影响的最显著的例子。虽然历史上的曹操才能出众，他在整部小说及所有相关故事和由小说生发的戏剧中，都被描绘成最不讲“义”的

① “忠”和“义”都是儒家概念。在最近一项对儒家著作的研究中，柯启玄(Norman Kusher)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儒家学者对男人之间平等主义的情感纽带非常警惕，因为这可能造成对传统等级制社会秩序的扰乱。柯启玄：《第五种关系：儒家语境中危险的友谊》(“The Fifth Relationship: Dangerous Friendships in the Confucian Context”),载《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105期(2000年),第1615—1629页。

人。这种描绘早于小说出现。宋代最有名的诗人苏东坡曾评论说他是“死见真性”，意为人之将死，就会露出本来面目。苏东坡和他的众多后继者指责曹操是“败伦人物”。他们所持的依据是：“操以病亡，子孙满前，而啜嚔涕泣，留连妾妇，分香卖履，区处衣物。”（《苏轼全集卷九十四·孔北海赞》）曹操的“啜嚔涕泣”不是问题：这部小说里的每个人物都眼泪充沛或者“泪腺发达”。他的罪行在于：弥留之际、当着众人的面，他流着泪把遗产赠与了众多妻妾。<sup>①</sup> 在一个以男性纽带为中心的世界里，其他类型的纽带都被视为毫无价值。在即将死去这样一个庄严的时刻表露对女人的感情是不可饶恕的罪行。虽然曹操终其一生都在操控他人，但苏东坡把他的临终场景单独挑选出来，认为这尤其令人生厌。究其原因，就是他在本该是男人的事儿中牵涉了女人。

曹操的这一行动打破了本应排他的男性纽带，从而证实了他尽管成就众多，却算不上英雄的看法。相比之下，刘备的临终场景就被描绘成一个与下属——特别是与诸葛亮——告别的动人仪式。刘备对诸葛亮非常信任，“遗诏托孤”，希望诸葛亮辅佐长子刘禅完成他们共事几十年未竟的军事大业。这里没有出现任何一个女人。更要紧的是，这一场景展现出文武兼备的刘备直到最后一刻仍能稳操政治权柄。他有能力得到三国时公认的“文”之化身诸葛亮与“武”之精英关羽的不二忠诚。因此，他是一个值得真英雄去追随的男人。当然，我们上面提到过，关羽对刘备的忠诚有模棱两可之处。而关羽与曹操的关系，也同样充满了自相矛盾的欲望与忠实。

<sup>①</sup> 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16 页。有趣的是，古希腊对男性自我控制描述的转折点之一，是柏拉图对老师苏格拉底被处死前场景的描绘。当时，苏格拉底禁止朋友们为他哭泣。参见范维斯（Hans van Wees）：《眼泪简史：古希腊性别差异》（“A Brief History of Tears: Gender Differentiation in Archaic Greece”），载福克斯豪（Lin Foxhall）和萨蒙（John Salmon）编：《当男人为男性：古典时期的男子气概、权力与身份》（*When Men Were Men: Masculinity, Power and Identity in Classical Antiquity*），路特里奇 1998 年版，第 16 页。



有评论家对关羽客居曹营和华容道捉放曹的情节给出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以证关羽之“义”。从被视为《三国》权威评注评论家的毛宗岗(活动于清康熙年间)开始,评论家们就试图发明各种不同含义的“义”来为关羽的行为寻找合理的借口。在毛宗岗的想象里,关羽当时处在是否杀曹的两难之中,是因为:“虽其人大奸大恶,得罪朝廷,得罪天下,而彼不能害我,而以国土遇我,是即我之知己也,我杀我之知己,此在无义气丈夫则然,岂血性男子所肯为乎?”<sup>①</sup>我们说过,如果对关羽和嫂子的关系进行异性恋式的解读,那么其中就存在着政治和性两个层面。同样的,尽管人们对捉放曹的情节总是从军事和政治的角度进行解读,但从性的层面进行尝试也未尝不可。小说中的曹操是一个高度性化的人物,但关羽从未被他吸引。相比之下,曹操第一次遇见当时还只是个马弓手的关羽时,就十分欣赏。作为一个傲慢自大的男人,关羽自与刘备一见倾心,在小说从头至尾都没有和其他任何男女有过情感牵绊。正如人们对“武”的英雄期待的,关羽成功地抑制住了他的欲望,不论是异性恋的,还是同性恋的。甚至连他的家庭关系也以“义”的名义湮没在了他与“兄长”、“君主”的盟约中。虽然他已婚、有孩子,但他和妻(妾)或子女之间的互动从未被提及。正因如此,对刘备来说,他是一个完美的伙伴。

在与其他男人打交道时,关羽也保持着对刘备的忠诚与忠实。这是他压抑、控制异性恋情感——守着嫂子们秉烛夜读已证实了这一点——在同性恋中的折射。例如,关羽不是用手,而是用刀去接曹操送给他的礼物。他还把曹操送给他的华服穿在刘备送的旧衣之上,似乎这样一来,他的身体就不会被玷污。值得注意的是,《三国》中的其他男人,尤其是刘备,喜欢热情洋溢地用牵手、拥抱这样的身

<sup>①</sup> 毛宗岗:《第一才子书》,载罗贯中著、毛宗岗批、金圣叹鉴:《〈三国演义〉的政治与谋略观》,老古文化(台北)1985年版,第130页。

体接触来表示对彼此的喜爱之情。而这种情感展现在关羽身上似乎完全缺失了。

如若关羽真的义薄云天，又对刘备忠贞不二，那他在华容道放走刘备劲敌曹操的举动就难免成为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情节之一。这段故事讲述曹操的军队在赤壁之战中被刘备、孙权联军击溃，曹操带着残兵败将惊慌逃生。他被迫穿过由关羽把守的华容道。狭路相逢中，关羽不但没有活捉或杀掉他，反而放走曹操以偿还过去客居曹营时曹操所施予的恩惠。这个宽宏的举动是得不到什么回报的；事实上，放虎归山后，曹操就成了刘关张三兄弟的克星。这段故事因此是对“义”的不同表现形式和它们影响人物政治命运的方式所进行的对比。

不过，这一整出捉放曹的故事都是为了突出关羽的道德正气而虚构出来的情节。此事从未见诸正史，甚至连在民间的评话故事中，情节也差异甚大。<sup>①</sup>但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批评家们不但成功地把这段故事变成了“私义”与“公义”冲突的一个范例，还利用它使得“信义素著”的关羽之“义”更为昭著。以致人们经常说关羽是“大义灭亲”的典范。

然而，如果从性与情感的层面上解读这段故事，就像前面解读关羽与嫂子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关羽先是对曹操过度拘礼，然后又纵虎归山，这归根到底是对刘备的背叛。和两个人之间其他类型的激情奉献一样，刘备、关羽之间的忠诚也应该是完全排他的。出于对刘备的忠心，关羽曾拒绝贴身穿戴曹操赠送的衣物。而通过插入华容道这个情节，故事讲述者们得以强化此前已在三人关系中制造出的紧张感。正如他在守护嫂嫂们时所公示的美德，关羽在与曹操的关系上也表现得“有目共睹可证实他清白”。而这种公示也同样蕴含着(同性)性的弦外之音。

<sup>①</sup> 参见丘振声：《三国演义纵横谈》，晓园出版社（台北）1991年版，第111—113页。

不管费多少笔墨试图为关羽开脱放曹的行为,关羽在事实上的确“背叛”了刘备。要记得,我们在前面探讨“英雄”的概念时,提到曹操只把自己和刘备两个人划定为“天下英雄”。如果关羽为刘备的英雄气质所吸引,合乎逻辑的是,他应该对同为英雄的曹操也有类似的感觉。他拒绝曹操的礼物玷污自己的身体,以及他对曹操表达的钦佩与喜爱之情极度夸张的排斥,都揭示了这种感觉的情欲因子。

在对捉放曹情节的评注中,毛宗岗认为关羽引曹操为“知己”。<sup>①</sup>而当代评论家则在无意之中把关羽对曹操的感情更进一步带入了性的领域。他们注意到,关羽之所以对曹操负有报恩的义务,是因为身在曹营时曹操允许他保留自身的“节操”。<sup>②</sup>为了给关羽释放曹操的行为开脱,人们常常把关羽的原欲升华成“大义”。理所当然的,“大义”应该全无含糊暧昧的人性弱点。就如我们前面述及的,小说对曹操这个形象暗藏的评价是:无论他看上去多么强势、多么富有英雄气概,他和女人的关系都使他丧失了作为一个真英雄的资格。作为“义”的化身,关羽是怎么也不能向曹操屈服(不论是哪种含义的屈服)的。

关羽的刚愎自用、狂妄自大也许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人生。<sup>③</sup>但历史上历代帝王慷慨地对他“封君”、“封帝”、“封神”,这使得他的政治生涯在他死后超越了任何一个历史人物或文学形象。毫无疑问,关羽是个极度矛盾、含混不清的典型形象。他的形象随着时间的不同而模糊、嬗变。然而,正是这个形象的不确定性,令他能够与时俱进地适应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观众。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令人们能够重新定位这一形象,使之适应相应的文本环境。在这一章中,我把关羽的形象放在两种背景中进行了解读:一种是文人小说,另一种是戏曲类的大众文本。同时,我

① 毛宗岗:《第一才子书》,第129页:“拼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义名”。

② 周兆新:《三国演义考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9页。

③ 对关羽梦境中“龙附足”而“升腾”的悲剧妄想的讨论,参见浦安迪(Andrew Plaks):《明代小说四大奇书》(*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6—413页。

还从性欲与政治这两个层面对这一形象进行了揭示。这两个解读“必然是晦涩不明、互相歪曲的——但晦涩和歪曲正好为各方提供了极为重要而又灵活多变的解读的可能性”。<sup>①</sup>

“武”之英雄如关羽，其性的特质必然被潜藏起来——人们往往对此刻意而为。特别是在文人小说中，所有的性信号都被精心遮蔽了起来。然而，即使小说中关羽的去性化显示了“抑制”的策略<sup>②</sup>，这一策略也完全可以被解构。尽管关羽的形象在性和政治方面表现得含混暧昧，但由于对“男男关系结构”的执著坚持，其形象边界往往落入欲望与权力的领域。这种渗透于关羽小说和大众形象中的结构，也许在试图“歪曲刻画”，但这种“歪曲刻画”，从欲望控制的层面来看，已经背叛了他对政治野心的精心压抑。对主公、长兄专一的忠诚为关羽赢得了独特的地位：在小说中，他是终极英雄；在传说故事中，他是武神。但是，那些崇拜他并将他圣化的人，也以非常强大的性信号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任何不忠的迹象，即使只是睡梦中的影射和潜意识（譬如小说中的情况），也会导致个人悲剧和国家灾难。这些在关羽与刘备、曹操的关系中支撑着同性社交欲望结构的性与政治的力量，从而为思想钳制与社会钳制从策略上提供了绝佳的例证。

最后，关羽形象的构建及其与刘备形象的关系在“文武”体系中可谓发人深省之至。作为兄长，刘备代表着家庭权威；作为主公，他代表着国家权力。如前所述，无论“文”或“武”，刘备都不算出类拔萃。不过，他在这两方面确实都拥有相当的实力。至少，足够使他有资格成为一家之主、一国之主。关羽据说有着“武”的所有素质。这或许能将他提升至神的地位，但在现实中，由于缺乏“文”的素质，他必须对一个“小男人”俯首

① 塞奇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男人之间》(*Between Men*),第15页。

② 马克梦在《十七世纪中国小说中的因果与限制》中正确地指出,和更正统的文学体裁相比,小说可能显得很“喧闹”(第12页)。不过,在本章中,我们拿来做对比的,是一部文人小说和一些在性描写上受限更少的作品。

帖耳。虽然这两个男人在中国男性特质的理想模式中都有自己的可取之处,作为“武”的终极典范,关羽却只能从属于具备更多“文”的特质的刘备。在下一章对文圣孔子的探讨中,我将对男性特质竞赛中“文”支配“武”的复杂方式进行考察。



### 第三章 圣人、先师、商人：“文”之象征孔子的变迁



这幅孔子像据说是唐代画家吴道子(约公元750)的手笔,题曰《先师孔子行教图》。请注意像中孔子腋下的佩剑。

前一章,我们对“武”之象征关羽做了分析,并对这一形象进行了当代解读。在这一章里,我们将探究“文”的建构和它在当代世界的重构。为此,我将追溯“文”的男性特质在“读书人—知识分子(文人)”典范上所呈现出的变化。而文圣孔子正代表了这些变化。因此,我分析的对象将再次集中于典范形象与社会观念,而非“真正的”男人。正如前两章所示,男性典范必须文武兼备。本章的重点即为这对组合中“文”的这一半。在确立了文圣孔子在中国男性特质这个框架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和男女两性的内在关系之后,本章将概述红色学者是如何将孔子构建成一个进步教育家的;孔子的“现代命运”因而并未终结。在本章的最后,我将对这一象征在20世纪最后20年间的状况予以分析。

我将表明,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文”的典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商业技能也被包括进来。作为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孔子,已切实颠覆了人们对“文”的传统认识。这位“文”之象征,不但提供着道德和政治动力,现在也开始纳入经济的成分。如果这个论断成立,那么,中国男性特质的建构就已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今天,中国的“男子汉”不再需要具备传统意义上的“文武”素质——事实上,他很可能连一样都没有。现在,拥有并炫耀饰物的尺寸大小、功能强弱——比如移动电话和笔记本电脑——可以用来衡量“文”的男性特质是否成功。中国男性的理想典范正向国际航班机上杂志里的青年高管形象靠近。而成功的青年高管形象也可以是女性的理想诉求,这一事实表明性别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在后面的章节里,我将再次探讨这一问题。我在本章的分析重点则放在“文”之象征孔子的意义变迁上。

## 孔子与中国男性特质框架

如前所述,中国大陆和海外华人社区的庙宇将孔供奉为文圣,关羽供奉为武圣。人们称孔子为“文圣”,关羽为“武圣”,而供奉孔子的庙

宇也随之被称为“文庙”。尽管在寺庙、连环画、戏曲和其他形式的大众文化中关羽更受欢迎<sup>①</sup>，但在精英阶层中孔子则更受尊崇，其教育思想直到本世纪仍是中国正规教育的基础。既然这两个标志人物代表了中国男性特质的双重理想，那么，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脑力工作者所追求的男子气概的组成的话，就必须对孔子进行解构。正是这些脑力工作者，延续了传统士绅阶层的作用。

当然，文化造诣和一定的身体力量都是构成男子气概的必要成分，这个观点可能也适用于其他文化。黎安友(Andrew Nathan)已令人信服地指出，以实证证明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往往是没有结果的；<sup>②</sup>我自然也不打算暗示中国男性特质是这个一般原则下的例外情况。本章的目的在于别处。尽管儒家思想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中国和欧洲学者视为中国性的精髓，而孔子是这一精髓的化身，但近期对孔子及其哲学的诠释却不是在向特殊性而是在向普适性靠拢。虽然经常有人出于民族主义的目的把孔子抬出来，但在计算机时代，把孔子与中国性等同起来的传统策略却很快就会过时了。在这个时代，由于中国性的概念日渐分散、模糊，即便是用最先进的应用程序和操作平台也无法解读孔子所象征的东西。

孔子在传统上被视作圣人。尽管这种状态是当代新儒家们所追寻的终极目标，但它显然超出了常人所能。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大多数中国男人向往追求的，是“君子”这个儒家理想。君子这个词在《论语》中出现过 106 次。它在英文中可以粗略地翻译为“有教养的男人”、“优雅的男人”或“有德行的男人”。在我们的讨论中，最贴切的提法则是“可效仿

① 霍奇(Bob Hodge)和雷金庆(Kam Louie):《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政治》(*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路特里奇 1998 年版,第 119—142 页。

②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蜕变的中国》(*China's Transition*),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36—151 页。



的人”。<sup>①</sup>《论语》中多次重申了君子与“文”之间的密切联系。与之相反，君子和“武”这一方面的男性特质之间的关联则很少被提及。<sup>②</sup>将君子与文联系在一起的最著名的表达之一，出现在《论语》第六章第二十七节。孔子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sup>③</sup>在第十八节，还有一个更详细的说明。孔子解释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sup>④</sup>大多数批评家认为，质是一个相对直接的概念。它是构成一个人的基本的或固有的物质。<sup>⑤</sup>经过“文”教和“文”化的过程，一个有着适当的质的男人就会成为一个翩翩君子。因此，“文”包含着将自然本性升华到文化教养的所有素质。

在实践中，“文”是良好教育的结果。据说孔子设立了“文行忠信”（即文化、德行、忠诚、信义）四个科目。<sup>⑥</sup>由于后面三个都是伦理观念，我们可以假定，我们所知的孔子传授过的技能如文学、音乐、射箭、御车、写作和数学等都属于“文”这个科目。这些素质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了有关教育的辩论藉以形成的基础组成部分。在这里，我要重申一点，这些被孔子视为成为君子的先决条件的技艺通常只适用于男性。

作为男性的榜样，君子是与小人相对的。《论语》中对比君子、小人之处数不胜数。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孔子所宣称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sup>⑦</sup>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大背景下，这个声明有着重要的意义。当时，对儒家最大的挑战来自墨子；因为后者坦然地提倡把追逐利益和实

---

① 郝大维(David L. Hall)和安乐哲(Roger T. Ames):《通过孔子而思》(*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 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第182—192页。

② 关于文与君子关系及其在宋代的表现的讨论, 参见马伯良(Brian E. McKnight):《宋代的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 in Sung China*), 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第191—193页。

③ 杨伯峻:《论语译注》, 中华书局(北京)1958年版, 第68页。

④ 同上书, 第65页。

⑤ 例见刘殿爵(D. C. Lau)译:《论语》(*Confucius: The Analects*), 企鹅图书1979年版, 第37—38页。

⑥ 杨伯峻:《论语译注》, 第78页。

⑦ 同上书, 第42页。

用作为理想的目标。在理论上，儒家几乎将传统中国的商人和经商营业者放在了社会地位的最底层，其对功利主义求利动机的仇视更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对儒家的这一态度，清代小说《儒林外史》提供了最显著的例证。<sup>①</sup>在这部小说中，毫无名利之心而又才华横溢的王冕被树立为男性典范；而所有那些为权力、特权和金钱所诱的读书人和官员，在小说中一概被描写成卑鄙的冒牌货。在许多方面，王冕堪称颜回转世——这位孔子最欣赏的学生（又一个在死后被封圣的完美君子）生前没有获得任何官职、财富或名声。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男性特质被塑造得像道家那样脱离社会、脱离政治。王冕对封侯拜相并不积极，但他可以自由地向统治者提出建议。据说孔子在其有生之年也曾周游列国，以寻找一个支持他主张的诸侯。用当代的说法，他是一个政治演说者。从定义上看，具有“文”的属性意味着具有纵横捭阖的语言技能，因此，文人不必付诸社会行动，仅以言辞就能影响社会事件。文人自视为社会的道德和精神导师。自然，孔子只和权贵结交而对普通民众——小人避之不及。有趣的是，孔子不光告诫他的追随者要规避小人，同时，还教导他们和女人保持适当的距离。<sup>②</sup>人们因此视女人为另一种会惹来麻烦、应尽量避开的群体。由于男性特质往往与性有关，而相关分析又往往被置于其与女性特质的关系中进行，澄清这个问题对孔子和“文武”框架的研究都至关重要。

## 孔子与两性

在上一章中，我已经说明了“武”的理想形象通常对女人怀有高度的戒备，以至于在大众的想像中，武圣关羽宁愿将美女斩首也不愿受其诱

① 吴敬梓：《儒林外史》，中华书局（香港）1972年重印本。

② 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98页。《论语》阳货篇第十七25节中：“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逊），远之则怨。’”

惑。古典小说《水浒传》中的女性人物也是因此而被残酷杀害的。<sup>①</sup> 相比之下,在下一章对典型的“才子佳人”式男女关系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才子却总能和女人共入床帏。也许有人会因此觉得文圣身边也总有美女环绕。可惜情况并非如此——孔子和女人在一起的形象从未出现过。<sup>②</sup> 在传统故事中,“文”的男人以“武”的男人难以企及的方式与女性交往,但这种情况并非理想。事实上,虽然才子佳人小说就定义而言是有才华的男子和美丽的女人之间的浪漫故事,但其中也有数以百计的爱情故事让读书人学到接近女色的愚蠢和危险之处。在这些故事中,女性往往是妓女、妖怪或者狐仙,她们用诡计来迷惑并毁灭男人。因此,虽然完美的王冕在生活中也有一男一女对他非常重要,但这个男人是位老农民,同时也是他的精神导师——隔壁秦老,而女人则是他的老母亲。他没有结婚,也没有那些浪漫的情感羁绊。

“文武”在传统上仅适用于男性,这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儿:女人们完全被禁止进入与“文武”相关的场所,如翰林院和军事机构。那些成功进入的——譬如祝英台,试图通过进入书院学习而获得人们对她“文”的修为的认可——则不得不做男人打扮。悲剧往往随之而来。同样,擅“武”的女性,如女战士花木兰,只有隐瞒自己的性别才能获得对自己成就的肯定。一旦这些女子再次涂上脂粉、穿起裙裾,她们所有的“文”、“武”属性就都消失殆尽。用约瑟夫·艾伦(Joseph Allen)的话来说,“中国女战士的穿衣与解衣”,“基本上不是行军打仗的故事,而是回家的故事”。所有不同版本的花木兰故事都是“驯化传说”。<sup>③</sup> “文武”是男性专

①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第75—114页。

② 实际上,不像关羽那样总有两个男人随侍两侧,孔子的画像把他展现为一个单独的、主宰性的形象,超出了人们可比的范围。这种塑造的标准化发生在汉代对他的至高尊崇之后。对此趣味横生的探讨,参见司马黛兰(Deborah Sommer):《天纵圣人? 孔子早期形象及文本指涉》(“The Unlearned Sage? The Early Iconography of Confucius and Its Textual Referents”),未发表论文。

③ 艾伦(Joseph R. Allen):《穿穿脱脱的中国女战士》(“Dressing and Undressing the Chinese Woman Warrior”),载《立场》(Positions),第4卷第2期(1996年),第346页。

属的品质，从未被赋予过女人。如果女人在孔子的神像下膜拜，那是为了她们的儿子成功通过科举考试。要不是作者们在谈论“男人的概念”时，往往和人类的概念混淆在一起，忽视了男人作为一个性别化的人天生就具有性的欲望和需要，这就不是问题了。<sup>①</sup>

的确，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观察到的，孔子本人明白无误地把女人和小人——一个需要避开的物种——归为一类：“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他宁愿与女性保持距离，也不愿她们在他的脚下献身。在《论语》对他一生的描绘中，孔子似乎在这方面坚持了他的原则。他所有的弟子和朋友都是男性，而他的教诲中所有的榜样也都是男性。他似乎在男人的陪伴下最为轻松愉快，而他所表现出的最大悲痛，是在他最喜欢的学生颜回死后。他会见艳名远播的南子夫人是他的同性社会性经历过的唯一一次挑战。他直言不讳的弟子子路当即对此表示不满，导致孔子不得不一再对天盟誓，声明自己的清白。<sup>②</sup>

因此，在文圣身上也同样可以找到武圣关羽所具有的同性社会性和厌女症的特征，尽管出现的形式不同，方式也不那么戏剧性。孔子的哲学以男性为中心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但学者们却认为儒家观念并不关乎性别。作为君子的对立面，《论语》24次提及令人厌恶的小人。但正如孔子所处时代对女性的忽视，在《论语》中女性作为一个群体从未被提及。孔子没有留下什么关于女性的训诫，这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诠释空间。甚至就在数年前，还有些人试图争辩说：“孔子的教诲和一些女权主义者相似！”<sup>③</sup>这种不切实际的说法，通常把理由建立在孔子所倡导的“仁”的概念上。在书写形式上，“仁”是“由‘人’和数字‘二’这两部分组

① 孟旦(Donald J. Munro):《早期中国“人”的观念》(*The Concept of Man in Early China*),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69 年版。

② 杨伯峻:《论语译注》,第 68 页。《论语·雍也》:“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誓)之:‘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③ 希曼(James D. Sellmann)和罗(Sharon Rowe):《儒家观念中的女性》(“The Feminine in Confucius”),载《亚洲文化》(*Asian Culture*),第 26 卷第 3 期(1998 年),第 1 页。

成的,所以,在英文中我们把它翻译为‘人对人的关怀(person to person care)’,或者为求简短的话就只是‘关怀(care)’”。<sup>①</sup>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作者所针对的目标群体大致是那些对中国文化怀有好感,但又不喜欢其性别主义倾向的西方读者,孔子因此被塑造成了一个关心他人、满怀爱心的人。

然而,对有些中国学者来说,他们长期以来最重要的受众就是中国共产党,孔子对女性的态度不是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毕竟,共产党明确提出妇女解放只是阶级解放的下一步。共产党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对政治权力的获取与继承上:只要对实现这一目标有所助益,妇女就值得欢迎。同样,在《论语》这样一部旨在创建由智者来统治、由君子来居住的国度的典籍中,女人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没机会出场,女性的缺席必然导致一个男权社会的确立,直到20世纪初五四运动时这一制度才在此基础上受到抨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是妇女受到重视的另一个重要时期。根据1950年代初性别平等的新精神,一些更尖锐的批评,如蔡尚思对孔子反女性、反人民的“五四式”的攻击得到了继续推广。<sup>②</sup> 而共产主义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孔子最具破坏性的批评则来自赵纪彬、杨荣国等年轻学者。他们关注的不是性别,而是阶级。他们写道,人们普遍相信孔子在“仁”的概念中发掘了人性,但恰恰相反,他只是为当时的统治精英服务。“仁”中之“人”并没有超出统治阶级的范围。<sup>③</sup> 因此,即使在其生年,孔子在政治上也是反动的,即使是他思想的精华(相对于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具体表现),在新中国也不该被效仿。

对孔子的这种近乎严苛的评价在1960年代初开始得势。从“文化大革命”到1970年代,“批孔批儒”大行其道。在这样一个反传统的环境

① 希曼和罗:《儒家观念中的女性》,第4页。

② 蔡尚思:《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棠棣出版社(上海)1950年版。这部著作对于孔子和孔学的抨击,犀利与严厉程度超过同时代其他人,也超过五四新文化运动诸健将。对于孔子和儒学的这一批评态度,蔡尚志在其后数十年中可谓一以贯之。

③ 赵纪彬:《论语新探》,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中，孔子显然无力恢复昔日的荣光。作为一个偶像，他代表的只是过去年代里一块多余的化石，而非男人们效仿的对象。不过，“文”作为男性主要的美德，显然也具有某种韧性，无法被如此轻易地抹去。许多在儒家典籍中穷经皓首的学者都有赖于对这些典籍作为官方经典的承认来维护他们本身的权威和特权地位。每当政治气候允许，他们就会为孔子辩护。毛泽东“总结我们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并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的指示被反复重提，以为继承传统儒家价值观提供合法性。<sup>①</sup>

不过，尽管像冯友兰这样有名的哲学家们勇敢地尝试为孔子在新中国找到一个位置，这些尝试只是进一步让这位文圣走下了神坛。他们认为，孔子创造的“仁”的观念是对平凡人的关爱，这为世界文化作出了宝贵贡献。通过这种论述，冯友兰和其他哲学家们用了最大的努力来证明孔子并不主张阶级压迫，而是提倡一种中国式的人本主义。这个论点是如此的富有魔力，直到 1980 年代一些学者们仍在试图证明孔子的人本主义优于欧洲人的人本主义。<sup>②</sup> 不过，这也进一步加强了对孔子的祛魅。如果他充其量只是一个人本主义者，那就不可能再恢复传统上所赋予他的神圣地位。

事实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 30 年里，所有的宣传机器都被调动起来，以塑造举国仰慕的新的男性榜样。在这些工农兵模范当中，大庆工人王进喜和大寨农民陈永贵是工农最好的代表。而士兵英雄的代表则是无处不在的雷锋。这些男人作为社会主义的理想形象，充斥着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所有媒体。尽管他们富于奉献、大公无私、思想单纯，但却混淆了此前中国传统“文”、“武”男性特质的所有观念。这些工农兵模范没有传统文圣或武圣所特有的激情和抱负。他们和以前的

① 雷金庆 (Kam Louie):《当代中国儒学批判》(*Critiques of Confucius in Contemporary China*), 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② 陈世陔:《孔子的伦理思想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之比较研究》, 载《湖北大学学报》, 第 2 期 (1986 年), 第 31—36 页。

原型之间唯一突出的共性,就是他们也完全缺乏性欲、对女人不感兴趣。在这种传统“文武”价值观遭受持续攻击的气候下,知识分子作为被新社会改造过了的文人,只能去寻找一个新的运作模式。

事实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早期,几乎没有与传统规范一致的“文”的模范人物。把知识分子置入阶级架构中是众所周知的困难,而在“文革”后为稳定知识分子队伍所做的尝试中,推出的是数学家陈景润这样书呆子式的英雄人物。据说有些女人觉得这些呆头呆脑的男人是理想的婚姻伴侣,但这实在很难激励太多的追随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便旧式文人是以死记硬背的学习、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来取得名望的,至少在理想中,他们是具有丰富内心世界的思考着的存在。而当雷锋和其他新的男性模范们所奉行的英雄主义是做一颗庞大机器上的小螺丝钉,并不假思索地执行那些无需思量的繁杂事务的时候,传统上对教育和文化的尊重就不得不下场一鞠躬了。新的理想并不提倡“文”、“武”方面的出色造诣,因为这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我控制和对他人的控制。实际上,1949年和1976年之间新的阶级分析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工农兵事业没有明显推动作用的个体性,这就产生了反“智”、从而反“文”的英雄。

## 作为教师和学者的孔子

因此,文人型知识分子的当务之急是在新的政治格局中证明自己有用社会。他们分了两个阶段来做这件事。首先,我将探讨较为正统的努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很明显,孔子不能再被推出来“为圣王,为万世作师,为万民作保,为大地教主”。<sup>①</sup>然而,除了1973—1974年“反孔”运动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sup>①</sup>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重印本。

后几乎所有关于孔子的评价中，至少会有一两段文字称赞他为发展教育做出的贡献。对于那些在社会主义中国很难自称是“劳动群众”的新文人来说，教学与研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工具，使他们可以自以为于社会主义建设是有用之身。教师是个正当的、有价值的职业，而堪称“万世师表”的自然是孔子。

传统上，最受一个人尊敬和推崇的人除了自己的父母，就是老师。毛泽东曾宣布希望作为一个教师留名青史。这个声明不太像是出于谦逊，而像是策略化地运用人们对教师一贯的敬意。如前所述，共产党的领导们主张要发挥道德模范的榜样引领作用。这个想法与“儒家教育哲学中榜样教育的理念”相当吻合。<sup>①</sup> 在“文化大革命”前，呼吁继承孔子的教育思想并赞美他作为一个学者和教师所起的作用是有有关孔子的讨论中的家常便饭。早在1954年，在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的全国性报纸《光明日报》上就出现了几篇赞美教育家孔子的文章。<sup>②</sup> 在其中的第一篇里，许梦瀛认为儒家教育教授“君子之道”以鼓励人们实行仁政。<sup>③</sup> 有趣的是，许梦瀛试图证明孔子拓展了君子的含义，使之不仅为贵族阶级提供参照，更蕴含了一种适用广泛的行为准则。因此，它在社会主义的当代中国仍具有现实意义。

君子爱人。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君子理应得到效仿。这种主张在“百花齐放”时期得到了大力强调，更有一部关于教育家孔子的专著于此时问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陈景磐在书中写道，教育家孔子用圣人和君子的人格境界启发学生。<sup>④</sup> 他采取的方法以自我修养的概念为

① 安乐哲(Roger T. Ames):《主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The Art of Rulership: A Study in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② 雷金庆(Kam Louie):《追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中国的现代化》(“In Search of Socialist Capitalism and Chinese Modernisation”),载《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第12期(1984年),第87—96页。

③ 许梦瀛:《孔夫子的教育思想》,《光明日报》,1954年6月14日。

④ 陈景磐:《孔子的教育思想》,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基础。“修养”一词在这里尤有意义,因为它也是刘少奇 1939 年发表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提出的基本原则。<sup>①</sup> 通过显示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曾把孔子作为社会主义新男性的原模型来广泛使用,学者和知识分子们试图证明他们的偶像对新社会仍具意义。诚然,重振儒家价值观的尝试得到了刘少奇、周扬等高层领导人的支持。1962 年,他们组织了引人注目的孔子逝世 2440 周年纪念活动。然而,不幸的是,这些人也属于“文革”期间失去了权力的派系。他们所倾向的儒家也因此“文革”中受到了强烈的攻击。

尽管受到了攻击,孔子在整个共产时期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地位。即使是在 1973—1974 年的“反孔”运动中,也可以看出人们对儒家思想再次涌起的浓厚兴趣。数百篇关于孔子的文章和书籍以及数以千计的“批判会”就是证明。这一时期的漫画和文字把孔子塑造成了一个懦夫的形象,就像生动深刻地展示于鲁迅笔下的酸腐文人孔乙己。不过,由于他是作为“反面教材”出现的,可以想见,构成“正面人物”的,就是所有与这些展现相反的东西。把孔子塑造为弱者也可能是对 1960 年代的反动,当时有体育教育工作者企图证明孔子实际上是一个体格健壮的人。《论语》节录中对他高大强壮的描述也被援引,证明他不只强调“文”的教育,对体育教育(如“武”)也很重视。<sup>②</sup>

那些想要推广孔子的人因此声称孔子并不忽视形而下的东西。这种说法是为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继承”孔子思想寻找理由,因为按道理,这时的男女模范们从事的都应该是体力劳动。传统中国文人对体力劳动的厌恶是众所周知的。孔子在《论语·子路》中明确表示不鼓励他的学生参加生产劳动。他讥讽要“学稼”、“学圃”的学生樊须是“小人”,认为君子好礼、义、信,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

①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 1962 年重印本。

② 辛兰:《孔子在体育方面的实践和主张》,载《新体育》,第 8 期(1962 年),第 13—16 页。

稼”。生产劳动因而不值得君子参与。像许多其他意识形态建构一样，“文武”也是关于自我控制和控制他人的。因此，“武”不仅指身体力量，还指如何运用这种力量。农民的生产劳动被认为是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不值得“武”的参与。在“文革”前，李荫农等学者就已经抛开了男模范必须是工农兵的幌子。他认为，孔子对中华文明作出的贡献比他所鄙夷的农民大。<sup>①</sup>

孔子因其教育思想在“文革”时遭受了最猛烈的攻击。这并不奇怪。封建制度在新中国注定要被抛弃，拯救这位被视为与封建制度一体化的哲学家就变得非常困难。如上所述，教育在许多知识分子认为孔子仍然堪称楷模的唯一领域。教育以及与之相关的“文”的价值观，使过去的文人阶层和现在的知识分子阶层仍可继续得到社会价值和权力。这在“文革”甫一结束就明白地显现了出来。文学界第一个对“四人帮”施行的政策提出质疑的作品——刘心武的《班主任》，就是关于教育的。<sup>②</sup> 这部作品出版后，作家们迅即将他们的性和男性特质及手中笔的力量结合在了一起。这从短篇小说《眼镜》<sup>③</sup>和争议性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sup>④</sup>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些作品把政治力量、性能力、吸引力和教育、知识及其他“文”的成就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文”的男性特质在1980年代初经历了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东山再起。孔子再一次被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作为万世师表，他被用来象征一个值得效仿的男人。在整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出现了信仰危机，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在经历了“文革”的幻灭之后，人们感到了道德真空的存在。因此，早在1980年，就有人提出用儒家道德教育作为一种手段来填补这一空白。孔子又一次作为可以让年

① 李荫农：《论孔子对劳动的态度》，《羊城晚报》，1962年3月22日。

② 刘心武：《班主任》，载《人民文学》，第11期（1977年），第16—29页。

③ 刘富道：《眼镜》，载《爱情小说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④ 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载《收获》，第5期（1985年），第4—108页。

轻人效仿的典范而被树立起来。因此,通过强调道德和教育状况已陷入危机之中,文圣孔子再度出山,以证实学者和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结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理应享有特权地位。

到1990年代初,孔子和毛泽东搭档成为中国历史上一古一今两位最伟大的教育工作者。对此,中共中央党校的许全兴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提出毛泽东曾多次提及想作为一名教师留名青史。此外,他还援引了毛泽东讲话和著作中多处对孔子的赞美。其中最有趣的一段关于孔子的毛泽东语录发表于1938年。在抗大讲话中赞颂了孔子之后,毛泽东问道:“为什么当时的孔夫子不作共产党呢?那是当时的老百姓不要他作共产党而要他作教书先生,而今天的老百姓则需要我们作共产党了。”<sup>①</sup>也就是说,如果孔子活在1930年代,他就会是个共产党领袖。这种宣讲差不多属于惯常的应景而发;然而,这段语录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用这种方式承认这位古代圣人对中国文化至关重要。

许全兴这样的批评家不只是在为儒家教育的优点辩护。作为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他的文章背后存在着政治动机几乎不言而喻。他以一句简短的评论作结,大意是虽然孔子对毛泽东的影响整体是积极的,但也有消极的一面。许全兴认为,孔子教育思想最大的缺点在于“重人伦,轻武力”。<sup>②</sup>正因如此,古往今来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思想家,都没有对物质和经济的发展给予足够的重视。相比之下,“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的这种偏颇,从实现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角度讲教育的重要性。他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sup>③</sup>。推测起来,要是孔子生活在1990年代,他就不只是个共产党领袖了,他还得是个共产党员企业家!

① 许全兴:《孔子与毛泽东:古今伟大“教员”》,载《孔子研究》,第4期(1993年),第4页。

②③ 同上书,第6页。

## 企业家孔子：1980年代和1990年代

鉴于千百年来孔子与知识阶层长期关联并被公认敌视商业与货币交易，把他塑造成一个商业大师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但是，就像我在下面的讨论中所要证实的，这种事还真就发生了。如前所述，人们常常奉孔子为万世师表，以试图恢复文人作为中国价值观的良心和维护者的传统形象。在过去的千百年中，这些赋予学者特权地位的尝试被证实十分成功，并很有可能在21世纪延续下去。可以肯定的是，唐君毅、杜维明这些“当代新儒家”<sup>①</sup>对这一转机并不持反对意见。例如，中国台湾孔孟学会1961年创办的《孔孟学报》今天仍在继续宣扬传统儒家的价值观。在北美，一些学术协会相继成立，以期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振兴传统的中华文化，比如出版《文化中国》季刊的加拿大文化与复兴研究会。值得注意的是，自1980年代中期起，一些海外的“当代新儒家”试图通过将儒家教育与东亚经济繁荣联系在一起，来推动儒家思想的现代化与国际化。<sup>②</sup> 社会科学领域的文化研究也提议把儒家价值观当作一种用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动态元素”。<sup>③</sup>

在中国内地，形势也在发生类似的转变。自1978年以来，几乎每年都会举行一个主要的关于孔子或儒学的国内或国际会议。这充分表明了人们对孔子及其哲学的热情正空前高涨。<sup>④</sup> 在最开始，举行这些会议是为了驳斥“四人帮”对孔子的批判。然而，很快，它们就变成了朝拜孔子的场合。这些会议几乎总是在孔子的诞生地曲阜和他的诞辰日举行。

① 梁新：《什么叫“当代新儒家”》，《文汇报》，1986年6月10日。

② 杜维明(Tu Wei-ming)编：《东亚现代性中的儒家传统：日本和四小龙的道德教育与经济文化》(*Confucian Traditions in East Asian Modernity: Moral Education and Economic Culture in Japan and the Four Mini-Dragons*)，哈佛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③ 霍夫斯塔德(Geert Hofstede)：《文化与组织：思维软件》(*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麦格劳-希尔1997年版。

④ 宋仲福、赵吉惠、裴大洋：《儒学在现代中国》，郑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53页。

这一事实使得举办这些会议的目的更为明显。正因如此,1984年9月的会议上还举行了孔子塑像的揭幕仪式,并成立了中国孔子基金会。基金会的首位会长是南京大学前校长匡亚明,他不光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还在学术界享有“孔学泰斗”的美誉。与会时,他呼吁“继承”孔子及其思想的新书正要面世。<sup>①</sup>

1994年10月5日,国际儒学联合会于北京成立,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当选名誉会长。李光耀的任职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儒学不仅兼容并包,而且可以作为建设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后,纪念孔子的国际会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多数与会的外国人都来自东亚和东南亚。亚太地区在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和整个1990年代的经济增长引发了人们对寻求“亚洲价值观”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儒学即是这一价值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系列文章接二连三地涌现出来,旨在证明儒学是如何在日本、韩国等东亚工业国家的现代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的。<sup>②</sup>

多年来一直呼吁“继承”孔子教育思想的学者和其他知识分子顺理成章地迅速从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的东亚经济繁荣中得到了好处。早在1979年,蒋子龙就在轰动一时的获奖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中含蓄地表现了儒家价值观和追求财富、工业化之间的联系。<sup>③</sup>至1980年代中期,这一联系已在哲学、政论领域明确地显现出来。到了1990年代,这个观点更得到了强有力的推广。<sup>④</sup>孔子俨然从众多王侯的

① 匡亚明:《孔子评传》,齐鲁书社1985年版。

② 例见王锐生:《儒家思想与东亚的现代化》,载《中国哲学史》,第4期(1996年),第7—11、31页;李翔海:《儒家伦理与东亚现代化》,载《中州学刊》,第1期(1997年),第64—69页。

③ 雷金庆:《追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中国的现代化》。

④ 比起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保守主义倾向在1990年代文化政治的其他方面表现得也非常明显。参见徐贲(Xu Ben):《不再令人着迷的民主:1989年以后的中国文化批评》(*Disenchanted Democracy: Chinese Cultural Criticism After 1989*),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贤明顾问变身成了一位管理顾问；他的语录为良好的商务实践树立了标准。<sup>①</sup> 由于据信能促进生产、增加利润，他的道德规范也被立为典范。

不过，如前所述，孔子在《论语·里仁》中明确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因此，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儒家学者，如理学家朱熹，都避谈利润和经营。如要君子典范在一个以经济衡量成败的时代里取得成功，厌恶金钱和商业的观念就必须得到转变。对历代儒家学者来说，道德都应凌驾于利润与实用之上。墨家的立场则与之相反。而这，恰恰是墨子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包括共产党执政时期，都普遍受到忽略的一个主要原因。<sup>②</sup> 有趣的是，在1980年代受经济驱动的社会风气下，许多人开始觉得这个原则需要重新予以评估。在那些探讨有关伦理与实用关系的文章里，结论通常都是：在“金钱就是一切”时代里，我们的社会仍然需要某种程度的道德。<sup>③</sup> 到了1989年，有三个国际会议在中国举行，以纪念孔子诞辰2540周年。与会学者热衷于把孔子有关逐利动机的观点和中国的现代化联系起来，认为“义”与“利”在这个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都至关重要。<sup>④</sup> 在一篇影响甚大的论文《论孔子的义利观和经济事务》中，匡亚明提出，经过他的仔细考察，孔子并没有真的强调将“义”置于“利”之上。实际上，孔子的最高理想是“义”与“利”和谐统一的“大同世界”。<sup>⑤</sup> 孔子之所以突出“义”与“利”之间的冲突，是因为他意识到在他的时代“大同世界”绝难实现。因此，他强调“义”，这样，至少可以先发展出一个伦理社会。

到20世纪1980年代末，学界一致努力以证明孔子的思想对经济增

① 在欧洲，工业革命开始时在新教中也发生了相似的转变。这显示出这种变化很可能是一种更普遍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症候。

② 雷金庆(Kam Louie)：《继承传统：解读中国的古典哲学家1949—1966》(*Inheriting Tradition: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lassical Philosophers in Communist China 1949—1966*)，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86年版。

③ 臧宏：《略论儒家的义利观》，载《学习月刊》，第4期(1986年)，第21页。

④ 苗润田：《浅论孔子的义利观及其现代意义》，载《齐鲁学刊》，第1期(1989年)，第55—59页。

⑤ 引自宋仲福等：《儒学在现代中国》，第358—359页。

长有利。不光有许多文章专门探讨儒家伦理与企业管理的关系,还有一批研究中国传统道德与市场经济的会议相继举行。<sup>①</sup> 学者们普遍承认,“仁”居于孔子教学的核心地位,意即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体现人文关怀。他们希望藉此证明,现代管理中必不可少却又缺失了的要素正是这种对人的独特性的强调。<sup>②</sup> 此外,人们还常常认为儒家学说和社会主义经济道德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在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儒家伦理应该被用来抗击金钱欲望对人的腐蚀。<sup>③</sup> 许多人都相信,在经历了“文革”和现代化之后,人们正变得丧失人性、彼此疏离。年轻一代尤其如此。这使得儒家伦理更加打动人心。<sup>④</sup>

作为为年轻一代树立的榜样,孔子再次得到了赞颂与宣扬。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一次,他以提出了能让仁慈的干部、经理们进行有效管理的方法而受到颂扬。在一篇内容详尽的文章中,北京大学经济学家赵靖认为企业家和现代企业都可以采用孔子的管理技巧。他的看法的要点在于它不光瞄准了企业“领导”,还瞄准了政治“领导”。他特别声称,那些在前些年强调政治的人“不了解我们的国情”,没有检验现实与否就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sup>⑤</sup> 赵靖承认孔子对国家经济结构的轻视在中国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不过,他认为,如果日、韩都能通过采用孔子的管理技巧迈向现代化,中国自然也可以。“道德管理”成为许多作者在新的产业中国倡导重振孔子的座右铭。<sup>⑥</sup>

在整个 1990 年代,工业化和消费主义的强大力量将包括男性特质

① 胡东原:《中国传统文化、市场经济、道德建设》,载《学海》,第 1 期(1996 年),第 52—54 页。

② 例见叶瑞昕:《孔子的义利观》,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4 期(1997 年),第 33—37 页。

③ 刘明华:《儒家义利观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载《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 期(1996 年),第 29 页。

④ 宋希仁:《儒家传统义利观与青少年道德教育》,载《江苏社会科学》,第 6 期(1993 年),第 119—123 页。

⑤ 赵靖:《孔子的管理思想和现代经营管理》,载《孔子研究》,第 1 期(1989 年),第 34 页。

⑥ 许启贤:《论儒家伦理与道德管理》,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 1 期(1998 年),第 48—54 页。

在内的文化产品作为商品推向了市场。<sup>①</sup> 学者、作家因此不得不走出小圈子中的互相满足而让消费者满意。他们的蜕变导致了他们的另一自我——孔子——也发生了类似的再造。文圣因此被重新解释为一个并不抑制课利动机的人，他只是把“义”当成君子(在他经济富足时)追求道德标准的一种方式来提倡。<sup>②</sup> 在目前的氛围下，人们炫耀奢侈品并把它们当作功成名就的标志，孔子这一象征也不得不头脚倒置。赵靖等学者探讨儒家道德管理技巧的最终目的就在于培育新一代追随改良孔子的领导人。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男性特质的社会发展环境已将“文”剔除出去。新的消费社会无疑使固守传统方式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进退两难。在这里，“传统”指的不只是封建时代的传统，也包括共产党的传统。1999年由共青团中央主办的杂志《中国青年》召集了一场关于英雄的大讨论。其中有个部分是把比尔·盖茨和苏维埃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形象保尔·柯察金放在一起，对他们的优点进行比较。<sup>③</sup> 每一条评论都谈到了比尔·盖茨，有不少认为他不但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还是一个“现实的榜样”。<sup>④</sup> 负责全国青年政治教育工作的党报媒体把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与保尔·柯察金相提并论，再早十年的话是不可想象的事儿。事业成功如今已显而易见成了道德政治教育的主要目标。改头换面的孔子大大鼓舞了“下海”文人的士气。令人崇敬的圣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

① 雷金庆(Kam Louie)和张钊贻(Cheung Chiu-ye):《三分天下:今日中国之文化景象》(“Three Kingdoms: The Chinese Cultural Scene Today”),载郑宇硕(Joseph Y. S. Cheng)编:《中国评论 1998》(*China Review 1998*),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43—575 页。

② 罗国杰:《关于孔子义利观的一点思考——兼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载《学术研究》,第 3 期(1994 年),第 51—53 页。

③ 保尔·柯察金是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他代表着“新男性,社会主义时代什么都敢做、什么都做得成的男人”。奥斯特洛夫斯基(Nikolai Ostrovsky):《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一部)》(*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 Part 1*),外文出版社(莫斯科)1952 年版,第 9 页。

④ 赵为民编:《盖茨、保尔的旧船票还能否登上比尔的客船》,载《中国青年》,第 8 期(2000 年),第 14—15 页。



已发现了适于 20 世纪人性化领导风格的秘密,这一宣称使这些人可以在尽情享受金钱的同时,也感到自己在道德上高人一等。他们是新的君子。

在 1980 年代初,智力与道德的商品化就已从根源上得到了传统化(就像封建时代的旧有方式)与合理化。1979 年《乔厂长上任记》出版之后,对乔厂长式的男性特质的歌颂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乔厂长夫妇都是在苏联学习后回国的。在 1999 年比尔·盖茨被树为时代英雄和最成功的企业管理者时,老的价值观念受到了质疑并暴露出其不足之处。最重要的是,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困惑与苦闷之后,中国男人——尤其是商人——终于能够重振民族主义和男子气概的自豪感了。孔子仍然可以作为最经久不衰的标志之一留在中国的先贤祠中。但这一象征在中国人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中已发生了一些光怪陆离的变化。例如,对现在的商学院学生来说,在孔庙举行毕业仪式并拍照留念并无任何不当之处。文圣留下的遗产,其功效在今天已不再由它们所激发的美德而衡量,而是由它们所带来的金钱效益来计算的。举例来说,旅游业要挣钱,曲阜因而大做孔子的文章,不光把这个话题炒热,还大张旗鼓予以宣传。<sup>①</sup>

旅行和金融正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为触手可及,也更加相互依存。变化中的中国必将在未来更加国际化。而“孔子”这一象征亦将随之改变。鉴于我们在过去 50 多年中应付过各式各样的孔子,这个男人确实堪称完美的“变色龙”。为了让我们“继承”他的教诲,孔子被分别诠释为圣人、学者、教师、复辟者和商业大师。商人是孔子所有头衔中最近的一个。例如,在 1998 年底和 1999 年东亚部分地区的经济陷入困境时,媒体很快就将矛头对准了孔子,认为是他倡导的封建“五伦”——“君惠臣

<sup>①</sup> 参见孔祥金、王新宏:《曲阜筹建孔子文化广场》,《人民日报》,1999 年 4 月 9 日;喻学才:《儒家思想与中国旅游文化传统》,载《孔子研究》,第 2 期(1990 年),第 29—33 页。

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导致了等级制度以及法律规范和透明性的缺乏，并继而引发了“亚洲的衰落”。<sup>①</sup> 不管你喜欢与否，也无论你怎么诠释中国文化，“孔子”都将继续作为中国文化的简写而存在。

尽管有关中国文化的讨论一般不强调性别，但这些讨论隐含的通常都是男性(文武)的观点。具体而言，孔子作为文圣将继续代表男性文化“文”的一面。男性特质“武”的成分也在发生变化，变得更加国际化。这从李小龙、成龙、洪金宝的功夫电影中就可窥见一斑。由于网络的发展，图像与典型人物瞬息之间即可进入各种不同的文化之中。中国男性特质的建构若想保有其现实意义，就需要不断改变，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同样的道理，基本的“文武”结构若想继续作为“国民特征”而存在，也不得不接受改变。只要所讨论的男人(渐渐也包含了女人)是中国人，无论是跨国公司的企业家还是公务员，人们都会认为他的个性中有些和文圣孔子一致的素质。这样一来，尽管“文”从未被渲染为包含着商业头脑和管理技能，这种不太可能的诠释似乎已在近期得到了认同。

---

<sup>①</sup> 巴克曼 (Michael Backman):《亚洲的衰落:揭露亚洲商业的阴暗面》(*Asian Eclipse: Exposing the Dark Side of Business in Asia*),约翰威立国际出版公司(新加坡)1999年版。

#### 第四章 旧式文人和当代知识分子：“文”的男性特质在过去与现在的代表



《西厢记》连环画



在上一章中，我们追溯了人们对文圣孔子不断变化的诠释。在这一章，我将选取小说、戏剧中的典型人物来检视传统和当代“文”的理想的化身。唐传奇《莺莺传》和元杂剧《西厢记》的男主人公张生，可以用来分析传统“文”的男性特质。至于当代“文”的男性特质，我将分析颇有争议的作家张贤亮在1980年代影响深远的三部小说《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习惯死亡》中的男主人公章永璘。无论是张生还是章永璘的故事，都有着半自传的性质。小说家、剧作家和读者们大多认为这些故事取材于“真实”的生活经历。因此，我们对这些反映了“文”的男性特质的文学作品的分析，将揭示出儒家教诲是如何牢牢印在真实的个体生命上的。

之所以说这些作品体现了“文”的男性特质，还由于在大众心目里，中国传统“文”的典型男性就等同于数不胜数的才子佳人故事里的书生形象。<sup>①</sup>正是这些虚构的书生，具象化地体现了“君子”所应有的才华品质。从表面上看，这些旧式书生和当代知识分子都是儒家教诲的化身。然而，更多的时候，故事中的这些书生却似乎有意在背离儒家正统，令人感觉理论和实践南辕北辙。例如，尽管孔子将女人与避之唯恐不及的小人相提并论，但在文学和艺术的演绎中，书生的两个基本生活目标却锁定在金榜题名时与抱得美人归上。在本章中，我将通过对才子佳人故事中两个原型的考察，来解释儒家理论与实践互相抵触的现象。

① 在英语世界有许多关于才子佳人体裁的研究。除了上面提及的马克梦(Keith McMahon)的两本相关著作，他还写了一篇文章来总结他对这个文学类型的一些主要想法。马克梦：《古代“才子佳人”小说与才女的优越性》(“The Classic ‘Beauty-Scholar’ Romance and the Superiority of the Talented Woman”)，载司徒安(Angela Sito)和白露(Tani E. Barlow)编：《中国的身体、主体和权利》(*Body, Subject & Power in China*)，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7—252页。亦请参见海诗纳(Richard C. Hessney)：《超越美貌与才能：〈好逑传〉中道德与侠义的自我》(“Beyond Beauty and Talent: The Moral and Chivalric Self in The Fortunate Union”)，载何谷理(Robert E. Hegel)和海诗纳(Richard C. Hessney)编：《中国文学中的自我表现》(*Expressions of Self in Chinese Literature*)，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4—250页。

最近,有一部言情小说集的编者认为,才子佳人体“发轫于明代末年,直到清代乾隆以后,才逐渐衰落”。<sup>①</sup>然而,另一部言情小说大观的编者则认为,“有人类社会,便有人类爱情生活存在”。<sup>②</sup>才子佳人体的确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高峰,但它的雏形可上溯至汉代<sup>③</sup>,它所传达的观念更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直至20世纪仍经久不衰。

## 唐代读书人

唐《莺莺传》(又称《会真记》)塑造了早期才子佳人文学中最佳的男性情人典型。正如闵福德(John Minford)和刘绍铭(Joseph S. M. Lau)指出的,“这个据说是自传的经典故事无疑是中国文学中最知名的爱情故事”。<sup>④</sup>这个以传奇风格<sup>⑤</sup>写就的故事只有几页长,却在此后的千百年间影响了人们对以读书人为主线的爱情故事的概念。对这个故事最杰出的艺术再现之一是王实甫的元杂剧《西厢记》。<sup>⑥</sup>这出杂剧的文学风格在明清时期被广为效仿。<sup>⑦</sup>尽管20世纪初期的语言改革意味着它不再是一个写作模板,但其中的观念却一直影响至今。在本章中,我将显现两种出现在唐代和元代之间的截然不同的男性特质理想。而这两个理想都表露了在男性特质的比重中“文”比“武”更加重要。最为重要的是,

① 殷国光、叶君远编:《前言》,载《明清言情小说大观(上)》,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② 王泽君、龙涛编:《前言》,载《中国言情小说大观》,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③ 才子司马相如和孀居佳人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司马迁(公元前145—前90)《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有记载,收录例见同上,第6—11页。

④ 闵福德(John Minford)和刘绍铭(Joseph S. M. Lau)编:《含英咀华:远古时代至唐代(上卷)》(*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s Volume 1: From Antiquity to the Tang Dynasty*),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7页。

⑤ 传奇是唐代兴起的一种短篇小说体裁。它以文言写就,篇幅短小,围绕着一两个人物展开。这种文体高度格式化,叙述者通常假定一种“客观”的观点,因此故事会给人一种真实可验的感觉。

⑥ 王实甫:《西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重印本。今人对王实甫知之甚少。据信他生活于13世纪的元代,主要创作活动约在元成宗大德年间。其杂剧作品见于著录的有14种。

⑦ 黄强:《明清“西厢热”持续的一个重要原因》,载《河北学刊》,第3期(1999年),第69—73页。

这两个版本都毫不含糊地指向这样一个认知：佳人必为才子所倾倒。这些学生才子虽然还不是文人，但志在成为其中一员。就此而言，这些佳人充当着这些正蓄势待发的才子们的鉴赏家、助威者，有时则是赞助人的角色。<sup>①</sup>直到1980年代，张贤亮仍能兴致勃勃、傲慢自负地对着这一现象夸夸其谈。

如前所述，男人之所以渴望在文上有所成就，是因为这成为文人在传统上意味着在科举考试中成功获得进入官僚特权阶级的敲门砖。不过，虽然文人与官僚阶级（也因而与权力）之间的身份重合是个普遍现象，但并非一成不变。尽管不是经常发生，但在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下，文人进入官场的入口的确可能变得极度狭窄。在从唐至元的历史时期里，“文人”这一称呼的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黄卫总（Martin Huang）对这种变化做了简洁的概括。他指出：“在唐和北宋时期，大多数文人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为官方认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士大夫（例如苏轼）。因此，文人和士大夫之间的区别无关紧要。元朝时情况则大为改变。蒙古统治者把文人几乎排在了社会阶级的最底层，并严格限制他们入仕从政。”<sup>②</sup>

黄卫总进一步指出，元代以后，文人的身份因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不得不应时而变。“到了18世纪，社会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商人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当个文人的职业选择受到了进一步的挑战。”<sup>③</sup>在第七章，我将对这种来自商贾的挑战——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中的——在“文武”男性特质上产生的影响作出更详尽的讨论。需要强调的是，比

① 孔慧怡对经典才子佳人故事作了一个幽默的、现代女性主义的重新阐释。她认为，这些女性之所以注意发现人才并赞助他们去参加科举考试是希望他们中能有一个考中之后回来付“红利”。孔慧怡：《妇解现代版才子佳人》，麦田文学（香港）1996年版。

② 黄卫总（Martin W. Huang）：《文人和自我的再呈现：十八世纪中国小说中的自传倾向》（*Literati and Self-Re/Presentation: Autobiographical Sensibility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Novel*），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

③ 同上书，第31页。

起元代,唐代时对文人—士大夫阶层这一概念的质疑要小得多。这是因为传统读书人在元代失去了仕途入口以及相应的权力和特权地位。在这一章,我将说明,尽管囿于社会贬损,但人们对文人优越地位的笃信依然存在。正如我在前两章所提到的,“文人”是一个被文—化(wen-ised)了的男人,有教养、有品位。这是成为儒家“君子”的一个重要历程。而且,就像拥有“武”的特质的男人一样,文人达到君子境界的最重要的标准也是自我控制。因此,如果女人在他获得“文”之成就的道路上——实践中即通过科举考试——成为阻碍,文人就应该能够像“武”的英雄一样抵御女色的诱惑。

所有的才子佳人故事都围绕着抱得美人归和通过科举入仕这两个主题展开,尽管不一定按照这个顺序。“才子”这个称谓揭示了这些故事的真切意图。根据早期的字典《说文解字》和《集韵》,“才”的主要含义是指草木之初或人的内在本质<sup>①</sup>,很像孔子谈到的“质”。而且,正如孔子所指出的,一个男人需要文、质两方面的素质才能成为一个君子。而文则起着教化所有男人都具备的质的作用。才子通常具有创造性的禀赋,如长于诗歌创作。然而,这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如果不经教化、教育和熏陶(即文—化),就毫无价值。在被文—化的过程中,才子得以修习更多的正统思想,使他能够通过科举考试、承担社会责任。<sup>②</sup>因此,才子佳人体是关于青年才俊成长为具有公认的男子气概并为社会所欣赏的文人、君子的故事。

如果说君子称号是所有男人都应该追求的最高奖赏,而性诱惑是最难克服的障碍的话,那么,“文”的男人在控制性欲上面临着和“武”的男人同样大的危险。然而,他用来控制这一诱惑的机制与“武”英雄们所采用的禁欲的方法截然相反。“武”的男性特质着力强化“兄弟义气”和在

<sup>①</sup> 《汉语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766页。

<sup>②</sup> 在科举考试过程中,初等生被称作秀才,秀意指“经改良的”或“有才艺的”。因此,秀才是最常见的文人,他们的“才”通过初等考试得到了“改良”,正常情况下他们会继续进行学习。

男人之间保持忠诚的观念。但是，男性竞争依然咄咄逼人。为了在竞争中获得掌控，三国时期的曹丕早已经认识到了“文人相轻”这一普遍原则的重要性。<sup>①</sup> 这个表达已成为一个人尽皆知的成语，用来形容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虽然明显体力较差，但“文”的男人显示出比“武”的男人更强的竞争力。他既能宣称自己在与男人和女人的交往中有着良好的自控力，又能娴熟地找到让自己性欲望得以满足的理由。《莺莺传》和《西厢记》可谓这一现象的典型例证。

由著名唐代诗人和政治家元稹(779—831)创作的《莺莺传》，依中国古代文体划分，属于唐传奇。它讲述了一个“性温茂，美丰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的张姓青年男子的故事。<sup>②</sup> 在一次旅行中，他求宿于一间寺庙，和孀居的崔夫人与她的幼子及女儿莺莺为邻。寺院周围的一支驻军于此时骤发兵变。张生认识附近的一些官员，就写信请他们来保护崔家。兵变平复后，崔夫人邀请张生赴晚宴以答谢其援手之恩。张生一见到她的女儿莺莺，“颜色艳异，光辉动人”<sup>③</sup>，立刻就爱上了她。在莺莺侍女红娘的帮助下，张生与莺莺情诗互换，并在几晚之后成为恋人。不久，张生去京城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两地相思，鸿雁传书。在京城张生还向朋友们展示了莺莺写给他的情书。虽然郎情妾意，但他铁了心不肯和莺莺结婚。分开一年之后，莺莺嫁给了另一位男子，而张生也另觅新妇。在经过她居住的小镇时，他还想去看她，但莺莺拒绝重叙旧情，只给他寄了两首表达弃妇之情的诗。

海陶玮(James Hightower)在自己的研究中专注于确认元稹到底是故事里的叙述人，是作者，还是两个身份兼而有之。因此，他并不太关

① 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教研组编：《汉语成语汇释》，无出版社和出版时间，第536页。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成语释义：指文人之间互相看不起。

② 收录于王泽君、龙涛编：《前言》，1992年，第138—156页。英文版参见海陶玮(James R. Hightower)：《元稹和〈莺莺传〉》(“Yüan Chen and ‘The Story of Yingying’”)，载《哈佛亚洲研究》，第33期(1973年)，第93页。

③ 海陶玮，英文版同上，第94页。



心这个故事在男性特质方面所蕴含的意义。不过，他“勉为其难地得出结论：这个故事的作者是元稹。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这个故事，目的是自我辩解，也是警示世人”。<sup>①</sup> 海陶玮的研究无可挑剔。但在用讽喻或对一个杰出政治家的间接攻击来解读这个故事的尝试“此路不通”后，他似乎不太愿意接受自己论据充分的结论：这个故事是对元稹自我经历的客观叙述。对“相当拘谨、对道德有自我意识与自我要求、不会轻易为友人所影响”的年轻的男主角张生，会以所谓“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为由，轻率地抛弃莺莺这样甜美的姑娘，他似乎百思不得其解。<sup>②</sup>

海陶玮对张生的评定是以现代西方的道德和利己观为基础的。如果我们把这个故事当作一个发生于两个家世良好、才貌出众的年轻人之间的婚前韵事来看的话，那么，这个结局就是人们所能希望见到的最佳结果。由于最终也没娶莺莺，“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sup>③</sup>。张生的错误就在于他失去了对性欲的自我控制，在没结婚前，就和莺莺上了床。在严正拒绝了莺莺这个情思之源后，他重新获得了对欲望的自控力。从莺莺为数不多的对白中，可以看出连她也深明此理。在分离来临之际，莺莺“恭貌怡声”地对张生说：“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sup>④</sup>虽然在故事的结尾莺莺称自己花容不再而羞见张生，她至少还活着并结了婚。而唐传奇中另外两个著名的女主人公任氏、霍小玉则没有这么幸运。像许许多多的美人一样，她们为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sup>⑤</sup>

① 海陶玮，(James R. Hightower):《元稹和〈莺莺传〉》，“Yüan Chen and ‘The Story of Yingying’”，第123页。

② 同上书，第122页。

③ 同上书，第103页。

④ 同上书，第97页。

⑤ 有趣的是，任氏和霍小玉都不出身于受人尊敬的家庭。任氏是个狐狸精，而霍小玉是个青楼妓女。这两个故事里的男主人公也很难称得上是什么君子。郑六“早习武艺”，而李益全无自我控制力。在“文武”语境中，他们的命运是他们应得的。这些故事参见王泽君、龙涛编：《中国言情小说大观》，第60—63、90—103页。

莺莺帮助张生证明了他的男性特质。首先，他对她的性征服证明了他的身体力量。第二，科举考试后他对莺莺的拒绝显示出他在男性自我控制上成功地吸取了一个教训。从故事的一开始我们就被告知，张生不仅是个美男子，而且“内秉坚孤”。但是，他第一次见到莺莺就被她的美貌冲昏了头脑，并试图通过红娘勾引她。美色当前，他的自我控制和对科举考试的坚定信念动摇了。当莺莺责备他试图以“淫泆之词”对她“掠乱以求”时，他只是“复逾而出，于是绝望”。<sup>①</sup> 是莺莺自己在几晚后不约而至，来到了他的床边。任何一个阶段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张生在自己控制中失败了。当他最终决定抛弃莺莺时，张生公开的理由（海陶玮称之为“奇异的胡拼乱凑”）几乎是中国所有传统爱情故事都会给出的一个标准答案：“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sup>②</sup> 这个厌女主义的观点和张生自我修养以实现君子之仪的坚定信念是一致的。他用压抑自己对这个女人的爱情来显示读书人在自我控制道路上的成功。莺莺只是张生用来证明自己“文”的男性特质的一个工具。而他的朋友和后世文人们一心效仿的，正是这种自我控制。

正如我此前指出的，证明自己可以做到自我控制是控制他人的重要前提。这也是男性掌握“文武”技能的一个必要条件。《莺莺传》是用文言写就的。在唐代，这是只有精英群体才能阅读的语言。事实上，许多唐传奇是写来为小圈子里的朋友们提供消遣的。因此，《莺莺传》里直白阐述的道德观，很可能确为文人读者所接受并代表了作者真正的道德立场，而并非讽喻和自嘲。如果黄卫总没有弄错的话，唐代文人对他们的信仰体系有着相对的自信。但是，到了元、明两代，知识阶层的社会地位已不那么稳固，文人把自己（和那些充斥着文学作品的青楼女子们一道）

<sup>①</sup> 海陶玮：《元稹和〈莺莺传〉》，第96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102页。

视为“社会边缘人”。<sup>①</sup> 才子通过压抑性欲来获得某些形式的启迪甚至成为君子的做法,也因此变得前景晦暗不明。

## 作为预备君子的才子

明清时期,故事讲述也成了一种更为精致的艺术形式。当小说开始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文学体裁时,复杂的思想——无论是有关道德的还是情感的——得以更为充分地生发开来。何谷理(Robert Hegel)在分析李渔的《肉蒲团》时<sup>②</sup>,就令人信服地证明这部小说可以被视为讽刺文学的杰作,李渔在其中对文人士绅阶层的嘲笑既幽默又无情。<sup>③</sup> 何谷理贴切地将男主角的名字未央生翻译为“Not Yet Spent”。从小说一开始,未央生就表明自己“闻道的悟性,行文的笔性,都是最上一流”,并声称他的愿望是要“作天下第一个才子”、“娶天下第一位佳人”。然而,由于毫无节制地寻求性满足,他的作为荒淫无耻,永远也达不到君子境界。小说结尾处对“他”(其实是经术士改造)的巨大阳物的割除,也许象征着其“冤孽之根”的断绝,但他的这番猛然醒悟是对佛教绝欲教义的可笑表演——也就是说,他仍未掌握儒家自律的秘典。

虽然才子佳人模式已可以用较为模糊和复杂的方式来构建,而李渔也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但大多数观众和读者不见得有时间和专业知识来解构他们的所见所闻。他们可能只想从中得到娱乐,得到对自己幻

---

① 徐碧卿(Hsu Pi-ching):《冯梦龙小说中的花魁与书生:超越的地位与性别》(“Courtesans and Scholars in the Writings of Feng Menglong: Transcending Status and Gender”),载《男女:早期和中华帝国的男人、女人和性别》(*Nan-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第2卷第1期(2000年),第77页。这篇文章在明代对唐代故事的欣赏方面有一段出色的论述。

② 成书于1657年的《肉蒲团》已有过很多译本。最近的一个英文版是李渔:《肉蒲团》(*The Carnal Prayer Mat*),韩南(Patrick Hanan)译,Arrow Books 1990年英文版。

③ 何谷理(Robert E. Hegel):《十七世纪中国小说》(*The Novel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6—187页。

想、渴望的描绘。特别是对那些寻求消遣的读者来说，他们极有可能把艺术和文学当成疲惫心灵的安慰剂。举例而言，人们一直视《肉蒲团》为一部色情小说，而很少认为它也是世情讽刺文学。元代以来才子佳人体的盛行主要在于它们令人感觉良好的故事线，而不是因为向读者提供了深刻的社会分析。不过，比起唐传奇，这些作品的流行度的确意味着它们所携带的信息为更广泛的观众所接受，或至少是更贴近市井。元杂剧就是一例。它可以被视为文人理想与关注的普泛化。戏剧、戏曲为“大众”所喜闻乐见，这和文学——特别是以古典风格写就的《莺莺传》——不同。因此，对元杂剧中的思想观念，人们可能会有与唐传奇截然不同的期待。然而，下面的分析将证明，在王实甫以《莺莺传》为蓝本所著杂剧的《西厢记》中，“文武”只是体现得更为明确具体，但其中的假设与逻辑并未改变。

《西厢记》的故事情节与《莺莺传》基本一致<sup>①</sup>，但有一些重要的补充和改动。例如，这个版本中的崔夫人强烈反对这一对年轻恋人在一起，丫鬟红娘则变成了最令人难忘的机智人物，极力促成男女主人公的好事。而最重大的变化是这个浪漫故事的结局——在《西厢记》中，张生和莺莺结了婚并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许多作家都为剧作结尾的大逆转额手称庆，认为这象征着年轻男女的爱情战胜了封建的婚姻专制。用更学术化的语言来描述的话，这些变化可以被看成是“情”对“礼”的胜出。<sup>②</sup> 情与礼都是儒家学说的范畴，而它们之间的相反相成，是中国历史上哲学争论的中心和新儒学的核心问题。在“文武”男性特质的背景下，礼当然是至关重要的。情，尤其与性有关的情，正是君子 and 英雄需要警

① 尽管由《莺莺传》衍生而来，《西厢记》的直接来源是董解元(约 1189—1208)《西厢记诸宫调》。对这个作品的译介参见陈莉莉(译音)(Ch'en Li-li)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Master Tung's Western Chamber Romance: A Chinese Chantefable*)，剑桥大学出版社，1976年。诸宫调是12世纪宋金元时期流行的一种说唱体，由曲牌(演唱)和说白(叙述)组成。

② 关于这个故事新版本的标准中文解读，参见马良春、李福田：《中国文学大辞典》第八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0—1842页中的相关词条。

惕防备的。然而,在《西厢记》中,张生不只对美女着迷、哭泣、下跪(这已经足够可怕了),而且对丫鬟红娘也是如此。正如宋耕所说,“剧中对害了相思病的书生的描绘几近漫画。这一方面可以归因于中国文学中嘲讽迂腐读书人的传统;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被视为沮丧的元代文人为百无一用的自己画下的一幅自画像”。<sup>①</sup> 就像我们从前面未央生的身上所看到的,这幅自画像在明清的许多小说中都找到了共鸣。

尽管张生在和女人相处时偏离了君子举止得宜的行为指南,但他的确找到了幸福,甚至得到了在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的奖励(唐传奇中的张生则没能通过)。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元杂剧是一个针对下层阶级的演出本,因此,读书人可以不必那么严格地恪守儒家的道德规范。<sup>②</sup> 虽然张生还不是一个君子,但他的才子信誉完好无损。就像他的前身,这个张生也有一副好相貌,有通过科举考试并进入官场的志向。不幸的是,他在“内秉坚孤”的能力上有所不足。正是这一缺陷向西方和中国观众表明,“小生”的角色——张生即为其中经典——缺乏男性特质。<sup>③</sup> 缺乏自律会导致在权力获取中败北几乎是条不容置疑的铁律。然而,为什么自元以下会出现这么多像张生一样软弱但又富有魅力的才子形象呢?文人不可能真的在上一个千年中放弃所有对“文武”男性特质的理想和对权力、特权的追求。

《西厢记》表明,虽然唐传奇明白无误地把自我控制当作男子气概的一个先决条件,《西厢记》中的才子却无需这一核心价值就能功成名就。这出剧目的观众不限于文人阶层——它的目标观众群更为广泛,商贾、

① 宋耕 (Song Geng):《银样蜡枪头:元曲中男性特质的构建》(“Wax Spear-head: The Construction of Masculinity in Yuan Drama”),载《淡江评论(台湾)》(*Tamkang Review*),第30卷第1期(2000年),第220页。我得承认在写作这个章节时,我从这篇论文的许多见解中得到了助益。

② 即使是这个文本的出版本,也曾经历过多次改编以使其对“无知男女”有所针对。相关叙述参见马兰安 (Anne McLaren):《中国民间文化与明代说唱》(*Chinese Popular Culture & Ming Chante fables*),布里尔出版社1998年版,第49—52页。

③ 宋耕:《银样蜡枪头:元曲中男性特质的构建》,第209页。

工匠、市民、农户无所不包。另外，到了元代，由于文人社会地位的降低，他们为不安全感 and 不确定性所困扰，以至于他们的自画像几乎是对自己的讽刺。不过，“文”仍旧高于“武”，像其他许许多多以脆弱、敏感的书生为主角的才子佳人故事一样，《西厢记》只巩固了文人（即使他还未达到君子的境界）最富阳刚之气的男性地位。不同于唐传奇《莺莺传》中张生是唯一重要的男性角色，《西厢记》中还涌现了其他几个值得注意的男性原型人物。在剧作的开始，当寺院被叛兵包围时，张生给将军杜确发了一封求援信。在寺庙被围攻时，送信的人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和高强的武艺。勇敢坚忍的和尚慧明不负所托圆满完成了这个任务。杜确将军带着五千人的军队赶到寺院解了崔家之危。正如宋耕指出的，“信是用精致典雅的语言写就的……作为一个瘦弱的、自己打不了仗的书生，张生之所以号称‘胸有百万兵’，皆因他是文本权力的持有人”。<sup>①</sup> 有趣的是，他的英勇行为是在两位“武”的英雄——军事将领（英雄）和忠诚、勇敢的僧侣（好汉）的协助下完成的。“文”对“武”的指挥地位在剧中被自然化了。

《西厢记》中还有其他两个需要关注的男性角色。他们都是与张生争抢莺莺的对手：叛军中的将军孙飞虎和书生郑恒。在英雄杜将军的帮助下，两个对手都被彻底击败了。同样代表着“文武”二元组合的这一对小人与杜确、张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之间的区别是：杜和张象征着正当和正义的“文武”：杜是皇家军队的将军，而张是个在未来科举考试中夺得了头名状元的才子。相比之下，孙和郑是“文武”的伪代表：孙是个逆贼，郑尽管有着富有强大的家世背景却荒废学业、一事无成。这两个人都因为有负于“文武”理想而受到了惩罚。

我们对《西厢记》的简短讨论证实了高罗佩和黄卫总等学者的主张，那就是，元明时期的文人感到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如前朝安全。事实

<sup>①</sup> 宋耕：《银样蜡枪头：元曲中男性特质的构建》，第242—243页。

上,夏志清相信,其实早在北宋时期的故事复述者那里张生形象就已经出现了改变。他认为,“他们那些质朴的观众消化不了元稹笔下的故事,可能更想看到一个要么更悲剧要么更幸福的结局。唐传奇里卑鄙无情的男主角因此适时地变成了一个深情的恋人”。<sup>①</sup> 这出杂剧还证明,读书人在获取政治权力和社会接受的竞争中比其他男人更具竞争力。而对女人所有权的争夺就是这种竞争最生动的例证。因此,赢得女人不只是一种性征服,更是对社会、道德正义的肯定。我们看到,尽管有许多读书人失去了政治权力,但通过在创作中将这种理念正当化,“文”的价值高人一等的信念在文人中依然强大。《西厢记》中的张生可能已经失去了唐时原版的“内秉坚孤”,但说到底,他们在骨子里还是同一个人。

张生作为才子的“文”的信誉仍然只要通过科举考试就能获得正式承认。人们的看法是,作为一个历练阶段的文人,其自我控制可以稍稍放纵一点儿。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才子只有通过年轻时的放纵才能学到自我控制。但一旦结了婚并通过考试,社会寄望就要求他成为一个成熟的文人,而不再是一个犹豫、多情的才子。有鉴于此,把《西厢记》而不是唐传奇《莺莺传》划分在才子佳人故事类别下是有道理的。这是因为,与元杂剧版不同,唐传奇版中的张生虽然也曾中道迷途,但随着对美色诱惑的最终拒绝,他重新找回了自我控制力。不过,即使是元杂剧中的张生也在“文”(包括文学的和道德的)上相当自负。人们仍旧认为他优于那些只擅武艺和在文学才华上不及他的男人。所不同的是,在现实中缺乏解决之道使得才子们的幻想更为夸张。才子的名头意味着即便他对经科举考试入仕这样的世俗追求漠不关心,也同样能鱼跃龙门。<sup>②</sup> 才子因此可以鱼与熊掌兼得:他和女人上床,并且在不离开她的情况下

① 夏志清(C. T. Hsia):《述评引言》(“A Critical Introduction”),载王实甫(Wang Shifu):《西厢记》(*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Chamber*),熊式一(S. I. Hsiung)译,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8年英文版,第15页。

② 例如,章文泓、纪德君:《才子形象模式的文化心理阐释》,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1996年),第111页中所引的所有才子在职业生涯中都获有一个学位。

也能在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这是才子佳人故事的一个标准套路。由于大多数观众都不是读书人，金榜题名因而得以在幻想的空间里保存了下来，自我控制与自我满足之间的对立也不再需要那样彻底的解决之道。

## 当代文人

在从“文武”范式方面对传统才子的形象进行了阐释之后，我将在传统文人的框架内对知识分子男性特质的当代建构做一番探讨。为此，我将集中审视备受争议的作家张贤亮（生于1936年）的半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绿化树》（1984）、《男人的一半是女人》（1985年）和《习惯死亡》（1989年）中的男主人公。在1980年代末期和1990年代，这些小说，尤其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被视为中国新的性开放的象征。这三部小说均被翻译成外文并在西方世界唾手可得。张贤亮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乃至海外（从1989年的《习惯死亡》开始）大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对中国人的性的描写。

尽管西方读者——和许多21世纪的中国读者——会觉得他对性的描述做作、陈腐，但必须记住，张贤亮是在一定历史阶段完成这些创作的。许多评论家都认为他“为这个国家知识分子的困境的言说动人心魄”。<sup>①</sup>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自我认同的知识分子，他的书写揭示了许多当代文人所关注的东西。中国正在迅速的变化之中；我们将要探讨的这三部小说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业已时过境迁。但是，我将证明，张贤亮小说中提出的有关男性特质的基本问题源自传统，并将在此后“文”的男性特质的建构中经久不衰。由于张贤亮的小说反映了那个不寻常的历史关头，大多数评论家们的关注被导向了“劳改农场”的生活，或/和这种

---

<sup>①</sup> 摘自封底广告。张贤亮(Zhang Xianliang):《习惯死亡》(*Getting Used to Dying*),艾梅霞(Martha Avery)译,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1991年英文版。



生活对男主人公与女性关系的影响。<sup>①</sup> 故事叙述者的不安全感、自高自大感、阳痿症和厌女症也因此被放在了劳改农场或极权政治的框架中加以解释。

我认为,这种不寻常的政治情况掩盖了小说对“文”的男性特征的恒定性描绘,因而造成了读者和张贤亮自己对极左时期是否已阉割了“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怀疑。<sup>②</sup> 当然,我不会轻看知识分子在极左时期所遭受的苦难与不公正待遇。我也赞同在特殊时期可能会产生一些扭曲人性的观点。然而,传统才子和当代知识分子在自我认同上的确有着基本的相似之处。这些相似点超越了社会或政治地位变化的影响。就像唐代的张生毫无疑问地在元代张生身上复活,张贤亮半自传体三部曲中的知识分子章永璘也是经典文人的又一个变体。<sup>③</sup> 这一复制过程并不难理解,而对其最好的揭示,就是用它对灵肉之分的调整及其如何对男女和男男关系产生影响的方式来阐明“文武”二元结构。

《灵与肉》是张贤亮早期的一篇小说,从名字上看他已在肉体与心灵之间划出了界限。<sup>④</sup> 这个短篇讲述一个被错划为右派、送往国营农场劳动的年轻人,选择继续当个牧马人而不是到国外继承他父亲遗产的故

① 例见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对张贤亮劳改农场小说内特海姆式的解读》(“A Bettelheimian Interpretation of Chang Hsien-liang's Concentration-Camp Novels”),载《亚洲专刊》(*Asia Major*)1991年第4卷第2期,第83—113页。金介甫认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男主人公章永璘实际上是个“集中营的幸存者”(第100页)。其他与章永璘相关的有关“劳改农场”的文章见同期《亚洲专刊》。例如,吴燕娜(Yenna Wu):《张贤亮劳改农场小说中的女性救赎者》(“Women as Sources of Redemption in Chang Hsien-liang's Labor-Camp Fiction”),载同上,第115—131页;以及威廉姆斯(Philip F. Williams):《“改造”和中国劳改农场小说》(“‘Remolding’ and the Chinese Labor Camp Novel”),载同上,第133—149页。

② 艾梅霞(Martha Avery)译:《译者前言》(“Translator's Introduction”),载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Half of Man Is Woman*),艾梅霞译,企鹅图书1989年英文版,第7页。

③ 其他批评家也指出了张贤亮小说中的漂亮女人和莺莺之间的联系。参见吴燕娜:《张贤亮劳改农场小说中的女性救赎者》,第129页。

④ 张贤亮:《灵与肉》,原载1980年《收获》,重印《张贤亮选集》卷1,第138—165页。这部小说是1980年左右发动的反击“血统”论运动的一部分。“血统”论主张阶级忠诚是由一代传向下一代的。

事。这个故事的主旨不在于直接阐明“文”与“武”的转变。然而，小说的名字的确反映出精神、脑力观照比物质、肉体观照更为重要的原则。《绿化树》及其姊妹篇《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明白地阐释了这个原则。在《绿化树》中，知识分子章永璘——这两部小说的叙述者和男主人公——在1961年被劳教释放，分配到一个国营农场工作。尽管形容憔悴，他仍得到了少数民族青年妇女马缨花的关爱。从爱慕她美貌的男人所提供的粮食和其他食品支撑下的“美国饭店”里，马缨花拿出食物给章永璘充饥。章永璘打不回猎物，也做不了家具，但她喜欢听他讲的故事和想法。在章永璘出现之前，强壮英俊的农场车把式海喜喜是马缨花在所有追求者中的最爱。当马缨花表现出她对大脑的喜爱超过肌肉时，这两个男人打了一架，势均力敌，谁也没赢。但章永璘成了默认的胜利者，海喜喜则逃之夭夭。当晚，马缨花流露出了对获胜英雄的爱意。但当章永璘情炙如火时，马缨花却劝他先好好念书，等条件好了再成家。但还没等这些发生，章永璘就被指控协助海喜喜逃跑，又被抓了起来。等六年后他被释放，才知道马缨花早带着女儿跟哥哥回老家了。小说结束于1983年的北京。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次会议中，章永璘回想起了那些像马缨花一样的普通的体力劳动者是怎样帮助他“变为一种新的人”的。

显然，故事叙述者对“绿化树”（马缨花的学名）的回想是把它当成了哺育他恢复健康、成功的普通劳动者的象征。这种抽象是一种误导。正像乐刚指出的，除了是个“喂食的母亲形象”<sup>①</sup>，马缨花还是个文盲，没有阶级觉悟，出身少数民族，还有一个私生女。如果要算个什么人物，那她就是“提供了一个有力的、颠覆人民的”人物形象。<sup>②</sup> 不过，她在故事中的角色的确是喂养章永璘，敦促他念书，并使他成为一个完整的男人。食

① 乐刚(Gang Yue):《乞讨之口:饥饿、食人主义与现代中国的饮食政治》(*The Mouth That Beggars: Hunger, Cannib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Eating in Modern China*), 杜克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195页。

② 同上书, 第197页。

物在她的身份中所占比重如此之大,以至于在互相表白时,她不让他叫她“亲爱的”(对这个词她显然不熟悉),而叫她“肉肉”;她自己则叫他“狗狗”。<sup>①</sup> 章永璘想到:

“狗狗”这个表示疼爱的称谓,虽然也令我叹服,使我叫绝,但立刻也使我感到与我一贯所向往的那种“优雅的柔情”迥然相异。我既然已经成为正常人,既然已经续接上了过去的回忆,她这种爱情的方式和爱情的语言,就隐隐地令我感觉别扭,觉得可笑。我虽然不愿意她发现我与她之间,有着她不可能拉齐的差距,但我却开始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种差距。<sup>②</sup>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章永璘对被浪漫化了的劳动人民和妇女的真诚。然而,就像他不断提醒我们的,他和他们之间有着“不可能拉齐的差距”。<sup>③</sup> 然而,有趣的是,当他质疑马缨花的那些爱称时,他觉得尤为可笑的是“狗狗”,而不是“肉肉”。实际上,对一个无法在农场的严酷环境中自己谋生的知识分子来说,马缨花就等同于一片可以使他获得温饱的肉。他是和她两岁女儿唯一的食物来源;而其他男人则向她提供食物,这就是为什么她总有充足的食物来源。有趣的是,他把她当作一片提供心灵养分的肉,但却没有跟她发生肉体关系。这令人回想起《三国》、《水浒》中“武”的男性。但章永璘和他们截然不同。他没有性交恐惧。他只是在升华自己的性能量,直至他们都做好准备。她明了这一点,并像传统小说中的贤良女子那样,劝所钟情的男子义无反顾地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她希望他升华,因为“你是念书人,就得念书。只要你念书,哪怕我

① 张贤亮:《绿化树》,重印于《张贤亮选集》卷3,第291页。

② 张贤亮:《绿化树》(Mimosa),戴乃迭(Gladys Yang)译英文版,中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37页。

③ 同上书,第135页。

苦得头上长草也心甘情愿”<sup>①</sup>。因此，就像旧时代的才子一样，他驾轻就熟地和一个美丽的女人在一起，她心甘情愿地压抑自己的性欲以使他毫无负担地念书。他读书、思考；她做饭、缝纫。对章永璘和那些传统文人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家庭生活画面。要让这个乌托邦真正完美，就需要一个让这个女人也渴望实现的共同理想。因此，叙述者讲到，“那容光焕发的脸，表明了她在一种气氛里得到了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她享受着一个人的权利。后来，我才渐渐感觉到，她把有一个男人在她旁边正正经经地念书，当作由童年时的印象形成的一个憧憬、一个美丽的梦，也是中国妇女的一个古老的传统的幻想”<sup>②</sup>。从古至今的女性对才子佳人故事的向往由此跃然纸上，即便她们身处国营农场的严酷环境中。

这个理想在男人的关系中得到了更有力的显现。离开劳改农场后第一次发工资，章永璘就要心眼儿骗一个可怜的农民把五斤黄萝卜贱卖给他。<sup>③</sup> 在整部小说里，不仅马缨花因为他有学问而看重他，甚至他的男性对手也把他当成聪明、有学问的人来尊重。作为一个读书人，叙述者心安理得地接受马缨花的自我奉献，因为他了解这是“中国妇女的一个古老的传统的幻想”。海喜喜有着强壮的身体和道德上的顾忌，这使他成为章永璘(文)一个完美的“武”的对应。重要的是，连他也臣服于章永璘作为读书人的高人一等。他不仅把马缨花让给章永璘，还显示了他“不记夙怨的男子汉作风”<sup>④</sup>，把一百多斤黄豆留给他们之后才逃跑。他向章永璘保证这是他偷偷自种的黄豆：“我知道你们念书人不吃偷来的东西。你不知道，我跟你实说了吧！”<sup>⑤</sup>可见，读书人似乎理所当然地在道德领域占据着优越的地位。

① 张贤亮：《绿化树》(Mimosa)，戴乃迭(Gladys Yang)译英文版，中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页。

② 同上书，第132页。

③ 同上书，第55页。

④ 高嵩：《张贤亮小说论》，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页。

⑤ 张贤亮：《绿化树》英文版，第151页。

当章永璘问他为什么不带走自己种的黄豆时，海喜喜回答说：“我不带！我走到哪达儿都短不了吃的。不像你们，一个女子，一个念书人……”<sup>①</sup>这句离别之语是一个“武”的男人对才子配佳人这个一般原则逆来顺受的认可。海喜喜至少还曾试过追求马缨花，要真的是个英雄好汉式的传统的“武”的男性，他就压根儿不必为此费心了。时代的变化多大啊！在下一章中，我将展示共产主义革命给“武”的男性特质带来的一些变化。但不管我们讨论的中心是知识分子还是农民，“文”优于“武”是个不变的原则。在所有的反躬自问、自我怀疑的外衣之下，知识分子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自我认同感和对情欲纠缠的超然地位也依然保持不变。在这部小说中，章永璘并不需要像唐代的张生一样抛弃马缨花。不过，他在故事里很合宜地被迫离开了她，因而得以到首都北京发展他的事业。如要展现他有赢得一个女人然后在新的政治框架中抛弃她的能力，我们还需要看看这个故事的续篇《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 半个男人也是英雄

章永璘曲折的自传故事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得以继续。在这部小说里，他被关在了1967年的劳改农场。作为煎熬中仅存的一点慰藉，劳改犯们每晚都要交换他们在梦中与女鬼交欢的故事。在这种性饥渴的环境中，章永璘碰上了一个在排水沟边洗澡的女劳改犯，并将她性感的赤裸躯体尽收眼底。她也发现了他，却用毫不防御的姿态让他继续盯视。八年后，劳改释放的章永璘在国营农场里放羊为生。生产队的党委书记曹学义派了一个名叫黄香久的女人来帮他修羊圈。而她，正是他八年前遇见过的那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分开的这八年中，黄香久已结过两次婚，也离了两次婚。不久，章永璘和黄香久在曹学义的批准下结了婚。

---

<sup>①</sup> 张贤亮：《绿化树》英文版，第151页。

但新婚之夜，章永璘发现多年的性压抑已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性无能。他想离婚，但被她拒绝了。没多久，章永璘就发现黄香久背着他和曹学义发生了关系。在挫折和痛苦中，他把自己埋在了西方和中国哲学中。大渠决口给了章永璘一个成为英雄的机会，而黄香久当晚对他也尤为体贴：他终于勃起，从“半个人”变成了“完整的人”。男性功能恢复后，他以公然的轻蔑对待黄香久，而她则回报以新的柔情与依恋。但章永璘已下定决心要离开她。而此时，正巧是“文革”后期知识分子重新出山的当口。

章永璘铁了心离开一个使他成为“完整的人”的女人以追求男子汉的雄图大业，这样的行为或者会令唐代的张生为他感到骄傲，但在当代中国他的行为却把他卷入了一场有关性道德的文学大争论。一些中国评论家视他为“伪君子”，而另外一些评论家则把他先前的阳痿和其后对黄香久的遗弃视为对那个时代政治气候变化的反映。<sup>①</sup> 还有人认为这部小说中性与政治的交织寓意着动乱年代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阉割”。<sup>②</sup> 不管人们把章永璘对女主人公的行为理解为其内心道德斗争还是外界政治斗争的结果，我们都很难避免得出“女人被用来充当一个男人进行奋斗的阶梯”的结论。<sup>③</sup> 瓦格纳(Marsha Wagner)在她对这篇小说的评论

① 例见周惟波：《章永璘是个伪君子》，原载《文汇报》，1985年10月7日；宁夏人民出版社编：《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重印，第4—6页。相反的观点，参见蔡恒茂：《习惯于从容地谈论它》，原载《当代作家评论》，第2期（1986年），宁夏人民出版社编：《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重印，第100—110页。

② 吴燕娜(Yenna Wu)：《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性与政治的交织》(“The Interweaving of Sex and Politics in Zhang Xianliang’s Half of Man Is Woman”),载《汉语教师协会会刊》(*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第27卷第1/2期(1992年),第1—27页。

③ 钟雪萍(Zhong Xueping)：《男性的痛苦与欲望：〈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之阅读政治》(“Male Suffering and Male Desire: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Half of Man Is Woman”),载柯临清(Christina K. Gilmartin)、贺萧(Gail Hershatter)、罗丽莎(Lisa Rofel)、怀特(Tyrene White)等编：《女人、文化、中国》(*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哈佛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页。

中就认为，“这部小说是关于厌女心理的一个极好的研究对象”。<sup>①</sup>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对黄香久的描绘的确远不及《绿化树》中的马缨花那么令人同情。虽然马缨花是个单亲妈妈，也会和其他男人打情骂俏，但小说强调了她的贞洁。与之相反，黄香久不但离了两次婚，和章永璘结婚后还跟农场干部曹学义偷情。章永璘决定抛弃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以便在国家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显得有些道理。但是，就像马缨花一样，事实上黄香久也是章永璘得以康复的原因。对章永璘来说，曹学义实在太过强大，他无法像对海喜喜那样打一架较量一番。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章永璘以英雄姿态出现的关头是在决坝的洪水中。他是个游泳好手，而曹学义却是个“旱鸭子”。就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由于水在阴阳学说中属阴，征服水的能力可以被视为控制女性力量的能力。正是在这次洪水之后，章永璘恢复了性能力，并拥有了凌驾于黄香久之上的力量。他和黄香久上床时终于“行了”，黄香久也完全爱上了他。但就在这个时候，他却决定离开她。

章永璘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令许多批评家觉得莫名其妙，甚或道德败坏。<sup>②</sup> 然而，在“文武”二元模式中和唐代男主角张生的榜样参照下，当代知识分子章永璘的行为是自然而然的，并不难理解。唐代张生仅仅认定了莺莺若在身边会对他在生活中走向成功构成威胁。而作为莺莺在20世纪的转世化身，黄香久的不值得信赖则是通过她和曹学义的婚外性关系来宣示的。如前所述，元代文人阶层失去了太多的政治权力，以至于他们被塑造成了软脚虾。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元代张生最终和莺莺结了婚，而唐代张生则有足够的决心离开她。知识分子在“文革”时

① 瓦格纳 (Martha L. Wagner):《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Reviews: Half of Man Is Woman”),载《现代中国文学》(*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第5卷第1期(1989年),第142页。

② 例见黄子平:《正面展开灵与肉的搏斗》,原载1985年10月7日《文汇报》;枫谷(整理):《我们看〈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武汉大学部分研究生讨论综述》,载《当代作家评论》,第4期(1986年),第112—115页。

期降低的地位当然也能用来解释为什么知识分子章永磷对和妻子偷情的党委书记曹学义做不出什么惩罚。不过，在洪水决坝事件中章永磷赢得了“精神胜利”。很明显，黄香久在此后对章永磷全心全意，并认为和曹学义偷情是个错误。不管怎样，到故事结尾时，“文革”结束，邓小平回到北京，知识分子也重新获得某些失去的权力和特权。由对传统文人的忖度，我们完全可以预期章永磷的离去，“因为黄香久试图把他困在由她掌控的生活当中，已成了他精神进一步解放的障碍”。<sup>①</sup>

唐代张生所制定的“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一般规律，现在被明确赋予了政治和心理的元素。批评家谭国根(Kwok-kan Tam)认为，章永磷对待女性(性欲)和对待男性(政治野心)一样，为了实现解放，他“必须摆脱他与黄香久以及他与曹学义之间复杂、扭曲的关系所隐含的权力游戏”。<sup>②</sup> 因此，对知识分子章永磷来说，男人和女人都是用来支配和超越的。

在古代中国，文人为政治权力(和美丽的女人)而互相竞争。就像《西厢记》所生动展现的，即使在元代，那些竞争中的成功者也总是被塑造得道德高尚、才华横溢，而失败者则被描绘为品德恶劣、缺乏文化与文学才能。科举考试成功在过去是通向政治权力的正常轨道。但在20世纪，这个体系崩塌了。不过，知识分子仍然可以认为自己拥有像被废黜的古代儒家官员一样的道德优越感，为获得认可和特权而奋争。争而不得时，他们就会循古训“超脱”，听从檀道济的忠告：走为上策。<sup>③</sup> 通常情

① 谭国根(Kwok-kan Tam)：《张贤亮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性与权力》(“Sexuality and Power in Zhang Xianliang’s Novel Half of Man Is Woman”)，载《现代中国文学》(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第5卷第1期(1989年)，第69页。

② 谭国根(Kwok-kan Tam)：《张贤亮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性与权力》(“Sexuality and Power in Zhang Xianliang’s Novel Half of Man Is Woman”)，载《现代中国文学》(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第5卷第1期(1989年)，第69页。

③ 有关这一现象的讨论，请参见雷金庆(Kam Louie)：《继承传统：解读中国的古典哲学家1949—1966》(Inheriting Tradition: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lassical Philosophers in Communist China 1949—1966)，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1—128页。



况下,退回个人的精神世界和离开在行为上是一致的。<sup>①</sup> 而很多时候,女性都被当成是知识分子展示道德、精神优越的场所。<sup>②</sup> 中国强大的政治机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一段时期发动的间歇但彻底的反精英文化运动,使得读书人在官僚体系或政府中直接争权变得困难重重。“逃避”成了很常见的选择。

张贤亮的《习惯死亡》就是一个主人公沉溺于头脑中的精神生活而与物质上的生存境遇相疏离的例子。故事叙述者没有名字,但分别用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来指代自己;这也进一步突出了他人格分裂的迹象。尽管叙述者没有名字,但他对劳改农场的记忆和这部小说所表达的观照都指向其自传性质。因此,这部小说可以视为《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续篇。确有一些批评家指出,“考虑到小说中的潜台词,我们不难看出他不是别人,就是章永璘”,并进而以章永璘来称呼故事叙述者。<sup>③</sup> 这部小说以“现代主义”的模式写就。由于在历史时期、地点和人物上模棱两可,准确还原故事中纪年和人物的工作变得十分困难。但小说的情节相对简单。故事叙述者是一位过去的政治犯,有过多次数濒死经历。他的小说给他带来了国际声誉。在美国和法国的旅行中,他和好几位女性发生了关系,其中包括一个他以前在中国大陆的情人、一个中国台湾女人、一个学中文的法国女人和一个越南妓女。然而,每一次高潮时,他都会被一个突然闯入的画面吓个半死——一把枪射出的子弹正中他的头部。<sup>④</sup>

① 最近的例子请参见高行健:《灵山》,中文版 1990 年初版于台湾;《灵山》(*Soul Mountain*),陈顺妍(Mabel Lee)译,哈珀·柯林斯 2000 年英文版。

② 参见我关于《灵山》的论文。雷金庆(Kam Louie):《在南部山野中寻找中国人的灵魂》(“In Search of the Chinese Soul in the Mountains of the South”),载《中国杂志》(*The China Journal*),第 45 期(2001 年),第 145—149 页。

③ 钟雪萍:《被围困的男性特质:二十世纪后期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性与男性主体性问题》,第 65 页。

④ 把性高潮和死亡联系起来是相当普遍的。比如,法文中的“la petite mort(小死)”指的就是性高潮的结果。然而,就像钟雪萍所显示的,章永璘将性与死亡结合在一起有着将厌恶女人的观念合理化的效果(第 71—75 页)。

在小说的最后，他的思绪回到了一位从前的情人——显然就是上了年纪的马缨花或者黄香久身边。小说里，这是唯一一次女人与性没有和死亡及头部中弹联系在一起。因此，尽管在性控制权的全球竞争中可以宣扬“上个洋妞就是爱国”<sup>①</sup>，但民族主义议程仍然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叙述者只有在回到中国妇女身边才能获得心灵的平静，也就是他笔下的“爱国主义”。<sup>②</sup>

在《习惯死亡》中重生的章永璘不再阳痿。和其他一些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较为知名的作品一样<sup>③</sup>，这部小说也用男主人公征服多个性伴侣的“丰功伟绩”来强调他的男性魅力。但是，这个男人并不快乐。无论如何，与其他男人相比，他在面对女人时的竞争力已变得更为显著。事实上，仿佛情事诸多仍不足以说服叙述者自己及其读者他现在已不再是“半个人”，他的一位嫁给了美国男人的情人还向他保证：“你说我那连鬼都会笑话的小东西并不小，你说把你以前和男人做爱时的全部快乐加起来还不如和我的那一刹那，要不然你也不会叫得惊天动地。”<sup>④</sup>通过走向国际，现在有了更多的男人可供他在智力、行为上战而胜之。<sup>⑤</sup> 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表现在很多地方，而判断的标准通常在于只有他们才知道

① 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上个外国人就是爱国:中国的先锋民族主义者》(“To Screw Foreigners Is Patriotic: China's Avant-Garde Nationalists”),载《中国杂志》(*China Journal*),第 34 期(1995 年),第 209—234 页。

② 张贤亮:《习惯死亡》英文版,艾梅霞译,第 301 页。

③ 最具争议也最有名的是贾平凹的《废都》,小说中的作家是个非常有性吸引力的男人,尽管他看起来并没在社交上做什么值得这种吸引力的事。除了不用通过任何皇家考试,这个作家的形象很像传统文学中的典型文人。贾平凹:《废都》,1993 年北京第 1 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1996 年重印本。

④ 张贤亮:《习惯死亡》英文版,艾梅霞译,第 212 页。

⑤ 由性竞争引发的强烈情感在澳洲的一场喧嚣争论中得到了极好的阐释。这场争论由 1994 年 1 月发表的一篇文章激发。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居住在悉尼的中国女人。她宣称,比起中国男人,白人男性是更好的情人。这篇文章在澳洲媒体产生了巨大的反应。有关这一争议,请参见钟勇(Yong Zhong):《白色面具和黄皮肤之下:对悉尼一场关于华裔的性的辩论的后殖民批评》(“What's Behind White Masks and Yellow Skin: A Postcolonial Critique of a Chinese Sex Debate in Sydney”),载奥门森(Wenche Ommundsen)编:《杂种月亮:澳大利亚华裔作品评论集》(*Bastard Moon: Essays on Chinese-Australian Writing*),《他乡》特刊(*Special Issue of Otherland*),2001 年第 7 期,第 56—72 页。

真实的中国。1990年代的热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和《洋妞在北京》都毫不含糊地把在性上“征服”白人女性与国家的复兴联系在一起<sup>①</sup>，这样，“中国男人能赢得外国女人这一胜利不只象征着中国男性特质的复活，也象征着中华民族本身的复兴”<sup>②</sup>。

当然，现实世界里中国男人之间的性竞争比中国男人与白种男人之间的更加激烈。因此，小说对与海外华人的竞争给予了更多更细的笔墨。例如，有一次，章永璘儿时的玩伴乔——一个在美国非常成功的商人慷慨地奉承说：“如果当时伯父、伯母带你全家来美国，你会做得比我更好。”章永璘的回应毫不客气地展示了他争强好胜的性格。他沉吟道：

是的。如果我们当时举家迁来美国，我会比现在的你干得更好。在美国白手起家打出天下的，并不全是智商很高的中国人。可是，在中国大陆被视为敌对阶级的子弟嗣后又成为“对四化有贡献的知识分子”，却个个必须具备超常的秉赋。不然，你活都活不下来。这点你知道吗？

然后，他开车送他回旅馆，一路无话。小汽车在他们两边如流水般过去。被命运捉弄的感觉和迷惘都僵在脸上了，以致两人都不敢互相瞧一眼对方。几天后，他便带了金妮来见他。两个男人中间，必须有个女人才能活泼地对话，才能证明两个知识分子朋友在性上面旗鼓相当。<sup>③</sup>

① 《北京人在纽约》(导演郑晓龙、冯小刚，北京电视台，1993年)；《洋妞在北京》(导演王秉林、李建新，北京电影制片厂，1996年)。

② 鲁晓鹏(Sheldon H. Lu)：《中国的肥皂剧：视觉、性与男性特质的跨国政治》(“Soap Opera in China: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s of Visuality, Sexuality, and Masculinity”)，载《电影杂志》(Cinema Journal)，第30卷第1期(2000年)，第37页。

③ 张贤亮：《习惯死亡》英文版，艾梅霞译，第70—71页。这种把“买来的”女人用在男性结交上的做法和艾莉森(Anne Allison)关于一家日本夜总会状况的民族志著作里的描述很相似。艾莉森：《夜间工作：东京舞女俱乐部里的性、快感和共同的男子气概》(Nightwork: Sexuality, Pleasure, and Corporate Masculinity in a Tokyo Hostess Club)，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和中国历史上其他“文”的男人一样，章永璘看不起商人。对他来说，“智商很高的中国人”是那些具备超常秉赋的知识分子。在小说的另一个部分，他援引一位刚刚参观了巴黎卢浮宫的共产党员朋友的话说：“没有贵族就没有艺术。我指的是广义的贵族，真正的贵族。一个产生不了精神贵族的国家是可悲的！”<sup>①</sup>尽管执著于精神贵族的信念，到1980年代初，经济改革已催生了一整个关于党政人员、商业管理人员和知识分子关系的文学流派。这一文学运动在蒋子龙1979年的《乔厂长上任记》之后产生<sup>②</sup>，到1980年代时已以“改革文学”闻名。这一流派风行一时，使许多原本对商业毫无兴趣的作家也加入到与经济改革相关的创作中。比如，张贤亮就写了一部探讨关于改革时代男子气概的小说。<sup>③</sup>到了1990年代，全球化和商业化的潮流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更趋于个体。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甚至连孔子也被重新演绎为商业大师，许多作家都下了海。张贤亮本人也在1990年代中期成为两个大企业的经理。<sup>④</sup>

在传统定义下，文人不能是一个商人，连兼职商人也不应该做。不过，我需要重申一下，我们的关注更多的放在“文”、“武”男性的建构上，而不是男人过去或目前在干些什么。正如我将要在第七章展示的，作为西化的结果之一，“文”的男性建构早在20世纪初就已发生了转变。就

① 张贤亮：《习惯死亡》英文版，艾梅霞译，第285页。这种把“买来的”女人用在男性结交上的做法和艾莉森(Anne Allison)关于一家日本夜总会状况的民族志著作里的描述很相似。艾莉森：《夜间工作：东京舞女俱乐部里的性、快感和共同的男子气概》(*Nightwork: Sexuality, Pleasure, and Corporate Masculinity in a Tokyo Hostess Club*)，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Manger Qiao Assumes Office”)，英文版载王明杰(译音)译：《赤橙黄绿青蓝紫》(*All the Colours of the Rainbow*)，中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0—178页。这部小说集还收录了蒋子龙以改革为主题的其他几篇小说。

③ 张贤亮：《男人的风格》，1983年初版，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台湾)1988年重印本。

④ 王瑾(Jing Wang)：《高雅文化热：邓小平时代中国的政治、美学和意识形态》(*High Culture Fever: Politics, Aesthetics, and Ideology in Deng's China*)，加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4页。

如前一章我们对孔子的探讨中提到的，“文”中可以包含商业头脑的扭转在1990年代达到了顶峰。儒家商业伦理在西方管理实践中具有价值的提法也摆在了西方商学院学生的面前。<sup>①</sup>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双方或其中一方，只有在辩证互动中才会发生改变。但是，无论发生什么变化，“文武”建构似乎始终保持着几条基本原则。从唐朝至今，“文”的男人继续保有道德高地并自认为是精神贵族。对女性来说，无论是去京城赶考的才子、被劳教的犯人还是在巴黎访问的作家，“文”的男人都极富魅力。除了为他提供食物和性，女人还具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用途。毫无例外，对“文”的男人来说，由于智力高过他人，他们要取得成功就一定要能控制他人。但更重要的是，他更要能控制自身。直到他学会了这一点，他才能从一个才子变成成熟的文人、君子。还有什么比能自如地施予或抑制对女人的性欲更好的方式来证明这种自我控制呢？在这一点上，“文”的男人和“武”的男人是相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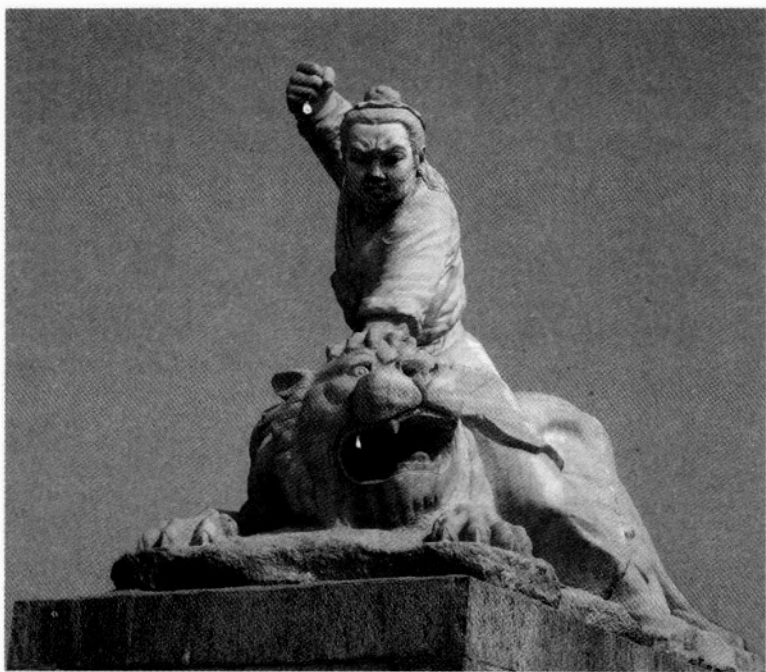
更重要的是，正如《习惯死亡》中的故事叙述者所观察到的，男人之间只有通过女人和性才能彼此关联。要记得，这个看法来自他与表弟乔自发生成的竞争。他觉得，作为一个历史的意外，他的物质状况不如表弟富足，而女人则有助于拉平他们之间的差距。这可以用两种方式解读：女人能提供谈话的话题或介质；女人能成为素质相对较好的那个男人的奖励。如果我们已经证明“武”的男性特质以忠诚、团结和兄弟情谊为重，而“文”的男性特质似乎更突出竞争、沙文主义和自我中心，那么，第二种解读方式就和第一种一样可信。这有些奇怪，因为“武”的男性特质理应是好战的、强调身体力量的，而“文”的男性特质则意味着书呆子气、有教养。但另一方面，这又合乎逻辑。如果“文武”讲的就是控制，那

<sup>①</sup> 程亏夫(译音)(Cliff Cheng):《“我们选择不竞争”:“择优”录取、亚洲人、亚裔美国男人和他们的男子气概》(“We Choose Not To Compete”: The ‘Merit’ Discourse in the Selection Process, and Asian and Asian American Men and Their Masculinity”),载程亏夫编:《组织中的男子气概》(*Masculinities in Organizations*),赛奇出版社1996年版,第177—200页。

么作为基本动机，“文”必须占据对“武”的主导地位。这样一来，尽管女性往往是把男人联系在一起的管道，但男性特质仍是象征着男人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的首要建构。在下一章中，我将结合阶级对“武”的男性特质作出更紧密的分析，以便进一步调查这一现象。这样，男性特质被用来调整社会政治力量的事实就会显得更为明显。



第五章 劳动阶级的英雄：传统与后毛泽东时代  
小说中“武”的形象



武松打虎雕塑



在这一章，我们将聚焦著名作家贾平凹的一篇短篇小说，以探讨“武”的男性特质在当代中国的构建问题。此前，我想先澄清一下有关“武”的几个重要问题。正如我们在前面三章指出的，科举考试中鱼跃龙门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意味着与权势联结在一起的男性特质是“文”；而“武”则更像是“劳动阶级”的男性理想。说到“劳动阶级”，我指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概念中的无产阶级或任何城市产业工人。<sup>①</sup> 在中国，“武”的英雄大多是出身穷困中下阶层的农民。

## 古代中国的好汉

虽然武圣关羽是“武”之理想的最佳范例，但众所周知的是，千百年来，关羽的偶像地位已经上升到无法轻易将其归类为“劳动阶级”的地步。他生前就是声名赫赫的将军，死后又成了神。他的神圣地位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他是凡人无法企及的一个理想。他是“英雄”群像中的一员：这些男人在政治上野心勃勃，一心想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而对于那些出身社会下层、社会地位的流动性极其有限的英雄人物，我们的分析就必须集中在“好汉”身上了。夏志清(C. T. Hsia)把好汉译为“good fellow(好哥们)”。这一直译相当贴切，因为“哥们情谊”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从友谊的理想状态升华成兄弟之情”的。<sup>②</sup>

而《水浒》中充满了这些条件。这里的一百零八条梁山好汉个个都

① 谁属于什么阶级在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毛泽东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赋予贫苦农民马克思主义阶级架构中无产者的身份，颇有成效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毛泽东选集》卷一，外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23—59页。

② 夏志清(C. T. Hsia)：《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86页。



是亡命之徒，个个都能“为兄弟两肋插刀”<sup>①</sup>，也个个都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地带。除了山寨领袖宋江一心想被朝廷招安、为皇帝效力<sup>②</sup>，其他好汉们对在政治上或社会上担当高官要职都不报什么期望。<sup>③</sup> 因此，虽然英雄和好汉都体现了“武”的理想，但好汉们大多来自穷困阶层，并留在这一阶层当中。他们所从事的典型职业包括当和尚、囚犯、步兵、农民，还有渔民。在比较有名的梁山好汉里面，武松、鲁智深、林冲、李逵和杨雄最令人难忘。而武松可能算得上是这些好汉中的好汉。他具有一个好汉所有最重要的特点，因而被赋予了“武”姓、松名（松通常是长寿与坚定的象征）。<sup>④</sup> 他的名字蕴含着的是一个有着永恒“武”之精神的男人。在审视当代中国劳动阶级的英雄之前，我将用武松的形象粗略地介绍一下传统意义上的好汉。<sup>⑤</sup>

武松命中注定是个绿林强盗。即使真的参加了正规军，他也只能是个低阶军官。很难想象有一天他能“高贵”到变成一个将军。即便是在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如戏曲、连环画或泥塑中，也没人奢望他能像关羽一样通过读本书而得到任何“文”的属性。尽管如此，他可以说是中国民间传说中最受欢迎与爱戴的英雄人物。举个例子说，所有的中国孩子都熟知《水浒》第二十二回“景阳岗武松打虎”的细节。

在这一回里，武松在回乡看望哥哥的途中路过景阳岗。上岗前，他在一家小酒店里喝酒。这个酒店卖自产的村酒。因为酒性暴烈，据说在

① 詹纳尔(W. J. F. Jenner):《为兄弟两肋插刀:另一中国传统评述》(“A Knife in My Ribs for a Mate: Reflections on Another Chinese Tradition”),乔治·莫里森(George Ernest Morrison)民族学讲座第54期,1993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堪培拉)。

② 1975年开展了一项全国性的反宋江运动。对他“罪行”的分析,参见章培恒、黄霖:《宋江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③ 宋江也是梁山好汉中极少数不会武艺的成员之一。和他类似的只有柴进和吴用。不过,没有“武”的属性仅仅意味着这些男人“自然而然”地起着领导的作用。

④ 参见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中国符号字典》(*Dictionary of Chinese Symbols*),联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7—238页。

⑤ 不要忘记,除了一小撮人的姓名是有历史根据的(武松不包括在内),这部小说大致上属于虚构。因此,这些英雄好汉的名字很可能不是偶然的产物。

店中吃过三碗酒的，没有人过得了前面的山岗，因此人称“三碗不过岗”。武松以典型的好汉作风，吃了不止三碗，而是 18 碗酒。当他起身准备过岗时，酒家叫住了他，告诉他前面有只大老虎。这老虎已经害死了近 30 条大汉的性命。但武松认为酒家只是想吓唬人，好把人留在他的店里歇宿，因此对酒家的警告置之不理。走出了一段路，他才发现确实有官府张贴的印信榜文，证实有老虎在此地出没。他对此的反应颇具启发效果，“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难以转去”。<sup>①</sup> 就因为担心他的好汉身份会受到质疑，他决定拿生命冒险。

他继续前行。就在老虎出现之前，书中写道：“一阵狂风”刮起，预示着这不是个普通的动物。

那老虎一扑，一掀，一剪；但三般都没打着。武松轮起哨棒从半空劈打老虎，但打急了，正打在枯树上，把那条哨棒折做两截，只剩了一半在手里……

那大虫咆哮，性发起来，翻身又只一扑扑将来。武松又只一跳，却退了十步远。那大虫恰好把两只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将半截棒丢在一边，两只手就势把大虫顶花皮胳嗒地揪住，一按按将下来。那只大虫急要挣扎，被武松尽力气捺定，那里肯放半点儿松宽。武松把只脚望大虫面门上、眼睛里只顾乱踢。那大虫咆哮起来，把身底下爬起两堆黄泥做了一个土坑。武松把大虫嘴直接下黄泥坑里去。那大虫吃武松奈何得没了些气力。武松把左手紧紧地揪住顶花皮，偷出右手来，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尽平生之力只顾打。<sup>②</sup>

武松打了五六十拳，又用打折的哨棒直打到那只老虎死在地上。

这段打虎的情节虽然言简意赅，但却细致生动。在老虎出现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这只猛兽凶残得惊人，武松用了几十个拳打脚踢才把它制

① 施耐庵：《水浒传》第 1 卷，联经出版社（台北）1987 年版，第 304—305 页。

②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第 1 卷，沙博理译，外文出版社 1980 年英文版，第 356 页。

服。情节发展的每一步,不仅有对自然环境的描绘,还有武松内心的剖白。老虎死了,武松也已使尽了气力。当他看见枯草中又钻出两只老虎时,不禁惊惧交加:“阿呀!我今番罢了。”其实,这是两个猎人披着虎皮在捕猎那只吃人的老虎。和读者一样,猎人们也深为武松的勇敢和力量所折服。以上这些细节,都加深了武松的英雄气概。正像周光廓指出的,如果武松打虎打得易如反掌、无所畏惧、轻松自如,那他身上的英雄主义色彩就不会这样显著了。<sup>①</sup>事实上,在小说第四十三回,另一位梁山好汉李逵连杀了四只老虎,但他杀得那么自然而然、不费吹灰之力,以至于大家对这件事都没留下多深的印象。而李逵也并不以打虎英雄闻名后世。

作为一个“武”的英雄,这段打虎的情节凸显了武松身上两个使他超出其他水浒好汉的特征。首先,这个片段大书特书了他对酒精的耐受力。所有的英雄好汉酒量都很大。在小说中,各路英雄不断地在酒馆和旅馆相遇,而不管何时相聚,暴食(特别是肉类)和暴饮(酒精)都是必然上演的戏码。为了证明武松在这个仪式中的过人之处,他过景阳岗时是一人独饮的,而小说对这酒的力道也浓墨重彩、大肆渲染。更有甚者,武松打死那只吃人老虎的行为发生在他喝下了六倍于醉倒一个普通人的酒之后。大开杀戒是这些英雄好汉的例行公事。武松自己就在第三十一章进行过一次灭门的“杀人狂欢”,男女老幼,无一幸免。在这场屠杀中,“我们跟着武松的朴刀,看到它把坐在交椅上的人‘劈脸剃着,和那交椅都砍翻了’。又看到它将另一个人齐耳根连脖子砍倒在楼板上”。<sup>②</sup>这种暴行之野蛮对那些情感细腻一些的读者来说简直令人毛骨悚然。相比之下,把酒精和痛快的杀戮结合在一起的打虎故事则吸引了来自各个年龄阶段的读者,这里杀死的没有儿童,也没有妙龄少女,有的只是一只

① 周光廓:《水浒怎样描写武松打虎》,载《水浒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80—188 页。

②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第 100 页。

危险的吃人老虎。<sup>①</sup>

中国孩子都是通过景阳岗打虎的故事知道武松的。然而，成年人更感兴趣的则是武松打虎之后那三章中发生的故事。武松来到他哥哥武大郎家里。面目丑陋、生得短矮、诨名“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娶了个漂亮的老婆，名叫潘金莲。潘金莲的淫行及其命运已使她成了《水浒传》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中最令人难忘的女性角色。她所犯下的奸情与荡妇这个概念共鸣之强，使得她的名字成了中国语言中荡妇的代名词。人们对潘金莲的兴趣已持续了数百年的时间。《水浒传》中的这三章已被扩展成了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当然也有些人会说是最色情的——小说作品之一《金瓶梅》。<sup>②</sup> 小说《金瓶梅》敏锐的洞察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预告了明末商贾阶级对文人阶层性观念所造成的威胁。在第二章中，我已经探讨了商人在1990年代是如何通过孔子进入到“文武”范式中的。在第七章中，我将进一步考查商人及商贾阶级是如何整合进入男性特质混合体的。而这一章，我把论述的重点放在武松身上。在《水浒传》、《金瓶梅》这两部古典小说中，武松与潘金莲以及其他主角的关系框架大体保持了一致。

在第一次被引见给她的小叔子武松时，潘金莲就在心里想：“我嫁得这等一个，也不枉了为人一世！”<sup>③</sup>一有和武松独处的机会，她就开始试着勾引他。武松以能令关羽也为之倍感骄傲的“武”的姿态“争些儿把那妇人推一交”，又给她上了一堂叔嫂之间须举止得体的伦礼讲座。之后，他告诉哥哥要警惕这个妇人，并从此开始和这个美艳动人的嫂嫂保持距离。不久，武松被派去外地公干。两个月后，当他返回时，他发现了潘金

① 要知道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老虎经常和龙联系在一起，在神话传说中有些地位。这从大众成语中就能看出来，比如“龙腾虎跃”、“龙争虎斗”。

② 成书于16世纪，这部小说发表时未具实名，署名兰陵笑笑生，作者本名不得而知。克莱门特·埃杰顿(Clement Egerton)在老舍的帮助下把整本小说译成了英文。兰陵笑笑生：《金瓶梅》4卷本，埃杰顿译，路特里奇1939年英文版。

③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第364页。

莲与西门庆的奸情。人称西门大官人的好色财主西门庆和潘金莲一起毒死了武大郎。通奸和谋杀给了武松一个绝好的理由展开疯狂的复仇——他砍了奸夫淫妇的头提到他哥哥的牌位前。这个情节极为生动地印证了那个关于觊觎自己兄弟妻妾的禁忌,以及作为“兄弟”监督其他兄弟妻妾贞洁的责任。

为了显示他对嫂嫂毫无性趣,武松对潘金莲的身体进行了一番嗜虐的野蛮表演;这是他从前所展示的得体举止的另一面:“武松两只脚踏住他两只胳膊,扯开胸脯衣裳。说时迟,那时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里衔着刀,双手去挖开胸脯,抠出心肝五脏,供养在灵前;‘啞’一刀,便割下那妇人头来,血流满地。”<sup>①</sup>正像爱泼斯坦(Maram Epstein)贴切指出的那样,这一段“变种的恐怖强奸”说明了潘金莲“已不再是个女人,而是一个与悖伦欲望相连的危险象征”。<sup>②</sup>性越轨是不可饶恕的罪过。为了向公众显示他在这方面的纯洁,武松必须以残暴的方式展示他复仇的怒火。就像我在分析关羽这个形象时提到的,这种激烈的否认下隐藏着“武”的男性被禁锢了的性欲。武松的故事中,这种欲望在觊觎兄嫂的影射下显得更加令人忌讳。武松在性压抑下所表现出来的暴虐,在传统小说塑造的有着大量的“武”,却几乎没有“文”的特质的劳动阶级英雄人物身上是很典型的。这些人只能通过施行暴力和自律来控制他们的道德世界。

## 当代中国的“武”

在过去的时代,从未有人质疑过这样一个观点:“文武”既是一个连续的整体,同时,男性特质也和阶级相关联。只有那些身上拥有较多

---

<sup>①②</sup> 施耐庵:《水浒传》,1987年版,第368页。艾梅兰(Maram Epstein):《铭刻要点:明清小说中的文化与身体》(“Inscribing the Essentials: Culture and the Body in Ming-Qing Fiction”),载《明代研究》(Ming Studies),第41期(1999年),第25页。

“文”的特质的男人，才属于较高的阶层。不过，即使只拥有最低限度的“武”的特质，也总比那些什么男性特质也没有的人强。要真正成为一有权力的男人，就必须文武兼备。就性别而言，女人，由于没有“文”或“武”的特质，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力的。至少人们公认：男人主外担当公职，女人不但不应该参与公共生活，更应该被排除在政治权力的游戏之外。当然，现实生活并非如此简单。尽管武松这样的小说故事的确在强化“文=更多的权力，武=较少的权力，而女性=没有权力”这样的简单公式，但很显然，小说对她们破坏力的刻画说明了女人也拥有着巨大的个人力量。

至20世纪，这一情况在中国社会已广为接受。正如我在下一章中将要展现的，彼时，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书写有关爱与性的主题。这些女作家对传统上一向被认为是男性领地的抱负与不满也有了领会。就像我在第七章中将要提到的，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的侵略对中国男性的身份认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接踵而至的社会乱象巨大如斯，以致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帮助下）在20世纪中叶关闭了大门，试图在一个符合僵化意识形态决定性特征的劳动阶级英雄的虚幻世界里创造自己的命运。<sup>①</sup> 在1970年代末，当中国的大门重新打开时，中国女性对中国男性也变得更为挑剔。显然，在对社会制度的不满之外，一些女性也受到了1970年代初——特别是1973—1974年的反孔运动中——女权主义言论的影响。她们对那些所谓的男性弱点尤其蔑视，宣称在中国找不到“男子汉”。孙绍先在她对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中发现，在1980年代，“这种找不到男人的苦闷，使得女性主义文学的气氛低沉压抑”。<sup>②</sup> 这种情绪在张洁对一个事业成功的男干部的嘲讽描写中得到了极好的体现：这个男人斜倚在红色沙发上，“两腿恣意地叉开，其中一条还跨骑在

① “文革”时这一倾向达到了顶峰。有关这些特点的清单，参见杨岚(Yang Lan):《文革小说》(Chinese Fic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香港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第33—120页。

② 孙绍先:《女性主义文学》, 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第68页。

沙发的扶手上。裤门的扣子一粒也没扣，露出了女人才穿的花哨的内裤”。<sup>①</sup>

大概是受到了西方观念中关于“男子汉”气质的影响，有些人认为，中国男人在薄薄的一层男性特质的表象下，有着令人反感的阴柔气质。比如说，年轻的女权主义者范扬在她对男女的二元讨论中谈到了“阴盛阳衰”的问题。她声称，与其他文化中的男人相比，中国男人有一部分男性特质似乎是被“阉割”了，连银幕上也找不到阿兰·德龙塑造的那种硬汉角色。<sup>②</sup> 甚至海外华人都认为 1980 年代的中国缺少男子汉。通过对弗洛伊德心理学和结构主义的运用，读者甚众的中国香港学者孙隆基总结道：全世界的华人男性都被女性化了，“无论是在香港、台湾或内地，中国男人的‘太监化’倾向，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sup>③</sup>。

对男性太监化的恐惧，可能是对在由传统社会秩序扰动引发的性角色行为变化中失去的男性特权的反应。随之出现的是一种新的小说流派，把男人塑造成超阳刚的角色，比如猎人、原始部落男子和粗旷的边民。可笑的是，当中国的前卫人士用投西方所好的符号、形象来寻找西方硬汉式的“男子汉”时，在西方世界，评论家却早已展开了对硬汉神话的质疑。<sup>④</sup> 一些女权主义者指责说，后现代的敏感男性在“异性恋与同性恋、黑人特质与白人特质、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之间摇摆滑动”，以期“得

---

① 张洁：《方舟》，载中国文学出版社编：《爱是不能忘记的》，哈里特译，熊猫丛书 1987 年英文版，第 152 页。

② 范扬：《阳刚的陨落》，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88 年，第 200 页。

③ 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集贤社（香港）1983 年版，第 213 页。当然，女性主义的发展导致了男人的“阉割”在西方也是个普遍的控诉。例见法卢迪（Susan Faludi）《受抑制的人：现代男性的背叛》（*Stiffed: The Betrayal of the Modern Man*），Chatto & Windus 出版社 1999 年版。

④ 关于海明威对爱与性的态度的讨论，参见唐纳森（Scott Donaldson）：《意志的力量：海明威的生活和艺术》（*By Force of Will: The Life and Art of Ernest Hemingway*），维京出版公司 1977 年版。在这里我以海明威为例是因为中国评论家经常把他当成最能表现男子汉精神的一位西方作家。

到一点另一个”。<sup>①</sup> 而与我们这项研究有关的是，中国的男性特质是可以被构建得不同于当代西方男性特质的，尽管这不同总在不断演变中。

埋怨中国与西方国家相比缺少男子汉并不恰当。这种哀怨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无论是男还是女，给男子汉下的定义都惊人的相似。如果真是谁下定义谁就有控制权的话，那么男女作家意见的趋同就只表示着一个趋势——由于男女两性似乎都对“真正的男人”或“真正的女人”所应具备的气质有着固定的观念，性别的鸿沟将进一步扩大。而为了反击那些认为中国缺乏男子汉的指责，人们似乎必须提供证据以证明有些中国男人不仅坚强不屈，而且这些特点纯属本土固有，绝非舶来物品。事实上，这种反击确已发生：198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运动“寻根文学”就堪称是青年男作家们对指责他们是伪男人的回应。

在一本对1980年代中国文学各流派进行探讨的书中，曹文轩用了整整一章来讲述“硬汉子”的崛起。<sup>②</sup> 曹文轩认为，这些男主人公都具有外表冷硬、内里宁折不弯的基本特征。他从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找到了许多例子来证明这些特点的存在。事实上，文学并非是唯一一个男性形象看起来符合“硬汉”特征的领域。<sup>③</sup> 其他一些创造性的艺术作品——如电影《红高粱》——和1980年代末流行歌曲中的“西北风”，都赞美“男性”特点中的坚韧和力量。毫不奇怪，这些特点与我们上面所讨论的“武”的特点并无二致。在本章剩下的篇幅中，我将集中审视“寻根文学”作家贾

① 穆尔(S. Moore):《拉来一点儿他者:后现代主义皮条客》(“Getting a bit of the other: the pimps of postmodernism”),载查普曼(Rowena Chapman)和卢瑟福(Jonathan Rutherford):编《男性秩序:拆解男性特质》(*Male Order: Unwrapping Masculinity*),劳伦斯和威沙特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65—166页。

② 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1—267页。

③ 韩起澜(Emily Honig)和贺萧(Gail Hershatter)注意到寻找“男子汉”的热潮在1980年代强大到诞生了一本专门致力于这个问题的杂志起名就叫《男子汉》。韩起澜、贺萧:《个人的声音:1980年代的中国女性》(*Personal Voices: Chinese Women in the 1980's*),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1页。



平凹的小说《人极》，以探讨这类作家对中国缺乏男子汉的不满的典型反应。<sup>①</sup> 如果从性别、阶级以及它们如何与社会权力和控制的概念相联系上审视贾平凹对男子气概的歌颂，我们发现他的确在寻找并发现了中国男性特质的文化根源。

既然我们将聚焦于一个特定的故事，那么对《人极》的故事概要及其产生的背景做些了解，当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个故事发表于上海文学杂志《文汇月刊》1985年10月号，标题《人极》。朱虹在英译本中将之译为《一个男人能承受多少？》<sup>②</sup>虽然这的确是一个男人写的关于男人的故事，但我还是更喜欢“人极(Human Extremities)”的直译，因为我认为作者想做的，是发表一个关于男女两性的宣言。这和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在他写《人类的境况》时所做的相仿佛。<sup>③</sup> 也只有在这种双重性别的语境中，这一文本本身才能成为一个广义上的、关于人类存在所承受之重的有力宣言。

这个故事发生在商州——西安(古都长安)南面一个不是太远的小县城。商洛地区是贾平凹绝大多数作品的故事发生地。他不但写了一篇以商州为标题的小说，还写了一系列反映商州人情风物的散文和短篇小说。他最著名的小说《废都》也明确指向西安这座历史名城。<sup>④</sup> 《人极》的故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及其之后。故事正式拉开帷幕是在1969

① 出生于1952年的贾平凹是陕西省商州人。“文革”中当过农民。1972—1975年就读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数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几部短篇小说集，也有一些诗歌和散文作品。他的小说《浮躁》获1987年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贾平凹(Jia Pingwa):《浮躁》，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译，路易斯安那大学出版社1991年英文版。《人极》第一次发表于1985年第10期的《文汇月刊》上(第2—12页)。英译本参见贾平凹:《人极》，载朱虹编译:《西部中国》(*The Chinese Western*)，巴兰坦图书出版集团1988年版，第1—52页。朱虹把标题翻成了《一个男人能承受多少？》(“How Much Can A Man Bear?”)。

② 朱虹编译:《西部中国》，1988年。

③ 英译本参见马尔罗(Andre Malraux):《男人的命运》(*Man's Estate*)，麦克唐纳译(Alastair Macdonald)，企鹅图书1961年版。令人好奇的是，企鹅图书在把安德烈·马尔罗这部原名为《人类的命运》(*La Condition Humaine*)的法文小说译成英文时，将标题男性化了，变成了《男人的命运》。

④ 贾平凹:《废都》，1993年北京第1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重印本。

年，两个农民——光子和拉毛一出生就认作兄弟。两个人是如此亲近，以至于成年后他们就一起住在拉毛家里。事实上，他们的父母在他们出生前就给他们定下了“娃娃亲”。要不是生为同性，他们大概已经结为夫妻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头两年里，他们以劊猪骗驴谋生。1969年县里发了大水，他们从浊水浪头里救上来一个娇弱艳丽的年轻女子亮亮。等故事发展到后来，我们知道她其实是另一个镇上一位教师的女儿。搭救了亮亮的翌日，光子出门去给镇子上的几家人劊猪。这时，拉毛拔了门关进去，要和亮亮睡觉。亮亮觉得拉毛对她有“救命之恩”，就迁就了他。愤怒的光子不肯原谅自轻自贱、把自己当“牲畜”的拉毛。拉毛在绝望中自杀。亮亮也消失无踪。在失去拉毛的悲痛中，光子放弃了劊猪的营生，有三年时间生活得像是中了邪。这三年里，他每日三餐都盛一碗饭供在死去的拉毛灵前以示哀悼。

来年商州大旱，光子遇上了一个叫白水的女人。白水本是南山的农妇，灾荒中不得不出来乞讨活命。她被村里自称为“造反队”的男人们轮奸怀了孕。出于怜悯，光子和她结了婚。白水在腊月里生下一个儿子，起名虎娃。然而，光子并不知道白水之前已经结过婚了。两年后，她的另一个丈夫现身并抢走了她。不久，白水就被前夫虐待致死。整整三年，光子虽然再次遭受了沉痛的打击，却还是又当爹又当妈、“磨男寡”守着虎娃长大。渐渐的，他恢复正常，并再次开始干起了劊猪骗驴的营生。

故事发展到这个时候，“文革”结束了。很多人都从监狱里被放了出来。光子意外地再次遇上了被诬陷入狱刚刚获释的亮亮。亮亮已从一个漂亮女人变成了一个刚强的、一心一意要为她和她父亲伸冤报仇的复仇者。之前入狱的遭遇，她声言，“一日月把我折磨得也男不男、女不女的”。这时，我们还得知，在和拉毛的事后，亮亮生下了一个女孩。在进监狱前，亮亮把孩子交给了一个陌生人，从此就再也没有见过她。她和光子决定结婚。夫妇俩都辛苦工作，攒钱给亮亮去北京告状。在经历了许多磨难之后，亮亮家的冤案全面调查落实，那些当年制造了这起牵涉

二三百人冤案的坏人也受到了制裁。亮亮转入城市居民户口,接替其父在附近的一个小镇教书。因为光子无法习惯城镇生活,他们不得不两地分居。虎娃也跟着亮亮在她的学校上课。五年后,亮亮因病去世。因为没有在她的葬礼上流泪,包括虎娃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光子心肠太硬。光子在亮亮死后变得极少说话,更只字不提亮亮的事儿。年老后,在他糊糊涂涂的梦想里,虎娃和亮亮失踪的女儿成了夫妻。

这个故事的主角光子,有着好汉所有的特征。他坚韧、沉默到近乎麻木不仁的地步,并且,虽然身体几乎被摧垮了,他的道德良心却从未妥协过。在把亮亮从河里救上来之前,小说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他的阳刚之气:“到上岸,也剥了精光,用热尿揉搓了肚子。抓污泥涂了腿根处那块部位……光子也是水豹人物,当下口叼了一把砍刀,溜下水去。”<sup>①</sup>这段描述非常清晰地勾勒出一个行为粗犷、大胆的男人形象。虽然对他赤裸的身体并没有什么细节描述,但这段文字足以让我们注意到他的男子气概。在故事的这个阶段,光子和拉毛还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对女人一无所知。而这也是故事中唯一一次提到光子是个水中好手。如果我们接受水经典的象征意义,认为它表示阴阳二元中的阴(女性),那么,把一个女人从水中救起的处男光子是个“水豹人物”,这一点就很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了。

虽然光子不怕下水,但这个片段也告诉我们他的确抓了污泥涂在阴茎处,使之免受寒冷河水的侵袭。当然,在传统的“五行”理论里,土在阴阳结构中是个中性元素,因此能中和阴阳两极。<sup>②</sup>我们还可以把象征意义再推进一步——在阴阳二元论下,属阴的水太多是会致命的。而在这个故事里,洛河的确年年涨水,泛滥的河水冲下来的不仅有上游的柴草、

① 贾平凹:《人极》英文版,载朱虹编译:《西部中国》。

② 李约瑟(Joseph Needham)对阴阳学说的发展及其与五行理论的关系作了详尽、精深的探索,参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2, 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牛津大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216—345页。

木料，也有死亡与不幸。在这种情形下，尽管被冲下来的亮亮暂时得了救，她不免也还是会在日后带来不幸的催化剂。对拉毛而言，她所带来的，即是他的英年早逝。尽管男人们试图保护自己免受阴性的自然灾害之苦，但他们仍然摆脱不了一个被洪水冲来的“弱态生娇”的女子——阴之终极组合——所带来的灾难。<sup>①</sup> 如果再对比一下上一章中我们讨论过的章永璘同时征服了洪水和女人的片段，这段情节就更显得妙趣横生：当对阴的征服给“文”的男人带来的性能力和权力时，它带给“武”的男人的，却只有不幸。

光子用嘴叼了一把砍刀下水的事实也意味深长。刀，当然是“武”的男性特质一种独特、致命的象征。我们已经发现，武圣关羽的刀对他的人格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它不仅和关羽形影不离，甚至还有好几个名字。在当代文学叙事中，刀同样也是有力的男性象征。例如，另一位著名的“寻根”作家郑万隆写了许多“异乡异闻”系列故事，其中的主角们都是用刀子打架的好手。即使带着枪，这些人物的雄性力量也一定要用刀来彰显。一把出鞘的刀，就像一个勃起的阴茎，可以带来惩罚，也可以带来奖励。在面对危险和死亡时，只有那些精通刀法的男人才“像个男子汉”。郑万隆的小说《峡谷》里，故事主人公申肯就是用刀杀死了一头熊，但他自己也因为在救人时抱着熊滚下悬崖，死在了杀熊的过程中。当把他和熊分开时，他的脸“板得整整的，没有一点恐惧也没有一点悲哀”。<sup>②</sup>

刀不仅是痛苦或造成痛苦的能力的象征。在光子这儿，刀还兼有另一项功能。在第二次提到他握刀时，小说写到：他“抽出一刃刀子，寒光一闪，就在猪腿根后划出血口……操弄一会，用刀子割下一个疙瘩来”。光子用刀剗掉了猪的生殖器官。擅长用刀能增加英雄气概，刀的这种功

① 这部小说中另一位女性人物的名字明白无误地取成了白水。作者应该是有意识地取了这个名字，以显示这个人物作为小说中最悲惨、最无助的形象就像是平凡的水——阴气，变成了人形。

② 郑万隆：《峡谷》，载郑万隆：《有人敲门》，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71页。

能所具有的性含义也同样出现在郑万隆的作品中。在“异乡异闻”系列的另一个故事《老棒子酒馆》中，主角陈三脚抓住了一头短脸熊，用刀豁开了它：“刀是从咽眼里扎进去，整个儿豁开，肠肚都流出来了，卵子也被打碎了。”<sup>①</sup>

因此，刀既能使人想起男性特质强大有力的画面，也能使人想起这种阳刚之力遭到破坏的画面。刀是阴茎的象征。在《人极》故事的这个节点上，光子对它的掌控毫无问题。刀光一闪，他就能够把身子被河芦缠住的亮亮从必死无疑的洪水中背出来。不过，不要忘记，这时“文革”业已开始，一切都颠倒了。而在“寻根”文学的传统中，这正是粗犷而富有男性气概的男人大显身手的时期，也是“武”的男性特质力压“文”的感情的时期。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农民，光子毫不犹豫地救下了一个柔弱女子。他显然是一条“武”的好汉。然而，就像女人闯入经典的“武”的英雄的生活时所造成的后果一样，亮亮的出现却打乱了兄弟俩人的好日子。

拉毛上吊，并不是因为他对强奸亮亮感到羞愧，而是因为他的“兄弟”含沙射影地骂他“猪狗不如”。而武松在拒绝潘金莲的勾引时也声称他不是“那等败坏风俗没人伦的猪狗”。<sup>②</sup> 就像伊甸园中的夏娃给人类带来灾难一样，亮亮在不知不觉中破坏了处男纯洁的幸福和“兄弟”之间准婚姻的生活。虽然亮亮也因此失去了童贞并忍受了生下一个她必须抛弃的孩子的痛苦，但对自己被强奸的事，她的反应是接受现实。而且，在履行了充当男性人物这一阶段的陪衬的职责后，她在故事里消失了十年之久。

故事的焦点在于所发生的事情给兄弟二人带来的恐怖。拉毛自杀，是因为他放任让他“不得安然”的性器官占据了情感。在光子眼里，失去

<sup>①</sup> 郑万隆：《峡谷》，载郑万隆：《有人敲门》，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

<sup>②</sup>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1980年版，第170页。

自我控制力的拉毛变得猪狗不如。像《水浒》中的英雄好汉一样，光子和拉毛彼此奉献，过着无忧无虑的和睦生活，几乎没有什么需要自律的地方。正如夏志清指出的，劳动阶级的英雄——比如武松——在喝酒、杀人上放纵无度，禁欲是他们自我控制力的唯一证据。<sup>①</sup> 既然这样，拉毛和亮亮睡觉就表明他不仅没有自控能力，还背叛了他和光子之间隐晦的同性暧昧关系。更何况救下亮亮的男人是光子，就是被睡，她也该是光子的女人。

拉毛和兄弟的女人上床，就犯下了有违传统英雄主义故事中所反映的兄弟情谊准则的最严重的罪行。如前所述，关羽小心翼翼地让全天下都看到他在和嫂嫂们的关系上是高尚正直的。出于同样的原因，人们视武松为英雄中的英雄。近些年来，这种兄弟情谊的观念重新浮现，成为许多中国小说主导性的主题，尤其是作家谈到自己在农民中的经历的时候。<sup>②</sup> 经常被用来形容这种情谊的一个表达是“哥儿们帮”，意即“一帮兄弟”。虽然男人之间的这种情谊迄今都是从柏拉图的角度来定义的，但其强度毋庸置疑。而且，正因为这些关系应与明显的性放荡、性嫉妒无关，人们认为它们颇具男子气概。

从对“兄弟”惩罚性的不理睬，到后者自杀后同样极端的病态忏悔，光子对拉毛发生性行为的反应非常激烈。<sup>③</sup> 拉毛死后，他不再挥刀，“如是三载”，“形如饿鬼”，“见天三餐盛一碗饭供在灵前”。他对拉毛的悼念

①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第75—114页。

② 雷金庆(Kam Louie)：《事实与虚构之间：〈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文学与社会〉论文集》(*Between Fact and Fiction: Essays on Post-Mao Chinese Literature & Society*)，茆药出版社(悉尼)1989年版，第76—102页。

③ 光子极端的情绪变化反映了包裹在整个兄弟义气理想中的互相矛盾的意识形态。在最近一篇研究了清末三起手足相残案例的文章中，艾德里安·戴维斯(Adrian Davis)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兄弟义气互相抵触的要求(从平等主义的友爱到对等级制度的遵从)在对稀缺资源的竞争中是有可能导致谋杀的。戴维斯：《中华帝国晚期的兄弟情谊与手足相残》(“Fraternity and Fratricide in Late Imperial China”)，载《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105期(2000年)，第1630—1640页。这个故事里光子并没有谋杀拉毛，但他对亮亮隐约的竞争明显导致了后者的死亡。

活动令人回想起传统上为父母专用的哀悼。这个显示哀伤的仪式已然超越了夫妻——光子、拉毛若生为男女就会拥有的关系——之间所应承担的丧葬之礼。虽然拉毛使用蛮力迫使亮亮与他发生性行为，但这个事件本身却意味着他权力的显著消解。对于光子而言，这三年的悼念仪式表面上是为他在拉毛之死中所起的作用赎罪。但是，在故事的背景框架里，它也是一份认定放荡性行为罪有应得的宣言。在这个故事里，应付的代价就是暂时丧失了权力与控制。

这场有关性欲的演出因此是一个权力游戏，而这场比赛的输赢很大程度上是由玩家本身的性别决定的。那些当权者，即所谓“男子汉”，被视为在控制中保有主导地位，他们既可以给予也可以收回性快感/性权利，而女性的性快感则依赖于丈夫、情人甚或强奸犯。但是，尽管性权力是投注于男性的，但男人却只能在证明自己拥有控制力的情况下才能继续持久拥有这种权力。设若任凭欲望放荡不加节制，无论男女，《水浒》中潘金莲、西门庆的命运就是他们的下场。在《人极》里，由于被自己对亮亮的欲望击败，拉毛，照他自己的评价，变成了牲畜不如、比女人还差。这件事对亮亮的影响较小。这是因为在传统伦理中，她和其他所有女性都被视为缺乏控制力，她们也因而被豁免了部分责任。只有“男子汉”才能掌控自己的欲望，而女人和伪男人则成为自身欲望的奴隶。

例如，出现在光子生活中的另一个女人白水也有被强奸的经历，这一次是一帮“造反队”残酷的轮奸。不过，这番经历似乎提高了她的性意识。和旧时女鬼狐仙爬上毫无戒心的故事讲述者的床一样，她三番五次地在晚上找到光子门上。<sup>①</sup> 在极度无助与缺乏自尊的境况中，白水显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当光子赶她走时，她叹说，自己已无处可去，“我不是个好女人，我该去死”。<sup>②</sup> 看起来，失去贞操/贞节在贾平凹等作家笔

①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收集了很多这样的传说故事。蒲松龄：《聊斋志异》，商务印书馆（香港）1963年版。特别参见《红玉》第103—107页和《聂小倩》第54—59页。

② 贾平凹：《人极》1988年英文版，第19页。

下的男权社会中就剥夺了女人能用来购买合法的性与道德唯一有价值的物品。这些女人只剩下一条狐仙和青楼女子所走的道路：以性为武器来支配男人。但这种神奇的力量只有在男人被“蛊惑”时才有短暂的效果。对“男子汉”而言，他们面临的挑战在于是否能够抵抗这样的魅力。

当然，女人还有另一个更终极、激烈的选择，那就是叶蔚林 1985 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中描述的抗议自杀和相约自杀。<sup>①</sup> 在这个故事里，五个年轻的女子宁可不结婚而选择同时上吊自杀。小说没有设定故事发生的时间。这表明过去造成女性自杀的情境在当代并未得到改变。就像古时的“烈女”自杀那样，即使是现在，女性类似的死法也是受到包容、同情和理解的行为，尽管导致自杀的情由会遭到谴责。通过对自己生命最后、也是唯一一次主宰，女性成为光荣的，当然，同时也是死去了的男人：她们超越自身的欲望获得了自律和权力，这是“牲畜”拉毛没能做到的。而当他也用自杀以示弥补时，他的“兄弟”光子用三年的悼念仪式来表达对他的敬重之情。

## “文”的男人与被阉割的硬汉

男性禁欲本身并不成其为一种美德，它必须成为一种自我要求的拒绝。如果缺乏将这种自我控制付诸实践的能力，这个男人就只能成为被怜悯和蔑视的对象。因此，纵观中国历史，与太监有关的传说皆有诸多贬抑。人们认为他们贪得无厌、喜怒无常、胆小懦弱。<sup>②</sup> 在许多时候，太监被等同于女人，因为她们也缺乏自律和自我约束的能力。例如，《诗经》在 2500 多年前就曾写道：“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sup>③</sup>

① 叶蔚林：《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作家出版社 1986 年版。

② 胡马纳(Charles Humana)、王武(译音)(Wang Wu)《阴阳之道：中国式的爱情》(The Ying-Yang: The Chinese Way of Love), Tandem 出版社(伦敦)1971 年版，第 62—80 页。

③ 江阴香编译：《诗经译注》，中国书店 1982 年英文版，第 4—6 页，《大雅·荡之什·瞻印》。



在大众想象中充斥着各种各样关于太监沉迷于“乌七八糟的壮阳药和中草药、经常性的阴精按摩和准房中术”<sup>①</sup>以期“重夺男子气概”的故事。他们涉嫌嗜好性虐——就性含义的所有层面而言；这进一步证明了太监不是“男人”。人们通常认为，太监在历史上所取得的权势既没有通过正常的“文”的途径——科举考试，也没有通过“武”的途径——军中服役。他们设若一朝得势，那绝不会是择优录用的结果，而一定是因为腐败无能的皇帝的偏袒。因此，太监在传统的文武环境中显得愈加卑劣。透过儒家背景，外界所强加的对性的无力自控就被转化成了在生育上的无能。在我们正在检验的文本中，儒家以生育能力来定义男子汉气概的观念引发了有趣的复杂状况。故事里，是拉毛和亮亮上了床，是“造反队”的强奸犯们让白水怀孕生下了虎娃。相比之下，光子这个有着硬汉所有特点的故事主人公俨然成了一个功能正常的太监。

至此，我们必须超越夏志清有关男人需要以自愿接受的禁欲来证明他们男子汉气概的见解。为什么这种自我控制如此必要？答案就在于儒家“克己复礼”的追求。这条规诫是成为君子的关键，其作用是支配女性和其他男性。因此，自我控制是控制他人的一个基本前提。这一原则似乎不仅适用于儒家模式，而且也适用于其他文化系统。出自通俗道教和佛教密宗中延迟或抑制射精的房中术就是这种控制力的另一延伸。因此，能够克制性欲不只是一种自律的磨练，它还是获得政治权力以及道德和精神上的优越感的一个必要标准。自我控制似乎是一个领导者应有的受到普遍赞誉的素质。正如福柯指出的：

为了不至于过度，不至于产生暴力，也为了避免陷入专制权威加于别人的罗网以及受欲望折磨的心灵，行使政治权力需要管理自身的力量，这是政治权力内在调整的一个原则。节制被视为自我控制的一个方面，与正义、勇气或智慧有着同等的地位；也就是说，它

---

<sup>①</sup> 胡马纳、王武(译音)：《阴阳之道：中国式的爱情》，第68页。

是一种使人有资格对他人实行掌控的美德。最具王道的人是能主宰自己的人。<sup>①</sup>

儒家思想观念对拥有继承人非常重视。从这一点上来说，光子的悲剧就在于他的后继无人。这个信号表明光子成为完整男人的一个要素被阉割掉了。这一不完整性，使光子丧失了获得“王道”的资格。他作为一个不合格男人的地位在和亮亮地位的比较中显得特别意味深长。在故事的开始，“文革”正值顶峰。亮亮被政治风浪席卷而至，由光子和拉毛救上了岸。她基本上是被空有一身蛮力的农民拉毛强奸了。像所谓“文革”迷失的一代一样，亮亮在这段露水姻缘后生下的女孩被交给了一个农民，从此再也没有露过面。“文革”后亮亮家的冤案平反昭雪，亮亮得以重振她家的地位和声望，但光子却无法融进这个特权圈子。直至生命终结，他始终是个农民。

这个故事的言外之意即为：对性欲的自我控制是一个人具备“王道”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光子和拉毛两个都是农民。即便时常走街串巷、剿猪骗驴，他们作为贫苦农民的状态都未曾改变。因此，无论他们的性行为是圣洁的抑或兽性的，他们都不会被视为“高贵”。就拉毛和“造反队”这样的农民而言，男人的兽性是他们取得控制的唯一途径。但这种令他们处于主导地位的肉体能量的释放，在相对平和的时期难免转瞬即逝。虽然暴力也算是有几分“武”的勇猛，但它并不是关羽式的“武”。关羽是个被神化了的将军。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所提到的，他最常见的是夜读《春秋》的形象。因此，他的“武”是经过“改良”的。而武松式的“劳动阶级”的“武”，虽然也有值得称道的时候，却永远也无法提升至领导的地位。相比之下，出身于“文”的阶层的人则随时可以将其政治地位合法化。柔弱的儒家学者和老师（最基本的文人）的女儿亮亮一样，都

<sup>①</sup> 福柯(Michel Foucault):《性史(卷二):快感的享用》(*The Use of Pleasure;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2*), 罗伯特·赫利(Robert Hurley)译, 企鹅图书 1988 年英文版, 第 80—81 页。

有获得领导地位的保障。他们的共同点就在于他们都拥有自我控制能力和适当的阶级背景。

因此,只有当相关人来自“文”的阶层时,那种使一个人成为领导者的自我控制力才能从性领域移至政治领域。这在那些抱着其知识精英身份不放的作家作品中尤为突出,比如张贤亮。就像上一章所显示的,张贤亮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是关于男性知识分子的。他们通过对自己性冲动的掌控,重新获得在“反右运动”或“文革”中丧失的政治权力;而女性角色则是用来推动这一进程的。

值得注意的是,《人极》中的亮亮是作为一个女人接替她父亲的教职的。除了不是个儿子,这个安排在她知识分子的家庭背景下完全没有不符合逻辑的地方。但是,这个故事相当清楚地表明了,亮亮在重夺这一地位的过程中已失去了她的性别特征。文中多次提到她“男不男、女不女的”。大概正是亮亮的中性化才使她获得了政治权力。然而,对她的这种接纳蕴含着儒家扭曲的以性别为由厌恶女性的观念。以男性化面目出现的亮亮没有扮演一个女人应该扮演的角色,无论如何诚心,她在这个故事里始终没能给光子生下一男半女。实际上,她成了个女太监。就和太监取得控制权一样,女人获取政治权力因而被阐释为一种注定要失败的非自然现象。

这个故事并没有经常提到“文革”,但它被明确地当作了在性和政治领域引发混乱的罪魁祸首。就像光子在故事开头感叹到的,“真是社会混乱,人心也都齜齜”!<sup>①</sup>这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是个很常见的主题。实际上,“伤痕文学”就是有关戴错政治帽子的文学作品的别称。其中,几乎所有的诱拐与强奸都是由没有或不应该有政治权力的“武”的男人施行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农民、工人;如果是干部和军官,他们就被塑造成在前政权中被错误地赋予了政治权力的恶

---

<sup>①</sup> 贾平凹:《人极》,1988年英文版,第19页。

棍，不论是前国民党政权还是前“四人帮”政权。

问题不在于中国男人是否女里女气或有太监一样的行为举止，而在于这样的形象是会引发一种政治力量的感觉还是一种荒谬感。一项对中国年轻女性进行的调查显示，《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是大众流行的男性形象中最不理想的男性。<sup>①</sup>他女性化的行为不光使他失去了吸引力，更遭到了许多人的反感。<sup>②</sup>从贾宝玉在大观园他的表姐妹和婢女中所受的欢迎来看，历史上的情况并非始终如此。就像我们在第一章中曾提及的，高罗佩等学者以此来解释这种现象：中国男人女性化的过程始于明代，到了清朝，由于汉人对满族征服者所擅长的武术的反感，“理想的爱人被塑造成一个风雅秀致、多愁善感、脸色苍白、身材瘦削的青年男子的形象。他终日在书本、花丛中流连幻想，稍遇挫折就生起病来。”<sup>③</sup>

不过，如果从“文武”上分析这个形象的话，这个“风雅秀致、多愁善感、脸色苍白、身材瘦削的青年男子”分明就是一个传统的文人形象。宝玉可能身体孱弱。他也乐于承认自己没有“武”的技能。不过，传统时代的女人是否因为他的长相把他当作理想情人就不得而知了。她们更有可能是为他的“多愁善感”所倾倒，最重要的是，为他的社会地位及其伴随而来的权势所吸引。况且，他只是那些偏好“文”的特定阶级男女的“理想情人”。对那些来自其他阶层的人来说，会受吸引的应该是关羽、武松所代表的“武”的男性形象；在当代，即为李小龙、成龙和周润发这样的动作明星——我们将在第八章对此进行探讨。

小说《人极》这样的故事表明，在中国，对硬汉形象咄咄逼人的重现即是如此：一个劳动阶级的英雄，被剥夺了政治、经济权力，却不屈不

① 刘达临：《性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2页。

② 最早成书于18世纪中叶的《红楼梦》是公认的关于礼仪规矩的最好的经典小说。曹雪芹：《红楼梦》全4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③ 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第296页。

挠地试图要求自己的权利。然而,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中,暴力并非通向权威的合法途径。这些英雄因此只能得到好汉的地位。“武”的美德所能做到的也就到此为止了。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有关这类“武”的男人的故事是由从前的知青写就的。他们从农村返城后对“文革”和农民的行为方式进行了公开的谴责。在“社会混乱”的“文革”时期,他们是知青,是英雄。而在1970年代末“文革”被完全否定时,他们曾经拥有的政治资本统统化为了债务。返城知青需要把他们上山下乡的经历合理化,即使不为保有政治上的合法性,也要为保持自身心态的平和。

为了替自己的农村经历辩护,韩少功、郑万隆、贾平凹等男性作家转向民族主义,致力于“文化寻根”运动,认为文学之根深植于中国民间贫穷落后的地区。在这股思潮中,作家们从古典文学和中国农村的好汉观念中找到了灵感,在他们的作品里呈现出一种特定的男性特质。不幸的是,由于《水浒》等传统小说中的好汉都是“社会混乱”的产物,这些观念往往与现行政策相抵触。正因如此,“寻根文学”像传统文学中的前身一样充满了模棱两可的说法。对这些含混之处,“寻根”作家的解决之道常常在政治和性上左右摇摆,究竟取决何者,就要看当时政府与社会关注的重点所在了。

“文革”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整体而言,这些变化的发生指向一个更“正常”的社会结构。基梅尔(Michael Kimmel)在对其他社会进行分析时指出,“新的男性特质的出现……暗示着更大的结构变化正以各种方式触发那些导致女性重新界定自身角色的微观社会进程和引起男性特质历史性‘危机’的关键事件”。<sup>①</sup> 中国的问题在于,在试图解决女性所面临的性别不平等状况时,重新赋予她们的是男女两性的

---

<sup>①</sup> 基梅尔编(M. S. Kimmel):《男人的变化:男人和男性特质研究的新方向》(*Changing Men: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 on Men and Masculinity*),赛奇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页。

传统角色，而“文革”时她们才刚刚挣扎着摆脱这些角色。<sup>①</sup> 中国男人也有样学样，跟着将使男人，特别是“文”的男人，成为传统受益者的性角色再次内在化。在“正名”的过程中，作家们不只在恢复旧有的政治秩序上效率颇高，在恢复旧的性别等级制度上也同样干脆利落。

正如性的优势可以转移到政治领域，政治和经济力量也可以被视为性能力。当基辛格等政治家发现权力是种春药时，他们不过是加强了那些在政治、经济上有权有势者的一个陈腐观念。在过去的 150 多年中，就整体而言，中国知识分子已宣示了他们抵制西方国家和经济帝国主义的愿望。然而，他们对文化帝国主义，尤其是传递着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形象的媒体帝国主义的抵制还只是基于道义和政治上的考虑。如果让那些在性上贬低中国男性的人只看西方对男子汉的研究，他们就会发现，“在硬汉姿态和床上表现的表象之下，许多西方男人在性上都感觉缺乏信心、矛盾重重”。<sup>②</sup>

不论男人对自己的性能力感觉如何，1980 年代的小说中似乎有着符合曹文轩所描述的“男子汉”形象、和我们所讨论的光子这样的硬汉太监不同的人物。他们是由王蒙、蒋子龙、李存葆这些在都市生活的干部塑造出的男性形象。乔光朴这样的经理（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中的男主人公）是硬汉，可他们一点也不太监。实际上，他们非常具有儒家风范：受过教育，有官方职位，有孩子。<sup>③</sup> 他们的权力和魅力来自他们所拥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力，而非刀和其他武器。即使故事的主人公是个人民解放军，他们的“男子气概”也不源自他们的枪炮，而来自他们为自

① 杨(Marilyn Young):《四眼天鸡在中国:关于女性之管见》(“Chicken Little in China: Some Reflections on Women”),载德里克(Arif Dirlik)和马思乐(Maurice Meisner)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验》(*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M. E. Sharpe 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53—268 页。她观察到女性在毛泽东之后的时代在恢复传统性别角色上面临相似的困境。

② 梅特卡夫(Andy Metcalf)和汉弗莱斯(Martin Humphries,)编:《男人的性》(*The Sexuality of Men*),普卢托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 页。

③ 雷金庆:《事实与虚构之间:〈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文学与社会〉论文集》,第 38—48 页。

己的部队、同志和家庭的奉献之中。事实上,有时他们的武器会被故意设定成出了问题。<sup>①</sup>

经历了百余年的现代化和半个多世纪的共产党统治,中国作家似乎还在继续追随传统的性别秩序、“文武”模式以及它们与阶级、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然而,这并不是一个线性过程。变化在辩证地发生影响。对那些为我们塑造了新的劳动阶级英雄的作家们来说,比如塑造了光子的贾平凹,重申儒家“克己复礼”的箴言并非他们的全部追求。作为农民出身的男子汉的典范,光子和农民出身、嗜血暴力的水浒“弟兄”不同,他自觉地回避暴力,痛恨强奸亮亮和白水的恶行。光子对配偶的温柔和支持与从前的英雄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过去,武松等英雄好汉要么不结婚,要么就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他们的妻子。

“文化大革命”及其催生的劳动阶级英雄可能会对“男子汉”的形象产生长久的影响。尽管出身于拥有最少政治权力的阶级,光子身上本该具有的那些令人不快的男性特点似乎被女性化了。而且,他的自控能力也并不仅仅局限于性。在整个故事中,对他的塑造显现了儒家意义上对男子汉要求的所有的自律精神。农民光子居然被视为接近了传统意义上的君子,这一事实表明,“正名”的过程在后毛泽东时代尚未完成。尽管“文革”中劳动阶级的英雄在传统的“文武”结构中显得太不现实、太不连贯,以致难于成为行为典范,但光子的形象确实不像封建时代与五四时期的男子汉那样残忍、粗疏。

然而,这不意味着中国传统在现代的中断,也不意味着性别、阶级和权力之间的基本关系发生了改变。恰恰相反,这个故事一清二楚地告诉我们,女性无论有着什么样的背景都永远无法真正成为“领导男性的人”,而光子这样的农民也永远无法在政治权力上和知识分子竞争。因此,低下阶层的女性和男性要想取得控制权,尽管短暂,就只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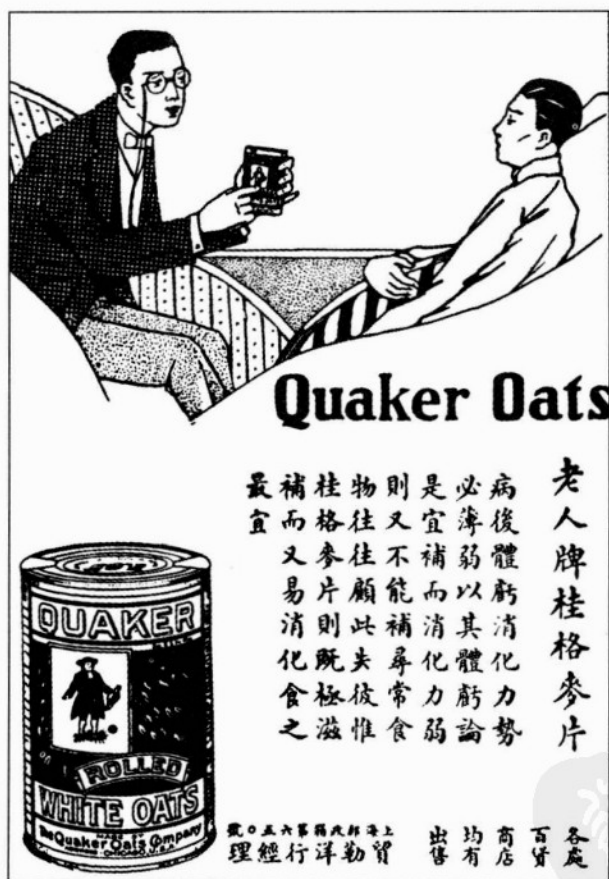
<sup>①</sup> 对人民解放军战士的塑造,例见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沿着女性化—男性化的轴线才可能实现。不过，只要保持体力上的强大，他们就能维持住对那些比他们更“女性化”的男女的支配地位。《人极》这样的故事似乎暗示着，比起性别，阶级统治是一种更为持久有力的控制手段。





# 第六章 女性的声音：20 世纪“女性的男性”理想



**Quaker Oats**

老人牌桂格麥片

病後體弱消化力勢  
必薄弱以其體弱論  
是宜補而消化力弱  
則又不能補尋常食  
物往往顧此失彼惟  
桂格麥片則既極滋  
補而又易消化食之  
最宜

各處百貨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英大馬路五號  
理經行洋勒寶

广告画中，一个西化的年轻人在劝说另一个穿着中式服装的孱弱的中国青年吃美国桂格燕麦。载《良友》，上海1927年12月版，第36页。

在本书一开始我就提到,中国的男性特质需要更加系统而深入的理论研究。这是因为,虽然近年来中国性别与性的问题得到了一些关注,但其焦点主要放在女性身上。即使作家们抗议女性处于长期“被噤声”的状况<sup>①</sup>,聚光灯也仍旧固着在她们的境遇。随着“女作家产业”在20世纪后二三十年的出现<sup>②</sup>,关于这个“被噤声”的性别的对话以及她们自己发出的声音,几乎震耳欲聋。然而,正如许多男性只是把女性当作衡量自身价值的尺度,女性即便谈论的是自己,关注的也是她们和男性之间的关系。而只有在多种性别和性彼此相关而不被孤立开来时,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性别与性。

正如在前面章节中所讲的,由于形成社会制度的思想机制一般由男人控制,他们是各种社会理想,包括男性特质的主要建构者。“文武”的定义因而只适用于男性,只为保持男性对女性的优势。女性根本没有资格进入“文武”这个领域。理所当然的,在文学经典中,女性的声音大多经由(常常是有缺陷的)男性才得以放大出声。从噪音中挽回女性“被裹住的”声音并听到她们对男人的看法,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女性在20世纪开始接管一些思想机制。于是,她们的声音日渐摆脱中间介质的包裹,变得更加清晰可闻。特别是在上个世纪的下半叶,越来越多的女性公开参与文学等多种多样的媒介活动;不过,从批评家习惯性地把她们的职业角色定位为给作品增添了“女作家特有的怪诞特色”来看,她们显然仍处在边缘地位。<sup>③</sup>

① 余明宝(Yue Ming-Bao):《性别化现代中国小说的起源》(“Gendering the 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载吕彤邻(Tongling Lu)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社会中的性别与性》(*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

② 李木兰(Louise Edwards):《巩固社会主义父权制:女作家产业和女性主义文艺批评》(“Consolidating a Socialist Patriarchy: The Women Writers’ Industry and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载安东篱(Antonia Finnane)和马兰安(Anne McLaren)编:《中国文化中的服装、性与文本》(*Dress, Sex and Text in Chinese Culture*),莫纳什亚洲研究所1999年版,第183—197页。

③ 白露(Tani E. Barlow):《前言》(“Introduction”),载白露编:《我自己就是个女人:丁玲选集》(*I Myself Am a Woman: Selected Writings of Ding Ling*),灯塔出版社1989年版,第25页。

在这里,我并不想端出一副女作家因为是女人就更加真理在握的态度。或者,用王德威(David Wang)的话说,我不希望给人留下这种印象:通过在本章中强调女作家、女读者对女性问题的掌握能力,我试图把女权主义约化成男女之间简单的二元对立。<sup>①</sup>不过,我的确认为,在一本关于男性特质的书中,检视女性如何对男子气概进行建构至关重要。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她们所建构的各种男性理想告诉了我们“女人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且,更进一步的是,她们说明了“文武”这种社会建构总是由那些控制着操纵手段的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进行操纵的。

在这一章中,我想申明的观点是,在现代女性的笔下<sup>②</sup>,男性往往被塑造为欲望的对象。<sup>③</sup>男性从主体变成了被凝视、被估价的对象。其结果是,女作家塑造的男性特质变得和青春无邪、性无知、温柔、异国风情等一系列传统上与“文武”毫无瓜葛、却与女性特质有关的特点联系在一起。自然,由于研究的对象是令女性喜爱的男性,很难想象“文武”不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浮现出来。本章将通过分析三位有代表性的女作家丁玲(1904—1985)、茹志鹃(1925— )、王安忆(1954— )的代表作来探讨这些形式。<sup>④</sup>这几部代表作包括:《莎菲女士的日记》(1928)<sup>⑤</sup>、《百

① 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现代男作家小说中的女性主义意识》(“Feminist Consciousness in Modern Male Fiction”),载杜克(Michael Duke)编:《现代中国女性作家:批判性评价》(*Modern Chinese Women Writers: Critical Appraisals*),M. E. Sharpe 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54 页。

② 对“新女性”和文学的关系的探讨,参见文棣(Wendy Larson):《现代中国的女性与写作》(*Women and Writing in Modern China*),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31—165 页。

③ 就像我们之前所看到的,1980 年代出现的像《男子汉》那样的杂志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明。

④ 关于这些作者的详细情况,参见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和雷金庆(Kam Louie):《二十世纪中国文学》(*The Literature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赫斯特出版公司 1997 年版。

⑤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Miss Sophia's Diary”),英文版载白露(Tani E. Barlow)编译:《我自己就是个女人:丁玲选集》(*I Myself Am a Woman: Selected Writings of Ding Ling*),灯塔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9—81 页。

合花》(1958)<sup>①</sup>和《锦绣谷之恋》(1987)。<sup>②</sup> 它们的发表时间之间分别有着近30年的差距。之所以做此选择,是因为它们代表了后帝国时代的中国三代女性的观念态度。这三个故事都探讨了巨大社会政治变革时期年轻女性的思想和感情。

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现代”女性面临着“五四”那代人的两难处境。一方面,她们想摒弃传统规范,渴望被美化了的、承诺了现代生活模式的欧化的个人主义。<sup>③</sup> 女主角其实已经抛弃了传统价值,但另一方面,她尚不清楚自己能有什么替代方案。第二个故事是茹志鹃的《百合花》。小说的背景设定为国共内战的历史转折点,也即在“现代”和共产中国之间。在这里,主角的同情明确地站在共产党人一边,而读者也都了解,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是一个即成的历史事实。最后一个故事,发生在共产主义理想由于在“文革”和“文革”后逐渐幻灭而遭到横扫的时期。它预示了1990年代及此后的享乐主义消费文化。

我选择这三个故事作为研究中国女性对男性建构的代表,因为它们都是由女性在具有充分自我意识的情况下所写的她们对男、女关系变化中的看法。第一个故事中的男主人公是位海外华人。他体现了人们在“五四”时期所特有的对西方事物的向往。第二个故事中的男主人公是位年轻的战士。他是共产中国的前几十年里一位典型的英雄形象。第三个故事中的情人是个与叙述者有婚外恋的作家。他暧昧的道德观更使他成为20世纪末那个彷徨不定的时代的偶像。这三个故事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关注所在,几乎都是甫一问世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和影响。这三部作品都有英文

① 茹志鹃:《百合花》(Lilies),戴乃迭(Gladys Yang)译,载《百合花和其他小说》(Lilies and Other Stories),熊猫丛书1985年英文版,第7—19页。

② 王安忆(Wang Anyi):《锦绣谷之恋》(Brocade Valley),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和陈迈平(Chen Maiping)译,新方向1992年英文版。

③ 一些批评家对莎菲作了一种更为残酷的解读,认为她被描写成陷入了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陷阱中遭受双重受害。张永泉:《在黑暗中寻求光明的女性——莎菲形象的再评价》,载《丁玲作品评论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43—163页。

译本,在中国和英语世界中获得了广泛的评论。不过,大部分的文学批评都集中在作者的女性主体性上。与此相反,我将要突出的不仅是她们对男、女关系的描写,更主要的,是她们所塑造的男主人公的特征。

## 丁玲和西化的男性

我将以丁玲的小说作为开始。这篇小说写于一个西方帝国主义令人尴尬地横行中国、而中国男性因此意志极度消沉的时期。就像我将在第八章中指出的,当时的通行表达“东亚病夫”直到今天还苦涩地留在中国人的记忆当中。中国男性在一些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最优秀的作家如鲁迅、郁达夫和郭沫若笔下体质衰弱、道德卑劣。无论是作家还是他们塑造的人物都呈现出那个时代共同的特色——浪漫主义倾向。正如我们即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这一渴望浪漫的潮流部分地体现为对西方生活方式的模仿。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大多在欧洲、美国或日本学习过现代的思想观念。然而,他们对自己的职业前景和中国的未来都没有安全感。因此,这个“浪漫一代”往往沉湎于感伤主义和自恋般的自我怜惜。事实上,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惯常将男性塑造成无法或不愿照顾自己和家人的人。女性往往因此死去,被卖入娼寮,或是去当奶妈。<sup>①</sup>

女性“消失”的主题既不局限于中国文学<sup>②</sup>,也不局限于女性。然而,就像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指出的:

男作家安排女性人物死亡或遭受折磨的倾向,反映了男作家关心的主要问题是男性命运。女性人物常常消失或死去;在被设定为

<sup>①</sup> 例见柔石:《为奴隶的母亲》,载鲁迅等:《中国现代短篇杰作选》,外文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05—229 页;以及沈从文:《丈夫》,载同上书,第 398—417 页。

<sup>②</sup> 关于其在西方文学中的反映,参见厄玛斯(Elisabeth Ermarth):《虚构的共识与女性受害者》(“Fictional Consensus and Female Casualties”),载赫布兰(C. G. Heilbrun)和黑格奈特(M. H. Higgonet)编:《女性的再现》(*The Representation of Women*),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1—18 页。

悲剧主人公时,她们不幸的结局往往反映了男性的焦虑;而女主人公经常充当的是以男性为中心的计划的符号。<sup>①</sup>

无论是男人消失还是女人消失,男人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确实总是把女性塑造成牺牲品。<sup>②</sup>

“五四”时期对女性作为牺牲品的描写不过是旧瓶装新酒而已。尽管作家们以同情的姿态对女性的命运表达了愤慨之情,但就整体而言,他们的作品表达的是和传统小说类似的观点。在大量的前—现代小说中,女性人物要受男人的伤害,或者为男人的事业而牺牲。在传统故事中,女性所表现出的自我牺牲经常达到超出常人的境界,以至于拥有超自然的力量。<sup>③</sup>把女性神化成超自然的灵体,使作者得以创造出“一个中国社会所一力维护的贤妻象征”<sup>④</sup>。她们的神灵状态为不可能达到的标准提供了基础。虽然这些女性似乎是占据了叙述的中心位置,但这个位置只允许她们展示谦卑的、应由所有女性效仿的美德。然而,随着女作家的出现,我们看到了截然不同的视角。虽然女作家也在很大程度上专长于表达自己的需

① 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五四文学中消失的女人和男人:茅盾、冰心、凌叔华和沈从文短篇小说的后女性主义调查》(“Disappearing Women and Disappearing Men in May Fourth Narrative: A Post-Feminist Survey of Short Stories by Mao Dun, Bing Xin, Ling Shuhua and Shen Congwen”),载《亚洲研究评论》(*Asian Studies Review*),第22卷第4期(1998年),第451页;亦请参见李木兰(Louise Edwards):《民国时期对现代女性的监管》(“Policing the Modern Woman in Republican China”),载《近代中国》(*Modern China*),第26卷第2期(2000年),第115—147页。

② 不难理解的是,在对这些作品所做的文学分析中也反映了这一趋势。此外,就像姜克维(William Jankowiak)所观察到的,这一趋势在有关中国人的性别研究中也很明显。姜克维:《中国女性、社会性别和性:对最近研究的批判性评价》(“Chinese Women, Gender, and Sexuality: A Critical Review of Recent Studies”),载《关心亚洲学者通报》(*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第31卷第1期(1999年),第31页。尽管这种观察在一定程度上看似无可争辩,但看到它明显使这一领域的一些学者不快还是很有趣的。参见霍威尔(Jude Howell)等:《答复》(“Responses”),载同上,第37—47页。

③ 有关例子请参见马幼垣(Y. W. Ma)和刘绍铭(Joseph S. M. Lau)编:《中国传统小说集:主题与变奏》(*Traditional Chinese Stories: Themes and Variations*),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37—409页“超人少女”和“鬼妻”这两个章节所收录的故事。

④ 吴法蒂玛(译音)(Fatima Wu):《中国灵异小说中的狐狸精(上)》(“Foxes in Chinese Supernatural Tales: Part I”),《淡江评论》,第17卷第2期(1986年),第141页。

求和欲望,但她们对男性人物的塑造却有着与此前男作家迥然相异的态度与评价。本章将探讨“文武”理想下男、女特征之间的一些根本性的分歧。

当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于1928年第一次发表时,评论家认为这些先锋性的文字首度清晰地表达了现代年轻女性心中所想。有些人把它比作“扔在死寂文坛上的一发炮弹”<sup>①</sup>。这本日记本身很简单,它讲述了12月至3月之间莎菲几个月的生活。正如她的名字所暗示的,莎菲是一个现代的、西化的年轻女性。故事中其他的主要角色也都是西化的青年男女。莎菲已经离开她的家庭,独自住在旅馆房间里。因此,对于鲁迅关于易卜生笔下的娜拉离家出走后会怎样的猜测,她的故事是一个可能的答案。事实上,莎菲的生活并不幸福。她患有肺结核,无法从事日常的工作和学习。而且,她还沉溺于自省和幻想之中难以自拔。莎菲在日记中记录她的病情变化和心绪起伏。一个叫苇弟的年轻男子迷恋于她,但她总觉得他不懂得她,并以利用他的感情为乐。而她自己则迷恋一个学商的新加坡留学生凌吉士。她的日记详细记录了她对这名男子时而癫狂、时而矛盾的欲望。为了接近他,她不顾自己的病情搬进了一个潮湿的公寓房间。日记在莎菲实现了“我和他的嘴唇合拢来”的最大愿望后戛然而止。虽然她体会到了胜利的滋味,但那个吻同时也令她感到堕落。在满心自我怜惜当中,她决定离开北京搭车南下。

黎德怡(Amy Lai)认为,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制造了“另一种形式的‘沉默’,而这意味着女性自我的僵局”;因为,莎菲是在绝望中离京南下并停止了记日记的。<sup>②</sup> 如果考虑到这整本日记都是由一个女人写

① 引自费梅兹(Yi-tsi Mei Feuerwerker):《丁玲小说:现代中国文学中的意识形态与叙事》(*Ding Ling's Fiction: Ideology and Narrativ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0页。

② 黎德怡(Amy Tak-yee Lai):《解放、困惑、监禁: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与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女性自我》(“Liberation, Confusion, Imprisonment: The Female Self in Ding Ling's 'Diary of Miss Sophie' and Zhang Jie's 'Love Must Not be Forgotten'”),载《比较文学和文化》(*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第3期(1998年),第95—96页。

成的，而之后的嘈杂讨论也主要是由女人展开的，那这个结论就不怎么有道理。在这个常常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女权主义小说的作品中，丁玲采用的手法使叙述者可以用最自恋的方式沉浸在她的感觉和情绪中。她可怜倒有可能，但绝不沉默。她无情地剖析并嘲笑她周围的每一个人。日记的形式使她可以用纯粹自我本位的方式来处理所有的情爱关系；对我们来说，毫无疑问，这个世界只有在莎菲的介入下才有意义。特别是，她把苇弟和凌吉士这两名男子置于严密的审视之下，坦率地讨论了他们在她的情感生活中的意义。

首先，我想讨论一下苇弟这个人物。他是“五四”小说中典型的那种感情过于丰富、依赖性过强的男性。从字面上理解，苇弟的名称意味着“名字叫苇的弟弟”。中国人常常对亲近的人以“兄弟”、“姐妹”相称。然而，考虑到评论家白露(Tani Barlow)等人花了不小的篇幅来讨论莎菲这个名字在欧洲的起源和意义，那么，对苇弟这个名字，除了体现关系亲密的事实以外，讨论之少，令人惊讶。小说所指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亲密呢？与“弟”所表示的年幼之意相反，苇弟其实大莎菲4岁。他不仅不介意被称为“弟弟”，而且他本人也不叫莎菲的名字，而称她为“姊姊”。虽然已经25岁，但他的举止行为却极端孩子气。如果莎菲对他不好，他常常会生气、流泪。

在明清小说中(如《红楼梦》的宝玉)，甚至在郁达夫等男作家的现代作品中，这种过度敏感、以自我为中心的青年男子都有可能令人喜爱。但在一个现代女性眼中，他们不但毫无浪漫可言，甚至还令人气恼有加。小说中苇弟第一次出场，莎菲就说他过分“忠实地去表现他的真挚”，并评论说：“反只能让我更觉得他太容易支使，或竟更可怜他的太不会爱的技巧了”。<sup>①</sup>她操纵着苇弟对凌吉士的嫉妒之情，并给他看了自己的私密日记。但看过之后，苇弟显示出的竟只是更多的自怜和抽噎，“我不喜

<sup>①</sup>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英文版，白露译，第52页。



欢那高个子!”他指的是凌吉士。然而,正像刘禾(Lydia Liu)指出的,在丁玲写《莎菲女士的日记》时,她努力地(通过女性叙事者)坚持自己的主张,“不是作为某个人的女儿、妹妹、恋人或朋友,而是作为一个自主的主体”<sup>①</sup>。《莎菲女士的日记》是关于莎菲的,不是关于苇弟或凌吉士的。纵然苇弟本性上以自我为中心,但他不断声言爱上了莎菲的行为与“五四”个人主义和自由的理想是背道而驰的,而这也正是莎菲等现代女性对他感到不屑的原因。

这个观察看起来似乎不言自明。但是,如果是和传统文学中年轻女性如何为贾宝玉和其他那些受溺爱的、极度敏感的青年男子而意乱情迷相比较的话,男性吸引力的理想明显已发生了变化。贾宝玉喜欢的,也许是女孩子的陪伴和女性化的物件,但他仍然对自己的生活拥有控制力。在孩提和少年时代,他被当作女孩教养。但成熟之后,他仍然在科举考试里中了举。在遁入空门之前,他还育有一子。因此,和元杂剧《西厢记》里的张生一样,贾宝玉缺乏控制的表象之下掩藏着一个才子,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就通过科举考试,实现“文”的使命。尽管对男性特质“武”的一面不屑一顾,他的飞扬文采却从未受过质疑。

与此相反,在1920年代,苇弟乖戾、愠怒、怨愤的行为却只令他看起来又可悲又愚蠢。宝玉容易感情用事的时候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少年,不像苇弟,已经25岁了。而且,比起他殷勤对待的女人,苇弟还大了4岁。“文武”可不适用于孩子和软弱的“老男人”。苇弟与宝玉和张生不同,那两个人都展现了能取得“文”之成就的迹象,因而有资格被称为才子(即文人的雏形)。而苇弟虽幼稚却并非幼年,泪水涟涟却并无才能。他剩下的就只有令人鄙视了,尤其是对莎菲这样的“现代女性”来说。苇弟已

① 刘禾(Lydia H. Liu):《创造与介入:现代中国文学中女性传统的生成》(“In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The Making of a Female Tradition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载魏爱莲(Ellen Widmer)、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编:《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的小说与电影》(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 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07页。

丧失了控制莎菲的能力,他频繁掉下的眼泪只进一步证明他同样也丧失了自我控制。那就难怪“在苇弟面前,好像莎菲已经变成了一个男子,而苇弟却变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悲悲切切的女性”<sup>①</sup>。

传统才子的形象显然对现代女性缺乏吸引力。那么,替代物又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将要在下一章中看到的,男性理想之一是学商的、西化的青年男子。《莎菲女士的日记》也塑造了这样一个男人。他就是受西方教育的凌吉士。莎菲一开始觉得他有异国情调和性吸引力,部分原因是由于他来自海外。下面是她第一次遇见他时的印象:

那高个儿可真漂亮,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男人的美,从来我还没有留心到……他,这生人,我将怎样去形容他的美呢?固然,他的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但他还另外有一种说不出,捉不到的丰仪来煽动你的心。比如,当我请问他的名字时,他会用那种我想不到的不急遽的态度递过那只擎有名片的手来。我抬起头去,呀,我看见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了。我能告诉人吗,我是用一种小儿要糖果的心情在望着那惹人的两个小东西。<sup>②</sup>

如果把这段话里的代词从“他”换成“她”,我们眼前就是一个美艳撩人的女性。莎菲对凌吉士的幻想尽管情欲勃发,却与具体的性别无关。就像刘禾指出的,“叙述者不仅将男人的‘嘴唇’客体化,好像它们是糖果,她还忽略了阴茎,将男人的性女性化,把它和嘴唇(阴唇)联系在一起”<sup>③</sup>。这个人不是一个男人。至少在开始,他被当成了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西方的镜像中的女人。更重要的是,在他身上,中国男性特质中“文”、“武”特征都消失了。他既不是喝醉了可以写出古典诗词的书生,也不是

① 李达轩:《丁玲与莎菲系列形象》,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②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英文版,第55页。

③ 刘禾:《创造与介入:现代中国文学中女性传统的生成》,第201页。

可以单枪匹马对抗一支军队的高超剑客。他是一个幻象。

性反转幻想在种族和文化上有其对应之物。“五四”是一个中国人把西方世界“西方化”的时期，他们对西方的刻板印象就是性解放。因此，第一次遇见凌吉士时，莎菲把这个来自陌生土地、迷人而充满诱惑的高大男子浪漫化了。虽然故事中的他并不是一个高大的白人男子，但对莎菲来说，来自新加坡、有着西方教养的凌吉士就意味着英国味和异域风情。就像刘禾再次指出的，“莎菲的幻想并不完全是对一个白人男子的幻想，而是对一个有着白人男子般的性吸引力的中国男子的幻想”<sup>①</sup>。然而，当莎菲最终亲吻到那双嘴唇时，她又为什么觉得他那样令人厌恶呢？

由于来自“西方”，他可以不受属于中国男性传统的“文武”美德一部分的任何限制。然而，他拥有中国血统，却又在“事实上”不是个中国人。因此，他既不属于东方，又不属于西方。作为一个在种族、国籍的严格界限间游移的杂合体，他既有可能招致那些追求确定性的人的反感，也可能令她们深受吸引。在亲吻凌吉士并令他情欲勃发的幻想实现之后，他的皮囊之下则是莎菲所理解的西方大学生对物质主义的追求。这种西方主义是能自我实现的。一开始，莎菲还曾请他给自己教授过英语这种神秘西方的语言。然而，当他在她面前越来越多地显露自我时，她开始认识到他所能理解的唯一语言是职业成功和赚钱。在著名的男作家老舍眼中——下一章即将讨论——这种与“文武”背道而驰的属性还有可能被描绘成爱国的和阳刚的，但对莎菲而言，这样的男人一钱不值。<sup>②</sup>

她对凌吉士的幻灭和蔑视在小说中被明确地解释为西方浪漫爱情观念的误导产物。例如，3月21日的日记中提到：

①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 China, 1900-1937*），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页。

② 海外华裔男性只能靠挣钱走上成功之路的观念广为接受，这也带出了下一章中我将要探讨的刻板印象问题。

单单为了那男人的柔发，红唇……我又梦想到欧洲中古的骑士风度，拿这来比拟不会有错，如其有人看到过凌吉士的话，他把那东方特长的温柔保留着。<sup>①</sup>

对欧洲骑士和骑士风度的幻想是不切实际的。这一点明确无疑，因为这段日记的下面就披露了这样的现实：她当晚就得知凌吉士已经结婚，在新加坡不仅有过风流韵事，还是妓院常客。莎菲即刻宣称他“还不懂得真的爱情”，并“决定来教教这大学生”。<sup>②</sup>

于是，凌吉士也许看起来像一个盔甲锃亮的骑士，但实际却是个冒牌货。认识到这一点的莎菲，在第二天就让苇弟看了她的日记。而他也无法彻底懂得她。她迅速走出了下一步，亲吻了凌吉士，然后离开北京去了南方。吻上凌吉士撩人的嘴唇，令她获得了某种“胜利”的感觉。她对欧洲骑士的幻想，以及从苇弟对她的依赖中得到的乐趣，都被这一吻治愈了。她离开他们去了更加宜人的南方，既为自己的健康、也为自己的理想。

莎菲的离京南下似乎表明了，正像“五四”小说中盛行的“消失的女性”，她的这种行为包含着一定程度上的“自我清除”和自我肯定。<sup>③</sup> 费维恺(Feuerwerker)认为，“莎菲用写作走向自我肯定和自我理解的挣扎以自我挫败而告终。这可以部分地归结为：日记这种形式，就像她所采用的，被证明特别适合于表现这种失败”<sup>④</sup>。这是对文本一种可能的解读。但就莎菲对自己浪费时间、精力写日记的声明以及她对自己迷惑于凌吉士外表的自我谴责而言，这种解读有些过于拘泥文字了。与许多男作家

①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英文版，第71页。

② 同上书，第73页。

③ 参见王顺珠(Shunzhu Wang)：《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和赫斯顿〈凝望上帝〉中的双声女性话语》(“The Double-Voiced Feminine Discourses” in Ding Ling’s ‘Miss Sophie’s Diary’ and Zora Neale Hurston’s ‘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载《淡江评论》，第28卷第1期(1997年)，第131—158页。

④ 费梅兹：《丁玲小说：现代中国文学中的意识形态与叙事》，第50页。

创作文本中的其他女性角色不同,她自我导演的放逐是积极选择的结果,是迁往一个气候更宜人的地方。就在她行动时,还嘲笑着男人想:“我胜利了!我胜利了!”作为日记的作者,通过把这些男人从她的脑海中驱逐出去并结束这本日记,她实现了一定的独立。对她来讲,消失的,其实是那些男人。

更重要的是,作为全知的作者,丁玲为女性赢得了一场两性之间拉锯战的胜利,而此前没有任何其他中国作家能够做到这一点。既往的男作家们往往试图采纳女性观点,但不可避免地仍用男人的声音在宣讲。最终,在他们的作品中,成为牺牲品的女性只提醒着男人的失败——他们无力在封建宗法制的罪恶下保护她们。女性的痛苦,只是男性关注的投射:他们的权力和他们的“文”、“武”属性。对于丁玲创造的莎菲来说,她周围的男人身上缺乏传统的“文武”男性特质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但她觉得这些男人既可怜又可恶。她知道这些男人已经失去了传统的“文武”男性特质,但还没有找到获取欧洲骑士风度的办法。她把周围的人变成了她宣告个人意志的对象,而不是把自己变成男性关注其自我形象的一面镜子。丁玲之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表明,女性常常积极、公开地塑造和改造男性特质。

## 茹志鹃和战士

郑大群认为,探索“做女人”的权利的女性文学革命不幸夭折,直到1980年代才恢复生机。<sup>①</sup>但只有在我们期望文学作品明确指涉浪漫关系、性关系或女性的性时,这个论断才是正确的。而在有关男、女关系的著作或女性权利的文学方面,这一时期其实涌现了大量的作品,其中有

<sup>①</sup> 郑大群:《女性禁忌与后新时期女性写作》,载《文艺评论》,第2期(2000年),第33—37页。亦请参见李子云(Ziyun Li):《女性话语的消失与复兴》(“The Disappearance and Revival of Feminine Discourse”),载《淡江评论》,第30卷第2期(1999年),第55—69页。

许多抱着促进性别平等的特定目的。“性平等”在男男女女的发型、服饰中均有体现,它们似乎更加趋同。<sup>①</sup> 由于男女两性都越来越多地把能量放在了社会重建与革命事业中,个人“虚荣”受到了坚决的打击。在1950年代,人们对这种集体主义的信条普遍接受。只在“百花齐放”时期出现过对这一信条小心翼翼的、试探性的异议,如后来被定性为“毒草”的一些作品《在悬崖上》<sup>②</sup>和《红豆》。<sup>③</sup> 这些小说涉及了诸如个人愿望和性的渴望等话题。它们特别谈及了男性和女性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应该发挥的作用:他/她们既有社会角色,也有性别角色。然而,即使是这些试图复兴传统及个人主义的性别角色与性角色的小心尝试,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这种清教徒式的氛围给外人的印象是:建国后的前几十年里,中国人在性关系、情爱关系和婚姻关系所带来的欢乐和忧伤方面完全空白。爱情、婚姻和婚外恋情的各种变体在过去为传统故事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但此时,它们只能完全服务于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种种限制即便没有把创作传统爱情故事变成不可能的任务,至少也步履维艰。但这段时间也确实不是传统时期了。比如说,远较以往为多的女性在从事写作;再比如说,政令强迫下的性平等也曾符合她们的集体向往。尽管政治气氛严酷,为了宣传而进行的艺术创作中仍然产生了一些难能可贵的作品。茹志鹃的《百合花》,就是1950年代出现的最富情感的“爱情故

① 相关讨论参见安东篱(Antonia Finnane):《中国女性应该穿什么?一个民族问题》(“What Should Chinese Women Wear? A National Problem”),载《近代中国》,第22卷第2期(1996年),第99—131页。

② 邓友梅(Deng Youmei):《在悬崖上》(“At the Precipice”),李华元(Hua-yuan Li Mowry)译,载徐凌志韞(Vivian Ling Hsu)编:《本是同根生:现代中国女人的故事》(*Born of the Same Roots: Stories of Modern Chinese Women*),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4—127页。

③ 宗璞(Zong Pu):《红豆》(“Red Beans”),白杰明(Geremie Barmé)译,载詹纳尔(W. J. F. Jenner)编:《香草——曾被当作“毒草”的中国短篇小说》(*Fragrant Weeds — Chinese Short Stories Once Labelled as “Poisonous Weeds”*),三联书店(香港)1983年英文版,第195—228页。

事”之一。·不管算不算女权主义之作，它都绝对是建国后女性如何看待男性特质的一个很好的例证。《百合花》中的战士是那个时代的典型英雄。当时生活中最有名的英雄战士是董存瑞（1929—1948）和黄继光（1931—1952）。<sup>①</sup>

这些模范都得到了大力的宣传，以使民众们效仿他们无私的爱国行为。一般来说，他们都英勇无畏、勤俭节约、毫无例外地出身劳动阶级。就对男性特质的分析而言，他们令人好奇地拥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被塑造得像具有中国传统美德的女人。也就是说，他们都仪表堂堂、忠诚无比（对传统女性来说，是对恋人的忠诚，但对这些男人来说，是对同志的忠诚），最重要的是，还英年早逝。事实上，他们死时都童贞完好，确保了他们的纯洁，既没有留下任何污点，也未沾染任何资本主义思想。和《百合花》中的年轻战士一样，董存瑞、黄继光等英雄模范为战友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正因如此，茹志鹃有了“活生生的”楷模原型来加工她的故事。茹志鹃在回忆创作经历时强调了上述事实。她说，小说中的战士形象源于她在战场上遇见的两位真实的战士。<sup>②</sup> 茹志鹃早期作品中塑造的“生活中”的人物是1950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典型。作为普通人的“典型”人物，他们展现了符合当时中国共产党教条信念的美德。<sup>③</sup> 1958年《百合花》甫一问世，就得到了茅盾热情的赞扬。<sup>④</sup> 这部作品也奠定了茹志鹃以细腻重现军民鱼水情见长的大作家的声誉。<sup>⑤</sup>

故事发生在1946年秋共产党对国民党发动进攻的时期。叙述者是一个被分到前线包扎所当临时急救员的文工团成员。一位年轻稚气的

① 关于这些部队楷模的生平简介，参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

② 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How I Came to Write ‘Lilies on a Comforter’”），载萧凤霞（Helen Siu）编：《犁沟：农民、知识分子和国家》（*Furrows: Peasants,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7—303页。

③ 一些批评家在之后的论辩中指责茹志鹃没有塑造出“当代英雄”。欧阳文彬：《试论茹志鹃的艺术风格》，载孙露茜、王凤伯编：《茹志鹃研究专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8页。

④ 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载同上书，第247—251页。

⑤ 史景平：《歌唱普通人的心灵美——谈茹志鹃的〈百合花〉》，载同上书，第265—270页。

解放军战士(他太年轻了,以至于只能当个“通讯员”而不是普通的战士)奉命护送她去包扎所。在路上,她满怀同情地注意到了他的羞怯不安和奉献精神。因为配给还没到,包扎所需要从老百姓家里给伤员借被子。从村里的一个新媳妇那儿,他没借来被子,叙述者则不费吹灰之力地借到了她作嫁妆的新被子。虽然战士因为新媳妇的态度咕哝着说这个村里的“老百姓死封建”,但显而易见,这对青年男女都因彼此在场而有些尴尬。这次会面之后不久,年轻的战士为救战友扑在了一枚手榴弹上,光荣牺牲了。新媳妇用她绣满百合的新婚被子裹住死去的战士,当作给他下葬的寿衣。表面上,这个故事讲述的是军民相互依存的传统主题,但这位战士和新媳妇所表现出来的感情却暗示着更深的、隐匿的欲望。

在1950年代茹志鹃写下这个故事的时候,那位新媳妇是否感受到了这位年轻战士的性吸引力大概没什么意义。有重要意义的是这个死亡场景所暗示的男、女关系的变化。作者告诉我们,这条被子是新婚嫁妆,连新娘也最多只用过一两次。它“属于”她和她出门在外的新婚丈夫(多半正在部队里保卫他们的新家园),标志着他们婚姻的和睦与亲密。正因为如此,旁边的人才对她用这床被子当寿衣包裹死去的战士而感到震惊。通过让他们分享最珍爱的私人物品,她象征性地把两个男人——她的丈夫和她“所爱的人”联结在一起。这个故事并没有告诉我们她丈夫的反应,但它的要义明显指向一种受容许的反应:赞许、悲伤,而最重要的,是和死者的同志之情。人们把这种新的共产主义的思维转变当成正常的思路接受下来,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个评论家曾提及此事。然而,这种思维转变对女人作用的评价却具有真正的革命意义。在过去,女人被塑造成对兄弟情谊理想的威胁。男人们要联合起来反对女性。然而,在《百合花》中,这个女人却充当了男性情谊的中间人。她不再是摧毁兄弟之情的、令人恐惧的妖妇,而是情谊连结过程中的工具。毫不意外,这个故事的作者是位女性。

正如我在另一本书中指出的,“这个故事涉及了两组强烈的对比:男



人和女人之间,以及传统价值观和现代社会主义中国的崭新价值观”<sup>①</sup>。因此,除去性别角色在暗暗地发生着变化,还有许多传统模式的特点仍然保留了下来:男人去当兵,女人要么当卫生员,要么留守在后方家里。然而,除了上面讨论过的新媳妇所充当的角色,这个故事还反映了更多的重要变化。这从叙述者、战士和新媳妇之间的三角关系就可以看出来。尽管这不是一本日记,但它采用了第一人称手法,事件也显然是由叙述者从一个年长女性的角度来交代的。因此,虽然故事涉及的是三人关系,但就像《莎菲女士的日记》,它毫无疑问注定拥有自传体的性质和女性叙述者的全知视角。她掌控着、讲述着这个故事。虽然茹志鹃在1980年声明“《百合花》中没有真人真事,也不来源于真人真事”<sup>②</sup>,但在同一篇文章里,她也提到这名战士的形象是她遇见过的真人的集合。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对这名战士的塑造才显得意义重大。几乎所有的中国批评家都认为这位战士可爱、天真、憨直。<sup>③</sup>批评家觉得他可爱,主要是因为他似乎在性上没有经验、毫无防备。在故事里,叙述者第一次和他讲话时他害羞到“脸涨得像个关公”<sup>④</sup>。关于武圣关羽的暗喻唤起了我们在第二章对厌女症(也许恐女症更贴切)方方面面的讨论。这位战士和这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似乎表明,即便是以被动、消极的方式,他也不想和她们有来往。在坐下休息时,他直接和女性叙述者保持了“远远的”距离,以至于这个被解放了的女人着了恼。他拒绝再回去找新媳妇借被子也显示了这一点。

但是,我们发现,在这两种情况下,他在女性面前脸红都不是对有厌

① 霍奇(Bob Hodge)和雷金庆(Kam Louie):《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政治》(*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路特里奇1998年版,第66页。

② 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第297页。

③ 例见绿漪:《纯朴的诗篇》,载孙露茜、王凤伯编:《茹志鹃研究专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5—280页;以及汤铭:《美丽的花朵,纯朴的诗篇》,载同上书,第261—264页。

④ 茹志鹃:《百合花》,载《中国当代作品选编1949—1986》卷一,华语教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6页。

女症的武圣关羽的简单重放,而是因为不知道该跟女性说什么的尴尬和羞怯。这位新战士是“武”的男人,但去除了所有“武”的传统中令人厌恶的方面。事实上,他在女性面前的羞涩有着传统故事中才子佳人互动的余韵。正像佳人在那些故事里唤起了男人的保护欲和占有欲,这位战士也激起了年长叙事者的母性和姐弟之情,以及新媳妇微妙而深沉的浪漫依恋。从读者的角度来看,因为知道他为保护战友而牺牲,这位战士与传统小说中悲剧女主角的相似之处就显得更为明显。何谷理(Robert Hegel)令人信服地论证说,他“最后的自觉行为把这个人物从有趣的土包子变成了理想的英雄”<sup>①</sup>。

这名战士最后的行为是扑向即将爆炸的手榴弹。为战友的安全牺牲自己,这正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雄模范的典型行为。这种行为让人不禁回想起封建中国贤德女子所做的自我牺牲。它甚至让武神关羽的兄弟义气也相形见绌,因为关羽没打算死在兄弟之前,只愿意同日而亡。而正是自我牺牲这种行为,在故事中使女人们的心完全融化了。在传统爱情故事中,女人自杀或者被杀会获得高度赞誉,人们会认为她们的行为理应得到效仿和崇拜。在共产党早期的宣传文学中,男人也用无私的行为来成就他们的英雄地位。不过,像董存瑞、黄继光这样的男人是为了别的男人而死的。他们保持着无性英雄的状态。《百合花》故事里的战士似乎和这些男人差不多;所不同的是,他是由女作家创造的。这个事实改变了把他树立成楷模的男性特质体系的本质。就像传统贤德女性可怖的死亡撩拨起了男性的性幻想,在这里,一个保有童贞的“挺棒的小伙”也激起了女性的深厚情感。他是很羞涩,但并非没有吸引力。

就主客体关系而言,性和性别的逆转在这个故事里找到了相似之处。在传统文学中,男人盯着女人看,而这位战士则处在两个女人的注

<sup>①</sup> 何谷理(Robert E. Hegel):《茹志鹃〈百合花〉中的政治融合》(“Political Integration in Ru Zhijuan’s ‘lilies’”),载胡志德(Theodore Hutters)编:《解读现代中国短篇小说》(*Reading the 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y*),M. E. Sharpe 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99 页。

视下。叙述者钟爱地看着他，注意到他“块头不大”但“高挑挑的个子”、“厚实实的肩膀”，以及“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sup>①</sup>新媳妇嘲笑他的羞涩忸怩，导致他挂破了衣服。她们喜欢捉弄他，但同时也很想保护他，无论在他生前还是死后。他在性上对她们毫无威胁，反而是她们明显地令他张皇不安。在这方面，他再次表现得像传统故事中扭扭捏捏的年轻女子一样，红着脸，不敢看异性的眼睛。

叙述者本应以客观的态度讲述故事，而这一事实使得她对这位战士的客体化显得更为强烈。尽管体格上不如他强壮，但她从一开始就对战士发号施令。这种主宰性的角色使她比战士在传统意义上更“阳刚”。不光叙述者是个女性，作者茹志鹃也是个女性。故事中的两个女人和作者都拥有此前由男性世代拥有的优势：有权利塑造典型、讲述故事。不幸的是，她们所塑造的理想男性，就像旧时的理想女性，也以死告终。虽然造成他死亡的原因表面上源于政治而非性别因素，但其展现的具体结果确实将它带入了女性的世界。

女性对主体性心声的欣赏使性与性别的进一步逆转成为可能。对应于女性消失的程式，现在消失的变成了男性。死去的他将活在女性的心中；这与传统故事中的状况截然相反。虽然是个战士（还只是个部队上的小通讯员），但他既没有文化修养也没有武术训练，因此，在传统意义上，他非“文”亦非“武”。但显然他注定要成为一个英雄，而他也确实在男子汉的万神殿里保有一席之地。至少在女性创作中，男性特质和性别角色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了巨变。对工农兵模范的推广给传统认识下的阶级、性别政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文武”的男性特质不得不进行重组。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看到了“文”、“武”之变迁是如何不断发展进入 21 世纪的。在 20 世纪，女性开始在公共领域参与对男性特质

---

<sup>①</sup> 茹志鹃：《百合花》英文版，第 8 页。

的概念进行定义，人们对男性特质的认知随之发生了最重大的变化。

在茹志鹃等女作家的笔下，青年男子被细腻地刻画成可爱的人，能令女性产生欣赏、爱慕之情，并积极充当观察者、保护者和创造者的角色；而这些角色在传统上都是由男性担当的。在《百合花》中，两个女人都对这名年轻的战士怀有母亲与姐妹般的关心，以及近乎爱情的温柔感觉。那还是共产中国的早期，个人的爱情受到压抑，出版物中更不会出现性感受的直接表露。这种清教徒式的环境“文武”理想应该是较为合拍的。但是，在女性眼中，对“文武”理想的传统理解几乎已变得毫无意义。阶级和性别之间的权力差异注定已有所改变。其结果是，作为这些权力关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文”和“武”也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

以后见之明来看，我们更容易发现，许多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无论是与社会主义还是与现实都没有多少相似性。尽管如此，那时创造的男性理想建构依然令人钦佩。它们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1980年代。“文革”期间，女性和农民被特别强调成凭自身能力掌握了“文武”技能的人。这些都是浪漫的理想。在“文革”的幻灭经历后，这些理想被讥为幻想。正如我们已看到的，紧随幻灭而至的反冲对男性特质的构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女性来说，理想的男性也成了最受欢迎的一个调查热点。下面，我将以茹志鹃的女儿王安忆为中心，探讨她提出的一些典型。

## 王安忆和作家

“五四”时期，西方帝国主义使中国男性的自尊支离破碎。同样，1980年代中国社会剧变，男性彻底陷入了对自己的怀疑当中；用钟雪萍的话来讲，他们感到自己的男性特质受到了重重“围攻”。<sup>①</sup>就连过去那

<sup>①</sup> 钟雪萍(Xueping Zhong):《被围困的男性特质：二十世纪后期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性与男性主体性问题》(*Masculinity Besieged? Issues of Modern and Male Subjectivity in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杜克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些曾以蛮力取胜的男人也处于“困境”之中。<sup>①</sup> 何依霖(Margaret Hillenbrand)认为,只有像张贤亮那样对权力关系进行策略性的经营,男人才继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尽管男性抱怨被围困的处境,他们的反应却咄咄逼人,以使自己在身心两方面都意志坚强、不可抗拒。

这对女性而言是个挑战。诚然,这是一个革命英雄不再保有任何魅力的时代。男性不必再和敌人战斗,而女性渴望的是能提供现世安稳、拥有职业前景的男性,而不是被炮弹炸飞了的、一见异性就脸红的战士。《百合花》中的英雄或许会让恋童癖、恋尸癖们心泛涟漪,但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个愤世嫉俗的时代,这位英雄的忸怩举止只会招致众人的嘲笑。与之相反,1980 年代文学和电影中由男性创作的“野性男人”则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些男人没有革命热情或爱国热情。他们用自己的力量和赚钱能力来展示男子气概。他们乐于当个坏男人或是危险的男人,而女性的创作可以说为驾驭这些男人创造的野兽提供了方式。

早在 1980 年,老一辈(以茹志鹃《儿女情》中的母亲为代表)中国女性就已对年轻一代以自我为中心、缺乏理想的现实深为叹惋。<sup>②</sup> 1980 年代初,人们还能就阶级、革命立场与物质、企业状况孰优孰劣展开辩论。到了 1980 年代末和 1990 年代,以职业来衡量一个男人的价值已无需任何商榷。当然,理想男人还有许多别的衡量标准。譬如说,张抗抗在《北极光》中就给出了早期单纯选择的例子:年轻的女主人公试着在形形色色从事脑力和体力劳动(文武)的男人中进行挑选。<sup>③</sup> 到 1980 年代中期,“当代中国没有男子汉”已成了女作家的共同慨叹。<sup>④</sup> 王安忆正是在这种

① 何依霖(Margaret Hillenbrand):《困境中的丈夫:近期中国小说中对武的衰落的表现》(“Beleaguered Husbands: Representations of Marital Breakdowns in Some Recent Chinese Fiction”),载《淡江评论》,第 30 卷第 2 期(1999 年),第 112—150 页。

② 茹志鹃(Ru Zhijuan):《儿女情》(Sons and Successors),克伦普纳(Ellen Klempler)译,李怡(Lee Yee)编:《中国新写实主义文学作品选》(The New Realism: Writings from China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喜坡克雷书店 1983 年,第 17—30 页。

③ 张抗抗:《北极光》,载《收获》,第 3 期(1980 年),第 4—61 页。

④ 池莉:《不谈爱情》,熊猫丛书 1994 年版,第 159 页。

“女性写作”的氛围下进行创作的。

关于“女人想要的到底是什么”，王安忆最出名的作品是1980年代中期出版的爱与婚外性三部曲：《荒山之恋》（1986）、《小城之恋》（1986）和《锦绣谷之恋》（1987）。<sup>①</sup>在这一章，我将集中探讨最后一部小说，因为《锦绣谷之恋》似乎在男主人公身上完美地封装了“文”的理想。尽管小说写的是女主人公一个特定的生活阶段，但像前两个故事一样，就从她的视角看待男性角色而言，这个故事写得很到位。其中一个男性人物是她的丈夫，他是个态度温和、肯承担家务并容忍她发脾气的知识分子。另一个是她的一次笔会上遇到的理想情人，他是个聪明、有声望、很能感受到她的需求的作家。我们已知道王安忆的母亲茹志鹃在《百合花》中对战士——一个1950年代“武”的男人是如何处理的。我将表明，随着时代转变，她的女儿现在更关注的是“文”的男人。不过，她对男性特质的评估也偏离了传统故事中的判断。

《锦绣谷之恋》的女主人公是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她的婚姻已变得平淡乏味。在庐山举行的一次作家笔会上，她遇见了一位著名小说家。她发现自己陶醉在久违的激情之中。回家后，重归日复一日的相同环境，她在焦灼中等待着那位作家的来信。因为没有收到他的信，她的不安与日俱增，但最终，她终于意识到，与其说她是爱着生活中真实的这个他，倒不如说是爱着他们风流情事中所创造出来的那个“他”。对西方读者来说，这个故事几乎和女主人公的生活一样枯燥。对中国台湾读者来讲，“这个爱情题材一点也不特别”。<sup>②</sup>然而，“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是如此的道德严谨，以至于有评论家认为王安忆是“‘五四’以来的中国大陆的现、当代女作家中，最大胆的一个”。<sup>③</sup>与此同时，这位评论家还指责王安忆把“有些过于丑恶、不能给人带来愉悦的东西”引入了“文学的大雅之堂”。

① 这三个作品在王安忆的《荒山之恋》，南粤出版社（香港）1988年版中都有收录。

② 陈信元：《性与寻根》，载柏杨编：《小城之恋》，林白出版社（台北）1988年版，第10页。

③ 钱虹：《优美失落之后》，《光明日报》1987年8月21日。

我们把分析的重点放在故事中的男性人物身上,也就是她的丈夫和情人。在某些方面,这个三角恋爱和莎菲在苇弟、凌吉士之间周旋类似。不过,这个故事中女主角的丈夫不是一个被宠坏的小子。相反,他承担了不少家务,并且毫无怨言地忍让她的坏脾气。比起苇弟咄咄逼人的热情,“他在沉默中忍受着一切”。<sup>①</sup>不幸的是,对他来说,这么做并不正确。“她看出了他的默默的忍耐与小心翼翼,她为他难过,更为自己难过”。<sup>②</sup>这个故事里的丈夫并不像苇弟那样无能,只是有些无趣。但他的妻子对他的反应却和莎菲的情感剧变遥相呼应。

故事开始时,女主人公在床上醒来,用眼角觑着旁边的丈夫:

丈夫躺在床上,朝天躺成一个“大”字,占据了方才退让出来的一半。大约是风在吹动着竹帘,晃动了早晨的阳光,他身上忽暗忽明,她心里也是忽明忽暗,似乎一颗心拴上了秋千,时高时低,微微地恶心。而他终是不动。

然后,他好像在睡梦中听见了什么的召唤,陡地一动,四肢划水似的向下一划,翻了个身,盘腿坐起了。先是呆呆的,凭空地睁着眼睛,像在坐禅。然后茫茫地伸出手去,摸向床头柜上,第一下就摸着了一个耳扒子,便扒耳朵。随着耳扒伸入耳朵,他的眼睛眯了起来,有了些微表情,这才有了活气。<sup>③</sup>

故事结束时,她在短暂的风流韵事后又回到了他的身边,同样的场景重复出现。他在给自己扒耳朵中自得其乐,懒得和她有任何接触。即使当他们都穿好衣服,“收拾得十分焕发”,也会因“彼此深知了底细似的,再难互相仰慕”。<sup>④</sup>对女人来说,她生活中每日面对的男人不过如此:平凡寡淡。即使他把欧洲骑士耀眼的盔甲或解放军战士的军装穿在身

①② 王安忆:《锦绣谷之恋》英文版,第17页。

③ 同上书,第2页。

④ 同上书,第3页。

上，她对他除了厌烦就没了其他感觉。

在这单调乏味的状态下，她去参加了庐山的笔会。庐山是一个美丽的度假胜地，充满魅力和明信片般的风景。她是个编辑，工作是整理作家的创造性作品。她人生中将第一次亲眼见到一些闻名遐迩的与会作家。这是一个能激起她浪漫情怀的完美设定。而且，她也的确遇上了一位著名作家，并神魂颠倒地爱上了他。这和莎菲所表达的对凌吉士的痴迷不太一样。时代变了。这位年轻女子并没有患上“五四”时期的“春风沉醉”<sup>①</sup>症；那时局促、潮湿的城市生活中滋生的结核病菌引发了那种症候。勾她魂魄的不是年轻的“外国”学生，而是年长的已婚男子。尽管如此，在遇见他的第一晚，她睡在床上“开始回想这内容极其丰富的一天，同时就好像学生检查自己的操行似的开始检点这一日里自己的行为举止”。<sup>②</sup>事实上，整个会议期间，她一直觉得自己“像个中学生那么害羞而天真”。<sup>③</sup>相比之下，除了著名作家的身份和烟不离手的特点，故事对这个他并没有什么描绘。不过，他是个体贴周到的同伴。比如说，去仙人洞时，他把她的背包夺去了背在他的肩头，让她靠着崖壁那一边走，以免被悬崖峭壁吓到。<sup>④</sup>

在本章探讨的所有男性人物中，他最像传统爱情故事中“才子佳人”模式里的才子。他温柔、博学、成功、迷人。他有着一个“文”的人所有的配件。在故事里，他是一位作家，还相当成功。她因为他的名望而崇拜他，并因为他的言辞技巧而对他心生爱慕，而不是因为他对诸般情况都能掌控自如，比如说，在崖壁上行走时应走在正确的一边。他身上的一切似乎都符合传统甚至“五四”时代的模式。然而，这里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别。她的职业是一名编辑，她的工作是向像他这样的人约稿，然后

① 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熊猫丛书 1984 年版，第 7—17 页。

② 王安忆：《锦绣谷之恋》英文版，第 33 页。

③ 同上书，第 64 页。

④ 同上书，第 45 页。



进行编辑。她可以改写他的稿件，只要她想，甚至可以把他完全删去。简言之，现在，她已变成了他男子气概的最后仲裁者。而且，她还可以把他塑造成任何她想要的样子。

正如王安忆自己在另一篇小说中指出的，“女人爱男人，并不是为了那男人本身的价值，而往往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爱情的理想”。<sup>①</sup>彭滨也指出，这段婚外情的要点在于这个年轻女子能够因此把情人——一个可供她随时回想、把玩的形象带回乏味的婚姻生活。<sup>②</sup>有趣的是，在提到她怎么会写这个故事时，王安忆似乎假定：“男女之间一旦成为夫妻，爱情的神话般的宫殿就倒塌了，变成一堆废墟……那种庄严神秘感荡然无存……于是，很容易产生内心的骚动，萌发新的追求，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sup>③</sup>相比之下，这篇小说和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其他小说都假定爱上一个脑海中的理想要好得多，你可以珍藏这个理想，不必在现实世界中和他有任何接触。若一经了解，男人就变得乏味无比了。因此，让女人回家、让男人消失，经过这两者共同的作用，女作家和叙述者就有了随心所欲地调整、塑造这一理想的机会。

因此，就像和莎菲接吻之前的凌吉士，幻想中的男人是最理想的男人。这些理想形象生活在女性的头脑当中，有点像传统鬼怪故事中的狐仙鬼妻。在对男女关系的早期刻画中，有两类典型女性：圣女或妖精。有时候，一个女人（或精灵）最初可能对这个男人怀有邪恶的目的，但最终却为他所“拯救”并为他献身。大多数文学批评都专注于这种类型，她们的作用似乎在于为凡间女子树立一个典范。这些超自然的存在，毫无疑问是想象出来的、使男人受益匪浅的虚构物。尽管戏曲和其他表演艺术形式的大众化的艺术再现可能对这些故事作出细微的修饰，使它们更

① 王安忆：《荒山之恋》，第94页。吴亮在他对《锦绣谷之恋》的评论中也讲了自己的看法，参见吴亮：《爱的结局与出路》，载《上海文学》，第4期（1987年），第89页。

② 彭滨：《论王安忆艺术的风格的演变》，载《社会科学家》，第6期（1989年），第74—78页。

③ 引自郭立：《王安忆话“三恋”》，载《作品与争鸣》，第3期（1988年），第76页。

积极地展现女性,但“男性=消费者、女性=被消费者”的模式一直没有改变。

这些传统玄幻、鬼怪故事在性别方面最有趣的一点,是那些迷人的狐狸精和鬼怪几乎总是女性。在有关婚恋题材数以百计的鬼故事中,只有极少数是关于鬼丈夫的。这一事实极为显著地证明了作家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一成不变的观点的接受。他们都不喜欢把男性(极有可能是作者的性别)塑造成为女性牺牲自己的天使或恶魔。漂亮的女人(无论品德如何)是供他们观赏和消费的。当然,女性也同样会内在化这些形象,但只是当作课程来学习,以使自己更迷人、更适于消费。

以上三个故事表明,只有当女性取而代之开始扮演神话故事缔造者的角色时,我们才会有鬼情人、鬼丈夫。虽然这些故事里的外国学生、战士和作家并不是狐仙鬼怪,但这些女作家的意图却非常清晰。这些男人是为了在头脑中痴狂、珍藏而人为设计的对象。他们都是抓来的浮光掠影,也许挺有吸引力,但都不是在消失之前可能已自然地变得幼稚、无趣或陈腐的男子汉。真实的东西就是不如幻想或理想的好。真实的男人要吃要喝,不一定总是快乐。他们放屁、打嗝、挖耳屎,有时还拒绝消失。就是其中最受欺负的男人,也会试图维护某种程度的自我定义。真实的男人还参与权力游戏。事实上,对中国男人来说,取得“文武”,就等于是取得了支配身心的力量。

这也就难怪依赖于自我控制、控制他人的“文”、“武”在这些由女性创造的理想形象中变得面目全非了。在这些作品中,男人可能仍能展现“文”、“武”的痕迹,但随着控制要素的减弱或缺失,他们已无法援用孔子或关羽等传统偶像所固有的权力和男子气概。丁玲笔下的新加坡学生是个会说英文(照字面解释,就是英雄的“文”)的冒牌外国人。因此,他可能不受普通中国男人所受的约束,甚至可能具有性诱惑力。但“文武”在当时还是中国男子专有的素质。他非文非武,部分原因就是半个外国人的身份。这也就是为什么吻他时,他的味道会令人生厌。同样,茹

志鹃笔下的战士可能是可爱的,身上也没有过去那些“武”的英雄所具有的厌女症,但那是因为他已经被女性化了。看他背的武器(照字面解释,就是“武”的器械)就知道了——步枪筒里插着几支野菊花和树枝作装饰点缀。比起“武”的英雄,他更像个男孩,死时枪都还没开过火。王安忆笔下的男作家,在职业上就是个文人,他的举止风度无一不让人想起昔日“文”的读书人。然而,正如我们在上面看到的,读书人可能没有多少改变,但女人却发生了变化。现在的她们已经可以参与霸权游戏。在这个故事里,身为编辑,女主人公的任务就是对这些男人的文章(照字面解释,就是“文”的作品)进行控制。男主人公“有意被模糊了”,变得无足轻重。而女作家则“想象、制造并促成了这桩风流韵事以便再造她的自我”。<sup>①</sup>

女作家对自我的肯定是在关于权力和主导地位的较量中建立起来的。到1990年代后期,女性对父权制的挑战已到达了一个新顶点。女作家在作品中展现出了对性政治中的奴役和压迫观念敏锐的感知。在这种背景下,争议作家陈染(1962年生)的作品有着启迪的作用。她写了大量关于年轻女性和她们追寻自我认同的故事。尽管女性人物可能会迷惑、会上当,但她们不断成长,并坚持了自我认同。陈染笔下的男性角色都是父亲、医生和教师这样的权威形象。<sup>②</sup>在她的作品中,这些男人可能在性上占年轻女性的便宜,但不同于以往文学中这类权力滥用会把女人弄成除了做鬼就无处寻求正义的牺牲品,陈染笔下的女性人物会渐渐成长并界定自己。与此相反,由于滥用手中的权力,这些男人放弃了所

① 陈海伦(译音)(Helen H. Chen):《性别、主体、性:界定王安忆四篇性逾越小说中的颠覆话语》(“Gender, Subjectivity, Sexuality: Defining a Subversive Discourse in Wang Anyi’s Four Tales of Sexual Transgression”),载张英进(Yingjin Zhang)编:《多元世界中的中国:中国比较文学论集》(*China in a Polycentric World: Essays in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页。

② 陈染小说中的大部分男性角色跟美国女权主义者德沃金(Andrea Dworkin)谴责的男人差不多糟糕,德沃金:《女人恨》(*Woman Hating*),杜冬出版公司1974年版。

有成为君子或男人的领导者的权利。他们因此被剥夺了终极权力。在陈染的故事中，这样的男人与其说是恶棍，倒不如说是些可怜的、帮助女主人公成长的人物形象。<sup>①</sup>

虽然中国传统文学中没有足够多的女性创作可以使我们轻松点评女性是如何看待和建构文武的，但现当代的女性创作却足以令我们对她们的观点作出一些评论。一般而言，传统意义上的“文武”在她们对模范男性的构建中并非最主要的标准。“文”的男人、“武”的男人和“外国”男人在她们的刻画中都受到了蔑视和怀疑。即使男人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拥有更多的权威，在把他们创造出来的女作家的智力游戏中，他们也只能是被操纵的对象。正像这本书所表明的，如果“文武”的首要推动力是控制——包括自我控制和控制他人，那么这就不足为奇。这些故事可能以爱情、婚姻为主题，但基本的问题仍是性政治。女性和其他人一样都希望拥有权力。急于发现她们除了是某人的女儿、母亲、情人、妻子或朋友之外的“真实”身份的危险在于，像她们所排斥的男人一样，她们也有可能变得异化和自我物化。<sup>②</sup> 虽然“五伦”这样的传统维系纽带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但人类却离不开维系纽带。

遗憾的是，由于在创造新的维系纽带时仓促上阵，一些女性简单地走上了一条完全逆反的轻松道路。在概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女作家的作品时，李晓江发现“没有一个故事沿袭了传统的浪漫故事。女人担任着主要角色，男人则居次要地位”。<sup>③</sup> 在主客体关系方面，女人发挥积极作用，对不幸的男性人物行使权力和支配权。然而，就像《莎菲女士的日

① 特别参见陈染：《私人生活》，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② 这对那些出生于1970年代的更年轻的作家们也同样存在。我在这一章中没有提及这一代作家。她们之中的卫慧最近创作了一部富有争议的、自我暴露风格的小说。参见卫慧：《上海宝贝》，徐穆实(Bruce Humes)译，康斯特布尔出版社2001年英文版。

③ 李小江(Xiaojiang Li)：《抵制并保持传统：新时期中国女作家作品中的权利主张》(“Resisting While Holding the Tradition: Claims for Rights Raised in Literature by Chinese Women Writers in the New Period”)，载《淡江评论》，第30卷第2期(2000年)，第108页。

记》表明的,即使从女人的角度来看,自我发现和“胜利”也并不必然带来幸福。还要记住的是,虽然女作家、女读者可能呈上升趋势,但她们对社会的整体影响仍然比较小。例如,1998年对北京500个家庭和500位书店读者的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提名的前十位现代中国作家中,没有一个是女性。<sup>①</sup>诚然,女性消费者现在拥有巨大的购买力,但她们中的大部分最喜欢阅读的是那些以“黄爱东西”为笔名的女作家创作的“通俗文学”。这些作品涉及的是平凡琐事,并不自诩有改变世界的想法。<sup>②</sup>

在我们分析过的上面几个故事中,女性操纵着她们笔下的男性角色以控制他们。但是,在这种冲突中,她们所能期待的最好结果大概也就是把没男人也行、也能让身体或思想逃离变为现实。又或者,在茹志鹃的作品中,让那个男人死去。无论哪种方式,解决之道都是将欲望的对象摆脱掉。她们对被(男人)珍视的“文武”组合的抛弃,不禁让人联想起拉康(Lacan)对作为能指的阳具的分析。根据这个分析,为了进入强大的男权世界,男人拿自己的器官“阴茎”和象征男权的能指“阳具”进行交换,即“丧失使用自己的性的机会”。<sup>③</sup>因此,他们经历了一种自身的“缺失”。而女人反正从未有过“阴茎”,也就不必经历这种“阉割”。然而,这种缺乏使得她们更适合于一个无性别的象征体系。

同样,由于在旧的象征性的权力架构中被剥夺了“文武”特征,中国女性即使随意取舍传统“文武”属性的残余也完全无损她们的女性特质。她们什么也不会失去,只会得到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一章揭示了她们走向这个新世界的最初几步。正如我在这本书中表明的,用巴特勒(Judith

① 尼尔森(Inge Nielsen):《现代中国文学已售罄》(“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ells Out”),载同上书,第100页。

② 雷金庆(Kam Louie)和张钊贻(Chiu-yee Cheung):《三分天下:今日中国之文化景象》(“Three Kingdoms: The Chinese Cultural Scene Today”),载郑宇硕(Joseph Y. S. Cheng)编:《中国评论1998》(China Review 1998),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0页。

③ 塞佛曼(Kaja Silverman):《符号学主体》(The Subject of Semiotics),牛津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5页。

Butler)的话来说,几个世纪以来,女性已证明她们能够“胜任”<sup>①</sup>“文武”之事。然而,要使“文武”之事背后的女性行为获得认可,她们需要做的不止是“行动性地”取得“文武”成果。她们还需要参加产生“性别一致性的监管实践”。在这一章中,我已经展示了这一过程所产生的一些影响。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我将沿着“文武”在海外发展的轨迹而行。同样,在过去,这也不是“文武”应该被发现的地方。

---

<sup>①</sup> 巴特勒(Judith Butler):《性别烦恼:女性主义与身份颠覆》(*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路特里奇 1990 年版,第 25 页。

## 第七章 老舍的《二马》与外国妻子：为现代世界构建“文”的男性特质



著名画家丰子恺 1939 年作品，艺术地再现了迂腐的过时文人孔乙己在酒馆外行乞的场景。取自《丰子恺绘画鲁迅小说》，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75 页。

到目前为止，我已在本书中集中探讨了一些当代的典型形象和他们在古代的原型，以对建构“文武”的不同方式进行分析。我还指出了现代中国女性是如何自觉或不自觉地试图把“文武”为男性专属的性别准则非自然化。在下面的两章中，我将把“文武”放在国际大背景中进行讨论，本章侧重于“文”，而下一章侧重于“武”。在中华帝国千百年的历史中，体现中国人特征的形象都没有真正受到外来形象的挑战，包括性别特征在内。但到了 20 世纪，中国人不得不对自己的特征进行改变以适应全球化进程的影响。第三章曾提及 20 世纪最后 20 年中人们一系列的再创造与重新具象化使“文”的标志孔子发生了一些改变。在这一章中，我将比较 20 世纪第一个和最后一个 20 年中“文”的特征，继续对这一重新诠释的过程进行研究。

20 世纪初是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受到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而严重动摇的混乱时代。虽然已有大量研究对这种影响进行了考量，但其对中国男性特质建构的作用却几乎还没有什么书面的探讨。<sup>①</sup> 东西方之间的联系是否大大改变了男性理想？如果是的话，男性新形象又是如何整合传统和西方的性别配置的？在这一章里，我将分析西方环境是如何改变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些模型的重建以期创造一个“文”的新男性原型的。老舍(1899—1966)的小说《二马》是展现东西方对接的最佳写照之一。<sup>②</sup> 1920 年代是徐志摩等西化的知识分子完全沉醉于欧洲文明的时候，以至于徐志摩极富影响力的朋友胡适一度呼吁要“全盘西化”中

① 自从萨伊德在 1978 年发表了他著名的《东方主义》一书，出现了一系列关于殖民地当地男性“女性化”的优秀研究。例见辛哈(Mrinalini Sinha)：《殖民主义与男性特质：十九世纪晚期男子气的英国人与像女人的孟加拉人》(*Colonial Masculinity: The “Manly Englishman” and the “Effeminate Bengali”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不过，关于中国的情况则是一片空白。

② 老舍：《二马》，载舒济、舒乙编：《老舍小说全集》卷二，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50 页。如无特别说明，我在本章将使用黄庚(Kenny K. Huang)和冯达微(David Finkelstein)的英译本，老舍：《二马》，黄庚、冯达微译，三联书店(香港)1984 年版。



国文化。<sup>①</sup> 尽管这时的男性理想非常多样,但《二马》展现的形象却在许多方面都堪称是民国时期的典型。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社会都动荡不已,这意味着《二马》中的形象所具有的先见性特征到现在才显著起来。

## 小说的历史背景

老舍的这部小说写于 1924—1929 年间。当时,他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中文讲师。<sup>②</sup> 在 26 岁离开中国时,老舍已当了数年老师,并成为基督教的信奉者。作为一个作家,老舍以对家乡北京市民忠实而生动的描写而闻名于世。他较知名的作品几乎都以这个城市为背景,讲述北京市井细民的生活。《二马》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这个故事的發生地在伦敦,而人物有着多种族的特征。<sup>③</sup> 一些评论家认为,由于他相对成熟,老舍在《二马》中抒发的观点与同时代大多数作品相比,感情和政治色彩没有那么浓厚。<sup>④</sup> 事实上,在中国社会混乱、爱国热潮高涨的时期,老舍个人就曾获传教士助益,在伦敦过着相对舒适的生活。因此,我们可以把《二马》理解成老舍尝试奠定自己民族主义者地位而写下的严厉控诉英国种族主义的作品。

考虑到 20 世纪最初几十年间旅居伦敦的中国人也像他们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同胞一样,由于吸食鸦片、嗜好赌博而“臭名昭著”,这个工作并

---

① 胡适是在 1929 年发出这一号召的。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及其由此引发的论战,参见他 1937 年的一篇文章,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胡适文存》第 4 卷第 2 部,远东图书(台北) 1971 年版,第 541—544 页。

② 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最早创立于 1916 年,1938 年改名为亚非学院。

③ 事实上,在他从欧洲和新加坡归国后,直至新中国成立老舍才回到北京。他在这段时间创作的许多短篇小说都不以北京为背景。对此的探讨参见王德威(David Wang):《老舍战争年代的小说》(“Lao She's Wartime Fiction”),载《现代中国文学》(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第 5 卷第 2 期(1989 年),第 197—218 页。

④ 宋永毅:《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学林出版社 1988 年版。

不困难。<sup>①</sup> 此外，“在有关生活在英国的中国人的报告中，最常带来不安的几乎必然是他们与白人妇女和女孩的性关系”。<sup>②</sup> 尽管市议会和乔治·韦德(George Wade)等个人进行的调查发现对被中国人性骚扰的恐惧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但托马斯·伯克等作家笔下的流行小说却不断在这个主题上盘旋，刺激英国人的想象。在《中国佬与孩子》中，伯克描写了一个中国男人对一个 12 岁的白人女孩的迷恋及其悲剧结局。<sup>③</sup> 这个故事大受欢迎。到 1936 年，以此为蓝本，已有三部电影问世。<sup>④</sup> 虽然伯克对他笔下的中国人不乏恻隐之心，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中国城的故事”中对犯罪和麻木不仁的邪恶大肆渲染。在英国人的想象中，伦敦莱姆豪斯区就是萨克斯·洛莫尔的傅满洲系列故事中典型的“毒品遍地的环境”。<sup>⑤</sup> 从那时起，“黄祸化身”傅满洲<sup>⑥</sup>成了高深莫测、奸诈邪恶的中国男人的普遍象征。<sup>⑦</sup> 这些故事造成了“不论什么年龄的英国人都知道在遇上中国人时应该有什么样的预料以及如何反应”<sup>⑧</sup>。

① 克尔南(V. G. Kiernan):《人类的主人:帝国时期的黑人、黄种人和白人》(*The Lords of Human Kind: Black Man, Yellow Man, and White Man in an Age of Empire*),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64 页。

② 梅:(J. P. May)《中国人在英国,1860—1914》(“The Chinese in Britain, 1860 — 1914”),载霍尔姆斯(Colin Holmes)编:《英国社会的外来移民与少数族裔》(*Immigrants and Minorities in British Society*),艾伦·昂文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13 页。

③ 伯克(Thomas Burke):《中国佬与孩子》(“The Chink and the Child”),载《莱姆豪斯之夜》(*Limehouse Nights: Tales of Chinatown*),格兰特·理查兹出版社 1916 年版。这本书非常流行,从 1916 年首版到 1920 年已再版了 7 次。

④ 比克斯(Robert Bickers):《英国人在中国:社区、文化和殖民主义 1900—1949》(*Britain in China: Community, Culture and Colonialism 1900—1949*),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4 页。在下一章我将回到电影版。

⑤ 同上书。在第 4 章,比克斯对那些影响了英国人对中国人观念的重要作品作了精到的概括和分析,第 22—66 页。

⑥ 同上书,第 43 页。

⑦ 关于萨克斯·洛莫尔(Sax Rohmer)笔下的傅满洲有着海量的文献。除了受这一形象启发而创作出来的电影和故事,还有几千家餐馆、玩具和游戏切切实实地以此来命名。有大量的网站也以这个偶像为主题。“傅满洲网页”(http://www.njin.net/~knapp/NewsOfFu.htm)是其中最好的之一。

⑧ 比克斯:《英国人在中国:社区、文化和殖民主义 1900—1949》,第 23 页。

因此,老舍的这部小说诞生于紧张的政治、种族气氛与东西方的相互对立中。它很容易被解读为由可怜的外籍工作人士写下的一份民族主义的抗议声明,和郁达夫在1921年发出的让中国在“沉沦”中“快富起来!强起来”的哀怨呼喊类似。<sup>①</sup>然而,这部小说主题的重点放在不同种族之间的爱欲和新旧学识之间的差异上,这使它成为研究在西方情境中构建中国男性特质的绝佳文本。本章将审视《二马》中三个男主角的构成,以梳理他们男性特质建构的观念基础。他们的男性特质与英国人的偏见短兵相接,一如历史。

这部小说是对上个世纪之交中国人所遭受的不公正颇为有趣的记载。例如,在小说中,只有两种外国人被描绘成对中国有所了解:传教士和商人。然而,对于前者来说,即使他们在中国已旅居多年,中国人充其量也不过是灵魂需要救赎的异教徒而已;而后者则因为中国人在管理金钱上庸碌无能而看不起他们。这些看法似乎确认了权威的八卷本《中国文学大辞典》中的观点;编撰者认为这部小说的特色就是叙述了海外华人遭受的偏见。<sup>②</sup>他们还解释了一些历史学家在研究中使用《二马》的原因,认为这与其中蕴含的有关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爱恨交织的深刻见解有关。<sup>③</sup>从种族和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说,这部小说完全可以被解读为一个传递着“爱国想法”的、“多少有些悲剧色彩”的作品。<sup>④</sup>

这一章中我还提出,在上个世纪初,威胁中国受教育阶级男性身份的不止是西方价值观的猛烈抨击,还有出现在中国的更敢于直言的女性

① 郁达夫:《沉沦》,载《郁达夫文集卷一》,三联书店(香港)1982年版,第16—53页。小说主人公是一个留日学生,因不堪忍受异族的欺凌、爱情的渴望又得不到满足而投海自尽。作品最后通过主人公之口喊出:“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

② 马良春、李福田:《中国文学大辞典第八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③ 例见费约翰(John Fitzgerald):《觉醒的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页。

④ 夏志清(Hsia C. T.):《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耶鲁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71—172页。

和劳动阶级的男性。彼时,男性身份正处在来自文化和性别挑战的巨大压力下,而杂糅的观念还未经阐释而稳固下来。<sup>①</sup> 正如下面我们将会看到的,中国男人的情绪因此在抑郁和兴奋之间摇摆不定,两种状态都以对过去文明的缅怀为基础,那时的中国是强大的,而“文武”特质专属于中国、专属于男性。这些情绪变化在此后的 70 多年间绵延反复,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是《二马》在 1999 年庆祝老舍百年诞辰时被制成了一部 20 集的电视连续剧。<sup>②</sup> “五四”时期和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之间许多明显的相似之处激起了中国官方对这本小说的关注。不过,在对于 20 世纪末的重要性和意义上,《二马》有着自己的局限性。和鲁迅、郁达夫等“五四”作家在著作中表现出的对作为中国人感到低人一等相反,1990 年代在海外的中国男人经常觉得他们的居住国是“没有文化的文化”。<sup>③</sup> 事实上,20 世纪最后 20 年间中国经济、政治力量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给海外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带来了直接的反响。<sup>④</sup> 本章的第二部分就将审视这些反响对“文武”的影响。

## 阶级:沉沦文人的世界

1905 年科举考试的取消导致以传统方式教育出来的文人地位极速下降。旧文人式微在文学中最好的反映是孔乙己这个人物形象,他对旧

① 关于海外族群的混杂身份有大量的文献。对一些简短的介绍性论文,可参见巴巴(Homi K. Bhabha):《中间文化》(“Culture's In-Between”),载豪尔(Stuart Hall)和杜盖伊(Paul du Gay)编:《文化认同问题研究》(*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赛奇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3—60 页;以及豪尔(Stuart Hall):《文化认同与海外族群》(“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载威廉姆斯(Patrick Williams)和克里斯曼(Laura Chrisman)编:《殖民话语与后殖民理论》(*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哈维斯特·惠特谢夫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92—403 页。

② 李明光(译音):《陈道明说〈二马〉》,《北京晨报》,1999 年 2 月 7 日。

③ 欧阳昱(Ouyang Yu):《墨尔本上空的月亮和其他诗》(*Moon Over Melbourne: Poems*),纸莎草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6 页。

④ 相关讨论参见霍奇、雷金庆:《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政治》,第 143—172 页。

式经典的如数家珍只能让他沦为小镇上的笑柄。<sup>①</sup> 鲁迅很有可能是刻意在用这样一个漫画人物质疑旧式文人。这意味着威胁他们的不仅是从前为他们提供支撑的社会、经济基础的消失,还有他们的后继者的围攻。孔乙己的典型形象之所以戳到了当时年轻作家和读者的痛处,是因为他们中包括郁达夫、巴金和老舍在内的许多人都在这时家道中落。<sup>②</sup> 对沦落成孔乙己的恐惧强有力地激励着知识分子们在新时代里重塑自己。

这重塑中的一部分就是要掌握外国的语言、知识。在教育系统中启用白话语言、现代内容,数以千计的中国人留学海外,这些都促进了新文人的涌现。他们以“新青年”为楷模,认为西优东劣的差距在于西方重幼而东方敬老。他们的使命就是要去老朽迎少年。<sup>③</sup> “文”的象征孔子遭到了猛烈的抨击,传统的士绅阶层似乎真的到了“关张大吉”的时候。<sup>④</sup> 共产党的学者们在稍后宣称,鲁迅等启蒙作家英明地预见了人力车夫所代表的劳动阶级的必然胜利。<sup>⑤</sup> 在老的士绅阶层注定走向灭亡时,左翼知识分子很可能对城市工人确实由衷崇敬,但显而易见,人力车夫永远无法像《儒林外史》中的王冕之于古代文人那样成为新文人的楷模。

“文武”一度破败不堪,但年轻的学者们把那些零零碎碎又缝在了一起,使它在这个现代世界中仍有适用之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利用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关于年轻和强壮取代老年和虚弱在人类进步中不可避免的观点,把旧式文人表现为陷中国人的普遍福祉于危险之中的势力。《二马》对这一点反复强调。比如,马则仁是小说中最令人鄙视的人物。虽然还不到50岁,可他总觉得自己已经老到没法从事任何形式的

① 鲁迅:《孔乙己》,载《鲁迅小说选》,外文出版社1960年版,第19—24页。

② 关于这些作家的生活,参见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和雷金庆(Kam Louie):《20世纪中国文学》(*The Literature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赫斯特出版公司1997年版。

③ 周策纵(Chow Tse-tsung):《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45—47页。

④ 雷金庆:《当代中国儒学批判》,第1—16页。

⑤ 鲁迅:《风波》,载《鲁迅小说选》,外文出版社1960年版,第42—44页。

生产和体力活动了。因此，他总是用最有礼但又令人难以置信的借口来逃避帮助他人，包括对他有些恩惠、想学习中文翻译一些资料的伊牧师。马则仁懒得惊人，一门心思只想讨巧。他已故的哥哥在伦敦给他留下一个古玩店，他也因为太骄傲而不肯好好经营。有时他也去店里帮忙，但其实是为了偷拿一两样细巧玩艺讨好房东温都太太。他在政治上幼稚无知，由于在抹黑、讽刺中国人的电影里扮演了一个看热闹的富商角色，他给自己的古玩铺招致了一场骚乱。靠着工作卖力、半工半读的伙计李子荣知道如何对付找麻烦的工人，这些有着潜在危险性的暴徒才从古玩铺安然退走。然而，马则仁鄙视李子荣，觉得他俗气，不像念书人。

虽然他觉得自己克制又可敬，但实际上，他对感情放纵并喜欢寻花问柳。在伦敦，他很快就赢得了房东温都太太的欢心。他总觉着自己是个美男子。即使在他妻子还在世的时候，他也找过别的女人。他瞧不上体力劳动者，特别看不起买卖人，在中国时还老做当官的白日梦。他经常陷入近乎修道的状态，注视着大自然的美丽，对没能当上官儿满心遗憾。他沉湎于这些应该属于文人的行为。在现实中，他显然与身边的人格格不入，对周围世界也全然不解。马则仁是自欺欺人、濒临灭绝的文人的生动写照，是走向穷途末路的孔乙己在冷漠异国的翻版。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各种规范和价值观念不得不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斗争中互相竞争，传统“文武”不可避免的崩塌就更加引人注目。

在这种情况下，马则仁的儿子马威和留学生李子荣作为马则仁的反向平衡脱颖而出。他们都很年轻，愿意用西方方式取代中国方式。特别是李子荣，他似乎已将“文武”理想整个放弃，高高兴兴地干着体力活儿、学习商业学位。他的阶级背景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共产主义的，他从商业和辛勤工作而不是从伦理方面上解释欧洲的成功。饶有趣味的是，赵遐秋等文学史家认为李子荣不是个理想人物，而马威是。<sup>①</sup> 马威

<sup>①</sup> 赵遐秋、曾庆瑞：《中国现代小说史》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确实更像他父亲真正的对立面。批评家们指出他既有爱国热情,也带着悲剧色彩。这也许是真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仍在传统的“文武”范式内继续运转,至少部分如此;他的行为方式与五四“浪漫一代”一脉相承。他非常多愁善感,很容易就陷入爱情、不可自拔。他非常爱国,容易产生英雄崇拜,感到孤独时会哭泣流泪。然而,他姿态戏剧化的冲动冒进“只发展成熟悉的舞台程式”。<sup>①</sup> 马威身上很有些令人想起《西厢记》中的张生的素质。而把他和传统才子区别开来的,是他和他父亲那一代人的疏离。

马威与他父亲有意识的疏离证实了李欧梵对这一代人的经典研究。李欧梵指出,到 1920 年代,“新”文人已开始偏离他们所对应的传统文人。在受新式文人青睐的“现代”风尚中<sup>②</sup>,李欧梵列出了当时一位社会评论家汇编的八个风潮,包括对自己的才能坚信不移、多情但懒散、喜欢现代时装、既有本国朋友又有国际友人。马则仁和他儿子马威都不是作家,所以不符合其中的一些条件,比如向刊物投稿或赞助新作家。但他们都是这份单子上罗列的男人典型。就像郁达夫塑造的“被先进教育阉割了的零余者”<sup>③</sup>,过度展现的感伤与自怜带来的是深切的无奈感。1920 年代是文人为自己逝去的阶级哀悼的时期,也是文人设法通过操纵“文”、“武”这样的旧观念而令那个阶级复活的时期。最后的结果时有悲剧色彩,时有喜剧效果。旧文人在走向国际的过程中,冒着的是不止在中国,而且也在海外受到嘲笑的危险。虽然拥有国际友人是成为“新”文人的一个先决条件,但《二马》对其效果的展示大概没法受到知识分子的欢迎:在国外,彰显“新”文人的零余、无奈不只可怜,而且荒谬。

① 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茅盾、老舍、沈从文:写实主义与现代中国小说》(*Fictional Real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Mao Dun, Lao She, Shen Congwen*),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26 页。

② 李欧梵(Leo Oufan Lee):《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哈佛大学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38 页。

③ 引文出处同上,第 250 页。

## 性别：外国女人的世界

这种荒谬感在爱、性和情绪力量的突显中最是引人注目。在 1920 年代的公开讨论中，爱和性是相当的热门话题。举个例子说，这段时期人们对《性博士》一类的出版物需求极大。<sup>①</sup> 正如李欧梵指出的，对文人来说，“爱已成为新道德的全部象征，轻易替代了已被等同于外部束缚的有关体统的传统观念”<sup>②</sup>。坠入爱河成了新文人不可或缺的一大特色。老马和小马都坠入了爱河。问题是他们选择上演爱情剧码的这个陌生环境。他们爱上的不是传统小说、戏剧中甜美、谦恭、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莺莺型的中国姑娘；伦敦也没有这样的女人。相反，他们爱上的是充其量只能将将容忍他们存在的外国女人。这些女人身处“文武”教化影响之外的国度，是无法用已知的文化规范进行衡量的。比如说，用阴阳学说无法符码化、程序化她们显得更为强势的行为，因为作为外国女性，她们压根无法被估计。

到了民国时期，只有男人才能掌握“文武”的传统观念受到了丁玲等年轻女性的挑战。她们对出版和政治活动兴致勃勃，表现出她们不仅能在“文”上有所成就，而且想得到这些成就应该带来的官方认可与权力。此外，她们还有意地、挑衅性地把男性当成性的对象来描写。<sup>③</sup> 早在 1911 年以前，康有为已经在他的《大同书》中对儒家思想进行了重新阐

① 彭小妍(Hsiao-yen Peng):《〈性史〉:张竞生的性革命》(“Sex Histories: Zhang Jingsheng's Sexual Revolution”),载《淡江评论》,第 30 卷第 2 期(1999 年),第 71—98 页。

②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第 265 页。

③ 刘禾(Lydia H. Liu):《创造与介入:现代中国文学中女性传统的生成》(“In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The Making of a Female Tradition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载魏爱莲(Ellen Widmer)和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编:《从五四到六四:20 世纪中国的小说与电影》(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 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94—220 页。



释<sup>①</sup>，“明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之权”。<sup>②</sup>但是，他指明了这个乌托邦式的幻想要在遥远的未来才能实现。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女性受到了更多的教育，也要求更多的权利，性平等不再是由男人赋予的，而是由女人来主张的。在传统的才子佳人程式中，才子总是赢得佳人的那一个，而在性上他对肌肉发达的“武”的男人所占的优势也从未受到过质疑；与之不同的是，文人的性总处在质询当中。在像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自叙者莎菲那样的女性审视下男人们局促不安，他们自己也对所有过错供认不讳。例如，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说，当国外势力的围攻中，“……被征服的国民，没有力量保护，没有勇气反抗了，只好别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杀”。<sup>③</sup>这也许可以解释女性受害者在“五四”文学中的普遍存在<sup>④</sup>，但如果是在没有中国女性可以牺牲的情况下呢？

《二马》描绘了 1920 年代中国男人在伦敦的生活，中国女人在那里的确是凤毛麟角。<sup>⑤</sup>老舍在这部小说里没有塑造任何中国女性人物。中国男性特质在中国本已受到了围攻，现在又从原生环境中突然被拿出来自生自灭，也没有可以用来牺牲的女人来抵挡凶猛的外国男人。产生于这种环境下的孤独感迫使在中国向来有女人陪伴的马则仁要从身边的外国女性身上寻求安慰。作为“浪漫一代”的代表，他的儿子马威也张扬着自己的性与感情。他很快就疯狂地爱上了喜欢卖俏的温都姑娘。在

① 康有为：《大同书》，古籍出版社（北京）1956 年版。

② 康有为：《大同书》，第 126 页。英文版参见汤普森（Laurence G. Thompson）：《〈大同书〉与〈共产党宣言〉之比较》（“Ta-t'ung Shu and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Some Comparisons”），载罗荣邦（Jung-pang Lo）编：《康有为：传记与论文集》（*K'ang Yu-wei: 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 1967 年版，第 79 页。

③ 鲁迅：《我之节烈观》，载《鲁迅选集》卷 2，外文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3—25 页。

④ 鲁迅的《祝福》就是一个好例证。鲁迅：《祝福》，载《鲁迅选集》，外文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125—143 页。

⑤ 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英国，中国人数量总体而言非常稀少，最多只有 2000 人左右。参见帕克（David Parker）：《通过中国人的眼睛：在英国的中国年轻一代的文化认同》（*Through Chinese Eyes: The Cultural Identities of Young Chinese People in Britain*），埃夫伯里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5 页。

老舍笔下,这对父子从温都母女那儿分租房子,这就形成了使主人公们面对跨种族性吸引力和浪漫可能性的日常环境。此外,二马都受过教育,在中国的社会环境里算是文人。相比而言,温都家的女人即使用英国标准来看也只是中低收入阶层孤陋寡闻的糊涂虫。<sup>①</sup>在性上的有利条件和在婚姻上的吸引力,这两个评估男性特质的最根本的元素从而以耐人寻味的配置组合映射在了种族、阶级的坐标轴上。

与小说对老一代文人的负面刻画一致,马则仁想和温都太太结婚的计划显得可悲又可笑。如果马则仁真是他自诩的正人君子,那他压根儿就不该对着个寡妇动念头,更不用说那还是个英国寡妇。小说中有一段描写马则仁陷入冥想,思量要是他跟温都太太结了婚,他们在中国的生活会是什么样。一个中年男人欠考虑的胡思乱想就已经够糟了,但要是韩素音对在战火蹂躏下的民国时期发生的跨种族婚姻的描述真实可信的话,现实可能比这个还要糟糕得多。<sup>②</sup>可马则仁又抗拒不了每天的肉体诱惑,于是他继续推进结婚的计划。不幸的是,他发现,没人愿意接受他和温都太太联姻,就连在首饰店买个结婚戒指他都得经受伙计的怀疑、嘲弄。马泽仁只会用陈腐的方式来衡量“文”的传统造诣的魅力,但首饰店里的一幕就惯于自欺欺人的他都觉得受到了打击。他终于明白了一个事实:传统的“文”的男性特质在新世界里无处容身。可悲的是,错不在教育和举止优雅等阶级属性上。问题是,就种族而言,传统的

① 有意思的是,温都太太在小说中提到他们是来自同一阶级的(英译本第270页):“我们英国人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可我们是有阶级的。我们婚姻的自由是限于同等阶级的……至于你我,没有阶级的隔膜……”这个评价显示出在她的信念中,受过教育、相对而言手头宽裕的中国男人和她这种背景的英国女人是同一阶级的。

② 韩素音(Han Suyin):《伤残的树》(The Crippled Tree),伦敦乔纳森·凯普出版社1965年版。尽管这篇小说可能并不是关于一个在中国社会动荡时期娶了个白种女人的中国男人所面临的困难的真实记录,但它的确显示了种族、语言差异所带来的额外的艰难。我并不打算为“跨种族的婚姻”都是灾难的说法背书。事实上,对不少人来说,中国男人“比起其他男人,已赢得了更多种族女人的承认,认为他们是好丈夫的人选”。克尔南:《人类的主人:帝国时期的黑人、黄种人和白人》,第164页。这些发现使得那种把中国男人当成潜在的强奸犯和瘾君子的虚构更加令人心痛。

“文”只能是中国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就像我在第一章中指出的。可是，对当时的英国人来说，“中国性”能勾起的，至多也不过是脑海中的一些异国人的形象。

二马和温都母女之间的情爱纠葛为中国第一部讲述中国男人与西方女人之间爱情的小说提供了基础。实际上，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中就已触及了新“浪漫一代”关注的第一批主题之一：和外国人的爱情故事。但那发生在两个（或三个）亚洲人之间，而不是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sup>①</sup> 以清末名妓赛金花和德国统帅瓦德西伯爵为蓝本的众多作品也值得注意<sup>②</sup>，不过，这个故事里男的是欧洲人，女的是中国人。这些情爱关系并没有超出 20 世纪初期众所接受的性别、种族规范，这些规范把西方和/或男性等同于权力，而把中国和/或女性等同于没有权力。相比之下，这一时期关于中国男性及其与白人女性关系的大量的英国色情文学却表现出了最本质的性焦虑与种族焦虑。它们“为一系列的欲望、压抑、投入和对白人人口的预测所左右……[因而归罪于中国人]有把白种女人引诱到他们聚居点的力量”。<sup>③</sup>

《二马》可以说是对这种媚俗文学的反应和衍生。与对应的英语作品一样，中国男人在这部小说中也情场失意。所不同的是，马家父子拥有“文”的特征。不过，“文”、“武”的传统配置压根儿就不是欧洲人会考虑的因素。文人可能拥有从财富或儒家风范派生出的神秘的性权力，但只有同阶级的中国人理解这些权力。对大多数的欧洲人来说，它们秘不可见，而文人也算不上男子汉。有趣的是，小说中“半工半读”的英雄李子荣了解但拒绝接受的似乎不光是这种“西方观念”，还包括性平等与情

① 有关这个故事的概述和探讨参见杜博妮、雷金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第 90—93 页。

② 关于赛金花的生活和一些有关她的文学作品，参见萧虹(Lily Xiao Hong Lee)、斯蒂芬诺什卡(A. D. Stefanowska)和刘咏聪(Clara Wing-chung Ho)编：《中国妇女传记辞典：清代卷，1644—1911》(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 The Qing Period, 1644—1911)，M. E. Sharpe 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82—184 页。

③ 帕克：《通过中国人的眼睛：在英国的中国年轻一代的文化认同》，第 59—60 页。

爱观在内的整个现代伦理。因此，他替包办婚姻辩护，并愉快地等着回到他那个 21 岁、没受过多少教育、只“认识几个字”的中国未婚妻身边。李子荣的婚恋哲学实用到了极致。他向马威解释说，因为愚昧无知，今日的中国有“成千累万的男人还闲着没事作呢”。因此，让妇女受教育是不合逻辑的。有一点知识，念一两本爱情小说，她们就会忘了照顾自己男人的责任。毫不夸张地说，在李子荣看来，“做饭，洗衣裳，是妇女的唯一责任”。<sup>①</sup>

## 种族、民族和阶级

在传统中国，外国男人也和女人一样被排除在男性特质的界桩之外。在《二马》中，文明之间的冲突催生新的规则，但旧的残余依然存在。就像一些批评家指出的<sup>②</sup>，小说塑造的英国男人要么像前传教士伊牧师一样虚伪，要么像商人亚历山大一样喜欢酗酒胡说，要么像被宠坏了的保罗一样自私霸道。就算是拼体力，小说中的英国人也都外强中干、不是中国人的对手。在和保罗打架时马威能打赢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即使是脑袋空空的温都姑娘玛力，虽然心里至多觉得马威对她的迷恋是件好笑的事儿，也在这一架之后觉得他非常英美而默许他握住她的手。因此，男性特质的理想深植于种族化的叙事之中。<sup>③</sup>

① 老舍：《二马》，1984 年英文版，第 263 页。

② 老舍自己在小说的后面宣称，“连半个有人性的也没写出来”。引自赵遐秋、曾庆瑞：《中国现代小说史》卷 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90 页。

③ 关于种族有大量的文献，这里将不介入它们是否具有任何科学价值的辩论。近期的相关探讨请参见《历史和人类学》，第 11 卷第 2—3 期（1999 年），特别是迪罗（Christine Dureau）、刘振辉（Morris Low）：《知识政治：亚太科学、种族与演进》（*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Science, Race and Evolu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第 131—156 页），以及刘振辉（Morris Low）：《演变中的日本：威廉姆斯·格里菲斯、杂糅与日本种族的白化》（*The Japanese Nation in Evolution: W. E. Griffis, Hybridity and the Whiteness of the Japanese Race*）（第 203—234 页）。在中国研究中，冯客（Frank Dikötter）的《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赫斯特出版公司 1992 年版，一直是本标准参考书。尽管我同意冯客种族“是一种文化构建”的观点，但我不太相信它和“客观现实没有关系”（第 8 页）。不管它是否和客观现实相符，老舍的小说都是民族主义话语怎样在不知不觉间陷入种族话语的一个好例证。

虽然不那么显而易见,这部小说还蕴含着关于民族与男性特质关系的丰富信息。<sup>①</sup>老舍在好几处详细介绍了“中国城工人”和“文”一类的中国学生之间的差别。在当时,所谓“中国城”指的是伦敦莱姆豪斯区,而“工人”大多是海员和洗衣房工人。<sup>②</sup>因此,如果用人们今天对“中国城”的理解来看,老舍对这个词的使用有几分时代倒错的感觉。如前所述,尽管上个世纪前30年伦敦的中国人口的数量极少且流动迅速,“中国城”一词对那时的英国人有着强大的魔力。它使英国人觉得“在中国城平静污浊的外表下萌动着的同样暗黑的激情、本能和导致这些神秘的黄种人被误解[、]惧怕和憎恨的种族倾向”。<sup>③</sup>老舍对“中国城的中国人”大段的抨击可以说直接来自这种观点,或是对此的反应。<sup>④</sup>无论是对作者还是对读者来说,尽管动机彼此矛盾,但都不会有损小说人物所激发的强烈感情。

对老舍来说,比起中国城的“工人”,学生和其他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要高人一等。中国城是伦敦“最给中国人丢脸的”地方。<sup>⑤</sup>对它肮脏粗俗的描写验证了英国人的东方主义观念。人们指责说,正是中国城居民的文化无能与语言无能助长了高深莫测、阴险邪恶的傅满洲综合症。<sup>⑥</sup>与

① “种族”和“民族”往往可以替换使用。同样的,这里我也不介入有关它们用法的论战。为方便起见,当指向存在于更大文化意义上的(国家的)人口中的少数人群时,我使用“民族”。就像“种族”,它作为话语的使用在这里至关重要,而它是否有个客观的指涉则是另一个问题。

② 1901年和1931年之间中国人在英国的主要职业表。参见帕克:《通过中国人的眼睛:在英国的中国年轻一代的文化认同》,第55页。

③ 史弗尔(Herman Scheffauer):《英国的中国人:一个日益严重的民族问题》(“The Chinese in England: A Growing National Problem”),载《伦敦杂志》(*The London Magazine*),6、7月号(1911年)。引自帕克:《通过中国人的眼睛:在英国的中国年轻一代的文化认同》,第59页。尽管“工人”和“中国城”也许是种误用,由于老舍在小说中用了这些说法,我也将沿用。

④ 老舍痛苦的大段控诉详见老舍:《二马》,1993年版,第12—13页。

⑤ 老舍:《二马》,1993年版,第12页。

⑥ 尽管老舍在这部小说中并没有提及这个形象,洛莫尔正是在这段时间在英国发表了广为流传的傅满洲的系列故事。除了上面提到的许多与傅满洲有关的网站,对傅满洲现象一个更为学术性的论述,参见克莱格(Jenny Clegg):《傅满洲与黄祸:一个种族主义荒诞神话的形成》(*Fu Manchu and The “Yellow Peril”: the Making of a Racist Myth*),特伦特姆出版社1994年版。

之相反，和其他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一样，二马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事实上，由于是基督徒，他们在离开中国之前就交上了英国朋友（这和老舍本人的经历一样），刚到伦敦他们就能在与当地人的交流中应付自如。想来同为基督徒也意味着他们和英国人共享着一种能够彼此沟通的共同的精神素质。

唯一和二马有沟通问题的是中国城的工人。小说告诉我们，这些工人都是广东人。不管是语言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中国城的工人成了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不光彩的群体。在小说结尾，当他们准备在马家古玩铺制造骚乱时，已沦落成了一帮暴民，在窗外“鬼鬼啾啾的”，说的每句话都带着“句尾的长余音：呕——！喽——！呕——……”<sup>①</sup>在这段意味深长的情节中，李子荣是英雄。因为有时给他们当翻译，他学会了跟他们讲广东话。因此，这里的坏人不是英国人，而是其他的中国人，那些在“文”、“武”上均无可取之处的中国人。他们并不是真的被当成男人来塑造的，而是一群面目模糊、叫做阿丑或阿红的乌合之众。<sup>②</sup>

中国城里唯一一个在谈话中能说得有点意义的广东人是范掌柜，马则仁定期光顾的中国饭馆的老板。有趣的是，他给自己坐落在中国城的最热闹的饭馆起名叫状元楼。范掌柜的这一举动是对这个名字的绝妙嘲弄。在儒家传统男性特质的架构中，从“文武”的角度来看，做买卖的商人是最不令人向往的男人。做买卖显然不属于孔子提倡的艺术和技术。儒家和道家思想往往将愚昧的农民理想化。但是，正如我们在第一章和第三章中看到的，贸易、谋利是直至最近才和“文”、“武”有所兼容的。海外华人中也存在这一观念，赚钱在海外也可能为人诟病。

范掌柜老把自己当成个东方玩艺儿，因此生意兴隆：他爱说不合文法的陈词滥调来迎合顾客。他脸上老是笑，弄得小眼睛总眯缝着（像个

① 老舍：《二马》，1984年英译版，第297页。

② “丑陋的中国人”和“赤匪”大概能更合理地体现这些名字预设的含义。

真正的中国人),只加深了他的蠢像。不过,他有着商业上的敏锐,在小说结尾,他以低价盘下了马家古玩铺。因此,范掌柜身上封装着东方主义关于成功的中国老板的概念:他的生活目的就是为了赚钱,不关心中国或世界的命运,没有什么原则,在“文武”上也没有任何可取之处。中国传统的故事讲述者也持有同样观点。马则仁看不起他,因为他是一个“买卖人”;<sup>①</sup>但他们仍然成了顶好的朋友,因为范掌柜对他应酬周到。虽然并没有那么邪恶,但范掌柜的样子还是让人想起了托马斯·伯克《莱姆豪斯之夜》中惹人厌恶的中国商人大富。<sup>②</sup>

因此,中国城的广东人愚昧、怯懦、贪婪,这 and 老舍与他同时代的托马斯·伯克等英国作家所认同的民族、种族话语相一致。和所有这些观念话语一样,这些概念或模糊或明确。在中国,小马先生和老马先生可能属于任何一个民族。事实上,小说告诉我们,尽管是广州人,但老马是在北京长大的。有意思的是,“他永远告诉人他是北京人,直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价值增高,广东国民政府的势力扩大的时候,他才在名片上印上了‘广州人’三个字”。

如果考虑到老舍自己的满洲血统,他对广州同胞的刻画就显得更为犀利。在孩提时代,老舍见证了占人口多数的汉人所表现出的对满族的仇恨,著名的反清革命家们煽动群众相信“五百万有奇”的满族人像动物一样“被毛戴角”,应被“诛绝”。<sup>③</sup>老舍应该也已经意识到,这种种族主义的煽动绝不是简单的说辞。事实上,辛亥革命期间有数以万计的满族人在西安、汉口、汉阳等城市被屠杀。老舍这样住在北京的满族人虽然免遭这种噩运,但他们必须接受汉族身份,改汉姓,迅速为汉族习俗同化。然而,正如沃哈(Ranbir Vohra)指出的,尽管老舍遮掩了他的种族身份,

① 老舍:《二马》,1993年版,第192页。

② 伯克(Thomas Burke):《大富和潘西》(“Tai Fu and Pansy Greers”),载《莱姆豪斯之夜》(Limehouse Nights),第149—168页。

③ 邹容:《革命军》,引自沃哈(Ranbir Vohra):《老舍与中国革命》(Lao She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哈佛大学出版社东亚研究中心(Cambridge, Mass)1974年版,第7页。

“他从来也没有原谅或忘记那些随着他的民族一起在 1911 年消失的东西”。<sup>①</sup> 沃哈是在 1974 年写下这番话的，而他的看法在老舍死后于 1980 年首次出版的半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中得到了证实。<sup>②</sup> 老舍在这部作品中清末的满族生活作了亲熟热情的描绘。

《二马》把中国汉族沙文主义者和常常对非主流文化发生兴趣的有教养的英国人进行了一番对比，这使小说对少数民族的处理显得更加引人注目。当李子荣告诉马则仁他们邻家的古玩铺卖蒙文满文书赚了很多钱时，马老先生的反应是偏执、不屑的：“谁买满蒙文的书啊？买那个干什么？”<sup>③</sup>虽然老舍对自己是个在伦敦的中国人应该有认同，但对民族差异的敏感很可能使他在有关伦敦的中国各民族群体的描述中头头是道、感情充沛。通过李子荣之口，他对种族、民族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偏见痛心疾首地说：

做饭、洗衣裳，中国人在海外的两大事业！……日本人所到的地方，就有日本窑子；中国人所到的地方，就有小饭铺和洗衣裳房。中国人和日本人不同的地方，是日本人除了窑子以外，还有轮船公司、银行和别的大买卖。中国人除了做饭、洗衣裳，没有别的事业。<sup>④</sup>

撇开历史准确性，这种对日本男人在控制性与金钱上更为成功的慨叹表明微妙的变化在“文武”建构上已然发生。正如我在第二章所示，在传统中国，性和男性特质之间的联系既不可言说，又不言自明。这篇小说也认为在赚钱和做买卖上成功是（不论如何勉强）男性功成名就的证

① 沃哈：《老舍与中国革命》，第 7 页。

② 老舍：《正红旗下》(Beneath the Red Flag)，唐 (Don J. Cohn) 译，中国文学出版社熊猫丛书 1982 年英文版。老舍这部被老舍先生的夫人藏于煤堆里而得以幸存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开笔于 1960 年代初，是仅写成 11 章 8 万余字的残卷，通过义和团进京、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沦陷等历史背景，对几个不同类型的旗人家庭的描绘，广泛地触及了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的种种社会问题，被认为是“一段满目疮痍的历史，一曲没落王朝的悲歌”。

③ 老舍：《二马》，1984 年英文版，第 297 页。

④ 同上书，第 81 页。



据。这个判断在后来马则仁和温都太太决定结婚时得到了重申。他们去买结婚戒指时,首饰店伙计只拿很便宜的货品给他们看。当温都太太明确表示他们想买个贵重东西时,伙计连忙道歉说,“我错了,我以为这位先生是中国人呢,没想到他是日本人。”<sup>①</sup>这最后的侮辱说服了马则仁和温都太太跟个外国人结婚是没有未来的。这在说明英国主流社会如何利用一个少数族裔(日本人)去压迫另一个少数族裔(中国人)上也是个颇具启发性的情节。

老舍在对二马和李子荣的刻画中尽量突出了传统“文武”和英国看法之间的差异之处。到描述中国城的同胞时,他似乎已经克服了那些模棱两可的东西。这篇小说里中国城的中国人就像鲁迅在小说集《呐喊》“序言”中描述的国民:他们没有思考能力<sup>②</sup>、麻木、愚弱。就此而言,马威与保罗打架和李子荣与中国城暴民打架之间的区别发人深省。前面一场是两个真正的男人在打架,而后面这一场,李子荣被描绘得就像京剧里的武生打退了一群无关痛痒的乌合之众。作为正面角色,马威和李子荣都文武兼备。赋予他们这些特性本身不是问题,但耐人寻味的是,在“文武”特征上,广东工人居然比保罗还不如。因此,外国人没有资格取得“文武”的这条概律需要限定条件。作为男人,广东工人比外国中产阶级更无可取之处。这说明,到20世纪初,阶级和种族的差异作为比种族机制更有力的他者化机制已开始产生影响。

中国城工人被描绘成毫无特色、说话费解的他者,与讲普通话的使馆官员和伦敦学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些男人做着所有传统与现代小说中男人做的事儿:他们关心自己的国家,勤奋学习,如有必要,也会打场好架——总之,他们有着“男子气概”的情感和行为模式。相比之下,中国城的广东工人一出场就表现得像面目模糊的中国佬。这些在小

① 老舍:《二马》,1984年英文版,第250页。

② 鲁迅:《短篇小说集〈呐喊〉前言》,载《鲁迅选集》,外文出版社1960年版,第1—6页。

说里经常提及的中国佬的形象，也是当时东方主义叙事所厌憎的非人怪物。<sup>①</sup> 虽然海外华人至少在表面上分享着一个“想象的社区”<sup>②</sup>，但正如豪尔(Stuart Hall)恰切提醒我们的，不论有多少连续性和相似性，海外族群都有许多“令人忐忑不安”的分歧与分裂。<sup>③</sup> 就像李瑞福(Ralph Litzinger)在关于另一民族、性别代表的分析中观察到的，少数民族并不总是客体化、东方化的。民族性和性别并非不是掌握了研究方法就能轻松掌握的范畴：“它们并不指向社会生活的真相，而指向总是由处于不同权力、权威位置上的社会行为人复杂的生产、协商史来告知的永无止境的文化政治。”<sup>④</sup>

## 英雄的肖像

尽管与性别和民族性有关的概念并不固定、难以捉摸，但对如何在这些范畴内构建理想进行分析是可能的。在确定了有哪些男人因没有文武而不包含在男性特质的竞争中之后，我们就可以对这部小说中的英雄——理想男人的构建进行一番研究了。如上所述，马威在许多方面都是“五四”一代青年男子的代表。在他眼里，英雄无疑是李子荣。作为他父亲的儿子，马威需要破除传统来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而李子荣似乎完全独立于传统和“现代”观照。马则仁因为他“俗气”又不了解念书的

① 中国人在欧洲的形象并非静止不变。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形象达到了东方主义的最强音。除了上面提及的比克斯的论述，对变化中的看法，参见道森(Raymond Dawson):《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The Chinese Chameleon: 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牛津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以及马克林(Colin Mackerras):《西方的中国形象》(*Western Images of China*)，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89年版。

②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Rise of Nationalism*)，新左翼书局1991年版。

③ 豪尔:《文化认同与海外族群》，第395页。

④ 李瑞福(Ralph A. Litzinger):《性别问题：毛泽东之后中国的少数民族再现》(“Questions of Gender: Ethnic Minority Representations in Post-Mao China”)，《关心亚洲学者通报》(*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第32卷第4期(2000年)，第11页。

目的而看不起他：李子荣不做当官梦，也乐意干体力劳动。特别是，马则仁弄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把古玩店做成个赚钱的生意那么感兴趣，也不理解他为什么会跟那些没有文化感悟性的外国人相谈甚欢。<sup>①</sup>他显然不符合传统标准下“文武”男人的定义。然而，马威对他几乎是崇拜的，当他“不只是个会办事挣钱的平常人，也是个心神健全的英雄”<sup>②</sup>。

李子荣准备从商以使自己富有，使中国强大。这和晚清洋务自强派所主张的出路并没有什么不同。到了民国时期，背离儒家在传统上对商业的厌恶并非真是什么异端邪说。真正令人震惊的是，“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一战”几十年后<sup>③</sup>，在以马则仁为代表的传统文人眼中，李子荣依然“俗气”、“平常”。这种对金钱的不屑与不信任充斥着整个 20 世纪，作家茅盾、曹禺等就经常在作品中描写不道德、剥削成性的商人与实业家。相比之下，老舍强调的是中国的未来就在于这些学习和从事商业的年轻人。在很多场合，他都把马则仁的无能拿来和李子荣的独创性、有效性做对比。马则仁因为李子荣缺乏“文”的成就鄙视他，但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拿两个人做个比较，马则仁充其量就只是个滑稽的人物形象。他那种“文武”在伦敦显然不合时宜，而李子荣的实干和完成商业学位的雄心被描写成那些有兴趣提升自己 and 中国的年轻人唯一可行的出路。

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的，“文”已从传统的文人才能变得包含了儒家所憎恶的商业学习和赢利活动。小说在好几个地方提到了“英雄”这个词。大多数情况下，它指的是在伦敦取得了成功的商人。例如，马威就曾用这个词来形容他建起了古玩铺的大伯。当然，并非所有的成功

① 在这里，我带着谢意援引本章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读者许多敏锐评论中的一段：“二马经营的是一家‘古玩’店。‘古玩’是通商口岸条约下西方人收集的中国生产的文化艺术品中一个遭受了低估的项目。‘古玩’体现了中国文化一个可以令人接受的面目。否则，这种文化是受诋毁受轻视的。因此，马家父子不光是在卖中国文化，他们甚至连这个都卖不好”。

② 老舍：《二马》，1993 年版，第 242 页。

③ 芮玛丽(Mary C. Wright)：《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一战：同治中兴，1862—1874 年》(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商人都是英雄。状元楼的范掌柜就更符合传统小说中商人的刻板印象。小说在许多地方都把李子荣当成真正的英雄。他的商业触觉、对学习的热爱和在困难情况下赢得战斗的能力，全部这些元素加起来造就了一个修饰一新的“文武”英雄。作为男性特质理想转变的代表，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郑重其事地准备继续学习。并不是学什么都行，他对学习怎样引领道德的生活毫无兴趣：他学习的是今天的 MBA，是如何不觉羞耻地赚钱。

有批评家指出，李子荣并不是作家们想宣传的理想。<sup>①</sup>相反，“中国现代青年的理想人格是马威、李子荣的结合”<sup>②</sup>。老舍本人也曾表示：

那时在国外……好像一个中国人能像英国人那样作国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先不用管这个理想高明不高明吧，马威反正是这个理想的产儿。他是个空的，一点也不像个活人。他还有缺点，不尽合我的理想，于是另请出一位李子荣来作补充；所以李子荣更没劲！<sup>③</sup>

作家、评论家对这些人物的矛盾态度证明对那些冲击着传统男性特质形象的年轻商人，老舍时代的文人已开始给予有限的尊重。因此，《二马》对三个男主人公刻板化的塑造为读者提供了了解中国男性特质主要特点的方便之门，这些特点显然是民国时期在西方的“文”的男人的共同之处。

## “文”在当代西方：以澳大利亚为例

老舍所塑造的海外文人典范在 20 世纪的大大部分时间里并没有发生

① 的确，王德威敏锐地指出他“甚至比二马更像傻子”。王德威：《茅盾、老舍、沈从文：写实主义与现代中国小说》，第 131 页。

② 王惠云、苏庆昌：《老舍评传》，花山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6 页。

③ 老舍：《我怎样写二马》，转引自同上。

什么显著改变。从总体上看,人们假定的在西方国家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径是积累大量的金钱。<sup>①</sup>确实有许多华人的大企业在海外取得了成功,特别是在东南亚国家。中国台北、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城市成了国际商业及金融中心,一些华裔商人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男人。然而,中国大陆有近30年的时间把赚钱当成是资本主义令人难以接受的行为。在此期间,中国与西方世界也极少互动。因此,出口到西方的“文武”之说其实源自东南亚。正如下一章将要显示的,源自这一地区的男性特质,特别是中国香港电影版,带着强烈的“武”的倾向。

冷战结束后,东西方之间的互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说,现在很多移民是为了做生意或受教育而离开中国,不再是为找工作而发生的劳动力迁移。大多数新移民都去了美国,但也有数以万计的人来到澳大利亚等其他西方国家。1990年,仅一年时间就有13000多名中国学生报名参加澳大利亚的海外学生英语语言强化课程(ELICOS)。<sup>②</sup>此外,1993年进行的一项对200名中国内地学生的调查发现,他们中60%以上有大专学历,100%受过中学教育。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些人可被归为知识分子,有较高的“文”的专长。然而,同一份调查也显示,这些学生中的80%—90%以在餐馆洗碗为业。<sup>③</sup>

他们在中国的学业成绩也无法成为他们可以携带的跨文化商品。对许多人来说,最紧迫的任务是重新激活他们在中国已赢得的社会认

---

① “旧钱”和“新币”之间的差异在二战前的英国非常重要,但这种差异在中文作品中常常被掩饰过去了。

② 关于1990年代在澳大利亚的亚洲学生数量概况,参见安德森(Curtis Andressen)提供的教育、就业、培训部的表格。安德森:《亚洲出生的澳大利亚海外留学生的所在地与特点》(“The Loc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sia-born Overseas Students in Australia”),载科格兰(James E. Coughlan)、麦克纳马拉(Deborah J. McNamara)编:《澳大利亚华裔:迁移与定居模式》(*Asians in Australia: Patterns of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麦克米兰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

③ 冯兆基(Edmund S. K. Fung)和陈杰(Chen Jie):《观念的变化:大陆中国人对澳大利亚和中国的态度》(*Changing Perceptions: The Attitudes of the PRC Chinese Towards Australia and China, 1989—1996*),格里菲斯大学澳亚关系研究中心1996年版,第8页。

可。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接受正规教育这一“文武”成就的关键标准会成为大多数中国移民的奋斗目标。即便是成了企业家，他们也普遍希望子女拥有高等教育资格。<sup>①</sup>至少，对男性来说，在居住国创造出公认的“文武”成就相当于恢复了失去的男子气概。虽然许多评论家都注意到了中国移民重视学习成绩的倾向，但他们忽视了这一倾向所带来的对男性特质的影响。因此，我提议对一本题为《娶个外国女人做太太》的文集做个简要分析，因为它收录了这些学生的“自白”。<sup>②</sup>

我选择仔细考察这本书是因为它涉及的主要是生活在澳大利亚的文人的爱情生活。尽管澳大利亚不在欧洲和北美，但关于他们恋情的叙述在其他西方国家也具有典型意义。而且，他们也很好地说明了自老舍之后在西方生活的中国学生的命运经历了何种改变。这本合集的标题故事是由武立所写的唯一一篇作品。这是个令人愉悦的小故事，显示了多元文化在澳大利亚的成功。这个爱情故事详细描写了武立1989年抵达悉尼后在最初几年里找对象的过程。因为急于结婚，叙述者武立去了悉尼的一家婚姻介绍所。当被问及他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时，他很坦率地说：“我想找一个洋妞做太太，我想要的太太一定要对东方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我要让我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接受两至三国语言的教育。”然而，当问起他自己的条件时，他语塞了：

说什么好呢？说过去我做过中国一家报纸的记者，说我很会演讲，说我组织过很多全国大型活动，说我很会做饭，说我不抽烟、不喝酒，可这所有的都是过去的我。如今的我外语不会，身份没有，地

① 相关讨论参见利弗-特雷西(C. Lever-Tracy, D.)、叶(D. Ip)、奇泰(J. Kitay)、菲利普斯(I. Phillips)和特雷西(N. Tracy):《澳大利亚的亚洲企业家:布里斯班和悉尼中印社区少数族裔的小企业:给多元文化事务办公室的报告》(*Asian Entrepreneurs in Australia, Ethnic Small Business in the Chinese and Indian Communities of Brisbane and Sydney: Report to the Office of Multicultural Affairs*),澳大利亚政府出版服务处(堪培拉总理内阁部)1991年版。

② 武立:《娶个外国女人做太太》,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位是个厨房的洗碗工,如何让一个西方长大的女孩子对你那个无法显示的过去产生兴趣?如何让一个素不相识的异国姑娘对一个和她无法沟通的这个小伙子坠入爱河?<sup>①</sup>

他所坦白承认的“这所有的都是过去的我”只有部分是正确的。他仍然拥有不抽烟、不喝酒、很会做饭这些好丈夫的大体素质。他后来婚姻的成功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作者、演说家和组织者所拥有的教育、公共素质则属于过去,因为在澳大利亚,没有英语语言技能是对在中国备受重视的“文”的属性的阉割。因为不会英语,武立成了“厨房的洗碗工”,没哪个女人想嫁给这么个男人。同样有趣的是,他对自己作为男人在所居国缺乏吸引力的感伤来自于他是个不体面的厨房洗碗工,尽管他声称自己“很会做饭”。烹饪技巧可以是门艺术,在一定的情况下,还意味着一种值得拥有的男性特质,而洗碗在这个故事里几乎成了件不道德的事儿。一个人很可能不必做不动脑子、不体面的琐碎活儿就成为一个著名的厨师,但洗碗这个工作则是毫无任何“文”或“武”的价值的。

和大多数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离开中国的留学生一样,武立在中国有着良好的教育资历和工作。他不是那些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身处种族主义盛行的澳大利亚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农民。他有着无穷的信心,从不怀疑他将最终再造从前的“文武”身份。即使婚姻介绍所没有帮他找到想要的东西,他最终还是给自己找了个妻子。在这个合集的几个跨文化婚姻故事里,武立和他妻子的恋情写得最满怀爱意,也最详细。没有读者会怀疑他们对彼此的爱。这也是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成功的一个最恰当的例子:他来自中国而她来自韩国。因此,她是个“外国人”,但不是盎格鲁澳大利亚人。他们之间用来沟通的英语对双方而言都是“外语”(武立这时已在澳大利亚呆了 3 年,学了一点儿英

<sup>①</sup> 武立:《娶个外国女人做太太》,第 4—5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语)。从所提供的描述中,似乎看不到他们之间有任何沟通障碍。如果武立原本只把盎格鲁澳大利亚人算作“外国人”而对最终娶了个亚裔澳大利亚妻子感到失望的话,那在故事中的确没有显露什么蛛丝马迹。他对妻子的骄傲之情在叙述中随处可见。他讲述了如何从她那里习惯了使用“请”、“谢谢”等西方常见的礼貌用语,同时陶醉在她对性技巧“不礼貌”的公开讨论中。

这种骄傲从一开始就来自“文武”方面。她第一次请他吃饭,他立即注意到,“她家住在悉尼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一个叫 RANDWICK 的海湾附近”。<sup>①</sup> 这里的言下之意是,虽然她自己只是一个护士,但她交往的都是受过教育的人。不只是普通的受过教育,而是“高级知识分子”,这使她的阶级关系也变得令人钦佩。当他告诉她自己在中国的工作和来澳洲后做过的二十几种低下工作时,“她睁大了吃惊的眼睛问:‘你在中国有那么好的职业,为什么要来这里当打工仔?’‘因为我想走向世界。我想体验丰富的人生!’”<sup>②</sup>这不是海外成千上万的前几代劳动者能够给出的答案。<sup>③</sup> 从 19 世纪直到 1970 年代,大多数去了国外的中国人都来自较低下、没有受过教育的阶级,他们所从事的主要职业是无需技术、遭受盘剥、艰苦繁重的体力工作。<sup>④</sup> 这些男人最多也只能声言拥有“武”一类的男性特质,这一点在海外中国庙宇中武神关羽的无处不在和文神孔子的相对缺席中也有所反映。

在一本影响巨大的关于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的书中,钱宁认为他们

① 武立:《娶个外国女人做太太》,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8 页。

② 同上书,第 9 页。

③ 然而,在更早的时候,来自不同阶级背景的男人就可能、也的确这么说过。参见《阐释》(Renditions)特刊《中国人看西方》(*Chinese Impressions of the West*),第 53/54 期(2000 年),特别是王韬(1828—1897)在《我的眼界开阔了》(“My Eyes Were Opened”)这一部分中的表白,第 159—230 页。

④ 对澳大利亚情况的描述,参见罗尔斯(Eric Rolls):《旅居者:中澳几百年关系的史诗故事》(*Sojourners: The Epic Story of China's Centuries-Old Relationship with Australia*),昆士兰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和留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之间最显著的区别大概在于他们已经发展出了一种充满活力的“冒险精神”。<sup>①</sup> 因此,当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得不从事在中国饭馆洗碗这样的体力工作时,他们觉得打这种工低于自己的真实价值,就像武立在从事这种劳动时感觉到的。然而,钱宁接着说,这对很多人来说,是另一种“再教育”,就像“文革”期间许多知识分子曾经历过的。不同的是,“文革”期间到农村去的知青们“多少还有一种沉浮于政治运动的悲壮”<sup>②</sup>,而在澳大利亚做体力工作既不悲也不壮。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得以卷土重来。不管有没有“冒险精神”,那些使男人得以声称掌握了“文武”的训练,也同样使他们得以学习新技能、适应新的形势。“文武”具有很强的适应性。

除了武立的婚姻,这本合集中还包含了其他十个婚姻故事。它把婚恋主题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含六个“成功”的婚姻报告,第二部分包含五个“失败”的婚姻报告。在六个成功故事中的中国伴侣,有三个是男性,三个是女性。他们一个和韩裔澳大利亚人结了婚,一个和白人非洲裔澳大利亚人,一个和意大利裔澳大利亚人,一个和英裔澳大利亚人,还有两个未指明原籍国的白人澳大利亚人。并非所有故事都像武立和他的韩裔澳大利亚妻子之间那样美妙,意大利裔澳大利亚人和他的中国妻子之间甚至可以被视作缺乏激情。伴侣们对彼此个性、文化的了解在程度上也有很大差异。尽管如此,它们都是不同种族之间尚可的婚姻关系的生动写照。与之相反,所有五个“失败”的婚姻报告,都是单一种族的中国人之间的婚姻。

当然,这种布局很可能是武立编辑上有偏见的结果。不过,这些夫妇都不是他胡编乱造出来的。这些报告显然是由当事人自己发来的真实故事,其中至少有三对夫妇在书中附上了他们的照片。这些故事和中

<sup>①</sup> 钱宁:《留学美国》,载《新华文摘》,第10期(1996年),第90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91—92页。

国官方推荐的书籍中的叙述也形成了对比。例如，由《新华文摘》摘录过的钱宁的《留学美国》也以异国婚恋为突出特色。钱宁在其中谈到了中国留学生所面临的问题和他们破裂的婚姻。在一个单一种族联姻的例子中，由于男方的父母在他们分手后来美国游玩，他的前妻“假装”没有和他离婚，表现得还像个贤惠能干的妻子和儿媳（并很享受这一切）。父母走后，丈夫和妻子又高高兴兴地复了婚。而当钱宁探讨跨种族婚姻时，他提到了一个小故事，其中的中国女人因为她的教授丈夫不懂中文、忽略她的情感需求而深感寂寞。又如，一个中国男子被他的美国白人妻子抛弃，并“希望他今后能找到一个更适合他的中国女人”。<sup>①</sup>

在一项关于澳大利亚中国留学生的研究中，冯兆基(Edmund Fung)和马克林(Colin Mackerras)指出，“虽然女生表示对跨国婚姻没有意见，但大多数的男性受访者都表示不愿意娶一个澳大利亚女人”。<sup>②</sup> 男人们不情愿的原因和钱宁在美国人的例子中指出的差不多：澳大利亚女人太霸道、太自信、在性关系上太乱等。这种偏见没有什么启发性。有启迪作用的是，这项研究中引述的唯一一个在现实中和“澳大利亚人”<sup>③</sup>结了婚的男中国留学生似乎有着一个非常美满的婚姻，以至于“他妻子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也和中国人结了婚”<sup>④</sup>。中国男人作为伴侣的适宜性在西方出生的华裔男子身上体现得更为显著。蔡彼得(Peter Chua)和藤野(Diane Fujino)在一项关于亚裔美国男性的研究中发现，“在美国出生的亚裔男性把他们的男性特质和一定的体贴他人的特征联系起来，他们也

① 钱宁：《留学美国》，载《新华文摘》，第10期（1996年），第93—95页。

② 冯兆基(Edmund Fung)和马克林(Colin Mackerras)：《澳大利亚的中国学生：态度研究》(“Chinese Students in Australia: An Attitudinal Study”)，载米尔纳(Anthony Milner)和奎尔第(Mary Quilty)编：《置身亚洲的澳大利亚：插曲》(Australia in Asia: Episodes)，牛津大学出版社(墨尔本)1998年版，第214页。

③ 冯兆基和马克林并未指明澳大利亚人在这篇文章中指的是什么，但语境似乎在暗指白种澳大利亚人。

④ 冯兆基和马克林：《澳大利亚的中国学生：态度研究》，第215页。

是唯一一个愿意做家务的男性族群”。<sup>①</sup> 尽管这种亚洲男性的刻板印象中包含的真相可能和傅满洲的形象差不多,但它们至少表现出积极正面的意向。<sup>②</sup>

当然,假设异族通婚中没有问题是天真幼稚的。卡门·卢克(Carmen Luke)和艾伦·卢克(Allan Luke)在他们的个案研究中详细分析了跨种族家庭所面临的一些复杂情形。<sup>③</sup> 事实上,甚至可以说,种族平等上发生的进步已引起了一些地区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激烈反对。<sup>④</sup> 在不可预知的关于种族关系的“亲身经历”中,种族肯定关系重大。<sup>⑤</sup> 尽管如此,1990年代的情况不像20世纪初那样严峻;当时,澳大利亚反种族通婚的法律制度对与“东方人”有关系的白人妇女的迫害非常活跃。<sup>⑥</sup> 尽管她们继续“因与有色人种通婚而经历形式独特的种族主义”<sup>⑦</sup>,卡门·卢

① 蔡彼得(译音)(Peter Chua)和藤野(Diane C. Fujino):《协商新的亚裔美国人的男性特质:态度与性别期待》(“Negotiating New Asian-American Masculinities: Attitudes and Gender Expectations”),载《男性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Men's Studies*),第7卷第3期(1999年),第391页。

② 对亚洲男人这种模式化的肯定使人想起日本女性那种把男同性恋幻想成“美男子”的方式。参见麦克莱兰(Mark J. McLelland):《现代日本男同性恋:文化神话和社会现实》(*Male Homosexuality in Modern Japan: Cultural Myths and Social Realities*),柯曾出版社2000年版。

③ 例见卡门·卢克(Carmen Luke)和艾伦·卢克(Allan Luke):《跨种族家庭:异中存异》(“Interracial Families: Difference within Difference”),载《种族与民族研究》(*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第21卷第4期(1998年),第728—754页。

④ 一国党在20世纪末澳大利亚的崛起就是一个例子。在关于美国黑人的话语中还可以找到更尖酸刻薄的表达。例见费伯(Abby L. Ferber):《“白种男人的耻辱”:当代白人至上主义话语中不同种族间的性和白人男子气概的构建》(“‘Shame of White Men’: Interracial Sexual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hite Masculinity in Contemporary White Supremacist Discourse”),载《男性特质》(*Masculinities*),第3卷第2期(1995年),第1—24页。

⑤ 卢克(Carmen Luke)和卡林顿(Vicki Carrington):《至关重要的种族》(“Race Matters”),载《跨文化研究杂志》(*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第21卷第1期(2000年),第5—24页。

⑥ 瑞安(Jan Ryan):《“她和个中国佬一起生活”:东方化法庭上的“白种”女人》(“‘She Lives with a Chinaman’: Orient-ing ‘White’ Women in the Court of Law”),《澳大利亚研究杂志》(*Journal of Australian Studies*),第18期(1999年),第149—159,216—218页。

⑦ 卢克(Carmen Luke):《跨种族家庭中的白种女人:关于杂糅、女性身份及种族他者的思考》(“White Women in Interracial Families: Reflections on Hybridization, Feminine Identities, and Racialized Othering”),载《女权主义期刊》(*Feminist Issues*),第14卷第2期(1994年),第52页。

克和艾伦·卢克所探讨的异族婚姻并不比“一般”的婚姻更糟糕。事实上,与似乎面临着更多社会接受问题的老一代不同。

我们访问的所有二三十岁的夫妇在谈到他们之间的差异时都把它当作一种独特的、正面的和确认中的特点:“一半一半”、我们“自己的方式”、“不同的方式”、“第三条道路”。不像一些曾经历了非殖民化和战后重建的老一辈,没人提到或似乎了解异族通婚在澳大利亚或亚洲原籍国曾经遭受的历史污名。<sup>①</sup>

自老舍的《二马》之后,关于中国人与白人恋爱的态度显然出现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促成这些变化的因素很多。就中国男性特质而言,导致这种新找到的自信最重要的因素与来到并在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长大的那些男人有着错综复杂的密切关联。他们都受过教育。在中国的文化框架内,他们被视为拥有保证他们男性身份感的“文”的素质。尽管英语可能有待提高,但他们有着在居住国取得成功的意志和自信。这种成功在相当程度上被当作是重拾的男子气概的一部分,而这种男子气概是以“文”或学业上的成功来衡量的。

“文武”体系已在西方男性特质的遮蔽下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可能是近年西方国家男子气概的定义发生变化的一个必然结局。以澳大利亚为例,在那里发展起来的多样化的、截然不同的男性特质是在性别、文化两方面差异逐渐得到认同的另一个反映。但这种认同还不够彻底。例如,澳大利亚的华裔男同性恋者才刚刚开始 in 公共场合公开表达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仍然受到了同性恋社区东方化的对待。<sup>②</sup> 然而,

① 卡门·卢克(Carmen Luke)和艾伦·卢克(Allan Luke):《论跨种族家庭与混血身份:澳大利亚视角》(“Theorizing Interracial Families and Hybrid Identity: An Australian Perspective”),载《教育理论》(*Educational Theory*),第49卷第2期(1999年),第231页。

② 例见艾尔斯(Tony Ayres):《中国娃娃——一个华裔澳大利亚同性恋的经历》(“China Doll—The Experience of Being a Gay Chinese Australian”),载《同性恋杂志》(*The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1999年第36卷第3/4期,第87—9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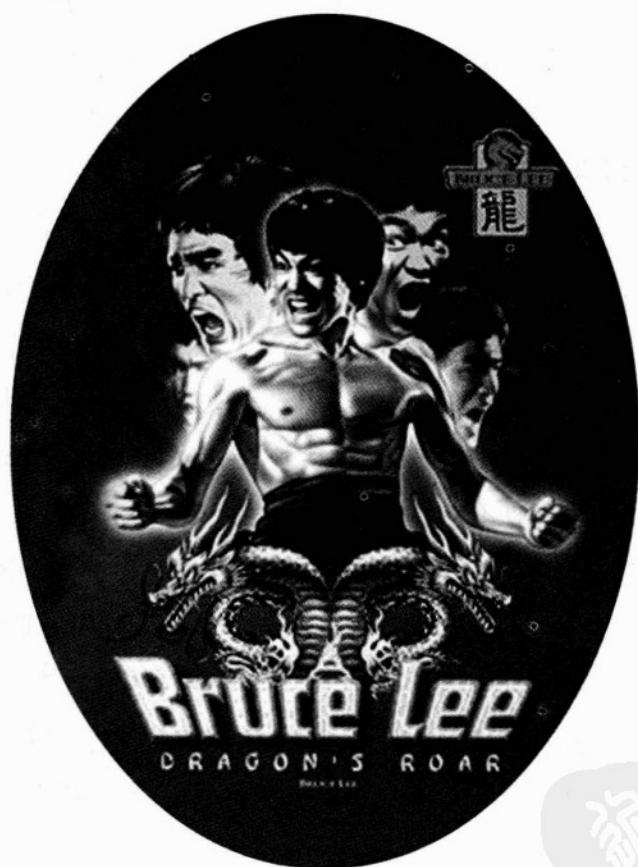
正如西方一些关于男性特质最精彩分析出自酷儿研究,华裔同性恋者在性别和性的创作上日渐增长的参与同样也只会进一步对中国的男性特质去魅化。<sup>①</sup>此外,就像商业利益占据了悉尼狂欢节等庆祝性的多样性的节庆日,工商业已用特定的方式接受了多元文化,例如,付费电视提供“外语”频道的多样选择。一些纯粹主义者可能会谴责这种纳入主流的做法是商业化的结果,但正是将差异融入商业“主流”体现出了整个 20 世纪性和文化解放运动在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成功。当我们进入 21 世纪时,有迹象显示,这一进程还将继续发展下去,“文武”也将成为全球男性特质构造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sup>②</sup>

---

① 参见伍德尧(David L. Eng)和霍姆(Alice Y. Hom)编:《问与答:亚裔美国同性恋者》(“Q&A: Queer in Asian America”),天普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中的相关论文。

② 我要指出的是,本章中我所讨论的作品最初都是由中国人写给中国读者的。它们因而代表了作者们希望中国读者们看到的自我形象。近几年来,出现了不少描写白人与亚裔幸福婚姻的英文作品。令人好奇的是,这些书大部分是由亚裔女性撰写的。尹瑞京(Suh-kyung Yoon)在一篇关于近期由郑念、张戎、穆爱萍、高安华创作的畅销书的评论中指出,这些中国女性作者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她们遵循了这么一个套路:“一个年轻的女人在中国苦苦挣扎挺过了‘文革’……在西方找到了健康、幸福——和一个丈夫”。尹瑞京:《哭泣游戏》(“The Crying Game”),载《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第 164 卷第 14 期(2001 年),第 64 页。这些流行的回忆录和小说打破了某些方面的刻板印象,而相反的力量也同样存在。

第八章 李小龙、成龙和周润发：国际化的  
“武”的男性特质



李小龙海报



在这一章,我们将分析电影巨星李小龙、成龙和周润发的影响,以探讨在现代西方情境中“武”的形象是如何实现转化的。通过这一过程,我将对“文武”男性特质的中国概念中“武”的一半在与男性特质的西方(好莱坞)构建动态交互中演变的方式进行评估。本章关注的三位男演员,是三位在好莱坞“闯出了天下”的男性中国艺人。而明显起源于亚洲的功夫片也是唯一在世界各地的电影院中取得了主流地位的非西方电影形式。<sup>①</sup> 李小龙、成龙和周润发的电影拥有共同的香港源起,为追踪 20 世纪最后几十年中西互动的轨迹提供了理想的文化场所。尽管中国已将香港作为地理实体重新吸纳,香港却能够并真正体现自己既传统又现代的一面;这三位演员都曾尝试并成功地在中国、美国以及许多后殖民地观众的观念中取得了一席之地。

尽管有着举足轻重的偶像地位,中国“严肃”的学术话语却很少提及这些超级巨星。这并不足为奇。顾名思义,“文涉”及的是那些和高雅文化、文学创作有关的东西,文人认为“武”在获得特权和权力上不那么重要,当然就对“文”持有比对“武”更多的敬意。正如韩宁(Stanley Henning)最近指出的,“学术界对中国武术的理论评介之匮乏已经成为非常突出的问题。即便有所涉及,通常也都浅议辄止、杂乱无章,不超出市面上流行的武侠小说的范畴。这一点,从分散的点滴议论到李约瑟的汉学巅峰之作《中国科技史》,已反映在了学术梯级的每一阶上”。<sup>②</sup>

诚然,自 1970 年代以来高等教育飞速扩张,许多从未被视为大学课程的学科,如运动人体学和休闲研究,现已进入了教学课程。然而,尽管武术培训学校和其他功夫行头用具的数量在中国乃至其他国家早已激

① 以下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大多数音像租赁店现在已设有功夫电影专区,由白人演员如查克·诺里斯(Chuck Norris)、尚格·云顿(Jean-Claude Van Damme)和史蒂文·席格(Steven Seagal)以及其他中国功夫明星如李连杰、洪金宝和杨紫琼主演。

② 韩宁(Stanley E. Henning):《学术遇上武术》(“Academia Encounters the Chinese Martial Arts”),载《中国研究书评》(*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第 6 卷第 2 期(1999 年秋),第 319 页。

增,但就整体而言,中国武术还不是学术界认可的主流课程。<sup>①</sup> 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正如我在分析孔子的那一章里讲到的,孔圣师自己就把御车和射箭两项属于武技的课程定为君子的必修技能。但到了唐代,科举考试的结构和重要地位决定了“文”才是功成名就的唯一标准,而“武”的作用则退居无关紧要。在第五章中,我们已经检视了“武”在当代中国的转变历程以及“武”怎样仍被当作是劳动阶级的男性特质。在这一章中,我将探究它在中国大陆境外的建构。

功夫电影对这一分析而言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来源。和学术界不同,票房不是一个“学术梯级”:它是一个以大众需求来衡量成功与否的、更为民主的工具。香港(及其派生的好莱坞)电影是在全球情境下揭开中国男性特质的理想之所。正如刘国华(Jenny Lau)在她对中国内地和香港电影的比较中总结的:“虽然香港电影对传统持讽刺的态度并已明显西化,但它们在本质上却仍属于中国。”<sup>②</sup>更重要的是,就西方观念里的中国男性特质而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银幕形象是大多数人见识到“活生生”的中国男人的形象及其日常行为的唯一途径。在过去的30多年间,香港电影向西方展现的大多是“流行”文化的一面。然而,在功夫电影兴起之前,中国男性特质的形象大多是由非华裔男子表演的。正如我在上一章中显示的,在20世纪初,马可·波罗笔下神奇的古代中国(Cathay)早已让位给充斥着犯罪、鸦片和未开化异教徒的阴暗景象。英国作家洛莫尔(Sax Rohmer)的创作成为描写中国男人最流行、最有影响力的书面文本。他在《奸诈的傅满洲博士》中详细展示了“一个具体的黄祸的化身,傅满洲博士,在想象中的形象”。这一想象的形象应该是“这

① 例如,互联网上的搜索引擎通常情况下会生成200000多个匹配关键词“功夫”的网址,包括武术俱乐部、影迷网站、书籍以及训练班。

② 刘国华(Jenny Kwok Wah Lau)(在书中Lau也拼作Loh):《中国内地与香港流行电影的文化演绎》(“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pular Cinema of China and Hong Kong”),载裴开瑞(Chris Berry)编:《透视中国电影》(*Perspectives on Chinese Cinema*),英国电影学院1991年版,第173页。



样一个人，瘦高，耸肩，像猫一样地不声不响，行踪诡秘，长着莎士比亚式的眉毛，撒旦的面孔、秃脑壳、细长眼，闪着绿光”。<sup>①</sup>

这是个臭名昭著的恶魔形象，但任何与真正的中国人有过密切接触的人都很难想象一个人何以凭空捏造出这样一个恶灵作为中国男人的象征。除了不协调地长着莎士比亚式的眉毛、撒旦的面孔，洛莫尔显然也从来没有留意过任何一个中国人眼睛的颜色。事实上，尽管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许多以傅满洲的故事为基础连续剧和电影，饰演傅满洲的演员中却没有一个是中国人，而其中最知名的傅满洲是由著名的恐怖电影演员波利斯·卡洛夫(Boris Karloff)出演的。因此，在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间，那些在屏幕上令欧美观众感到恐惧、着迷的阴险狡诈的黄种男人，在现实中压根就不是中国人。无论真实与否，对“黄祸”的恐惧直指一个没有安全感的西方男性特质的要害，因为“野蛮、阴险的中国人在一集又一集最轰动的电影和漫画里对白人处女垂涎三尺。强奸的威胁——对白人社会的强奸——主导着黄种人的行为模式”<sup>②</sup>。

即使在中国男性形象不完全是个恶棍时，譬如在上一章中所讨论的大卫·格里菲斯(D. W. Griffith)改编自伯克的《中国佬和孩子》的电影男主角，毫无疑问，他也是个性变态。<sup>③</sup> 男主人公程环迷恋地抚摸了一个12岁的白人少女。女孩的父亲因而将她虐待至死。程环随即杀死了女

---

① 洛莫尔(Sax Rohmer):《奸诈的傅满洲博士》(*The Insidious Dr. Fu-Manchu*)，金字塔出版社1961年版，第17页。

② 贺宾斯丹(Gary Hoppenstand):《黄皮肤的恶魔博士与鸦片烟馆:大众传媒娱乐中黄祸刻板印象的调查》(“Yellow Devil Doctors and Opium Dens: A Survey of the Yellow Peril Stereotypes in Mass Media Entertainment”)，载盖斯特(Christopher D. Geist)和纳赫巴(Jack Nachbar)编:《大众文化读本》(*The Popular Culture Reader*)，博林格林州立大学普及出版社1983年版，第174页。

③ 相关讨论参见马兰清(Gina Marchetti):《浪漫与“黄祸”:好莱坞小说中的种族、性与话语策略》(*Romance and the “Yellow Peril”: Race, Sex, and Discourse Strategies in Hollywood Fiction*)，加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5页。

孩的父亲。程环以这种方式加强了把跨种族性关系与乱伦、虐待、恋童癖、恋尸狂和谋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方学观念。正如马兰清(Gina Marchetti)指出的,在故事的结尾,由于“程环通过自杀象征性地惩罚了自己的罪行”,正统的种族和性别秩序得到了维护。<sup>①</sup>因此,早期好莱坞电影对中国男性特质的刻画是由恐惧、厌恶以及强加的性变态幻想而组成的混合体。

不过,比起英国,美国社会的种族更为多元,美国与中国在二战中的同盟关系也更为紧密。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略少了些可憎、可悲之处的中国男人的形象终于在美国出现。例如,1925年和1949年之间有48部关于“陈查理(Charlie Chan)”(纯美国制作)的故事片面世。它们都改编自厄尔·比格斯(Earl Derr Biggers)的六部小说,陈查理在其中是个维护美国法律系统的华人侦探。他说着洋泾浜英语,以满嘴都是“孔夫子说”开头的“东方格言”而闻名。即使陈查理是“作为对傅满洲所表征的中国(男性)的一个驳斥”塑造而成的,但就像陈河咏(Gloria Chun)所说,他“缺乏自信和性欲……(并)总是自认有错”。<sup>②</sup>陈查理这个人物符号是在中国遭受西方列强欺凌并逐渐为日本侵略蚕食的时候创造的。因此,他不是个威胁性的人物。美国可以、也确实在以高人一等的态度对待中国人,一个中国人的“正面”写照因而也无非就是个好脾气的、被阉割了的华人男子,最喜欢说的话是:“太对不起了。我犯了愚蠢的错误。队长——你会不会原谅我?”<sup>③</sup>更糟糕的是,陈查理这个角色也从来

① 相关讨论参见马兰清(Gina Marchetti):《浪漫与“黄祸”:好莱坞小说中的种族、性与话语策略》(*Romance and the “Yellow Peril”: Race, Sex, and Discourse Strategies in Hollywood Fiction*),加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② 陈河咏(译音)(Gloria Heyung Chun):《孤儿与勇士:创造华裔美国文化与身份》(*Of Orphans and Warriors: Inventing Chinese American Culture and Identity*),罗格斯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陈查理网(<http://www.charliechan.net>)对陈查理系列有完备的介绍,包括扮演过陈查理的演员的图片和生平。

③ 同上。

没有由一个中国演员扮演过。<sup>①</sup>

这些男性刻板印象是由非中国人为非中国观众创造的。这一事实从他们男性特质的构建方式就可以看出来。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所看到的,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所有的男人从概念上说都多少有些“文”和/或“武”。中国文化可能指摘曹操这样的反派人物滥用其文才或是武略,但至少他们是有“文武”在身的。而那些等而下之的人物,比如西门庆这种讽刺地模仿文武兼备男人的角色,则被塑造为道德败坏、活该受到惩罚的个体。相比之下,恶魔化身傅满洲之类的“黄祸”形象“往往被描绘得像野兽(狼、老鼠、秃鹰等)一样,强壮、狡猾、凶残……邪恶的那类动物”。<sup>②</sup> 在中国的民间传说中,最接近的类比应属狐仙——这种半人半兽、化身人形时通常为女性的类群,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看到的,一般都被剥夺了“文武”属性。

尽管傅满洲和陈查理的人物原型对西方人来说或者深具威胁或者神秘莫测,但在中国男性特质的模式下他们则不可理解。“文武”体系根本无法把他们当作中国男人收罗进来。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是文化和种族的再现:除了由创作者和观众共谋的中国设定,他们身上没有分毫的中国色彩。而这种共谋在经历了冷战、越战之后,虽程度略减,却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比如詹姆斯·邦德电影中“不博士”(Dr No)的形象。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反越战和民权运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种族和性别的看法。西方对中国男人的态度也开始发生转变。这些变化是国际关系中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革的结果。在诋毁中伤的同时,西方人也不得不承认越南人是勇敢的战士。此外,尽管人们仍然在以东方学的

---

① 这并不是因为没有能说洋泾浜英语的中国演员。例如,陈查理的儿子们都是由华裔美国演员扮演的。有趣的是,在老舍的《二马》里,针对马家古玩铺子的骚乱是由老马在一部辱华的电影里演了个群众演员引起的。

② 贺宾斯丹:《黄皮肤的恶魔博士与鸦片烟馆:大众传媒娱乐中黄祸刻板印象的调查》,第174页。

模式审视东方,但起码嬉皮士和一些大学教授已接受了东方神秘主义。日本经济实力的上升和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举办使柔道作为一种奥运会运动项目得到了承认。亚洲武术随之日趋普及。<sup>①</sup> 亚洲男性有时也会被表演成孔武有力的样子,以至于在风靡一时的电视连续剧《功夫》(1972—1975年首播)中,美国公众对接受一个被设定成有一半中国血统的男人“蚂蚱”金贵祥(由大卫·卡拉丁 David Carradine 扮演)作为剧中男主角已没有问题。

这部电视连续剧的影响不可低估。除了许多直接出自中国古代哲学典籍如道家经典的说教,这个系列起到了传播反种族主义信息的效果。例如,在1973年3月15日播出的第1季第10集《阿莱西亚》(Alethea)中,9岁的阿莱西亚(朱迪·福斯特饰)和金贵祥交往友善。但在一名男子遭到枪击时,阿莱西亚指证她看到了枪手金贵祥。金贵祥因此被逮捕并被判处死刑。“当金贵祥被押上断头台时,阿莱西亚制止行刑,并宣布她在作证时撒了谎。她当时只不过因为金贵祥是个中国人就说他是凶手。金贵祥获释。看到阿莱西亚因为自己的不诚实而郁郁不乐,金贵祥主动请缨,希望能把她从谎言的重负中解脱出来。他追踪到两个匪徒的下落并将他们绳之以法。”<sup>②</sup>金贵祥用精湛的功夫一如既往地 为所有观众重建了正义与安宁的感觉。与此同时,这部电视连续剧也向西方观众推广了中国武术,并反复传递出这样的信息:美国人误解也不懂欣赏东方的“智慧”与中国男人的真正价值。

## 龙争虎斗李小龙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拍摄《功夫》系列剧这个设想显然是由李小龙在

<sup>①</sup> 2000年悉尼奥运会第一次把柔道纳入了比赛项目中。

<sup>②</sup> 剧情介绍参见 <http://www.dm.net/~karen/kungfu/kungfu1.html>。

成功扮演了《青蜂侠》系列中的加藤这个角色后向制作公司建议的。<sup>①</sup>但是,令他(和他的影迷)反感的是,制作公司最终把金贵祥这个角色给了大卫·卡拉丁——一个“对武术狗屁不通”的白人演员。<sup>②</sup>制作人的假设很可能是正确的,美国公众的确可能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一个“东方”面孔作为英雄主义或男子气概的象征。从长远来看,好莱坞那时对李小龙的拒绝被证明是中国男性特质在西方演进的转折点。李小龙去了香港,并在短短2—3年的时间里拍摄了4部半电影。在香港的土地上,他终于能够发展出一个既是中国的、又风靡了大批西方电影观众的中国男性特质模型。

阿历克斯·布洛克(Alex Ben Block)曾于1973年在《时尚先生》上发表文章为李小龙在美国的出现推波助澜。他观察到,李小龙尤其吸引那些年纪轻轻、一无所有的男性观众。“李小龙不只对亚洲人来说是个英雄,对年轻的非洲裔美国黑人或其他各种少数族裔,甚至来自较贫困经济背景的白种人,也是一样。他代表着这样一个人,他似乎能够打破一切的社会束缚和所有阻碍我们成功的东西。”<sup>③</sup>作为一个低下阶层的英雄,李小龙打抱不平、为胜利勇往直前。而这些特点是“武”的男性特质的主要标准。当1970年代初海内外中国人都急切地试图得到国际认可时,李小龙在种族和民族上的意义就显得格外重要。

李小龙电影的一大核心主题是反抗种族压迫。他在1971年拍摄的电影《大老板》(*The Big Boss*),中文又名《唐山大兄》,把他推上了明星宝座。唐山是海外华人对中国的称呼,所以这部电影的中文名就含着“祖国来的大哥”的意思。这是个半真实的故事,讲述一名泰国华人如何帮助同胞工友反抗制毒、贩毒的泰国恶霸。李小龙扮演的角色用他的功夫

① 蓝潮:《李小龙全传》,名流出版社(香港)1999年版,第199—201页。

② 影迷网站“李小龙圣地”(The Shrine to Bruce Lee),[http://www.ocf.berkeley.edu/~chenj/brucelee/bruce\\_timeline.html](http://www.ocf.berkeley.edu/~chenj/brucelee/bruce_timeline.html),第4页。

③ 里特(John R. Little)编:《李小龙:大师语录》(*Bruce Lee: Words from a Master*),当代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技艺打败了在当地欺压中国工人的黑帮打手。在他 1972 年的电影《精武门》(又名《愤怒的拳头》)中,李小龙饰演著名武术家霍元甲的弟子陈真。<sup>①</sup> 霍元甲是精武门的创始人,在上个世纪之交因为和日本人作对而被毒杀。在霍的葬礼上,日本武馆送来上书“东亚病夫”四个大字的匾额。葬礼后,李小龙扮演的陈真只身来到日本武馆,说:“告诉你们,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他把一班日本浪人打得横七竖八,逼着日本人把匾额吃进肚子,还击败了日本武馆请来的俄罗斯空手道冠军。也是在 1972 年,我们看到电影《猛龙过江》中李小龙饰演的角色唐龙在罗马竞技场击败了七届空手道世界冠军、演员查克·诺里斯(Chuck Norris)。对李小龙来说,1972 年是繁忙的一年,因为他同时还在拍摄电影《死亡游戏》。电影中有他和身高 2 米 23 的黑人篮球明星阿卜杜-贾巴尔(Abdul-Jabbar)的精彩对打场面。<sup>②</sup> 由此,李小龙被塑造成了能征服各种肤色、各类体型对手的人物。

在《死亡游戏》拍摄完成前,李小龙受邀在《龙争虎斗》中扮演主角。这部电影后来“成了史上最著名的武术电影”。<sup>③</sup> 李小龙在影片中将一整队打手(有亚洲人也有白人)打得落花流水。虽然《龙争虎斗》在香港市场没有他的其他几部电影那么成功<sup>④</sup>,但这是唯一一部由美国人导演、好莱坞电影公司(华纳兄弟和李小龙自组的协和电影公司合拍)制作的李小龙电影。它为李小龙赢得了国际声誉,以至于李小龙的名字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是中国武术的代名词,而他的武术派别也被当作正宗的真功夫仿效。有意思的是,这部电影“受到了洛莫尔笔下傅满洲小说系列的启发,基本上是

① 关于霍元甲我们知之甚少。他生于 1869 年,1910 年打败了一个日本武师。之后他的行踪成谜。

② 龙比意(Bey Logan):《香港动作电影》(*Hong Kong Action Cinema*),泰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43 页。

③ 同上书,第 37 页。

④ 香港票房概要图见同上,第 37 页。

《不博士》(1962)的翻版”。<sup>①</sup>当然,两者的差别在于:这里的英雄不再是詹姆斯·邦德,而是一个中国男人。更重要的是,这个英雄是由一个中国演员扮演的。中国男性特质第一次占据了好莱坞舞台的中心。

饶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中国学者批评李小龙和傅满洲、陈查理、不博士一样,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他们认为他的银幕形象“刻板、单薄”。<sup>②</sup>他们把李小龙扮演的人物和“艳遇不断,风流韵事不停”的美国式英雄詹姆斯·邦德作了对比。对李小龙“把东方男子刻画成性无能、性冷淡的无用之徒”的指控应予特别关注。因为这种批评对中国男人来说具有普遍性。要不是缺乏性象征,中国男人几乎无所不能。我们首先要指出的是,只要礼俗许可,李小龙几乎在所有的打斗场景中都会脱掉衣服,尽可能地展示他兼具优美与硬朗的完美身材。他的身体必须在其历史背景下进行解读,而不能简单地归为“呆板”了事。正如伊冯娜·塔斯克(Yvonne Tasker)指出的,“李小龙身体和明星形象的硬朗浮现于一段软弱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中国的男人和女人都被表现成被动、柔顺的形象”<sup>③</sup>。

更重要的是,李小龙的银幕角色对由依依、苗可秀等美丽女星扮演的年轻女子其实颇富浪漫的吸引力。他只是没有把这些艳遇用明确露骨的方式在银幕上十足地表现出来。不过,考虑到当时预期的是香港及其他东南亚的观众群<sup>④</sup>,银幕上确已展现出来的亲吻和拥抱,已经算是那个时代公共道德所能允许的极限了。对这些观众而言,毫无疑问,这些女演员秋波顾盼中对李小龙身体的渴望,即便不比和007调情的邦德女

① 香港票房概要图见同上,第37页。

② 吴剑平:《好莱坞与丑陋的中国人》,载李希光、刘康:《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页。

③ 塔斯克(Yvonne Tasker):《精武门:武侠电影中的种族话语与男性特质》(“Fists of Fury: Discourses of Race and Masculinity in the Martial Arts Cinema”),载斯特科普洛斯(Harry Stecopoulos)、乌贝尔(Michael Uebel)编:《种族与男性特质主体》(*Race and the Subject of Masculinities*),杜克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页。

④ 在这里我指的是《龙争虎斗》之前的电影。

郎更强烈，程度也差不多。如果我们再把“文武”在性上的动态变化套用在李小龙的银幕形象上，那么，他在性上的男子气概就昭然若揭了。

就像传统故事中“武”的英雄那样，即使得到身边女性的芳心，李小龙所扮演的角色也不会像文人一样和这些美女谈情说爱：他总是先顾及自己的社会义务。这些义务包括了对师傅的极度忠诚、为家人和朋友报仇雪恨、在道德和性上保持白璧无瑕。这种正直与坚贞使他比欧洲骑士和三个火枪手显得更加拘谨规矩。但作为一个武术大家，比起《三国》关羽和《水浒》武松那些只会把对他们有想法的女人除掉的“武”的英雄，他已经进步了很多。对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观众群来说，李小龙所扮演的角色，远非呆板，而是散发着强大的性的气息。

在《猛龙过江》中，我们可以从替意大利黑手党工作的中国翻译身上找到将种族与性进行对接的最趣味横生的表达。这个翻译被塑造成一个搞笑的同性恋。其中有一幕，他把腰带塞进李小龙的裤子，并色迷迷地把手留在里面。在另一幕中，他用手在李小龙的身体上摩挲，感叹这“浑身的肌肉”。这个角色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是个中国人，但他为邪恶的欧洲人工作。他因此得以跨越种族的障碍。而他的性取向正反映了这种逾越。尽管有这种可感知的跨越，毫无疑问他对李小龙的身体仍“性”致勃勃。与此相反，在詹姆斯·邦德那里就很难找到这种露骨的同性色情行为。尽管邦德的超级男性特质可能会迷倒许多的英俊男人，但他在银幕上从来也没有被展现为另一个男人的欲望对象。通过研究李小龙的电影，陈嘉金(Jachinson Chan)认为，“李小龙扮演的人物似乎在鼓励同性对他身体的欲望”，“一个矛盾的或含混不清的男性特质模型，是更有效的对抗占支配地位的男性特质模型的方式”。<sup>①</sup>

李小龙电影以自己的方式超越了文化边界。为适应海外华人新的

<sup>①</sup> 陈嘉金(译音)(Jachinson W. Chan):《李小龙男性特质的虚构原型》(“Bruce Lee's Fictional Models of Masculinity”),载《男人与男性特质》(Men and Masculinities),第2卷第4期(2000年),第385页。



文化融合,它们对男性特质的塑造也因而作出了相应的调整。随着电影产业的出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此外,八卦专栏制造出的明星效应往往比演员塑造的银屏人物更具影响力,这对李小龙同样适用。他的诸多绯闻为影迷所熟知,而“武”的英雄可不该与这种桃色事件有牵连。依据“文武”原则,和女人上床的应该是才子,而不是武夫。他的崇拜者,就像之前关羽的崇拜者一样,对自己的偶像进行了改造。现在的李小龙被重新塑造为一个哲学家、教师、功夫名家<sup>①</sup>,堪称文武双全。武人在性上的清教主义约束因而可以松弛下来。事实上,一些中国的传记作者,如卢越说,由于是个白人,他的妻子琳达态度开放,“不介意”他和其他女性继续保持友谊!<sup>②</sup> 这位作者把种族与性混在一起,认为李小龙的风流行径像个“老外”——这指的是他的白人血统(他的母亲有一半中国血统)和出生于美国的事实。

在李小龙之后,功夫就不只是舞狮子、放爆竹了。世界各地的男人(和女人)都知道了点儿东方武术或者“武”的男性特质,对其中国渊源也深信不疑。李小龙的男性特质之所以得到了观众的广泛接受,是因为它所创造的男性样本填补了20世纪下半叶人们所体会到的强烈的空虚感。在最近的一篇敏锐、深刻的论文中,大卫·德瑟(David Desser)指出,“西方的‘功夫’热潮是越战后应激障碍症在文化层面上表现出来的电影符号之一,其他符号还包括了大量反映越战老兵在归国后陷入困惑的电影……更确切地说,白人武术明星的兴起在某种意义上把亚洲武术融入了美国动作英雄、美国影星和美国男人”<sup>③</sup>。这是从美国人的角度对

① 例如,传记作家米勒(David Miller)详细记录了李小龙怎样在精神和个人发展上鼓舞了他。米勒:《李小龙之道》(*The Tao of Bruce Lee*),古典书局2000年版。

② 卢越:《李小龙传奇》,皇冠出版社(香港)1996年版,第67页。

③ 德瑟(David Desser):《功夫热:美国首次接受香港电影》(“The Kung Fu Craze: Hong Kong Cinema's First American Reception”),载傅葆石(Poshek Fu)、德瑟(David Desser)编:《香港电影:历史、艺术、身份》(*The Cinema of Hong Kong: History, Arts, Identity*),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李小龙现象的重要性作出的一种解释。<sup>①</sup> 它直指美国男性在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及对中国男性特质的借鉴、吸纳。<sup>②</sup>

与此相反，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李小龙现象可以解读成中国“武”的男性特质重新打入了国际舞台。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看到的，在整个20世纪与西方的接触中，对其男性特质的肯定是中国备加关注的要点之一。在最近一本关于中国武术的书的结尾，作者用霍元甲如何在1909年向世界各地的武术家邀战来表达练武者的民族主义情结。他坚持认为，中国若想在功夫上打遍天下无敌手，就必须保持这种民族主义精神。<sup>③</sup> 各种族男性特质的竞争因而在功夫电影的崛起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李小龙确实是用拳脚打出了他的名声。在《唐山大兄》中，他打得东南亚恶霸们闻风丧胆。在《精武门》中，他打得日本浪人一败涂地。《猛龙过江》中，他胜了世界空手道冠军查克·诺里斯所扮演的白人男子。在《死亡游戏》中，他击败了黑人篮球明星贾巴尔。与所有“武”的英雄一样，他在低下阶层和少数族裔——如美国黑人、拉美裔以及新西兰的毛利人——中尤其受欢迎。在非西方世界，如埃及和其他中东国家，他也拥有众多影迷。<sup>④</sup>

## 好好先生成龙

当然，李小龙最受欢迎的地方是香港，以至于他在32岁英年早逝

① 硬汉新右翼电影对“越南创伤”的反应在《男性至上的焦虑》这一章中也有中肯的分析，参见奥尔(John Orr):《当代电影》(*Contemporary Cinema*)，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209页。

② 关于功夫电影如(1985)和(1993)，参见莫里斯(Meaghan Morris):《向李小龙学习：武侠电影中的教育学和政治正确》(“Learning from Bruce Lee: Pedagogy and Political Correctness in Martial Arts Cinema”)，载提克坎曼(Matthew Tinkcom)和比利亚雷霍(Amy Villarejo)编：《关键帧：大众电影与文化研究》(*Keyframes: Popular Cinema and Cultural Studies*)，路特里奇2001年版，第171—186页。

③ 陆草：《中国武术》，广东旅游出版社1996年版，第271—273页。

④ 在这些国家从互联网上登入这些影迷网站是很容易的。

时,一大堆香港演员把自己改成了李小龙式的名字,如黎小龙(原名何宗道)、吕小龙(原名黄建龙)、梁小龙(原名梁财生)。但他们都没能制造出李小龙那样的轰动效应。唯一例外的是成龙。在英语中,成龙(Jackie Chan)和李小龙(Bruce Lee)的名字似乎没有什么共同点。但他们的中文艺名密切相关。成龙原名陈港生,后来导演罗维给他改名叫成龙——“要成为一条龙”,寓意就是要继承李小龙的衣钵。<sup>①</sup> 这些与龙有关名字直指男性特质的核心。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指出的,龙除了是中国的象征,也是有着伸缩自如、可软可硬能力的阳物象征。因此,“小龙”和“成龙”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明确地指向了男性理想。李小龙有两部电影的片名中有龙。事实上,从洪金宝最近的电视连续剧《过江龙》到李安的电影《卧虎藏龙》,很多功夫片和动作片都喜欢把龙放在片名里。

成龙对李小龙最初的模仿远不止名字。在《龙争虎斗》中,成龙还只是个跑龙套的替身演员,被李小龙的双节棍一下正中面门。<sup>②</sup> 但成龙毫无怨言,他承认李小龙“令世界关注武术电影——没有他,我不认为会有人听说过成龙”<sup>③</sup>。在《城市猎人》中,成龙以在自己的影片中播放李小龙与贾巴尔对决的场面来向前辈致敬。在一场特别艰苦的打斗中,成龙扮演的人物看着电影院银幕上李小龙打败高大对手的武打场面,把它全盘套用在了自己的实战中。

像所有其他想成为准李小龙的演员一样,成龙花了近十年时间试图模仿死去的大师。但他在早期的职业生涯中和大多数李小龙的赶超崇拜者一样济济无名。在对好莱坞演员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等人的分析

① 关于成龙所用过的各种名字的讨论,参见石琪:《石琪影话集:十八般武艺》,次文化堂有限公司(香港)1999年版,第35—36页。

② 成龙(Jackie Chan)和杨致和(Jeff Yang):《我是成龙:我的动作人生》(*I Am Jackie Chan: My Life in Action*),艾伦·昂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73—174页。

③ 同上书,第169页。

中，理查德·戴尔(Richard Dyer)认为，他们很难板着脸保持硬汉式的男性特质而不拿这种风格开涮。<sup>①</sup> 成龙的巨大成功是他在放弃了硬汉形象并彰显出另一种男性特质——“功夫喜剧演员”时才取得的。像龙一样，成龙也以使用自己身体的惊人能力而著称。他的招牌之一是在影片中播放自己亲自做特技和受伤的片花。<sup>②</sup> 和李小龙在被击中或被刀砍中时也毫不退缩不同，成龙利用一切机会表明他的神经末梢和新世代的任何一个男人一样敏感。尽管钦佩李小龙的阳刚之气，成龙对硬汉形象的消解最终营造出了这样的效果：以拘谨的关羽为代表的传统“武”的男性特质被进一步淡化了。

因此，成龙的讽刺之处在于对“武”的硬汉特点的重新排序与强调去除。和受过武术训练、自己也是一个武术教练的李小龙不同<sup>③</sup>，成龙出身于在传统京剧学校受训的武生。<sup>④</sup> 他的电影对赤手空拳的打斗场景编排更为程式化。打斗者经常摆开套路，让人联想起京剧。打斗虽然精彩，但其设计对武术技巧的涉及与对娱乐效果的追求基本上差不多。京剧，就像功夫电影，是使观众得到愉悦的表演艺术。在1970年代初，香港观众由观赏一位中国武打明星在政治、经济更强大的男人圈中称雄获得了满足感。到1990年代末，殖民地重新整合回归中国成为了实实在在的

① 戴尔(Richard Dyer):《美好的身体:明星与社会》(*Heavenly Bodies: Film Stars and Society*),麦克米兰1987年版,第12页。

② 他在拍摄现场受伤在他的影迷中非常闻名,有详细的记录一一列举。例见梁健:《成龙》,星力有限公司(香港)1997年版。

③ 李小龙在他进入电影圈之前就创办了一所武术学校。终其一生,他一直在教授他独创的截拳道及其武道哲学。他的弟子包括斯蒂夫·麦昆(Steve McQueen)和詹姆斯·柯本(James Coburn)。截拳道在他死后大行其道。现在有很多有关截拳道这种武术的书籍,如里特(John Little)编:《截拳道:李小龙武道释义》(*Jeet Kune Do: Bruce Lee's Commentaries on the Martial Way*),塔特尔出版公司1997年版;以及杂志,如由加州振藩截拳道核心出版的《李小龙》。

④ 对成龙在于占元京剧学院的生活记叙,参见成龙、杨致和:《我是成龙:我的动作人生》,第20—122页。

现实,香港市民仍然能从精彩的电影镜头中获得满足感<sup>①</sup>。但现在的英雄不能只挥舞双节棍横扫千军,他必须明了自己的局限,并能令观众捧腹大笑以舒缓他们的焦虑感。<sup>②</sup>

为此,成龙在他的电影中注入了大量的幽默元素。除了闻名遐迩的打闹杂耍,成龙还擅长用搞笑来溶解“武”的刻板观念。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尊重传统价值观——他只是表明,要想赢就不得不改变一些正统观念。成龙第一部在观众中掀起热潮的电影《醉拳》(1978)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成龙扮演年轻的黄飞鸿——以这位广东武术英雄为素材,已发展出了一大批热门电影。<sup>③</sup> 成龙所饰的黄飞鸿拜醉鬼苏乞儿为师,学习功夫。但黄又调皮又懒惰。更糟的是,他学的功夫套路被称为“醉八仙”。“醉八仙”由八个小节组成,其中一节以八仙中唯一的女性成员何仙姑为模型。成龙扮演的黄飞鸿认为这部分过于女气就没有好好地练习它。这几乎使他在与上门踢馆的肇事者的决斗中丧生,靠着在“酩酊大醉”中打破一切武学定律,他才绝处逢生、打败对手。

这个简短的剧情介绍并不能充分再现一部制作精良、令人捧腹的电影。然而,“武”的观念在其中的转变清晰可辨。这部电影里“武”的英雄不是李小龙那种坚不可摧、无所不能的银幕形象。事实上,黄飞鸿从一开始就被塑造成一个爱玩儿的调皮鬼。在评论黄飞鸿不情愿学习模仿女人的“娘娘腔”功夫时,成龙大大自嘲了一番。也的确不可想象关羽或

---

① 加拉赫(Mark Gallagher)观察到,作为他对事件男性掌控的一部分,“在他差不多所有的电影中,成龙都用打斗作为一种生存策略”。加拉赫:《翻译中的男性特质:成龙跨文化的明星文本》(“Masculinity in Translation: Jackie Chan's Transcultural Star Text”),载《电影评论》(*The Velvet Light Trap*),第39期(1997年),第28页。加拉赫从“女性逻辑”和它的吸引力方面对这种策略作了探讨。这也可以视作我在第四章中提到的韩非子的“逃离策略”。

② 中国学者常常对成龙的风格之所以更“轻松”有着另一番见解。他们认为“李小龙负载历史重负比成龙沉重得多,自然难得轻松”。胡克:《成龙电影中的喜剧性动作与暴力》,《当代电影》,第1期(2000年),第69页。

③ 关于黄飞鸿系列及其对香港电影工业的影响的描述,参见《香港武侠电影的发展与演变》,载《当代电影》,第3期(1997年),第44—52页。关于成龙改变黄飞鸿形象的方式,参见陈墨:《功夫成龙:从港岛走向世界》,载《当代电影》,第1期(2000年),第74页。

李小龙穿着女装在公共场合欢蹦乱跳。然而，这恰恰是成龙在他的几部电影中做的。票房是一种权力的矫平器。女性和青少年观众的购买力意味着娱乐不能只简单地照顾成年男性的观赏喜好。<sup>①</sup>

拉姆齐·伯特(Ramsay Burt)在最近一项对男舞蹈演员的研究中指出，舞蹈传统使观众倾向于采用男性视角，这导致了：“男性的舞蹈范围被大大局限于：第一，男性要支配、控制女性的身体；第二，富有男子气概的动作、姿态要强健有力。”<sup>②</sup>李小龙吸引的是被边缘化的青年男性，而成龙电影则旨在满足家庭的需要。他最狂热的影迷中有很多是年轻女性。<sup>③</sup>因此，他的肢体动作在刚健的同时也优美流畅。许多关于什么是男子汉的传统看法在这里被打破了。成龙的身体不像李小龙的身体那样“精壮”。当他露出赤裸的身体（他的身体也确实非常漂亮）时，我们受邀围观，哈哈大笑。例如，在《警察故事4：简单任务》中有一幕，成龙所扮演的角色被命令脱掉身上所有的衣服。一群中年白人女游客在经过时，不仅愉快地给他拍照，有一个甚至还捏了捏他可爱的屁股。电影中的这个顽皮动作是对窥淫癖的邀请。而银幕上的女人和银幕下的观众所观赏的对象则是这个裸体的英雄。在展示了对男性权力的抛弃之后，这位裸体英雄要在性上重振男性的主导和控制地位将困难重重。

这并不意味着成龙式的男性特质在对女性的魅力上不如李小龙。事实上，把自己变成可爱的供女性观赏的对象，可能使他对那些购买力强大的女性来说更富吸引力。比如，日本女观众。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成龙一直是在日本最受欢迎的外国男演员。<sup>④</sup>正如我们在第六章中所看

① 相关描述，参见梅杰(Wade Major):《成龙》(Jackie Chan)，地铁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② 伯特(Ramsay Burt):《男舞者：身体、景象、性》(The Male Dancer: Bodies, Spectacle, Sexualities)，路特里奇1995年版，第8页。

③ 有一件轰动一时的事：一个日本女影迷在发现成龙已婚时跳到高速运行的列车前自杀身亡。

④ 细节参见梁健：《成龙》。

到的,女人乐于对腼腆的年轻男人提供庇护并进行幻想,尤其当这个男人相貌英俊时。比起李小龙,成龙在道学气和自诩正义上并不逊色。<sup>①</sup>在他的许多部电影中都有男主角训诫歹徒和打手、要他们做负责任的好公民的场景。在采访和传记中,他都强调他的电影是干净的:没有性,没有暴力,没有脏话。他也避免谈论政治。<sup>②</sup>他想确保自己为少年儿童和中国当局所接受。他成功了。他的几部电影早在1993年就已经获准在中国内地正式上映。<sup>③</sup>1999年9月,在北京还召开了一次会议,以庆祝他的各项成就。在这次会议上,他的高尚道德和正义表现受到了高度赞扬。<sup>④</sup>

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成龙电影在东南亚获得了巨大成功。其中一些,比如《奇谋妙计五福星》(1983)和《警察故事》(1985)大受欢迎,连出续集。像他之前的李小龙一样,红透亚洲的成龙也想打入美国(国际)市场。1980年他拍摄了两部好莱坞电影《杀手壕》和《炮弹飞车》,但都票房失利。对成龙来说,这段经历中最糟的部分,是他发现美国人拿他当稀罕有趣的东西,希望他“像条训练有素的狗一样表演”,做些以掌裂石之类的事儿。<sup>⑤</sup>回想起来,他作出决定,“我不想钻更多的火圈儿来博取版面,也不想为是个中国人而感到任何羞耻……我知道我是谁。我是成龙。我可能说不了完美的英语,但请告诉我,在国外,有多少脱口秀主持人会说中文?”<sup>⑥</sup>

---

① 不过,就像李小龙,最近一些关于成龙私生活的丑闻,比如他有个私生女,表明他的道德准则也只是—种表演。

② 维特斯泰特(Renée Witterstaetter):《为动作而死:成龙的电影与人生》(*Dying for Action: The Life and Films of Jackie Chan*),埃伯瑞出版公司1998年版,202页。

③ 丹内(Fredric Dannen)、朗(Barry Long):《香港巴比伦:东方好莱坞内幕指南》(*Hong Kong Babylon: An Insider's Guide to the Hollywood of the East*),米拉麦克斯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④ 蔡洪声:《成龙的电影世界》,载《当代电影》,第1期(2000年),第65页。

⑤ 成龙、杨致和:《我是成龙:我的动作人生》,第262页。

⑥ 同上书,第263页。

在这次经历之后,成龙有十多年时间多多少少和好莱坞制作保持着距离。到了1990年代中期,他又再次出击。他主演的《红番区》(1994)和《警察故事四之简单任务》(1996)在澳大利亚票房大好。这两部由董韵诗任制片人、唐季礼任导演的电影都由美国新线电影公司负责向国际市场发行。此后,新线公司把成龙签给了一家好莱坞电影制作公司拍摄《尖峰时刻》(1998)。这部由布雷特·拉特纳(Brett Ratner)执导的电影是一个搭档动作喜剧片。成龙在其中负责动作部分,而克里斯·塔克(Chris Tucker)负责喜剧元素。《尖峰时刻》票房收入超过1亿美元,是“跨国华语电影”最成功的电影之一。<sup>①</sup> 但它的成功之处远非金钱所能衡量。一个中国人和一个黑人搭档组合,这种错置具有革命性的意义。<sup>②</sup> 通过扮演喜剧角色,克里斯·塔克使成龙有可能变得更“严肃”。《尖峰时刻》中的成龙一反惯常的休闲装扮,出场时总是一身西装,举止得宜。这个转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正式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的身份出现在大银幕,他的职责是保护中国驻美大使的利益、打击染浅了发色的中国罪犯和他背后的英国老板。现在,美国和中国香港的观众可以一起把他们对1997年香港回归后的不确定抛在脑后。不过,影片中设置的一头金发的中国罪犯,也在时刻提醒着人们:对种族和文化界限的侵犯是不可取的。为了社会秩序,这些界限应该得到维持。

① 这是《尖峰时刻》上映前不久发行的一本书的书名。这本书中的文章不但出色地表明了“跨国主义”的潮流,也是重要的学术论文。其中包括了对《红番区》的优秀分析,参见弗尔(Steve Fore):《成龙与全球娱乐的文化活力》(“Jackie Chan and the Cultural Dynamics of Global Entertainment”),载鲁晓鹏(Sheldon Hsiao-peng Lu)编:《跨国华人电影:身份、民族国家、性别》(*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 Identity, Nationhood, Gender*),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9—262页。

② 关于这部电影和成龙与黑人观众关系的精彩分析,参见马兰清(Gina Marchetti):《成龙及其与黑人的联系》(“Jackie Chan and the Black Connection”),载提克坎曼(Matthew Tinkcom)、比利亚雷霍(Amy Villarejo)编:《关键帧:大众电影与文化研究》(*Keyframes: Popular Cinema and Cultural Studies*),路特里奇2001年版,第136—158页。



除了这些政治和道德上的信息,成龙也可以在银幕上说出他过去十几年一直想对美国人说的话。在影片结束、出演职人员字幕时,成龙试着唱一首说唱歌曲,结果却弄成了一种滑稽的模仿。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他很喜欢音乐,是著名的粤语流行歌手。对他的尝试,塔克装出一副觉得很可怕的样子。接下来,轮到塔克试着用中文说“谢谢”。可这么简单的一个词儿,他就是怎么都说不好(不过,在电影中,这个词儿他说得还过得去)。成龙大笑着说:“你看,我讲英文。你试试讲中国话。这下你就知道这有多难了。你瞧我得多费力啊。”他的言下之意当然是,你看我有多棒,我已经能够用英语拍电影了,你却连简简单单说声“谢谢”都做不到。观众都知道成龙是什么意思:他很棒,不只因为他会说英语,还因为他的英雄主义。成龙的英雄主义虽然带着笑声,也是了不起的。他不用替身、亲自上阵,扬言自己拍戏时受伤无数、身体的每一根骨头都断过。现在,他还可以自夸,他能够控制另一种文化的语言,用使观众哈哈大笑和道德主义的说教征服美国。

2000年,成龙与欧文·威尔逊(Owen Wilson)合作拍摄了另一部搭档动作喜剧《上海正午》。这一次,成龙扮演一个御林军军官,被派到美国去拯救被绑架的中国公主。影片把故事的背景设定在19世纪末。这为成龙提供了足够的表演空间,让他表现出中国改变其旧有方式的必然性。这部电影也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探索空间,令我们关注到男性特质刻画的种族化。在这部电影中,负责搞笑的或者说负责制造麻烦的,是欧文·威尔逊饰演的罗伊,一个白人扒手。影片结尾时,罗伊已经开始像个睿智的中国人一样说话了。他被部分地中国化了。成龙成了比其他人“更好的男人”,无论他们的肤色是黄、是黑还是白。他用说教式的喜剧做到了这一点,而非李小龙愤怒的拳头或死亡游戏。

到了千年之交,中国男性特质似乎已成功地成为全球男性特质构建的一部分。许多新闻记者和《新闻周刊》的撰稿人一样,开始认为“亚洲

男人来势汹汹”<sup>①</sup>。有意思的是，这些记者觉得成龙在银幕上手手敏捷，没有辜负他作为李小龙继承人的名头。但他仍然是个过分男人的男人。对这些西方人来说，成龙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个刻板形象。他们认为：“陈查理是早期屏幕上的刻板典型，拘谨、费解。接着出现的刻板形象有中国仆人、鬼鬼祟祟的中国恶棍，以及李小龙这样从来也没有在银幕上搞定过女孩子的中国超人。然后是成龙，李小龙衣钵的继承人。‘他是一个滑稽的武术家，但你会跟他上床吗？’旧金山大学社会学教授丽贝卡·金(Rebecca Chiyoko King)这样问道。”<sup>②</sup>

这位教授的问题可以从“文武”方面来作个说明。成龙在男性特质上并不像之前“武”的英雄那么拘谨。但是，在用身体表演方面，他对功夫程式的依赖仍然很大。功夫电影的问题在于，程式化的情节与动作给它招来一个“给无聊观众看的无聊电影”的名声，就像布鲁斯·威利斯、史泰龙他们拍摄的动作片。<sup>③</sup> 在当代世界，“无聊观众”——包括没受过教育的女性——也可以有购买力。他(她)们也可能觉得一个没头脑的身体很有性的吸引力。不像在传统的“文武”结构中，吸引女人的总是“文”的男人。这位社会学教授的问题其实呼应着一种“文武”情结。中国的批评家也一直在提倡“武戏文唱”的观点。<sup>④</sup> 成龙本人也表示，他希望自己能“文”能“武”。<sup>⑤</sup> 不过，迄今为止，在这一点上，他还没有成功。

① 潘以斯帖(Esther Pan):《为什么亚洲男人来势汹汹》(“Why Asian Guys Are on a Roll”),载《新闻周刊》(Newsweek),2000年2月21日,第50页。

② 同上。

③ 塔斯克尔(Yvonne Tasker):《给无聊观众看的无聊电影:当代动作电影中的男性特质、身体和声音》(“Dumb Movies for Dumb People: Masculinity, the body, and the voice in contemporary action cinema”),载科恩(Steven Cohan)、哈克(Ina Rae Hark)编:《放映男性:探索好莱坞电影中的男子气概》(Screening the Male: Exploring Masculinities in Hollywood Cinema),路特里奇1993年版,第230—244页。

④ 余仲华:《武打片要“武戏文唱”》,载《电影艺术》,第2期(1996年),第65—66页。

⑤ 陈野:《成龙谈成龙电影》,载《电影艺术》,第2期(2000年),第14、60—62页。

## 世界上最酷的人：周润发

摒弃李小龙、成龙，《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在提名性感偶像时列举了其他几位亚洲演员。香港动作明星周润发就是其中之一。在影迷网站上，他被称作“演技之神”、“世界上最酷的人”等等。在1999年11月的《时人杂志》上，周润发当选“最性感的动作明星”。在国际声誉上，他是唯一一位能与李小龙和成龙比肩的香港男演员。然而，和李小龙、成龙不同，周润发的偶像地位并非建立在他的功夫(武)实力上。瑟科(Anne Ciecko)认为，周润发主演的《英雄本色》(1986年，吴宇森导演)“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动作片的出现”<sup>①</sup>。瑟科并没有贬低成龙。她指出，成龙的“特技动作是好莱坞动作电影的制作人长期模仿的对象”<sup>②</sup>。然而，这只是承认了成龙的武生地位。相比之下，周润发的银幕形象则并不仅仅依靠自己的身体或动作技巧。

在一项对动作电影的开拓性研究中，塔斯克尔确认了三种类型的动作英雄：明星、表演者和演员。<sup>③</sup> 明星用自己的身体主导银幕，常常是像史泰龙那样肌肉健美的类型。表演者往往擅长某种形式的运动技能，特别是武术。而演员则有能力塑造一个复杂的人物。李小龙虽然没有施瓦辛格和史泰龙那样的大块头，但他半裸的身体占据着银幕的主导。这个身体在影片中被摸索着、亲吻着、砍刺着。仿佛有这么一个身体还不够，在《龙争虎斗》结尾那场著名的镜室格斗中，我们面对的是无数个李小龙的半裸身体。他是一个明星。正如史蒂夫·福尔(Steve Fore)指出

---

① 瑟科(Anne T. Ciecko):《跨国动作片:吴宇森、香港、好莱坞》(“Transnational Action: John Woo, Hong Kong, Hollywood”),载鲁晓鹏(Sheldon Hsiao-pen Lu)编:《跨国华人电影:身份、民族国家、性别》(*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 Identity, Nationhood, Gender*),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页。

② 同上书,第232页。

③ 塔斯克尔:《给无聊观众看的无聊电影:当代动作电影中的男性特质、身体和声音》,第73—75页。

的，靠肢体动作取胜的成龙是一个表演者。<sup>①</sup>而周润发塑造了众多或沉静忧郁或热情奔放的银幕形象，他们“如此自然地拥抱着生活以至于要饱经各种痛苦与折磨”<sup>②</sup>，则是个演员的好例证。

就像瑟科指出的，“周润发擅长用富于表现力的肢体语言（通过‘表演’）而非身体来塑造人物形象；他当然不会依据健美的文化与美学趣味去‘拗造型’”。<sup>③</sup>周润发的几部招牌动作片如《英雄本色》、《喋血双雄》（1989）和《辣手神探》（1992），都将故事的发生设定在现代城市，其中也没有什么功夫元素。这原本意味着在“中国”味儿上它们应该差了点。在所颂扬的“武”的男性特质上它们应该也有不足。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周润发在这三部电影中饰演的人物，可以说与《水浒传》中梁山好汉所遵从的行为准则差别不大。特别是，同性交往纽带在这些电影中是重要又普遍的元素。英雄们随时准备并愿意为兄弟和荣誉牺牲自己的生命。所谓的“搭档”在这里可不是用来起轻松喜剧作用的；他们是极其危险的对手，或像刘备、关羽那样的“兄弟”。

托尼·威廉姆斯（Tony Williams）在探讨导演吴宇森时指出，他执导的《英雄本色》和《辣手神探》——这些也是周润发的代表作品——把“英雄表现为 20 世纪的中国骑士。他们既遵循忠诚与友谊的传统准则，同时也具有现实的意义”。<sup>④</sup>这些电影里的警察部门常常出现关羽的神龛。威廉姆斯指出，在《英雄本色 II》（1988）的最后一幕，三位身受重伤的主

① 弗尔：《成龙与全球娱乐的文化活力》，第 252 页。

② 舒特（David Chute）：《影评》（Film Comment），引自哈蒙德（Stefan Hammond）、威尔金斯（Mike Wilkins）：《〈肉蒲团〉与〈喋血街头〉：香港怪诞电影基础指南》（*Sex and Zen & A Bullet in the Head: The Essential Guide to Hong Kong's Mind-Bending Films*），法尔赛德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4 页。

③ 瑟科：《跨国动作片：吴宇森、香港、好莱坞》，第 234 页。

④ 威廉姆斯（Tony Williams）：《空间、地点与场面：吴宇森的危机电影》（“Space, Place, and Spectacle: The Crisis Cinema of John Woo”），载傅葆石（Poshek Fu）、德瑟（David Desser）编：《香港电影：历史、艺术、身份》（*The Cinema of Hong Kong: History, Arts, Identity*），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48 页。

角坐的正是关羽、刘备、张飞这“三兄弟”应坐的次序——刘备在中间，其他人在两边。<sup>①</sup>周润发饰演的英雄马克在片中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了这种神秘元素。当豪(狄龙饰)问他信不信神时，马克回答到：“我相信神，我就是神。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就是神。”自我控制的至关重要性是“文武”理想的核心所在。而武神关羽的问题，就像我们在第三章中所看到的，在于他的自我控制机能可悲地出了错。周润发的这几部电影都是香港电影公司为华语观众制作的。因此，配饰关羽一出现，观众立即就能识别出来。

1999年的《再战边缘》(*The Corruptor*)是周润发征战好莱坞的第一批电影之一。这部影片也强调了对关羽“武”的男性特质的尊崇。除了主演是周润发，这部卖座片的导演、创作和制作工作全部都是由非中国人完成的。这就使得关羽在其中的出现显得更加不同寻常。周润发扮演的尼克·陈是负责纽约中国城亚洲帮派事务的华人高阶警官。他游走正邪之间，靠与黑帮勾结爬上高位。影片一开始，菜鸟警察丹尼·华莱士被引荐来作他的搭档，当时他正在警察局关羽的供桌前上香。影片快结束时，黑帮分子亨利·李背叛并杀了黑帮头子班尼。当尼克与亨利在他从班尼手里“继承”来的办公室里谈“生意”时，关羽的雕像又出现在了背景中。一些早期的电影使用过中国城，用来在东方主义的色彩下展现神秘、色情与暴力。《再战边缘》虽然也用了中国城，却把东方主义放在了更为广阔的框架中。这是一部关于正义、忠诚和背叛的电影。关羽的神像在剧中直接注视着这些男性特质的准则走向穷途末路。

就像《三国》和《水浒》，这部电影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于是否应赋

---

<sup>①</sup> 威廉姆斯(Tony Williams):《空间、地点与场面:吴宇森的危机电影》(“Space, Place, and Spectacle: The Crisis Cinema of John Woo”),载傅葆石(Poshek Fu)、德瑟(David Desser)编:《香港电影:历史、艺术、身份》(*The Cinema of Hong Kong: History, Arts, Identity*),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

予兄弟般或兄弟间的忠诚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中国古典作品中，兄弟情谊可以是对帮派、家族或国家而言。因此，爱国主义和对领主忠诚这样的“大义”应该先于家族亲人和帮派同伙。在《再战边缘》中，种族成了大义。电影从头至尾都在讲中国人如何不信任白人，而反之亦然。然而，在经历了互相搭救以及一起和两个女人共度春宵（这一夜共度令他们开始真正卸下心防）后，尼克和丹尼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谊。当他发现丹尼也接受了黑社会老大亨利·李的贿赂时，尼克才第一次质疑他们的情谊。这个意外遭遇发生在马来西亚毒品贩子的小店里。尼克试着阻止丹尼也被拖进烂泥潭。他对丹尼说：“你死了，你的生活完了。”他们的这次交谈又是在关羽的画像下进行的。忠义武神在银幕上俯视着两个兄弟的争执。尼克忠于“武”的理想中的个人荣誉与信任。但观众却知道，丹尼的背叛远比这个“堕落警察”所预计的更加复杂、多面。

丹尼从犯罪分子手里收钱并不简单。实际上，他是警局内务处派来对尼克立案调查的。然而，即便得知了丹尼的使命，尼克依然决定选择对兄弟之谊而不是对种族保持忠诚。和关羽在华容道选择了背弃对“国家”忠诚的大义而忠于他和曹操的兄弟之谊一样，尼克背弃了黑社会而选择忠于背叛了他的白人搭档。他不但没有杀死丹尼，还在与黑社会的决战中救了他的命：决战中，两位主角用强大的火力击溃了歹徒。尼克猛然发现最后一个残存的黑社会分子正向丹尼瞄准射击。在一枪干掉他之前，尼克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丹尼。尼克在丹尼的怀里死去。丹尼大声呼喊：“尼克，尼克。这里只有你和我，你的搭档。”搭档为伙伴献出生命是周润发香港动作片中的惯例。只不过，他的搭档在《再战边缘》里是个白人。而“这里只有你和我”是他们乞求在与其他种族的“联姻”中得到帮助的绝望而悲痛的呐喊。但是，没有哪个种族会来拯救他们。正像辛西娅 J. 福克斯(Cynthia J. Fuchs)在评论好莱坞跨种族搭档电影时说的，困囿于“男人情谊”的传统之中却又处于种族主义和异性恋规范之

外的搭档政治只剩从内部爆裂这一个结局。<sup>①</sup>

从这一点来说,《再战边缘》离好莱坞跨种族搭档政治的传统并不太遥远。中国的“武”的男性特质把种族荣誉与忠诚作为大义的一种。这种男性特质因而得以在这个好莱坞制作的电影中保持了下来。不过,只有对它进行改造后,这种保持才有可能。比如,这部影片柔化了英雄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周润发饰演的尼克对他的女友——妓女梅(May)极度温柔、非常关心,几乎把她当成个小妹妹。有一幕,梅吸毒过量。在她恢复时,尼克温情脉脉地用勺子给她喂汤喝。不用说,这一幕里不会出现任何形式的关羽像。在纽约这个设定的背景中,周润发饰演的“武”的英雄可以拥有感情细腻的灵魂。

周润发很少裸露身体(尽管他完全可以像尤伯连纳(Yul Brynner)一样,在扮演《安娜与国王》中的暹罗国王时半裸出境)。但他在银幕上多愁善感的人物形象已足以令现代城市女性也为之迷醉。米拉·索维诺(Mira Sorvino)饰演的梅格和朱迪·福斯特饰演的安娜就在《替身杀手》(1998)和《安娜与国王》中纷纷与他陷入爱河。难怪《新闻周刊》会认为亚洲男人来势汹汹!不过,这两部片子中周润发饰演的角色都没有和女主角的床戏。有些中国评论家对周润发的银幕人物居然没和米拉·索维诺上床大为失望,因为“在任何一部典型的好莱坞电影中,白人男主角与非白人女主角都会上演这一幕”。<sup>②</sup>这和那些攻击李小龙呆板、缺乏詹姆斯·邦德式的性魅力的人所表达的担忧如出一辙。然而,在对李小龙、成龙和周润发的银幕人物没有露骨床戏这一点进行分析时,我们既要考虑到傅满洲综合征的残留影响,也同样要考虑到传统“武”的英雄的

① 富克斯(Cynthia J. Fuchs):《搭档策略》(*The Buddy Politic*),载科恩、哈克编:《放映男性:探索好莱坞电影中的男子气概》,第195页。

② 李欧梵(Leo Ou-fan Lee):《好莱坞的香港电影:对美国流行文化中的亚洲影响的一点非正式评论》(“Hong Kong Movies in Hollywood: An Informal Comment on Asian ‘Influences’ in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载《哈佛亚太评论》(*Harvard Asia Pacific Review*),第9期(1998年冬)。

陈规惯例。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指出的，“武”的英雄视女人为兄弟情义的障碍。文人向女人示爱，而“武”的英雄只向他们的结拜兄弟示爱（以柏拉图式或者其他方式）。

事实上，武侠电影从一开始就遵循着这一陈规。<sup>①</sup> 兄弟情义的理想是建立“武”的男性特质的前提条件。在这一理想中，女人要想拥有英雄气概就不得不变成一个男人。而男人要想拥有性的吸引力就非得变成个文人不可。在好莱坞，一部要进入主流市场的电影中没有异性恋的爱欲表达——至少暗示——是很难想象的。因此，影片《替身杀手》设定了一个强烈的异性恋（同时也跨种族）的情爱关系。不过，和《再战边缘》一样，除了有个华人男主角和邪恶的中国城，这部电影基本上也是一个非中国制造。就像吉利安·桑德尔(Jillian Sandell)在评论吴宇森电影时指出的，对中国男性特质的这类“再造”是要付出代价的。而这一代价就是——“他对男人之间亲密关系的设想遭到了淘汰”。<sup>②</sup> 当导演李安宣布他要以王度庐(1909—1977)的小说为蓝本拍一部由周润发和杨紫琼主演的武侠电影《卧虎藏龙》时，很多动作片影迷都表示深为欣喜。而这些艺术家们也没有令人失望。这部电影不但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还在戛纳电影节上得了奖，并夺得包括最佳外语片在内的四项奥斯卡金像奖。成百上千的影评出现在世界各地，好评如潮。

但也有个别的负面评论。比如，《卫报》的夏洛特·雷文(Charlotte Raven)就觉得这部电影实在太过无聊，只有提前离场。这些批评激起的

① 导演胡金铨(1931—1997)把武侠片推向了高峰。武侠片和功夫片不同。前者更多的是基于传统小说，其中的大侠(或侠女)有着超凡入圣的技艺，能够飞檐走壁。而功夫英雄如李小龙和成龙则讲着广东话，长于徒手搏击，几乎没有什么超凡的特质。相关讨论见张建德(Stephen Teo):《香港电影:额外面向》(*Hong Kong Cinema: The Extra Dimensions*),英国国家电影电视资料馆1997年版,第87—134页。

② 桑德尔(Jillian Sandell):《重铸男性特质:吴宇森电影中的男性亲密场面》(“Reinventing Masculinity: The Spectacle of Male Intimacy in the Films of John Woo”),载《电影季刊》(*Film Quarterly*),第49卷第4期(1996年),第30页。



观众回应是难以置信与愤慨之情。<sup>①</sup>然而,这部电影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得到的评价确实不如预期来得高。<sup>②</sup>张建德(Stephen Teo)指出了这部史诗般的电影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他认为,《卧虎藏龙》是部武侠电影,因此,它“预装了大量文化与类型片中的陈腐观念”。<sup>③</sup>这些陈腐观念的一部分,就是男主人公为那些加在义上的观念——包括我们刚刚讨论过的正义、忠诚和无涉情爱——所压抑。李安在影片中加入了他的浪漫想象,和对爱情与情感观念的探索。《卧虎藏龙》中的“英雄原型被显著地稀释了”。在武侠与功夫片的惯例中浸润已久的中国观众很可能对这种掺杂持反对意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卧虎藏龙》在西方得到了热烈的欢迎。它推动了“文武”男性特质的国际化。而这,大概是这部电影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要让大量的西方观众接受一部打着字幕才能看的电影,代价就在所难免。而“文武”的二元体系也就不得被改组。

好莱坞在流行文化中的霸权地位还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电影胶片显现了对男性特质、女性特质等人类基本特点的建构进行包装的强大力量。因此,要想在国际上产生影响,理想建构就必须装裹于这些包装之中。现在,功夫片作为动作电影的一个分支已广为接受。好莱坞正式承认并给予“在《黑客帝国》中作出杰出贡献的袁和平‘功夫指导’的称号……这是对香港功夫电影、对电影美学独特贡献的一个迟来的肯定”。<sup>④</sup>袁和平是个

---

① 参见雷文(Charlotte Raven):《令人厌烦的呆板故事》(“Crashing Bore, Wooden Drama”),载《卫报》(*The Guardian*),2001年1月6日。除《卫报》2001年1月19日和20日的读者来信,“点心:思想的食粮”(Dimsum: Food for Thought)网站的“观点”(Perspective)栏中也可以找到愤怒回应的观众评论:[http://www.dimsum.co.uk/perspective/chen\\_yoursay2.html](http://www.dimsum.co.uk/perspective/chen_yoursay2.html)。

② 朱亨利(译音)(Henry Chu):《“卧虎”藏不住中国恶评》(“‘Crouching Tiger’ Can’t Hide From Bad Reviews in China”),载《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2001年1月29日。

③ 张建德(Stephen Teo):《爱与剑:武侠浪漫的辩证法》(“Love and Swords: The Dialectics of Martial Arts Romance”),载“电影感觉”(Senses of Cinema)网,<http://www.sensesofcinema/00/11/crouching.html>。

④ 陈耀成(Evans Chan):《后现代主义与香港电影》(“Postmodernism and Hong Kong Cinema”),载德里克(Arif Dirlik)、张旭东(Xudong Zhang)编:《后现代主义与中国》(*Postmodernism and China*),杜克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1页。

隐形电影人。<sup>①</sup> 他的影响力进一步说明了中国对人类动作观念的一整套贡献。这一整套观念中，并非每个元素都清晰可辨。在这一章，我们对三位国际知名的华人男演员李小龙、成龙和周润发进行了分析。他们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一整套的人类动作观念增添了中国内涵。他们都以自己的个人奋斗史证明了怎样去赢得西方世界的欢迎。李小龙出生在美国。成龙的父母定居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他也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童年时光。他们都有专门的英文名。以此类推，本名里含个“发”字的周润发至少也得起个不一样的英文名。但他坚持沿用自己的中文本名。他也没有把本名改成任何含有“龙”字的艺名。可中国和西方观众都认为他是个性感的男性偶像。这一事实表明，当中国男性特质在西方男性特质的影响下进行转化的同时，中国男性特质也在切实地改变着西方人观念中的男性特质。

---

<sup>①</sup> 在这本书里，我没有强调导演吴宇森、徐克、王家卫和李安这些“隐形”电影人的作用。他们在“文武”男性特质国际化上的影响不太明显，但却非常重要，值得我们做更详细的专门研究。

## 第九章 重建“文武”：中国男性特质的杂糅与国际化

在这本书中,我提出了将“文武”二元对立作为对中国男性特质模型进行概念化的一种分析工具和理论构想。由于“文武”有许多不同形式的体现,在不同时空中也有许多不同的含义,我尝试了用跨越中国历史的男性典范形象来归纳性地展示它的核心特性,而不是对一个文本或一段历史时期做更详细、更宽广的考量。我还使用了来自哲学、文学和电影研究等各种不同学科的资料和研究方法。这种做法的结果之一是,理想与现实表现之间的落差可以以多种方式得到体现。“文武”核心意义仍旧围绕着文华和武英。然而,在实践中,“文”可以指精湛的文学素养、有教养的举止行为和一般教育等各种属性,而“武”所指的描述符之多样和“文”不相上下,包括强壮的体魄、无畏的精神和格斗技能。这并不足为奇。我已经表明,作为一种文化建构,“文武”理想必须反映出促使它产生的多方面的社会条件。像所有的理想一样,唯一不断出现的问题是:它掩盖了所有社会中都存在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矛盾。因此,对中国男性特质的分析,最终把我们带回了不同人群之间如何相互协调的老问题。这又反过来引出了关于主导地位、从属地位、民族主义和霸权的问题。

在本书的前三章，我探讨了传统背景下的男性特质以及关羽和孔子。我提出了一个变化中的“文武”二元对立——一个主要由内在动力驱动的体系。而最后五章则显示了共产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等外部力量导致这个二元对立所发生的转变。在民族主义的信念中要“为祖国锻炼身体”，共产主义的信念则强调需要有体格健全的公民为社会建设作出贡献，这些都极大地影响着肉体性在中国的建构方式。<sup>①</sup> 这导致了工农模范形象的产生，比起“文”的英雄，他们在身体和精神的组成上都更接近于“武”。随着 20 世纪后期消费社会的到来，“文”在“文武”模式下相对于“武”的传统优势进一步被动摇了，男性理想也就越来越多地成了那些拥有充沛购买力的形象。其结果就是，男性特质的形象正远离它们传统的核心属性——文学、文化学识和武术技能。

20 世纪社会变革所导致的平民化进程也开始改变“文武”的性别约束机制。在过去，擅长“文武”技能的女性要么将自己伪装成男性，要么在被理想化为知己时成为“性别杂合体，因为她们至少有一部分生命接纳了男性的外观”。<sup>②</sup> 而现在，她们可以公开、正式地接纳“文武”属性。在过去，由于对“文”、“武”成就给予官方认可的文举、武举禁止女性参

① 除了著作《为祖国锻炼身体》外，包苏珊(Susan Brownell)还写了许多文章来阐述体育比赛(通过运动)对民族企业的重要性。她对揭示女性的身体、运动如何通过赢得国际体育赛事来大放异彩感兴趣。但终究，旧的性别等级观念还是占据了上风。参见包苏珊：《阴盛阳衰：中国公共文化中的体育、性别和民族主义》(“Strong Women and Impotent Men: Sports, Gende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ese Public Culture”)，载杨美惠(Mayfair Mei-hui Yang)编：《她们自己的空间：跨越中国的女性公共领域》(*Spaces of Their Own: Women's Public Sphere in Transnational China*)，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07—231 页；以及《世纪之交中国的性别与民族主义》(“Gende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载魏台玉(Tyrene White)编：《中国简报》(*China Briefing 1997 - 1999*)，M. E. Sharpe 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95—232 页。

② 关于这种杂合体的想象是如何建立起来的，魏嘱安(Giovanni Vitielli)给予了引人入胜的分析。参见魏嘱安：《模范鸡奸者：晚明文化中的爱和骑士精神》(“Exemplary Sodomites: Chivalry and Love in Late Ming Culture”)，载《男女：早期和中华帝国的男人、女人和性别》(*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第 2 卷第 2 期(2000 年)，第 234 页。

与,她们没有获得“文武”地位的正式资格。由于许多传统上为男性保留的禁区得到了开放,对男女关系的约束也相应放松。反过来,这也会降低中国社会中许多全男性组织如书院、军队和秘密会所特有的恐女症。作为一种提供了解中国男性特质的关键的社会建构,没有了那些围绕着它的含混、多变之处,“文武”的外表可以及时消融,把自己真正的目的显示出来:“文武”是用来巩固某些人特定的阶级利益而将其他人排除在外的一种权利工具。

除了女人,外国人和少数民族是另一些被“文武”体系排除了千百年的群落。从《山海经》<sup>①</sup>里最早出现的怪异的类人生物到这些怪物在《镜花缘》等小说中的后裔,非中国男人都被描述成只有在汉文明的教化下才能变成真正的人类。在汉文化的文明化影响范围之外的男人压根儿不可能拥有“文武”。外国人不参加文举或武举考试的事实将这种恐外心理形式化。这一系统也在20世纪开始瓦解。中央电视台现在定期播放外国留学生所掌握的诗歌朗诵和武术等传统“文武”技艺。中国境外设立了中文语言学校和功夫训练班,培养、输送在这些训练中合格了的毕业生。正如我们在这一章和前一章讨论的,自身经常遭受种族歧视的海外华人在不小的程度上促成了这一杂糅<sup>②</sup>趋势的出现。

21世纪的杂糅不只是“两种社会语言的混合物”或“两种语言意识之间”的相遇而已。<sup>③</sup>在今天国际化的世界里,几种语言和意识形成一个多

---

① 《山海经》成书年代是如此之久远,以至于人们认为其作者是传说中的伯益和大禹,据说他们生活在3500年前。英文译本请参见程小洁(Hsiao-Chieh Cheng)等编译:《英译山海经:上古中国的山川地理与神话传说》(*Shan Hai Ching: Legendary Geography and Wonders of Ancient China*),“国立”编译馆(台北)1985年版。

② 我这里所说的杂糅指的是荷米·巴巴(Homi K. Bhabha)所谓跨越国界的杂糅,而不只是多元文化或多样性的杂糅。参见巴巴:《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路特里奇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

③ 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小说中的话语》(“Discourse in the Novel”),爱默生(Caryl Emerson)、霍奎斯特(Michael Holquist)译,载霍奎斯特(Michael Holquist)编:《对话的想象:米哈伊尔·巴赫金文论四种》(*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by M. M. Bakhtin*),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8页。

层次、多方位的混合物是很常见的。吉姆·贾木许(Jim Jarmusch)的影片《鬼狗杀手》从“文武”的角度为这种后现代的杂糅过程提供了一个优秀例证。<sup>①</sup> 生活在纽约贫民区的鬼狗是一个力图坚持 18 世纪日本武士道经典《叶隐》所提倡的行为准则的非洲裔美国杀手。如第一章所述,三岛由纪夫所著的《叶隐入门》已在西方普及了这一经典,书中涵盖了用来恢复传统的男性理想的一系列原则。为了遵循这种行为准则,鬼狗为一个三流的黑帮老大卖命,而这位老大反过来也受到一系列不合时宜的规范的约束。鬼狗有时会和一个讲法语的加勒比冰淇淋小贩聊聊天,他也曾把《叶隐》借给一个黑人姑娘。除此之外,能和鬼狗进行任何有意义的交流的人并不多。为了践履自己的“宿命”,鬼狗迫使他那个不太情愿的意大利裔美国“领主”在最后杀死他。然而,这之前,他结识的非洲裔美国女孩已读过了《叶隐》,并将它传给了黑手党教父的女儿。因此,过去的武士准则可能将在这些年轻女性中流传下去。

这部电影是后现代杂糅的完美范例,不仅因为我们看到了多种语言和文化意识的共同影响(冰淇淋小贩并不说英语。然而,几乎是同时,鬼狗通过诉说同样的情绪和他在不同的场景中进行“沟通”),还因为过去和现在融合成了一个永恒的维度。鬼狗遵从来自其他时空的男性规范决定生死,他对想象中的过去的怀旧之情是英雄般的,但也是错置的。他相信他可以维持一种“远古之道”,但是,正如大友凉子(Ryoko Otomo)所说,《叶隐》还不到 300 年时间。《叶隐》试图用明中期王阳明的理学“将武士阶层在社会等级当中的顶层位置合法化”<sup>②</sup>,因此在它第一次写就时就已年代错乱。这种错置感由电影中声音、意识的多重性频繁引发。所有的一切都显得那么不搭调:从非洲裔美国姑娘和年轻的意

① 《鬼狗杀手》(*Ghost Dog: The Way of Samurai*)由吉姆·贾木许(Jim Jarmusch)执导,影星弗里斯特·维特克(Forest Whitaker)出演鬼狗,1999 年发行。

② 大友凉子(Ryoko Otomo):《〈叶隐入门〉:鬼狗、三岛由纪夫和现代性的他者》(“The Way of Samurai”: *Ghost Dog, Mishima, and Modernity's Other*),载《日本研究》(*Japanese Studies*),第 21 卷第 1 期(2001 年),第 33 页。

大利裔美国女人受托传授武士道,到用西方手法拍摄到的鬼狗的切腹表演。然而,所有这些自相矛盾的元素却胶合在了一起。大友凉子注意到,这部电影并没有“在多种意义中专注于某种意义,而是提供了一种从多种风格中选出的风格,一个折中主义的方法”<sup>①</sup>。如果说“文武”在王阳明的时代或许有过具体的文化引入的话,那么,如今它就是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由任何人继承下来的一种“风格”。<sup>②</sup>

甚至连《鬼狗杀手》的音乐也凸显了一种混杂的风格,将“文武”融入了大众文化。影片的音乐作者是 RZA。RZA 是罗伯特·迪格斯(Robert Diggs)的化名,是极为成功的说唱乐乐队武当派(Wu-Tang Clan)的创立人。鬼狗每次出门执行任务的时候,都在车上听着他们的音乐 CD。据说迪格斯去过中国的武当山(武当和少林是中国武术的两大圣地),在那里他受到了一些武术大师的接待。<sup>③</sup> 他的都市侠盗形象也正和鬼狗相像:一个被灌输了亚洲传统武术伦理的后现代男人。他的音乐是“一种邪恶的混合,包括毛骨悚然的钢琴段落、烦躁的管乐、哭泣般的小提琴和功夫电影的片段”。<sup>④</sup> 就像马兰清(Gina Marchetti)在另一种情境中观察到的,“黑人音乐和中国功夫有着共同的、流通于国际的文化货币”。<sup>⑤</sup> 在音乐之外,武当派乐队的收入还包括以“武”(Wu)为品牌的许多产品,如“武术穿着”(Wu-

① 大友凉子(Ryoko Otomo):《〈叶隐入门〉:鬼狗、三岛由纪夫和现代性的他者》(“The Way of Samurai”: Ghost Dog, Mishima, and Modernity's Other),载《日本研究》(*Japanese Studies*),第 21 卷第 1 期(2001 年),第 36 页。

② 请参见拙作《继承传统:解读中国的古典哲学家 1949—1966》(*Inheriting Tradition: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lassical Philosophers in Communist China 1949-1966*),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86 版,其中对中国人化用“风格”进行“抽象继承”的论辩方式作了一些讨论。

③ 埃斯凯纳齐(Mike Eskenazi):《武之重建:迪格斯兄弟是一个著名说唱团体的成员,但他们宁愿运行一个有利可图的唱片公司》(“Remaking Wu: The Diggs Brothers are Part of a Famous Rap Group, But They'd Rather Run a Profitable Conglomerate”),载《时代周刊》(*Time*),第 156 卷第 24 期(2000 年),第 82—83 页。

④ 卡洛尔(N'Gai Croal):《“带来骚动”:武当派接管了嘻哈界》(“Bring in ‘da Ruckus’: Rap's Wu-Tang Clan Takes Over”),载《新闻周刊》(*Newsweek*),第 129 卷第 24 期(1997 年),第 85 页。

⑤ 马兰清(Gina Marchetti):《成龙及其与黑人的联系》(Jackie Chan and the Black Connection),载提克坎曼(Matthew Tinkcom)、比利亚霍(Amy Villarejo)编:《键架:大众电影与文化研究》(*Keyframes: Popular Cinema and Cultural Studies*),路特里奇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50 页。

Wear)服饰系列和“武”(Wu)漫画书系列。它甚至还有功夫电子游戏系列,其中第一个就是于1999年发售的《武当:决战少林》。在这个游戏中,竞争者在亭子下互相较量功夫,亭子的横梁上刻有中文“文武庙”的字样。<sup>①</sup> 单单是这个游戏,在索尼的“游戏站”(PlayStation)上发行不久后就卖出了60多万份。可见,“文武”已经真正成为了国际性文化意识的一部分。

因特网、计算机游戏等大众教育和大众消费科技的出现无疑带来了一些无法预见的问题。但是它们同样带来了一些好处。理想形象如今变得更容易接近,且多种多样。头脑出色无疑会继续保有它的重要地位,但观众也希望看到矫健躯体的表演。同样,他们可能还想要看到“每个男人”——也就是他们自己——都能成为英雄。电影电视产业尽管有着种种不足之处,但能把“文”、“武”平民化,使之向着更激动人心的方向前进。在影视作品中,中国男性特质已显示出它既能跨越性别,也能跨越国界。早在1993年,李安大获成功的电影《喜宴》就已经涉及到了在美国的华人同性恋的问题。<sup>②</sup> 而在中国大陆,正如罗丽莎(Lisa Rofel)注意到的,“先锋电影人着迷于同性恋给当局带来的可能的挑战。男同性恋在嘲笑市场上的男性特质的同时,正在努力开拓一条通向跨国界同性恋想象的新路”。<sup>③</sup> 这种努力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刘冰鉴1999年的独立电影《男男女女》。影片把男同性恋当作生活在红尘俗世当中的普通人来描绘,这为此前被边缘化、被讥讽的男性行为提供了模范。这一平民化的进程不但使女性和“外国人”,也使劳动阶级和男同性恋对男性特质的理想产生影响成为可能。

用平民化这个词,我指的不是把男性理想形象简化成“无聊观众的

① 图片参见 <http://www.activision.com/games/wutang/ss10.html>。

② 我对这部电影的更多探论,请参见霍奇(Bob Hodge)、雷金庆(Kam Louie):《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政治》(*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路特里奇出版社1998年版,第147—172页。

③ 罗丽莎(Lisa Rofel):《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Other Modernities: Gendered Yearnings in China After Socialism*),加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3—284页。



无聊英雄”。我是指真正多种文化、多种性别的混合，既涵盖又高于现有理想形象。迈克尔·基梅尔(Michael Kimmel)注意到，“并非所有的男性特质都生来平等；或者毋宁说，我们都‘生来’平等，但由于我们对男性特质的定义并未在社会中得到平等的价值认同，任何假想的平等性都随之迅速蒸发”<sup>①</sup>。在这里，基梅尔指的是单一文化内部的不同族群。但这个论断在进行跨文化审视时显得更加准确。<sup>②</sup> 为了对不同的男性特质定义进行价值衡量，我们需要了解它们的含义、意义和重要性。只有在我们对用来表达理想男子气概的代码、符号背后的意义有了起码的了解后，我们的探讨才不会南辕北辙，产生误会。

如果大卫·吉尔莫(David Gilmore)等种族学家的观点，是正确的话，有些男子气概的核心元素似乎在大多数社会中都是共通的。但差别也同样存在。传统中国和美国概念当中的男性特质显然就有许多分歧。我们在前面所论述的“文武”的转变过程似乎表明，至少在中西对比的情景当中，某种程度的趋同和互相欣赏正在发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差别会完全消弭。但至少，全球化和性别平等化可能会使“文武”这个用以划分人群等级的传统工具变得多余。考虑到现有的社会结构和霸权持续主宰下的国际关系，这个目标很难达到。我已尽力和那些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人们一起为此作出贡献。最起码，我希望对更广阔的人群来说，这本书能够使一些至今未被揭示的理想中的中国男性特质变得更容易理解，使其无法有效地被极少数人用作主导、控制大众的工具。

① 基梅尔(M. S. Kimmel):《恐同症的男子气概:性别认同构建中的恐惧、耻辱和沉默》(“Masculinities as Homophobia: Fear, Shame and Sil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Identity”),载布罗德(H. Brod)、考夫曼(M. Kaufman)编:《男子气概论》(*Theorising Masculinities*),赛奇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页。

② 比如说,在一篇关于日本同性恋身份的文章中,马克·麦克莱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除了在非常一般的意义上,很难用美国或欧洲男女同性恋解放的本地特异性来对日本同性恋的生活和经历作出解释。”参见麦克莱兰(Mark McLelland):《日本的“同性恋身份”存在吗?》(“Is There a Japanese ‘Gay Identity’”),载《文化、健康和性》(*Culture, Health and Sexuality*),第2卷第4期(2000年),第469页。

## 参考文献

Allen, Joseph R. "Dressing and Undressing the Chinese Woman Warrior", *Positions* IV 2(1996), pp. 343 - 379.

艾伦:《穿穿脱脱的中国女战士》。

Allison, Anne. *Nightwork: Sexuality, Pleasure, and Corporate Masculinity in a Tokyo Hostess Club*,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6.

艾莉森:《夜间工作:东京舞女俱乐部里的性、快感和共同的男子气概》。

Ames, Roger T. *The Art of Rulership: A Study in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3.

安乐哲:《主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Rise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文版吴叡人译,台北:时报文化。

Andressen, Curtis. "The Loc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sia-born Overseas Students in Australia", in James E. Coughlan and Deborah J. McNamara (eds), *Asians in Australia: Patterns of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Melbourne: Macmillan, 1997, pp. 75 - 98.

安德森:《亚洲出生的澳大利亚海外留学生的位置与特点》,载科格兰、麦克纳马拉编:《澳大利亚亚裔:迁移与定居模式》。

Anonymous. *The Golden Lotus* (trans. Clement Egerton), 4 vol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39.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4卷本,埃杰顿译。

Avery, Martha, trans.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Half of Man Is Woma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9.

艾梅霞译:《译者前言》,载《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Ayres, Tony. "China Doll—The Experience of Being a Gay Chinese Australian" XXXVI 3/4(1999) *The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pp. 87 - 07.

艾尔斯:《中国娃娃——一个华裔澳大利亚同性恋的经历》。

Ayres, Tony. "Undesirable Aliens", *HQ*, 57(1998) pp. 110 - 115.

艾尔斯:《不受欢迎的异类》。

Backman, Michael. *Asian Eclipse: Exposing the Dark Side of Business in Asia*. Singapore: John Wiley & Sons, 1999.

巴克曼:《亚洲的衰落:揭露亚洲商业的阴暗面》。

Bakhtin, Mikhail. "Discourse in the Novel"(trans. Caryl Emerson & Michael Holquist), in Michael Holquist(ed),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by M. M. Bakhti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pp. 259 - 422.

巴赫金:《小说中的话语》,爱默生、霍奎斯特译,载霍奎斯特编:《对话的想象:米哈伊尔·巴赫金文论四种》。

Barlow, Tani E., ed. *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Writing and Femin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白露编:《现代中国的性别政治:写作与女性主义》。

Barlow, Tani E., ed. *I Myself Am a Woman: Selected Writings of Ding Ling*. Boston: Beacon Press, 1989.

白露编:《我自己就是个女人:丁玲选集》。

Barné, Geremie R. "To Screw Foreigners Is Patriotic; China's Avant-Garde Nationalists," *China Journal* 34(1995), pp. 209 - 34.

白杰明:《上个外国人就是爱国:中国的先锋民族主义者》。

Berry, Chris. *A Bit on the Side: East-West Topographies of Desire*. Sydney: EmPress, 1994.

裴开瑞:《略有偏侧:东西欲望的形貌》。

Berry, Chris (ed).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Cinema*,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1991.

裴开瑞编:《透视中国电影》。

Bhabha, Homi K. "Culture's In-Between", in Stuart Hall and Paul du Gay(ed.)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6, pp. 53 - 60.

巴巴:《中间文化》,载豪尔、杜盖伊编:《文化认同问题研究》。

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巴巴:《文化的定位》。

Bickers, Robert. *Britain in China: Community, Culture and Colonialism 1900—1949*.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比克斯:《英国人在中国:社区、文化和殖民主义 1900—1949》。

Biddulph, Steve. *Manhood: A Book about Setting Men Free*. Sydney: Finch Publishing, 1994.

比达尔夫:《男子气概:一本关于男人挣脱枷锁的书》。

Birch, Cyril, ed.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7.

白之编:《中国文学选》。

Bloch, Enid. “Sex between Men and Boys in Classical Greece: Was It Education for Citizenship or Child Abuse” IX 2(2001) *The Journal of Men's Studies*, pp. 183 - 204.

布洛赫:《古希腊经典中男人与男孩的性:是公民教育还是虐待儿童》。

Bly, Robert. *Iron John: A Book about Men*. Rockport, Mass: Element, 1991.

布莱:《铁约翰:一本关于男性启蒙的书》。谭智华译,台北:张老师文化,1996年。

柏杨编:《贾平凹卷》,台北:林白出版社,1988年。

Boyarin, Daniel. *Unheroic Conduct: The Rise of Heterosexuality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Jewish M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伯亚林:《不英勇的行为:异性恋的兴起与犹太男人的造就》。

Brod, H. & M. Kaufman, eds. *Theorising Masculinities*. Thousand Oaks: Sage, 1994.

布罗德、考夫曼编:《男性气质论》。

Brownell, Susan. “Gende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in Tyrene White(ed.), *China Briefing 1997—1999*, Armonk: M. E. Sharpe, 2000, pp. 195 - 232.

包苏珊:《世纪之交中国的性别与民族主义》,载魏台玉编《中国简报》。

Brownell, Susan. “Strong Women and Impotent Men: Sports, Gende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ese Public Culture,” in Mayfair Mei-hui Yang(ed.), *Spaces of Their Own: Women's Public Sphere in Transnational Chin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9, pp. 207 - 231.

包苏珊:《阴盛阳衰:中国公共文化中的体育、性别和民族主义》,载杨美惠编:《她们自己的空间:跨越中国的女性公共领域》。

Brownell, Susan. *Training the Body for China: Sports in the Moral Ord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包苏珊:《为祖国锻炼身体:道德秩序下的中国体育》。

Brownell, Susan and Jeffrey N. Wasserstrom (eds). *Chinese Femininities/Masculinities: A Rea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包苏珊、华志坚编:《中国女性特质/男性特质读本》。

Bulbeck, Chilla. *One World Women's Movement*. London: Pluto Press, 1988.

巴尔贝克:《一个世界的妇女运动》。

Bulbeck, Chilla. *Re-orienting Western Feminisms: Women's Diversity in a Postcolonial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巴尔贝克:《重新定位西方女性主义:后殖民世界女性的多样性》。

Burke, Thomas. "The Chink and the Child." In *Limehouse Nights: Tales of Chinatown*. London: Grant Richards Limited, 1916, pp. 13 - 37.

伯克:《中国佬与孩子》,载《莱姆豪斯之夜》。

Burke, Thomas. "Tai Fu and Pansy Greers." In *Limehouse Nights*, pp. 149 - 168.

伯克:《大富和潘西》,载《莱姆豪斯之夜》。

Burt, Ramsay. *The Male Dancer: Bodies, Spectacle, Sexualities*. London: Routledge, 1995.

伯特:《男舞者:身体、景象、性》。

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1990.

巴特勒:《性别烦恼:女性主义与身份颠覆》。

蔡洪声:《成龙的电影世界》,《当代电影》2000年第1期,第65—68页。

蔡恒茂:《“习惯于从容地谈论它”——读〈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2期,重印宁夏人民出版社编:《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0—110页。

蔡尚思:《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上海:棠棣出版社,1950年。

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曹雪芹:《红楼梦》全四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Chan, Evans. "Postmodernism and Hong Kong Cinema." In 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 eds. *Postmodernism and Ch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94 - 322.

陈耀成:《后现代主义与香港电影》,载德里克、张旭东编:《后现代主义与中国》。

Chan, Jachinson W. "Bruce Lee's Fictional Models of Masculinity" *Men and Masculinities* II 4(2000), pp. 371 - 387.

陈嘉金(译音):《李小龙男性特质的虚构原型》。

Chan, Jackie with Jeff Yang. *I Am Jackie Chan: My Life in Action*. St Leonards: Allen & Unwin, 1998.

成龙、杨致和：《我是成龙：我的动作人生》。

Chang, Ying-jen. "The Rise of Martial Arts in China and America",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Graduate Facult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1978.

张颖真(译音)：《武术在中国与美国的崛起》。

Chen Hanming and James O. Belcher, trans. *The Wreath at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 New York: Garland, 1991.

陈汉明(译音)、贝尔彻译：《高山下的花环》。

Chen, Helen H. "Gender, Subjectivity, Sexuality: Defining a Subversive Discourse in Wang Anyi's Four Tales of Sexual Transgression." In Yingjin Zhang, ed. *China in a Polycentric World: Essays in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90 - 109.

陈海伦(译音)：《性别、主体、性：界定王安忆四篇性逾越小说中的颠覆话语》，载张英进编：《多元世界中的中国：中国比较文学论集》。

陈景磐：《孔子的教育思想》，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

Ch'en Li-li, trans. *Master Tung's Western Chamber Romance: A Chinese Chantefab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陈莉莉(译音)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

陈墨：《功夫成龙：从港岛走向世界》，《当代电影》，2000年第1期，第72—78页。

陈染：《私人生活》，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

陈山：《中国武侠史》，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

陈世陔：《孔子的伦理思想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之比较研究》，《湖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第31—36页。

陈信元(译音)：《性爱与寻根》，载柏杨编：《小城之恋》，台北：林白出版社，1988年，第7—11页。

陈野：《成龙谈成龙电影》，《电影艺术》2000年第2期，第14、60—62页。

Cheng, Cliff. (ed.), *Masculinities in Organizations*,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996.

程亏夫(译音)编：《组织中的男子气概》。

Cheng, Cliff. "'We Choose Not To Compete': The 'Merit' Discourse in the Selection Process, and Asian and Asian American Men and Their Masculinity," in Cliff Cheng (ed.), *Masculinities in Organizations*,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996, pp. 177 - 200.

程亏夫：《“我们选择不竞争”：“择优”录取、亚洲人、亚裔美国男人和他们的男子气概》，载程亏夫编：《组织中的男子气概》。

Cheng, Hsiao-Chieh et al (eds. & trans.), *Shan Hai Ching: Legendary*

*Geography and Wonders of Ancient China*. Taipei: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1985.

郑小杰等编译:《英译山海经:上古中国的山川地理与神话传说》,台北:“国立”编译馆,1985年。

Chi. Li. *Apart from Love*. Beijing: Panda Book, 1994.

池莉:《不谈爱情》,北京:熊猫丛书,1994年。

Chou, Eric. *The Dragon and The Phoenix*. London: Corgi Books, 1973.

周嗣文:《龙凤》。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中文版周子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Chu, Henry. “‘Crouching Tiger’ Can’t Hide From Bad Reviews in China,” *Los Angeles Times*, 29 January 2001.

朱亨利(译音):《“卧虎”藏不住中国恶评》。

Chua, Peter and Diane C. Fujino, “Negotiating New Asian-American Masculinities: Attitudes and Gender Expectations” VII 3(1999) *The Journal of Men’s Studies*, pp. 391 - 413.

蔡彼得(译音)、藤野:《协商新的亚裔美国人的男性特质:态度与性别期待》。

Chun, Gloria Heyung. *Of Orphans and Warriors: Inventing Chinese American Culture and Identity*.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0.

陈河咏(译音):《孤儿与勇士:创造华裔美国文化与身份》。

Chute, David. “Film Comment”, in Stefan Hammond and Mike Wilkins, *Sex and Zen & A Bullet in the Head: The Essential Guide to Hong Kong’s Mind-Bending Films*. New York: A Fireside Book, 1996.

舒特:《影评》,载哈蒙德、威尔金斯:《〈肉蒲团〉与〈喋血街头〉:香港怪诞电影基础指南》。

Ciecko, Anne T. “Transnational Action: John Woo, Hong Kong, Hollywood.” In Sheldon Hsiao-pen Lu, ed. *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 Identity, Nationhood, Gender*.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pp. 221 - 237.

瑟科:《跨国动作片:吴宇森、香港、好莱坞》,载鲁晓鹏编:《跨国华人电影:身份、民族国家、性别》。

《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

Clatterbaugh, Kenneth.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Masculinity: Men, Women and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0.

克拉特鲍:《男性气概的当代观点》。

Clegg, Jenny. *Fu Manchu and The "Yellow Peril": the Making of a Racist Myth*. Stoke-on-Trent: Trentham Books, 1994.

克莱格:《傅满洲与黄祸:一个种族主义荒诞神话的形成》。

Cohan, Steven and Ina Rae Hark, eds. *Screening the Male: Exploring Masculinities in Hollywood Cinema*. London: Routledge, 1993.

科恩、哈克编:《放映男性:探索好莱坞电影中的男子气概》。

Coughlan, James E. and Deborah J. McNamara, eds. *Asians in Australia: Patterns of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Melbourne: McMillan, 1997.

科格兰、麦克纳马拉编:《澳大利亚亚裔:迁移与定居模式》。

Coward, Rosalind. *Female Desire: Women's Sexuality Today*. London: Paladin Grafton, 1984.

科沃德:《女性欲望:当代女人的性》。

Creel, Herrlee G. *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 Vol. I: The Western Zhou Empir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70.

顾理雅:《中国国家治理的起源,第1卷:西周王朝》。

Croal, N'Gai. "Bring in da Ruckus: Rap's Wu-Tang Clan Takes Over", *Newsweek* CXXIX 24(1997), p. 58.

卡洛尔:《“带来骚动”:武当派接管了嘻哈界》。

Croll, Elisabeth. *Changing Identities of Chinese Women*. London: Zed Books, 1995.

克罗尔:《中国妇女的身份变迁》。

崔奉源:《中国古典短篇侠义小说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

Dannen, Fredric and Barry Long. *Hong Kong Babylon: An Insider's Guide to the Hollywood of the East*, New York: Miramax Books, 1997.

丹内、朗:《香港巴比伦:东方好莱坞内幕指南》。

Davis, Adrian. "Fraternity and Fratricid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CV 5(2000), pp. 1630 - 1640.

戴维斯:《中华帝国晚期的兄弟情谊与手足相残》。

Dawson, Raymond. *The Chinese Chameleon: 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道森:《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中文版常绍民、明毅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Deng Youmei. (Trans. by Hua-yua Li Mowry). "At the Precipice." In Vivian Ling Hsu, ed. *Born of the Same Roots: Stories of Modern Chinese Wome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94 - 127.

邓友梅:《在悬崖上》,李华元译,载徐凌志韞编:《本是同根生:现代中国女人的



故事》。

Desser, David. "The Kung Fy Craze: Hong Kong Cinema's First American Reception." In Poshek Fu and David Desser, eds. *The Cinema of Hong Kong: History, Arts, Ident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9 - 43.

德瑟:《功夫热:美国首次接受香港电影》,载傅葆石、德瑟编:《香港电影:历史、艺术、身份》。

Dikötter, Frank.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2.

冯客:《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

Dikötter, Frank. *Sex,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London: Hurst & Co, 1995.

冯客:《性、文化与现代性》。

Ding Ling. (Trans. by Tani E. Barlow). "Miss Sophia's Diary." In Barlow, ed. *I Myself Am a Woman: Selected Writings of Ding Ling*. Boston: Beacon Press, 1989, pp. 49 - 81.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载白露编译:《我自己就是个女人:丁玲选集》。

Dirlik, Arif and Xudong Zhang, eds. *Postmodernism and Ch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德里克、张旭东编:《后现代主义与中国》。

Donaldson, Scott. *By Force of Will: The Life and Art of Ernest Hemingway*. New York: Viking, 1977.

唐纳森:《意志的力量:海明威的生活和艺术》。

Dover, K. J. *Greek Homosexuality*. London: Duckworth, 1978.

多佛:《古希腊同性恋》。

Dubbert, J. L. *A Man's Place: Masculinity in Transition*. London: Prentice Hall, 1979.

杜贝特:《男人的空间:嬗变中的男性特质》。

Duberman, Martin Bauml et al, eds. *Hidden From History: Reclaiming the Gay and Lesbian Past*.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91.

杜伯曼编:《隐藏的历史:复原男、女同性恋的过去》。

Duke, Michael (ed), *Modern Chinese Women Writers: Critical Appraisals*, Armonk: M. E. Sharpe, 1989.

杜迈克编:《中国当代女作家批判论集》。

Dureau, Christine and Morris Low,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Science, Race and Evolu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XI 2/3(1999) pp. 131 - 156.

- 迪罗、刘振辉:《知识政治:亚太科学、种族与演进》。
- Dutton, Kenneth R. *The Perfectible Body: The Western Ideal of Physical Development*. St Leonards: Allen & Unwin, 1995.
- 达顿:《可塑的身体:身体发育的西方理想》。
- Dworkin, Andrea. *Woman Hating*, New York: E. P. Dutton, 1974.
- 德沃金:《女人恨》。
- Dyer, Richard. *Heavenly Bodies: Film Stars and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1987.
- 戴尔:《美好的身体:明星与社会》。
- Eberhard, Wolfram. *Dictionary of Chinese Symbols*. Singapore: Federal Publications, 1990.
- 艾伯华:《中国符号字典》。
- Edwards, Louise. "Consolidating a Socialist Patriarchy: The Women Writers' Industry and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In Antonia Finnane and Anne McLaren, eds. *Dress, Sex and Text in Chinese Culture*. Clayton: Monash Asia Institute, 1999, pp. 183 - 197.
- 李木兰:《巩固社会主义父权制:女作家产业和女性主义文艺批评》,载安东篱、马兰安编:《中国文化中的服装、性与文本》。
- Edwards, Louise. "Gender Imperatives in *Honglou meng*: Jia Baoyu's Bisexuality."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and Reviews* 12 (1990): pp. 69 - 81.
- 李木兰:《〈红楼梦〉中的性别规则:贾宝玉的双性恋》。
- Edwards, Louise. *Men and Women in Qing China: Gender in the "Red Chamber Dream"*. Leiden: E. J. Brill, 1994.
- 李木兰:《清代中国的男人和女人:〈红楼梦〉中的性别》。
- Edwards, Louise. "Policing the Modern Woman in Republican China", *Modern China* XXVI 2(2000), pp. 115 - 147.
- 李木兰:《民国时期对现代女性的监管》。
- Edwards, Louise. "Wome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challenges to the grand gender narrative." In Louise Edwards and Mina Roces, eds *Women in Asia: Tradition, Modernity and Globalisa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pp. 59 - 82.
- 李木兰:《中国女性:对大性别叙事的新挑战》,载李木兰、若塞斯编:《亚洲女性:传统、现代与全球化》。
- Edwards, Louise and Mina Roces(eds). *Women in Asia: Tradition, Modernity and Globalisa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李木兰、若塞斯编:《亚洲女性:传统、现代与全球化》。

Eng, David L. & Alice Y. Hom (ed), *Q&A: Queer in Asian Americ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伍德尧、霍姆编:《问与答:亚裔美国同性恋者》。

Epstein, Maram. "Inscribing the Essentials: Culture and the Body in Ming-Qing Fiction", *Ming Studies* 41(1999), pp. 6 - 36.

艾梅兰:《铭刻要点:明清小说中的文化与身体》。

Ermarth, Elisabeth. "Fictional Consensus and Female Casualties." In C. G. Heilbrun and M. H. Higgonet, eds. *The Representation of Wome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 - 18.

厄玛斯:《虚构的共识与女性受害者》,载赫布兰、黑格奈特编:《女性的再现》。

Eskenazi, Mike. "Remaking Wu: The Diggs Brothers are Part of a Famous Rap Group, But They'd Rather Run a Profitable Conglomerate", *Time* CLVI 24(2000), pp. 82 - 83.

埃斯凯纳齐:《武之重建:迪格斯兄弟是一个著名说唱团体的成员,但他们宁愿运行一个有利可图的唱片公司》。

Faludi, Susan. *Stifled: The Betrayal of the Modern Man*,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99.

法卢迪:《受抑制的人:现代男性的背叛》。

范扬:《阳刚的隳沉》,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88年。

枫谷:《我们看〈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4期,第112—115页。

Ferber, Abby L. "'Shame of White Men': Interracial Sexual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hite Masculinity in Contemporary White Supremacist Discourse" III 2(1995), *Masculinities*, pp. 1 - 24.

费伯:《白种男人的耻辱:当代白人至上主义话语中不同种族间的性和白人男子气概的构建》。

Feuerwerker, Yi-tsi Mei. *Ding Ling's Fiction: Ideology and Narrativ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费梅兹:《丁玲小说:现代中国文学中的意识形态与叙事》。

Finnane, Antonia. "What Should Chinese Women Wear? A National Problem", *Modern China* 22. 2(1996), pp. 99 - 131.

安东篱:《中国女性应该穿什么?一个民族问题》。

Finnane, Antonia and Anne McLaren (eds). *Dress, Sex and Text in Chinese Culture*. Clayton, Vic.: Monash Asia Institute, 1999.

安东篱、马兰安编:《中国文化中的服装、性与文本》。

Fitzgerald, John.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费约翰:《觉醒的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

Fore, Steve. "Jackie Chan and the Cultural Dynamics of Global Entertainment." In Sheldon Hsiao-peng Lu, ed. *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 Identity, Nationhood, Gender*.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pp. 239 - 262.

弗尔:《成龙与全球娱乐的文化活力》,载鲁晓鹏编:《跨国华人电影:身份、民族国家、性别》。

Foucault, Michel. *The Use of Pleasure: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2 (trans. Robert Hurley). London: Penquin, 1987.

福柯:《性史卷二:快感的享用》。

Foxhall, Lin and John Salmon (ed.), *When Men Were Men: Masculinity, Power and Identity in Classical Antiquity*. London: Routledge, 1998.

福克斯豪、萨蒙编:《当男人为男性:古典时期的男子气概、权力与身份》。

Fu, Poshek and David Desser, ed. *The Cinema of Hong Kong: History, Arts, Ident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傅葆石、德瑟编:《香港电影:历史、艺术、身份》。

Fuchs, Cynthia J. "The Buddy Politic." In Steven Cohan and Ina Rae Hark, eds. *Screening the Male: Exploring Masculinities in Hollywood Cinema*. London: Routledge, 1993, pp. 194 - 210.

富克斯:《搭档策略》,载科恩、哈克编:《放映男性:探索好莱坞电影中的男子气概》。

Fung, Edmund and Colin Mackerras. "Chinese Students in Australia: An Attitudinal Study." In Anthony Milner and Mary Quilty, eds. *Australia in Asia: Episodes*.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冯兆基、马克林:《澳大利亚的中国学生:态度研究》,载米尔纳、奎尔第编:《置身亚洲的澳大利亚:插曲》。

Fung, Edmund S. K. and Chen Jie. *Changing Perceptions: The Attitudes of the PRC Chinese Towards Australia and China, 1989—1996*. Brisbane: Griffith University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Australia Asia Relations, 1996.

冯兆基、陈杰:《观念的变化:大陆中国人对澳大利亚和中国的态度(1989—1996)》。

Furth, Charlotte. "Androgynous Males and Deficient Females: Biology and Gender Boundarie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9(2)(1988): pp. 1 - 31.

费侠莉:《兼具两性的男人与不完整的女人:中国十六、十七世纪的生物学》。

Furth, Charlotte. *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费侠莉:《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甄橙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Furth, Charlotte. "Rethinking Van Gulik: Sexuality and Reproduc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Christina K. Gilmartin et al. (eds),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25 - 146.

费侠莉:《重新思考高罗佩:中国传统医学中的性与繁殖》,载柯临清、贺萧、罗丽莎、怀特等编:《女人、文化、中国》。

Gallagher, Mark. "Masculinity in Translation: Jackie Chan's Transcultural Star Text", *The Velvet Light Trap* 39(1997), pp. 23 - 41.

加拉赫:《翻译中的男性特质:成龙跨文化的明星文本》。

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教研组编:《汉语成语汇释》,无出版社和出版时间。

高明阁:《三国演义论稿》,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

高高:《张贤亮小说论》,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

Gao Xingjian. (Trans. Mabel Lee). *Soul Mountain*. Sydney: HarperCollins, 2000.

高行健:《灵山》,陈顺妍译。

Geist, Christopher D. & Jack Nachbar, eds. *The Popular Culture Reader*. Bowling Green: Bowling Green University Popular Press, 1983.

盖斯特、纳赫巴编:《大众文化读本》。

Gilmartin, Christina K., Gail Hershatter, Lisa Rofel and Tyrene White, eds.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柯临清、贺萧、罗丽莎、怀特等编:《女人、文化、中国》。

Gilmore, David D. *Manhood in the Making: Cultural Concepts of Masculin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吉尔莫:《男子汉的长成:男性特质的文化概念》。

Gordon, Michael-David. "Why Is This Men's Movement So White?" 26(1993) *Changing Men*, pp. 15 - 17.

戈登:《为什么这场男性运动如此之白?》。

Grey, John. *Men Are from Mars, Women Are from Venus*,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2.

格雷:《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Grosz, Elizabeth. *Volatile Bodies: Towards a Corporeal Feminism*. Sydney:

Allen & Unwin, 1994.

格罗斯:《易变的身体:身体女性主义》。

《古今汉语成语词典》,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郭立:《王安忆话“三恋”》,《作品与争鸣》1988年第3期,第76页。

Hall, David L. and Ames, Roger T. *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7.

郝大维、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中文版何金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Hall, Stuart.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ed),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3, pp. 392 - 403.

豪尔:《文化认同与海外族群》,载威廉姆斯、克里斯曼编:《殖民话语与后殖民理论》。

Hall, Stuart and Paul du Gay(ed.).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6.

豪尔、杜盖伊编:《文化认同问题》。

Halperin, David M. “Sex Before Sexuality: Pederasty, Politics, and Power in Classical Athens.” In Martin Bauml Duberman et al, eds. *Hidden From History: Reclaiming the Gay and Lesbian Past*.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91, pp. 37 - 53.

霍尔珀林:《性别在性之前:古雅典的男色、政治与权力》,载杜伯曼等编:《隐藏的历史:复原男、女同性恋的过去》。

Hammond, Stefan and Mike Wilkins. *Sex and Zen & A Bullet in the Head: The Essential Guide to Hong Kong's Mind-Bending Films*. New York: A Fireside Book, 1996.

哈蒙德、威尔金斯:《〈肉蒲团〉与〈喋血街头〉:香港离奇电影基础指南》。

Han Suyin. *The Crippled Tree*. London: Jonathan Cape, 1965.

韩素音:《伤残的树》。

《汉语大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3年。

Hawkes, David(ed. And trans.). *The Songs of the South*.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5.

霍克思编译:《〈楚辞〉选集》。

Hegel, Robert E. *The Novel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何谷理:《十七世纪中国小说》。

Hegel, Robert E. “Political Integration in Ru Zhijuan's ‘lilies’.” In Theodore Hutters, ed. *Reading the 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y*. Armonk: M. E. Sharpe,

1990, pp. 92 - 104.

何谷理:《茹志鹃〈百合花〉中的政治融合》,载胡志德编:《解读现代中国短篇小说》。

Hegel, Robert E. and Richard C. Hessney (ed), *Expressions of Self in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何谷理、海诗纳编:《中国文学中的自我表现》。

Heilbrun, C. G. and M. H. Higgonet, eds. *The Representation of Wome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赫布兰、黑格奈特编:《女性的再现》。

Henning, Stanley E. "Academia Encounters the Chinese Martial Arts."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VI 2(Fall 1999): pp. 319 - 332.

韩宁:《学术遇上武术》。

Henshall, Kenneth G. *Dimensions of Japanese Society: Gender, Margins and Mainstrea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韩歇尔:《日本社会分层:性别、边缘与主流》。

Herek, Gregory, M. "On Heterosexual Masculinity: Some Phys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Kimmel, M. S., ed. *Changing Men: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 on Men and Masculinity*.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1987, pp. 68 - 82.

贺瑞克:《异性恋的男性特质:性别与性的社会建构之身体后果》,载基梅尔编:《男人的变化:男人和男性特质研究的新方向》。

Hessney, Richard C. "Beyond Beauty and Talent: The Moral and Chivalric Self in *The Fortunate Union*", in Robert E. Hegel and Richard C. Hessney (ed), *Expressions of Self in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214 - 250.

海诗纳:《超越美貌与才能:〈好逑传〉中道德与侠义的自我》,载何谷理、海诗纳编:《中国文学中的自我表现》。

Hightower, James R. "Yuan Chen and 'The Story of Yingy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3(1973): pp. 90 - 123.

海陶玮:《元稹和〈莺莺传〉》。

Hillenbrand, Margaret. "Beleaguered Husbands: Representations of Marital Breakdowns in Some Recent Chinese Fiction." *Tamkang Review* XXX (2) (1999): pp. 112 - 150.

何依霖:《困境中的丈夫:近期中国小说中对武的衰落的表现》。

Hinsch, Bret. *Passions of the Cut Sleeve: The Homosexual Tradi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 韩献博:《断袖之癖:中国男同性恋传统研究》。
- Hodge, Bob and Kam Loui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8.
- 霍奇、雷金庆:《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政治》。
- Hofstede, Geert.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 New York: McGraw-Hill, 1997.
- 霍夫斯塔德:《文化与组织:思维软件》。
- Holcombe, Charles. "Theatre of Combat: A Critical Look at the Chinese Martial Arts", *The Historian* 52. 3(1990), pp. 411 - 431.
- 霍尔库姆:《搏斗场:以批判眼光看中国武术》。
- Holmes, Colin. ed. *Immigrants and Minorities in British Societ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78.
- 霍尔姆斯编:《英国社会的外来移民与少数族裔》。
- Holquist, Michael (ed),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by M. M. Bakhti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 霍奎斯特编:《对话的想象:米哈伊尔·巴赫金文论四种》。
- Honig, Emily & Gail Hershat, *Personal Voices: Chinese Women in the 1980'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韩起澜、贺萧:《个人的声音:80年代的中国女性》。
- Hooper, B. "China's Modernization: Are Young Women Going to Lose Out?" *Modern China* 10, 3(1984): pp. 317 - 343.
- 胡碧薇:《中国现代化:年轻女性会输吗?》
- Hoppenstand, Gary. "Yellow Devil Doctors and Opium Dens: A Survey of the Yellow Peril Stereotypes in Mass Media Entertainment." In Christopher D. Geist & Jack Nachbar, eds. *The Popular Culture Reader*. Bowling Green: Bowling Green University Popular Press, 1983, pp. 171 - 185.
- 贺宾斯丹:《黄皮肤的恶魔博士与鸦片烟馆:大众传媒娱乐中黄祸刻板印象的调查》,载盖斯特、纳赫巴编:《大众文化读本》。
- Howell, Jude et al. "Responses",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31. 1 (1999), pp. 37 - 47.
- 霍威尔等:《答复》。
- Hsia, C. T.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In Wang Shifu, *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Chamber*. Trans. S. I. Hsiu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ix - xxxvii.
- 夏志清:《述评引言》,载王实甫:《西厢记》,英文版熊式一译。
- Hsia, C. T.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

Hsia, C. T.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Hsiung, Anne-Marie. "A Feminist Re-Vision of Xu Wei's *Ci Mulan* and *Nü Zhuangyuan*," in Yingjin Zhang (ed.), *China in a Polycentric Worl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73 - 89.

熊贤关:《从女性主义新视界看徐渭的〈雌木兰〉和〈女状元〉》,载张英进编:《多极世界中的中国》。

Hsu Kai-yu, trans. and ed.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Poetry: An Antholog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

许芥昱编译:《二十世纪中国诗选》。

Hsu Pi-ching. "Courtesans and Scholars in the Writings of Feng Menglong: Transcending Status and Gender." *Nan-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 2(1) (2000): pp. 40 - 77.

徐碧卿:《冯梦龙小说中的花魁与书生:超越的地位与性别》。

Hsu, Vivian Ling, ed. *Born of the Same Roots: Stories of Modern Chinese Wome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1.

徐凌志主编《本是同根生:现代中国女人的故事》。

胡东原:《中国传统文化、市场经济、道德建设》,《学海》1996年第1期,第52—54页。

胡克:《成龙电影中的喜剧性动作与暴力》,《当代电影》2000年第1期,第68—72页。

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胡适文存》第4卷第2部,台北:远东图书,1971年,第541—544页。

Hua Shiping(e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1989—2000*.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1.

华世平编:《中国政治文化》。

黄华节:《关羽的人格与神格》,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

黄宽重:《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0年。

Huang, Martin W. *Literati and Self-Re/Presentation: Autobiographical Sensibility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Nove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黄卫总:《文人和自我的再呈现:十八世纪中国小说中的自传倾向》。

黄强:《明清“西厢热”持续的一个重要原因》,《河北学刊》1999年第3期,第69—

73 页。

黄子平:《正面展开灵与肉的搏斗》,原载 1985 年 10 月 7 日《文汇报》。

Hulsewé, A. F. P. "Han-time Documents." *T'oung Pao* Vol. XLV(1957), pp. 1 - 50.

何四维:《汉代文献》。

Humana, Charles and Wang Wu. *The Ying-Yang : The Chinese Way of Love*. London: Tandem, 1971.

胡马纳、王武(译音):《阴阳之道:中国式的爱情》。

Huters, Theodore(ed). *Reading the 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y*. Armonk: M. E. Sharpe, 1990.

胡志德编:《解读现代中国短篇小说》。

Jacka, Tamara. *Women's Work in Rural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杰华:《中国农村妇女的劳动》。

Jankowiak, William. "Chinese Women, Gender, and Sexuality: A Critical Review of Recent Studies,"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XXXI 1(1999), pp. 31 - 37.

姜克维:《中国女性、社会性别和性:对最近研究的批判性评价》。

Jankowiak, William(ed.), *Romantic Passion : A Universal Experie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姜克维:《情爱的震撼:一种普遍经验?》。

Jankowiak, William. "Romantic Pass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Romantic Passion : A Universal Experie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66 - 183.

姜克维:《中国的情爱震撼》,载《情爱的震撼:一种普遍经验?》。

Jankowiak, William R. *Sex, Death, and Hierarchy in a Chinese City: An Anthropological Accou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姜克维:《中国城市里的性、死亡和阶级斗争:一份人类学报告》。

Jenner, W. J. F. "A Knife in My Ribs for a Mate: Reflections on Another Chinese Tradition", The Fifty-fourth George Ernest Morrison Lecture in Ethnology 1993,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詹纳尔:《为兄弟两肋插刀:另一中国传统评述》。

Jenner, W. J. F. *The Tyranny of History : The Roots of China's Crisis*. London: Allen Lane, 1992.

詹纳尔:《历史上的暴政:中国危机的根源》。

贾平凹:《废都》,1993 年北京第 1 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1996 年重印。

Jia Pingwa. "How much can a man bear?" In Zhu Hong, ed. and trans. *The Chinese Western*. New York: Ballantine, 1988, pp. 1 - 52.

贾平凹:《人极》,载朱虹编译:《西部中国》。

贾平凹:《天狗》,载柏杨编:《贾平凹卷》,台北:林白出版社,1988年,第59—122页。

Jia Pingwa, *Turbulence: A novel*. trans. Howard Goldblatt.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贾平凹:《浮躁》,葛浩文译。

蒋星煜:《中国戏曲史钩沉》,河南:郑州书画社,1982年。

江阴香编译:《诗经译注》,北京:中国书店,1982年。

Jiang Zilong. "Manger Qiao Assumes Office", in *All the Colours of the Rainbow*. trans. Wang Mingjie.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1983, pp. 130 - 178.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英文版载王明杰(译音)译:《赤橙黄绿青蓝紫》,北京:中国文学,1983年,第130—178页。

康有为:《大同书》,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重印。

Kaufman, M. *Beyond Patriarchy: Essays by Men on Pleasure, Power, and Change*. Toronto: Oxford, 1987.

考夫曼:《超越父权制:快感、权利与变化之男性论文集》。

Kiernan, V. G. *The Lords of Human Kind: Black Man, Yellow Man, and White Man in an Age of Empi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克尔南:《人类的主人:帝国时期的黑人、黄种人和白人》。

Kimlicka, Paul. "The Novel *San Kuo chih Tung-su yen-i* As Literature: Uses of Irony By Its Author Lo Kuan-chung". Unpublished M. A. thesis, Indiana University, 1986.

金姆里卡:《文学小说〈三国通俗演义〉:罗贯中的讽刺手法》。

Kimmel, M. S. "The Contemporary 'Crisis' of Masculini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Harry Brod, ed. *The Making of Masculinities*. Boston: Allen & Unwin, 1987, pp. 121 - 153.

基梅尔:《男子气概当代危机的历史透视》,载布罗德编:《男子气概的养成》。

Kimmel, M. S., ed. *Changing Men: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 on Men and Masculinity*.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1987.

基梅尔编:《男人的变化:男人和男性特质研究的新方向》。

Kimmel, M. S. "Masculinities as Homophobia: Fear, Shame and Sil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Identity." In H. Brod & M. Kaufman, eds. *Theorising Masculinities*. Thousand Oaks: Sage, 1994, pp. 119 - 141.

基梅尔:《恐同症的男子气概:性别认同构建中的恐惧、耻辱和沉默》,载布罗德、考夫曼编:《男子气概论》。

Kimmel, M. S., ed. *The Politics of Manhood: Profeminist Men Respond to the Mythopoetic Men's Movemen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基梅尔编:《男人政治:亲女性主义男性对神话诗化男性运动的反应》。

Kimmel, M. S. and Michael A. Messner, eds. *Men's Lives*.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5.

基梅尔、梅斯纳编:《男人的生活》。

Kinkley, Jeffrey C. "A Bettelheimian Interpretation of Chang Hsien-liang's Concentration-Camp Novels." *Asia Major* 4(2)(1991): pp. 83 - 113.

金介甫:《对张贤亮劳改农场小说内特尔海姆式的解读》。

孔慧怡:《妇解现代版才子佳人》,香港:麦田文学,1996年。

Kong Xiangjin and Wang Xinhong. "Qufu choujian Kongzi wenhua guangchang" [Qufu Raises Money to Build Confucius Culture Square]. *Renmin ribao* [People's Daily]. 9 April, 1999.

孔祥金、王新宏:《曲阜筹建孔子文化广场》,《人民日报》1999年4月9日。

Kraus, Richard. *Brushes with Power: Modern Politics and the Chinese Art of Calli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克劳斯:《书法与权力:中国书法艺术与现代政治》。

匡亚明:《孔子评传》,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

Kusher, Norman. "The Fifth Relationship: Dangerous Friendships in the Confucian Context,"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CV 5 (2000), pp. 1615 - 1629.

柯啟玄:《第五种关系:儒家语境中危险的友谊》。

Lai, Amy Tak-ye. "Liberation, Confusion, Imprisonment: The Female Self in Ding Ling's 'Diary of Miss Sophie' and Zhang Jie's 'Love Must Not be Forgotte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No. 3(1998): pp. 88 - 103.

黎德怡:《解放、困惑、监禁: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与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女性自我》。

蓝潮:《李小龙全传》,香港:名流出版社,1999年。

Lao She. (Trans. Don J. Cohn). *Beneath the Red Flag*. Beijing: Panda Books, 1982.

老舍:《正红旗下》,唐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熊猫丛书,1982年。

老舍:《二马》,载舒济、舒乙编:《老舍小说全集》卷二,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250页。

老舍:《二马》,英文版黄庚、冯达微译,香港:三联书店,1984年。

Larson, Wendy. *Women and Writing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文棣:《现代中国的女性与写作》。

Lau, D. C. "Introduction", *Confucius: The Analect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9.

刘殿爵:《论语:前言》。

Lau, D. C, trans. *Confucius: The Analect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9.

刘殿爵译:《论语》。

Lau, Jenny Kwok Wah. "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pular Cinema of China and Hong Kong", Chris Berry(ed),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Cinema*,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1991, pp. 166 - 174.

刘国华:《中国内地与香港流行电影的文化演绎》,载裴开瑞编:《透视中国电影》。

Lee, Leo Ou-fan. "Hong Kong Movies in Hollywood: An Informal Comment on Asian 'Influences' in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Harvard Asia Pacific Review*, Winter Issue(1998 - 1999).

李欧梵:《好莱坞的香港电影:对美国流行文化中的亚洲影响的一点非正式评论》。

Lee, Leo Ou-fan.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王志宏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

Lee, Lily Xiao Hong, A. D. Stefanowska and Clara Wing-chung Ho, ed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 The Qing Period, 1644—1911*.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8.

萧虹、斯蒂芬诺什卡、何刘咏聪编:《中国妇女传记辞典:清代卷(1644—1911)》。

Lee, Yee. ed. *The New Realism: Writings from China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Hippocrene Books, 1983.

李怡编:《中国新写实主义文学作品选》。

Legge, James (ed. and trans.). *The Ch'un Tsew with The Tso Chuen*. Originally published 1935, reprinted Taipei: Southern Materials Centre, 1985.

理雅各编译:《春秋左传》,初版于1935年,重印于台北:南天书局,1985年。

Levant, Ronald F. "The Masculinity Crisis" V 3(1997) *The Journal of Men's Studies*, pp. 221 - 231.

利万特:《男性特质危机》。

Lever-Tracy, C., D. Ip, J. Kitay, I. Phillips & N. Tracy. *Asian Entrepreneurs in Australia, Ethnic Small Business in the Chinese and Indian*

*Communities of Brisbane and Sydney: Report to the Office of Multicultural Affairs*. Department of the Prime Minister and Cabinet,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1991.

利弗-特雷西等:《澳大利亚的亚洲企业家:布里斯班和悉尼中印社区少数族裔的小企业:给多元文化事务办公室的报告》。

李碧华:《中国男人》,香港:天地图书,1993年。

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

李达轩:《丁玲与莎菲系列形象》,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

Li Ju-chen(Li Ruzhen). (Trans. Lin Tai-yi). *Flowers in the Mirro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

李汝珍:《镜花缘》,林太乙译。

Li Mingguang. "Chen Daoming shuo 'Er Ma'" (Chen Daoming on the *Two Mas*). *Beijing Chenbao*(*Beijing Morning Post*), 7 February 1999.

李明光(译音):《陈道明说〈二马〉》,《北京晨报》1999年2月7日。

李汝珍:《镜花缘》,1828年初版,台北:学海出版社,1985年。

李翔海:《儒家伦理与东亚现代化》,《中州学刊》1997年第1期,第64—69页。

Li Xiaojiang. "Resisting While Holding the Tradition: Claims for Rights Raised in Literature by Chinese Women Writers in the New Period." *Tamkang Review* XXX 2(2000): pp. 99 - 109.

李小江:《抵制并保持传统:新时期中国女作家作品中的权利主张》。

李希凡:《略论三国演义里的关羽的形象》,载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编:《三国演义研究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李希光、刘康:《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李荫农:《论孔子对劳动的态度》,《羊城晚报》1962年3月22日。

Li Yu. (Trans. Patrick Hanan). *The Carnal Prayer Mat*. London: Arrow Books, 1990.

李渔:《肉蒲团》,韩南译。

Li Ziyun. "The Disappearance and Revival of Feminine Discourse." *Tamkang Review* XXX 2(1999): pp. 55 - 69.

李子云:《女性话语的消失与复兴》。

Liang Jian. *Cheng Long* [Jackie Chan]. Hong Kong: Xingli yuoxian gongsi, 1997.

梁健:《成龙》,香港:星力有限公司,1997年。

梁新:《什么叫“当代新儒家”》,《文汇报》1986年6月10日。

Little, John, ed. *Jeet Kune Do: Bruce Lee's Commentaries on the Martial Way*. Boston: Tuttle Publishing, 1997.

里特编:《截拳道:李小龙武道释义》,中文版温戈译,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10年。

Little, John R., ed. *Bruce Lee: Words from a Master*. Chicago: Contemporary Books, 1999.

里特编:《李小龙:大师语录》。

Litzinger, Ralph A. "Questions of Gender: Ethnic Minority Representations in Post-Mao China",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XXXII 4(2000), pp. 3-14.

李瑞福:《性别问题:毛泽东之后中国的少数民族再现》。

刘宾雁:《人妖之间》,载《刘宾雁报告文学选》,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147—206页。

刘达临:《性社会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

刘达临:《中国当代性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

刘达临:《中国古代性文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

刘富道:《眼镜》,载《爱情小说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

Liu, James J. Y. *The Chinese Knight-Errant*.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7.

刘若愚:《中国之侠》,周清霖、唐发铨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刘兰英等编:《中国古代文学词典:第二卷》,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

Liu, Lydia H. "In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The Making of a Female Tradition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Ellen Widmer and David Der-wei Wang, eds. *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 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94-220.

刘禾:《创造与介入:现代中国文学中女性传统的生成》,载魏爱莲、王德威编:《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的小说与电影》。

Liu, Lydia H.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中文版宋伟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刘明华:《儒家义利观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贵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第24—29页。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重印。

Liu Wu-Chi.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6.

柳无忌:《中国文学概论》。

刘心武:《班主任》,载《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第16—29页。

- 刘知渐:《三国演义新论》,重庆出版社,1985年。
- Lo Jung-pang, ed. *K'ang Yu-wei: 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7.
- 罗荣邦编:《康有为:传记与论文集》。
- Logan, Bey. *Hong Kong Action Cinema*. London: Titan Books, 1995.
- 龙比意:《香港动作电影》。
- Louie, Kam. *Between Fact and Fiction: Essays on Post-Mao Chinese Literature & Society*. Sydney: Wild Peony, 1989.
- 雷金庆:《事实与虚构之间:〈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文学与社会〉论文集》。
- Louie, Kam. "Constructing Chinese Masculinity for the Modern World: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Lao She's *The Two Mas*", *China Quarterly*, 164(2000), pp. 1062 - 1078.
- 雷金庆:《为现代世界构建中国男性特质:关于老舍的〈二马〉》。
- Louie, Kam. *Critiques of Confucius in Contemporary China*.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0.
- 雷金庆:《当代中国儒学批判》。
- Louie, Kam. "I Married a Foreigner: Recovering Chinese Masculinity in Australia", in Wenche Ommundsen (ed.), *Bastard Moon: Essays on Chinese-Australian Writing, Special Issue of Otherland* 7(2001), pp. 39 - 56.
- 雷金庆:《我娶了个外国人:在澳大利亚恢复中国男性特质》,载奥门森编:《杂种月亮:澳大利亚华裔作品评论集》。
- Louie, Kam. "In Search of Socialist Capitalism and Chinese Modernisat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2(1984), pp. 87 - 96.
- 雷金庆:《追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中国的现代化》。
- Louie, Kam. "In Search of the Chinese Soul in the Mountains of the South." *The China Journal* 45(2001): pp. 145 - 149.
- 雷金庆:《在南部山野中寻找中国人的灵魂》。
- Louie, Kam. *Inheriting Tradition: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lassical Philosophers in Communist China 1949—1966*.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雷金庆:《继承传统:解读中国的古典哲学家 1949—1966》。
- Louie, Kam. "Sage, Teacher, Businessman; Confucius as a Model Male." In Shiping Hua, e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Armonk, NY: M. E. Sharpe, forthcoming.
- 雷金庆:《圣人、先师、商人:作为男性典范的孔子》,载华世平编:《中国的政治文化》。



Louie, Kam. "Salvaging Confucian Education (1949—1983)." *Comparative Education* 20(1) (1984b): pp. 27 - 38.

雷金庆:《抢救儒家教育(1949—1983)》。

Louie, Kam. "Sexuality, Masculinity and Politics in Chinese Culture: the Case of the *Sanguo* Hero Guan Yu." *Modern Asian Studies* 33(4)(1999): pp. 835 - 860.

雷金庆:《中国文化中的性、男性特质与政治:以三国关羽为例》。

Louie, Kam(ed. and intro.). *Strange Tales From Strange Lands: Stories by Zheng Wanlong*. Ithaca: Cornell East Asia Series, 1993.

雷金庆编序:《异乡异闻:郑万隆小说选》。

Louie, Kam. "The Macho Eunuch: The Politics of Masculinity in Jia Pingwa's 'Human Extreminities'", *Modern China* 17. 2(1991), pp. 163 - 187.

雷金庆:《硬汉阉人:贾平凹〈人极〉中的男性特质政治》。

Louie, Kam and Cheung Chiu-ye. "Three Kingdoms: The Chinese Cultural Scene Today." In Joseph Y. S. Cheng, ed. *China Review 1998*.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543 - 575.

雷金庆、张钊贻:《三分天下:今日中国之文化景象》,载郑宇硕编:《中国评论1998》。

Louie, Kam and Louise Edwards. "Chinese Masculinity: Theorizing *Wen* and *Wu*." *East Asian History* 8(1994): pp. 135 - 148.

雷金庆、李木兰:《中国男性特质:“文武”论》。

Low, Morris. "The Japanese Nation in Evolution: W. E. Griffis, Hybridity and the Whiteness of the Japanese Race."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XI 2/3(1999) pp. 203 - 234.

刘振辉:《演变中的日本:威廉姆斯·格里菲斯、杂糅与日本种族的白化》。

陆草:《中国武术》,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6年。

Lu, Sheldon H. "Soap Opera in China: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s of Visuality, Sexuality, and Masculinity." *Cinema Journal* XXX 1(2000), pp. 25 - 47.

鲁晓鹏:《中国的肥皂剧:视觉、性与男性特质的跨国政治》。

Lu, Sheldon Hsiao-pen, ed. *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 Identity, Nationhood, Gender*.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鲁晓鹏编:《跨国华人电影:身份、民族国家、性别》。

Lu Tongling, ed.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Albany: SUNY, 1993.

吕彤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社会中的性别与性》。

鲁迅:《风波》,载《鲁迅小说选》,北京:外文出版社,1960年,第42—44页。

鲁迅:《孔乙己》,载《鲁迅小说选》,北京:外文出版社,1960年,第19—24页。

鲁迅:《短篇小说集〈呐喊〉前言》,载《鲁迅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0年,第1—6页。

鲁迅:《鲁迅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0年。

鲁迅:《祝福》,载《鲁迅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0年,第125—143页。

鲁迅:《我之节烈观》,载《鲁迅选集》卷2,北京:外文出版社,1980年,第13—25页。

鲁迅:《鲁迅选集》卷2,北京:外文出版社,1980年。

Lu Xun and Others, *Masterpieces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9—1949*,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3.

鲁迅等:《中国现代短篇杰作选》,北京:外文出版社,1983年。

绿漪:《纯朴的诗篇》,载孙露茜、王凤伯编:《茹志鹃研究专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5—280页。

卢越:《李小龙传奇》,香港:皇冠出版社,1996年。

Luke, Allan. “Representing and Reconstructing Asian Masculinities: This is not a Movie Review”, *Social Alternatives*, XVI 31(1997) pp. 32 - 34.

卢克:《亚洲男性特质的代表与再构建:这不是电影评论》。

Luke, Carmen. “White Women in Interracial Families: Reflections on Hybridization, Feminine Identities, and Racialized Othering” XIV 2(1994) *Feminist Issues*, pp. 49 - 72.

卢克:《跨种族家庭中的白种女人:关于杂糅、女性身份及种族他者的思考》。

Luke, Carmen and Allan Luke. “Interracial Families: Difference within Difference”,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XXI 4(1998), pp. 728 - 754.

卢克等:《跨种族家庭:异中存异》。

Luke, Carmen and Allan Luke. “Theorizing Interracial Families and Hybrid Identity: An Australian Perspective” *Educational Theory* IL 2(1999), pp. 223 - 249.

卢克等:《论跨种族家庭与混杂身份:澳大利亚视角》。

Luke, Carmen and Vicki Carrington, “Race Matters”,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 XXI 1(2000), pp. 5 - 24.

卢克、卡林顿:《至关重要的种族》。

罗贯中:《三国演义》全2册,台北:桂冠图书,1988年重印。

Luo Guanzhong. *Three Kingdoms: A Historical Novel* (trans. Moss Roberts), 3 vol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4.

罗贯中:《三国演义》全3册,罗慕士译,北京:外文出版社,1994年。

罗国杰:《关于孔子义利观的一点思考——兼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学术研究》1994年第3期,第51—53页。

罗竹风编:《汉语大词典》共13册及索引,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8—

1994年。

马良春、李福田：《中国文学大辞典第八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

Ma, Y. W. and Joseph S. M. Lau, eds. *Traditional Chinese Stories: Themes and Vari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马幼垣、刘绍铭编：《中国传统小说集：主题与变奏》。

Mackerras, Colin.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马克林：《西方的中国形象》。

Major, Wade. *Jackie Chan*. New York: MetroBooks, 1999.

梅杰：《成龙》。

Malraux, Andre. *Man's Estate*. Trans. Alastair Macdonald.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1.

马尔罗：《人类的命运》，麦克唐纳译（法译英）。

Mann, Susa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曼素恩：《兰闺宝录：晚明至盛清时的中国妇女》，杨雅婷译，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5年；又名《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定宜庄、颜宜蓓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Mann, Susan. "The Male Bond i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CV 5(2000), pp. 1600 - 1614.

曼素恩：《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的兄弟义气》。

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载孙露茜、王凤伯编：《茹志鹃研究专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7—251页。

Mao Zedong. "Report on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Peasant Movement in Hunan",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vol. 1.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67, pp. 23 - 59.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毛泽东选集》卷1，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年，第23—59页。

Mao Zedong. "The Snow." In Kai-yu Hsu, trans. and ed.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Poetry: An Antholog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

毛泽东：《沁园春·雪》，许芥昱编译：《二十世纪中国诗选》。

毛宗岗：《第一才子书》，载《〈三国演义〉的政治与谋略观》，台北：老古文化事业，1985年。

Marchetti, Gina. "Jackie Chan and the Black Connection", in Matthew Tinkcom and Amy Villarejo (eds), *Keyframes: Popular Cinema and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001, pp. 136 - 158.

马兰清:《成龙及其与黑人的联系》,载提克坎曼、比利亚雷霍编:《关键帧:大众电影与文化研究》。

Marchetti, Gina. *Romance and the "Yellow Peril": Race, Sex, and Discourse Strategies in Hollywood Fiction*.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马兰清:《浪漫与“黄祸”:好莱坞小说中的种族、性与话语策略》。

May, J. P. "The Chinese in Britain, 1860—1914." In Colin Holmes, ed. *Immigrants and Minorities in British Societ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78.

梅:《中国人在英国,1860—1914》,载霍尔姆斯编:《英国社会的外来移民与少数民族裔》。

McDougall, Bonnie S. "Disappearing Women and Disappearing Men in May Fourth Narrative: A Post-Feminist Survey of Short Stories by Mao Dun, Bing Xin, Ling Shuhua and Shen Congwen." *Asian Studies Review* 22 (4) (1998): pp. 427 - 458.

杜博妮:《五四文学中消失的女人和男人:茅盾、冰心、凌叔华和沈从文短篇小说的后女性主义调查》。

McDougall, Bonnie S. and Kam Louie. *The Literature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Hurst, 1997.

杜博妮、雷金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McIsaac, Lee. "'Righteousness Fraternities' and Honourable Men: Sworn Brotherhoods in Wartime Chongq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CV 5(2000), pp. 1614 - 1655.

麦岚:《“兄弟之义”和侠义男人:战争年代的重庆哥老会》。

McKnight, Brian E. *Law and Order in Sung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91 - 193.

马伯良:《宋代的法律与秩序》,中文版杨昂、胡雯姬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

McLaren, Anne E. *Chinese Popular Culture & Ming Chantefables*, Leiden: Brill, 1998.

马兰安:《中国民间文化与明代说唱》。

McLelland, Mark. "Is There a Japanese 'Gay Identity'?", *Culture, Health and Sexuality* II 4(2000), pp. 459 - 472.

麦克莱兰:《日本的“同性恋身份”存在吗?》。

McLelland, Mark J. *Male Homosexuality in Modern Japan: Cultural Myths and Social Realities*, Richmond: Curzon, 2000.

麦克莱兰:《现代日本男同性恋:文化神话和社会现实》。

McMahon, Keith. *Causality and Containment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 Leiden: E. J. Brill, 1988.

马克梦:《十七世纪中国小说中的因果与限制》。

McMahon, Keith. *Misers, Shrews and Polygamists: Sexuality and Male-female Relation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马克梦:《吝啬鬼、泼妇、一夫多妻者:十八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性与男女关系》。

McMahon, Keith. "The Classic 'Beauty-Scholar' Romance and the Superiority of the Talented Woman," in Angela Sito and Tani E. Barlow(eds), *Body, Subject & Power in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p. 227 - 252.

马克梦:《古代“才子佳人”小说与才女的优越性》,载司徒安、白露编:《中国的身体、主体和权利》。

McMullen, D. L. "The Cult of Ch'i T'ai-kung and T'ang Attitudes to the Military." *T'ang Studies* 7(1989): pp. 59 - 103.

麦大维:《齐太公崇拜及唐对武的态度》。

Metcalf, Andy and Martin Humphries, eds. *The Sexuality of Men*. London: Pluto Press, 1985.

梅特卡夫、汉弗莱斯编:《男人的性》。

苗润田:《浅论孔子的义利观及其现代意义》,《齐鲁学刊》1989年第1期,第55—59页。

Miller, David. *The Tao of Bruce Lee*. London: Vintage, 2000.

米勒:《李小龙之道》。

Milner, Anthony and Mary Quilty (eds). *Australia in Asia: Episodes*.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米尔纳、奎尔第编:《亚洲的澳大利亚:插曲》。

Minford, John and Joseph S. M. Lau(eds).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s Volume 1: From Antiquity to the Tang Dynas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闵福德、刘绍铭编:《含英咀华:远古时代至唐代(卷一)》。

Minh-ha, Trinh, T. *Woman, Native, Othe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曲明函:《女性、本土、他者》。

Mishima, Yukio. (trans. Kathryn Sparling), *The Way of the Samurai: Yukio Mishima on Hagakure in Modern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三岛由纪夫:《叶隐入门》。

Moir, Ann and Bill Moir. *Why Men Don't Iron: The Real Science of Gender Studies*.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8.

莫伊等:《为什么男人不熨烫:性别研究的真知》。

Moore, S. "Getting a bit of the other: the pimps of postmodernism." In Rowena Chapman and Jonathan Rutherford, eds. *Male Order: Unwrapping Masculinity*.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8, pp. 165 - 192.

穆尔:《拉来一点儿他者:后现代主义皮条客》,载查普曼、卢瑟福编:《男性秩序:拆解男性特质》。

Morris, Meaghan. "Learning from Bruce Lee: Pedagogy and Political Correctness in Martial Arts Cinema", in Matthew Tinkcom and Amy Villarejo(eds), *Keyframes: Popular Cinema and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001, pp. 171 - 186.

莫里斯:《向李小龙学习:武侠电影中的教育学和政治正确》,载提克坎曼、比利亚雷霍编:《关键帧:大众电影与文化研究》。

Muller, F. Max(ed). *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Vol. XXVIII; James Legge, trans. *The Texts of Confucianism part IV The Li Ki*, XI- XLV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85.

缪勒编:《东方圣书(第二十五卷):理雅各英译儒家经典第四部〈礼记〉三十五》。

Munro, Donald J. *The Concept of Man in Early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孟旦:《早期中国“人”的观念》,丁栋、张兴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Nathan, Andrew J. *China's Trans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黎安友:《蜕变的中国》。

Needham, Joseph.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2, 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中文版何兆武译:科学出版社,1990年。

Ng, Vivien W. "Homosexuality and the Sta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Martin Bauml Duberman, et al, eds. *Hidden From History: Reclaiming the Gay and Lesbian Past*.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91, pp. 76 - 89.

伍慧英:《末代中华帝国的同性恋与政府》,载杜伯曼等编:《隐藏的历史:复原男、女同性恋的过去》。

Nielsen, Ing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ells Out." *Tamkang Review* XXX 3(2000): pp. 89 - 109.

尼尔森:《现代中国文学售罄》。

Nienhauser, William H. Jr. ed. *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倪豪士编:《印第安那中国古典文学指南》。

宁夏人民出版社编:《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

Nonini, Donald M. "The Dialectics of 'Disputatiousness' and 'Rice-Eating Money': Class Confrontation and Gendered Imaginaries Among Chinese Men in West Malaysia", *American Ethnologist* XXVI 1(1999), pp. 47 - 68.

诺尼尼:《“争论”与“吃米的钱”之辩证法:西马来西亚华人男性的阶级冲突与性别想像》。

Oakley, Ann. *Sex, Gender and Society*. Aldershot: Gower/Temple Smith, 1972.

奥克雷:《性、性别和社会》。

Ommundsen, Wenche (ed.). *Bastard Moon: Essays on Chinese-Australian Writing, Special Issue of Otherland* 7, 2001.

奥门森编:《杂种月亮:澳大利亚华裔作品评论集》。

Orr, John. *Contemporary Cinema*.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8.

奥尔:《当代电影》。

Ostrovsky, Nikolai. *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 Part 1*,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2.

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一部。

Otomo, Ryoko. "The Way of Samurai': Ghost Dog, Mishima, and Modernity's Other", *Japanese Studies* 21. 1(2001), pp. 31 - 43.

大友凉子:《〈叶隐入门〉:鬼狗、三岛由纪夫和现代性的他者》。

欧阳文彬:《试论茹志鹃的艺术风格》,载孙露茜、王凤伯编:《茹志鹃研究专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1—122页。

Ouyang Yu. *Moon Over Melbourne: Poems*. Upper Ferntree Gully, Vic: Papyrus Publishing, 1997.

欧阳昱:《墨尔本上空的月亮和其他诗》。

Pan, Esther. "Why Asian Guys Are on a Roll." *Newsweek*, 21 Feb 2000.

潘以斯帖:《为什么亚洲男人来势汹汹》。

Parker, David. *Through Chinese Eyes: The Cultural Identities of Young Chinese People in Britain*. Aldershot: Avebury, 1995.

帕克:《通过中国人的眼睛:在英国的中国年轻一代的文化身份认同》。

Paz, Octavio. (Trans. Lysander Kemp). *The Labyrinth of Solitude*. New York: Grove, 1961.

帕斯:《寂寞迷宫》。

彭滨:《论王安忆艺术的风格的演变》,《社会科学家》1989年第6期,第74—78页。

Peng Hsiao-yen. "Sex Histories: Zhang Jingsheng's Sexual Revolution." *Tamkang Review* XXX 2(1999): pp. 71 - 98.

彭小妍:《〈性史〉:张竞生的性革命》。

Perry, John Curtis and Bardwell L. Smith, eds. *Essays on T'ang Society*. Leiden: E. J. Brill, 1976.

佩里、史密斯编:《唐代社会论文集》。

Plaks, Andrew. *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文版沈亨寿译,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

蒲松龄:《聊斋志异》,香港:商务印书馆,1963年。

Pulleyblank, Edwin, G. "The An Lu-Shan Rebell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ronic Militarism in Late T'ang China." In John Curtis Perry and Bardwell L. Smith, eds. *Essays on T'ang Society*. Leiden: E. J. Brill, 1976, pp. 32 - 60.

蒲立本:《安禄山之乱与晚唐藩镇割据的根源》,载佩里、史密斯编:《唐代社会论文集》。

钱虹:《优美失落之后》,《光明日报》1987年8月21日。

钱宁:《留学美国》,《新华文摘》1996年第10期,第85—97页。

丘振声:《三国演义纵横谈》,台北:晓园出版社,1991年。

Qu Yuan. "Li sao" (On Encountering Trouble). In David Hawkes, ed. and trans. *The Songs of the South*.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5.

屈原:《离骚》,载霍克思编译:《〈楚辞〉选集》。

Raven, Charlotte. "Crashing Bore, Wooden Drama." *The Guardian*, 16 January 2001.

雷文:《令人厌烦的呆板故事》。

Roberts, Moss (ed. and trans.). *Three Kingdoms: China's Epic Drama by Lo Kuan-chung*.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6.

罗慕士编译:《三国演义:中国的史诗剧》。

Rofel, Lisa. *Other Modernities: Gendered Yearnings in China After Soc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罗丽莎:《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

Rohmer, Sax. *The Insidious Dr. Fu-Manchu*. New York: Pyramid Books, 1961.

洛莫尔:《奸诈的傅满洲博士》。



Rolls, Eric. *Sojourners: The Epic Story of China's Centuries-Old Relationship with Australia*. St Lucia: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92.

罗斯:《旅居者:中澳几百年关系的史诗故事》。

Ross, Gordon Victor. "Guan Yu in Drama: Translations and Critical Discussions of Two Yuan Plays."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1976.

罗斯:《戏剧中的关羽:两部元杂剧的译本与批判性讨论》。

Rou Shi, "A Hired Wife" in Lu Xun and Others, *Masterpieces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9—1949*,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3, pp. 205 - 229.

柔石:《为奴隶的母亲》,载鲁迅等:《中国现代短篇杰作选》,北京:外文出版社,1983年,第205—229页。

茹志鹃:《百合花》,载《中国当代作品选编 1949—1986》卷一,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1989年,第165—182页。

Ru Zhijuan. "Ernü qing", translated as "Sons and Successors" by Ellen Klempner. In Lee Yee, ed. *The New Realism: Writings from China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Hippocrene Books, 1983, pp. 17 - 30.

茹志鹃:《儿女情》,克伦普纳译,李怡编:《中国新写实主义文学作品选》。

Ru Zhijuan. "How I Came to Write 'Lilies on a Comforter'." In Helen Siu, ed. *Furrows: Peasants,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97 - 303.

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在萧凤霞编:《犁沟:农民、知识分子和国家》。

Ru Zhijuan. "Lilies"(trans Gladys Yang), in *Lilies and Other Stories*. Beijing: Panda Books, 1985, pp. 7 - 19.

茹志鹃:《百合花》,英文版戴乃迭译,载《百合花和其他小说》,北京:熊猫丛书,1985年,第7—19页。

Ruhlmann, Robert. "Traditional Heroes in Chinese Popular Fiction." In Arthur Wright, ed. *The Confucian Persuas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141 - 176.

于如柏:《中国通俗小说中的传统英雄》,载芮沃寿编:《儒家信念》。

Rushton, J. Philippe. *Race, Evolution, and Behaviour: A Life History Perspective*,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7.

洛旭庭:《种族、演化及行为:生命历史的远景》。

Ryan, Jan. "'She Lives with a Chinaman': Orient-ing 'White' Women in the Court of Law" 18(1999) *Journal of Australian Studies*, pp. 149 - 159 & 216 - 218.

瑞安:《“她和个中国佬一起生活”:东方化法庭上的“白种”女人》。

- Said, Edward. *Orient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萨伊德:《东方主义》。
- Saikaku, Ihara, *The Great Mirror of Male Love* (Tran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aul Gordon Schalow),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井原西鹤:《男色大鉴》,沙洛译。
- Sandell, Jillian. "Reinventing Masculinity: the Spectacle of Male Intimacy in the Films of John Woo" *IL* 4(1996) *Film Quarterly* pp. 23 - 34.  
桑德尔:《重铸男性特质:吴宇森电影中的男性亲密场面》。
- Scheffauer, Herman. "The Chinese in England: A Growing National Problem." *The London Magazine*, June/July, 1911.  
史弗尔:《英国的中国人:一个日益严重的民族问题》。
- Schein, Louisa. *Minority Rules: the Miao and the Feminine in China's Cultural Politic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沙因:《弱势群体法则:中国文化政治中的苗族及女性》。
- Sedgwick, Eve Kosofsky. *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塞奇维克:《男人之间:英国文学及男性同性欲望》。
- Sellmann, James D. and Rowe, Sharon. "The Feminine in Confucius." *Asian Culture* XXVI 3(1998): pp. 1 - 8.  
希曼、罗:《儒家观念中的女性》。
- Sheehy, Gail. *Passages for Men: Discovering the New Map of Men's Lives*. London: Simon & Schuster, 1998.  
希伊:《男人通道:探索男性生活新地图》。
- Shen Congwen, "The Husband", in Lu Xun and Others, *Masterpieces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9—1949*,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3, pp. 398 - 417.  
沈从文:《丈夫》,载鲁迅等:《中国现代短篇杰作选》,北京:外文出版社,1983年,第398—417页。
- 史景平:《歌唱普通人的心灵美——谈茹志鹃的〈百合花〉》,载孙露茜、王凤伯编:《茹志鹃研究专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65—270页。
- Shi Nai'an, *All Men Are Brothers*, trans. Pearl S. Buck. 2 vols. London: Methuen, 1957.  
施耐庵:《水浒传》,赛珍珠译,2卷本。
- 施耐庵:《水浒传》2卷本,台北:联经出版社,1987年。
-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第1卷,沙博理译,北京:外文出版社,1980年。
- 石琪:《石琪影话集:十八般武艺》,香港:次文化堂有限公司,1999年。

- 舒济、舒乙编：《老舍小说全集》第2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
- 《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 Silverman, Kaja. *The Subject of Semio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塞佛曼：《符号学主体》。
- 司马迁：《刘敬叔孙通列传》，《史记：第8册第99卷》，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重印。
- 司马小萌编：《男子生活大全》，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
- Sinha, Mrinalini. *Colonial Masculinity: The “Manly Englishman” and the “Effeminate Bengali”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
- 辛哈：《殖民主义与男性特质：十九世纪晚期男子气的英国人与像女人的孟加拉人》。
- Siu, Helen (ed.). *Furrows: Peasants,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萧凤霞编：《犁沟：农民、知识分子和国家》。
- Sommer, Deborah. “The Unlearned Sage? The Early Iconography of Confucius and Its Textual Referents”. Unpublished paper.
- 司马黛兰：《天纵圣人？孔子早期形象及文本指涉》。
- Song Geng. “Wax Spear-head: The Construction of Masculinity in Yuan Drama.” *Tamkang Review* Vol. XXX 1(2000): pp. 209 - 254.
- 宋耕：《银样蜡枪头：元曲中男性特质的构建》。
- 宋希仁：《儒家传统义利观与青少年道德教育》，《江苏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第119—123页。
- 宋永毅：《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年。
- 宋仲福等：《儒学在现代中国》，郑州：郑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 Spence, Jonathan, D. *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 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皇帝》。
- Stacey, Judith. *Patriarchy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 斯黛西：《中国的父权制与社会主义革命》。
- Stecopoulos, Harry and Michael Uebel, eds. *Race and the Subject of Masculinit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斯特科普洛斯、乌贝尔编：《种族与男性特质主体》。
- Stoltenberg, John. *Refusing to Be a Man*. Portland: Breitenbush Books, 1989.
- 斯托尔坦伯格：《拒绝做男人》。

Su Dongpo. (Trans. Ch'u Ta-kao). "Tune: 'The Charms of Nian-nu'." In Cyril Birch, ed.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7, p. 361.

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初大告译,载白之编:《中国文学选》。

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香港:集贤社,1983年。

孙露茜、王凤伯编:《茹志鹃研究专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孙绍先:《女性主义文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

Symons, Donal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exu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西蒙斯:《人类性演进》。

Tam, Kwok-kan. "Sexuality and Power in Zhang Xianliang's Novel 'Half of Man Is Woma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5(1)(1989), pp. 55 - 72.

谭国根:《张贤亮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性与权力》。

谭良啸、张大可编:《三国人物评传》,台北:水牛,1992年。

汤铭:《美丽的花朵,纯朴的诗篇》,载孙露茜、王凤伯编《茹志鹃研究专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61—264页。

Tasker, Yvonne. "Dumb Movies for Dumb People: Masculinity, the body, and the voice in contemporary action cinema." In Steven Cohan and Ina Rae Hark, *Screening the Male: Exploring Masculinities in Hollywood Cinema*. London: Routledge, 1993, pp. 230 - 244.

塔斯克:《给无聊观众看的无聊电影:当代动作电影中的男性特质、身体和声音》,载科恩、哈克编:《放映男性:探索好莱坞电影中的男子气概》。

Tasker, Yvonne. "Fists of Fury: Discourses of Race and Masculinity in the Martial Arts Cinema." In Harry Stecopoulos and Michael Uebel, eds. *Race and the Subject of Masculinit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315 - 336.

塔斯克:《精武门:武侠电影中的种族话语与男性特质》,载斯特科普洛斯、乌贝尔编《种族与男性特质主体》。

Tasker, Yvonne. *Spectacular Bodies: Gender, Genre, and the Action Cinema*. London: Routledge, 1993.

塔斯克:《惊人的身体:性、类型和动作电影》。

Teo, Stephen. *Hong Kong Cinema: The Extra Dimensions*. London: The British Film Institute, 1997.

张建德:《香港电影:额外面向》。

Teo, Stephen. "Love and Swords: The Dialectics of Martial Arts Romance." *Senses of Cinema*, <http://www.sensesofcinema/00/11/crouching.html>.

张建德:《爱与剑:武侠浪漫的辩证法》。

*The Story of Hua Guan Suo* (trans. Gail Oman King). Phoenix: Centre for Asian Studies,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1989.

《花关索传》:金译。

Thompson, Laurence G. "Ta-t'ung Shu and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Some Comparisons." In Jung-pang Lo, ed. *K'ang Yu-wei: 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7.

汤普森:《〈大同书〉与〈共产党宣言〉之比较》,载罗荣邦编:《康有为:传记与论文集》。

Tinkcom, Matthew and Amy Villarejo(eds). *Keyframes: Popular Cinema and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001, pp.136 - 158.

提克坎曼、比利亚雷霍编:《关键帧:大众电影与文化研究》。

Tsao Hsueh-chin(Cao Xueq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trans. 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 2 vol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78.

曹雪芹:《红楼梦》两卷本,杨宪益、戴乃迭译,北京:外文出版社,1978年。

Tu Wei-ming (ed). *Confucian Traditions in East Asian Modernity: Moral Education and Economic Culture in Japan and the Four Mini-Drag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杜维明编:《东亚现代性中的儒家传统:日本和四小龙的道德教育与经济文化》。

Van Gulik, R. H. *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 Leiden: E. J. Brill, 1974.

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李零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中文版。

van Wees, Hans. "A Brief History of Tears: Gender Differentiation in Archaic Greece." In Lin Foxhall and John Salmon(ed. ), *When Men Were Men: Masculinity, Power and Identity in Classical Antiquity*. London: Routledge, 1998, pp. 10 - 53.

范维斯:《眼泪简史:古希腊性别差异》,载福克斯豪、萨蒙编:《当男人为男性:古典时期的男子气概、权力与身份》。

Vitielli, Giovanni. "Exemplary Sodomites: Chivalry and Love in Late Ming Culture",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 II 2 (2000), pp. 207 - 257.

魏嘱安:《模范鸡奸者:晚明文化中的爱和骑士精神》。

Vohra, Ranbir. *Lao She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沃哈:《老舍与中国革命》。

Wagner, Martha L. "Reviews: Half of Man Is Woma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5(1)(1989): pp.137 - 143.

瓦格纳:《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Wang Anyi. (Trans. Bonnie S. McDougall and Chen Maiping, ). *Brocade*

Valley.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92.

王安忆:《锦绣谷之恋》,杜博妮、陈迈平译。

王安忆:《荒山之恋》,香港:南粤出版社,1988年。

Wang, David D. W. "Lao She's Wartime Ficti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5 (12)(1989): pp. 197 - 218.

王德威:《老舍战争年代的小说》。

Wang, David Der-wei. "Feminist Consciousness in Modern Male Fiction", in Michael Duke(ed), *Modern Chinese Women Writers: Critical Appraisals*, Armonk: M. E. Sharpe, 1989, pp. 236 - 261.

王德威:《现代男作家小说中的女性主义意识》,载杜克编:《现代中国女性作家:批判性评价》。

Wang, David Der-wei. *Fictional Real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Mao Dun, Lao She, Shen Congw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王德威:《茅盾、老舍、沈从文:写实主义与现代中国小说》,中文版,台北:麦田,2009年。

王惠云、苏庆昌:《老舍评传》,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85年。

Wang Jing. *High Culture Fever: Politics, Aesthetics, and Ideology in Deng's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王瑾:《高雅文化热:邓小平时代中国的政治、美学和意识形态》。

王锐生:《儒家思想与东亚的现代化》,《中国哲学史》1996年第4期,第7—11、31页。

王实甫:《西厢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重印。

Wang Shifu, *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Chamber* (trans. S. I. Hsiu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王实甫:《西厢记》,熊式一译。

王树村编:《关公百图》,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

Wang Shunzhu. "The Double-Voiced Feminine Discourses in Ding Ling's 'Miss Sophie's Diary' and Zora Neale Hurston's *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 *Tamkang Review* XXVIII 1(1997): pp. 131 - 158.

王顺珠:《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和赫斯顿〈凝望上帝〉中的双声女性话语》。

王永:《关心男人》,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

王泽君、龙涛编:《前言》,载《中国言情小说大观》,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年。

Wei Hui. *Shanghai Baby* (trans. Bruce Humes). London: Constable Publishers, 2001.

卫慧:《上海宝贝》,徐穆实译。

White, Tyrene. (ed.), *China Briefing 1997—1999*, Armonk: M. E. Sharpe,

2000.

怀特编:《中国简报 1997—1999》。

Widmer, Ellen & David Der-wei Wang, eds. *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 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魏爱莲、王德威编:《从五四到六四:二十世纪中国的小说与电影》。

Williams, Patrick and Laura Chrisman (ed),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3.

威廉姆斯、克里斯曼编:《殖民话语和后殖民理论读本》。

Williams, Phillip F. "'Remolding' and the Chinese Labor Camp Novel." *Asia Major* 4(2)(1991): pp. 133 - 149.

威廉姆斯:《“改造”和中国劳改农场小说》。

Williams, Tony. "Space, Place, and Spectacle: The Crisis Cinema of John Woo." In Poshek Fu and David Desser, ed. *The Cinema of Hong Kong: History, Arts, Ident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37 - 157.

威廉姆斯:《空间、地点与场面:吴宇森的危机电影》,载傅葆石、德瑟编:《香港电影:历史、艺术、身份》。

Witterstaetter, Renée. *Dying for Action: The Life and Films of Jackie Chan*. London: Ebury Press, 1998.

维特斯泰特:《为动作而死:成龙的电影与人生》。

Wolf, Margery. *Revolution Postponed: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卢蕙馨:《推迟了的革命:当代中国女性》。

Wright, Arthur, ed. *The Confucian Persuas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芮沃寿编:《儒家信念》。

Wright, Mary C.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芮玛丽:《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一战:同治中兴,1862—1874》。

Wu Ching-tzu (Wu Jingzi). *The Scholars* (trans. by Gladys Yang and Yang Hsien-yi).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7.

吴敬梓:《儒林外史》,戴乃迭、杨宪益译,北京:外文出版社,1957年重印。

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Wu, Fatima. "Foxes in Chinese Supernatural Tales (Part I)." *Tamkang Review* XVII 2 1986: pp. 121 - 153.

吴法蒂玛(译音):《中国灵异小说中的狐狸精(上)》。

吴剑平:《好莱坞与丑陋的中国人》,载李希光、刘康:《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22—261页。

吴敬梓:《儒林外史》,香港:中华书局,1972年重印。

武立:《娶个外国女人做太太》,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吴亮:《爱的结局与出路》,《上海文学》1987年第4期,第88—91、96页。

Wu, Yenna. "The Interweaving of Sex and Politics in Zhang Xianliang's Half of Man Is Woman."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XXVII 1/2 (1992): pp. 1 - 27.

吴燕娜:《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性与政治的交织》。

Wu, Yenna. "Women as Sources of Redemption in Chang Hsien-liang's Labor-Camp Fiction." *Asia Major* 4(2)(1991): pp. 115 - 131.

吴燕娜:《张贤亮劳改农场小说中的女性救赎者》。

小明雄:《中国同性恋史录》,香港:粉红三角出版社,1997(增订版)。

谢鹏雄:《文学中的男人》,台北:九歌出版社,1992年。

辛兰:《孔子在体育方面的实践和主张》,《新体育》1962年第8期,第13—16页。

Xu, Ben. *Disenchanted Democracy: Chinese Cultural Criticism After 1989*.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9.

徐贲:《不再令人着迷的民主:1989年以后的中国文化批评》。

许梦瀛:《孔夫子的教育思想》,《光明日报》1954年6月14日。

许启贤:《论儒家伦理与道德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第48—54页。

许全兴:《孔子与毛泽东:古今伟大“教员”》,《孔子研究》1993年第4期,第3—9页。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Yang Lan. *Chinese Fic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3 - 120.

杨岚:《文革小说》。

Yang, Mayfair Mei-hui. (ed.), *Spaces of Their Own: Women's Public Sphere in Transnational Chin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9.

杨美惠编:《她们自己的空间:跨越中国的女性公共领域》。

叶瑞昕:《孔子的义利观》,《山西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第33—37页。

叶蔚林:《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作家出版社,1986年。

殷国光、叶君远编:《前言》,载《明清言情小说大观(上)》,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年。

Yoon, Suh-kyung. "The Crying Gam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CLXIV 14(2001), pp. 64 - 66.



尹瑞京:《哭泣游戏》。

Young, Marilyn. "Chicken Little in China: Some Reflections on Women." In Arif Dirlik and Maurice Meisner, eds. *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9, pp. 253 - 268.

杨:《四眼天鸡在中国:关于女性之管见》,载德里克、马思乐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验》。

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北京:熊猫丛书,1984年。

郁达夫:《沉沦》,载《郁达夫文集》卷1,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第16—53页。

喻学才:《儒家思想与中国旅游文化传统》,《孔子研究》1990年第2期,第29—33页。

余仲华:《武打片要“武戏文唱”》,《电影艺术》1996年第2期,第65—66页。

Yuan Mei. (Trans. Kam Louie and Louise Edwards). "Double Blossom Temple." In *Censored by Confucius: Ghost Stories by Yuan Mei*. Armonk: M. E. Sharpe, 1996.

袁枚:《双花寺》,载雷金庆、李木兰编译:《袁枚〈子不语〉》。

Yue, Gang. *The Mouth That Begs: Hunger, Cannib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Eating in Modern Ch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乐刚:《乞讨之口:饥饿、食人主义与现代中国的饮食政治》。

Yue Ming-Bao. "Gendering the 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In Tongling Lu, ed.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pp. 47 - 65.

余明宝:《性别化现代中国小说的起源》,载吕彤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社会中的性别与性》。

臧宏:《略论儒家的义利观》,《学习月刊》1986年第4期,第16—21页。

张洁:《方舟》,载中国文学出版社编:《爱是不能忘记的》,哈里特译,北京:熊猫丛书,1987年,第125—222页。

张抗抗:《北极光》,《收获》1980年第3期,第4—61页。

章培恒、黄霖:《宋江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章文泓、纪德君:《才子形象模式的文化心理阐释》,《中山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第110—118页。

Zhang Xianliang. (Trans. Martha Avery). *Getting Used to Dying*.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1.

张贤亮:《习惯死亡》,英文版艾梅霞译。

张贤亮:《灵与肉》,原载1980年《收获》,重印《张贤亮选集》卷1,第138—165页。

张贤亮:《绿化树》,重印《张贤亮选集》卷3,第161—338页。

Zhang Xianliang. (Trans. Gladys Yang). "Mimosa." In *Mimosa*.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1985, pp. 7-181.

张贤亮:《绿化树》,英文版戴乃迭译,载《绿化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7—181页。

张贤亮:《男人的风格》台湾版,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

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收获》1985年第5期,第4—108页。

张贤亮:《张贤亮选集》卷3,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

张永泉:《在黑暗中寻求光明的女性——莎菲形象的再评价》,载《丁玲作品评论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第143—163页。

赵纪彬:《论语新探》,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

赵靖:《孔子的管理思想和现代经营管理》,《孔子研究》1989年第1期,第26—37页。

赵为民编:《盖茨、保尔的旧船票还能否登上比尔的客船》,《中国青年》2000年第8期,第14—15页。

赵遐秋、曾庆瑞:《中国现代小说史》下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

郑大群:《女性禁忌与后新时期女性写作》,《文艺评论》2000年第2期,第33—40页。

郑万隆:《峡谷》,载郑万隆:《有人敲门》,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59—72页。

郑万隆:《有人敲门》,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

Zhong Xueping. "Male Suffering and Male Desire: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Half of Man Is Woman." In Christina K. Gilmartin, Gail Hershatter, Lisa Rofel, Tyrene White, eds.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75-191.

钟雪萍:《男性的痛苦与欲望:〈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之阅读政治》,载柯临清、贺萧、罗丽莎、怀特等编:《女人、文化、中国》。

Zhong Xueping. *Masculinity Besieged? Issues of Modern and Male Subjectivity in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钟雪萍:《被围困的男性特质:二十世纪后期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性与男性主体性问题》。

Zhong, Yong. "What's Behind White Masks and Yellow Skin: A Postcolonial Critique of a Chinese Sex Debate in Sydney", in Wenche Ommundsen(ed.), *Bastard Moon: Essays on Chinese-Australian Writing, Special Issue of Otherland* 7(2001), pp. 56-72.

钟勇:《白色面具和黄皮肤之下:对悉尼一场关于华裔的性的辩论的后殖民批

评》，载奥门森编：《杂种月亮：澳大利亚华裔作品评论集》。

《中国当代作品选编 1949—1986》：上卷，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1989年。

周光廓：《水浒怎样描写武松打虎》，载《水浒研究论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180—188页。

周惟波：《章永璘是个伪君子》，载《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6页。

周兆新：《三国演义考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周中明：《中国的小说艺术》，重印台北：贯雅文化，1990年。

Zhu Hong, ed. *The Chinese Western*. New York: Ballantine, 1988.

朱红编：《西部中国》。

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广州：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

朱正明：《中国关帝文化寻踪》，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

Zito, Angela. *Of Body & Brush: Grand Sacrifices as Text/Performanc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司徒安：《身体与笔墨：作为文本和仪式表演的十八世纪祭天大典》。

Zito, Angela and Tani E. Barlow, eds. *Body, Subject & Power in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司徒安、白露编：《中国的身体、主体和权利》。

Zong Pu (trans. Geremie Barmé). "Red Beans." In W. J. F. Jenner, ed. *Fragrant Weeds—Chinese Short Stories Once Labelled as "Poisonous Weeds"*.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1983, pp. 195 - 228.

宗璞：《红豆》，白杰明译，载詹纳尔编：《香草——曾被当作“毒草”的中国短篇小说》。

作家出版社编：《水浒研究论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

